

文革回憶錄叢書

青春

從

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青春

從

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 / 李正權 著 - 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4.6

ISBN 978-988-16350-3-7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文革 - 回憶 - 重慶

文革回憶錄叢書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 · 發行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網 址: <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 info@cccpress.com

sales@cccpress.com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字 數: 332 千字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12

定價: HK\$ 75 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對文革武鬥的回憶和反思，以較為廣闊的視野，在親見親聞的基礎上，通過當年調查和採訪得來的材料，比較全面地記敘了重慶文革從文鬥到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武鬥到後來炮火連天的“全面內戰”的發展演變，記敘了武鬥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別是專業武鬥隊中那些青年學生、青年工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以及從搶槍到交槍、從戰場廝殺到戰後殺俘、從勝利進攻到敗退逃難武鬥全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情節，許多正史不會記載的真實生動的細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重慶文革武鬥的小百科。

目 錄

內容簡介.....	1
序：刻骨銘心的回憶與反思.....	3
引子：“七二五”槍聲	1
1. 被封閉的歷史	3
2. 抹不掉的陰影	10
3. 從批鬥老師開始	15
4. 批鬥型武鬥的特點	23
5. 由辯論引起的武鬥	30
6. 從抓流氓到造反	36
7. 一不小心成了砸派	44
8. 武鬥全面開花	49
9. 拼鋼鉗	55
10. 我的第一場武鬥.....	61
11. 武鬥升級為戰爭.....	66
12. 撤上南山.....	71
13. 黃山炮兵排.....	77
14. “我愛黃山是戰場”.....	83
15. 槍炮打爛重慶城.....	89
16. 建設廠爭奪戰.....	94
17. “八八”海戰	101
18. 火燒交電大樓.....	109
19. 去建設廠“提”槍.....	114

20. “八一八”戰役	122
21. 最黑暗的一幕	129
22. 南岸的戰鬥（上）	136
23. 南岸的戰鬥（下）	142
24. 反到底派大舉進攻	147
25. 對家人深深愧疚	151
26. 槍不是好玩的	157
27. 停火之後	163
28. 體育館的苦難日子	170
29. 小報和宣傳隊	178
30. 反到底“逃難”	183
31. 專縣的戰爭	190
32. 搶槍	195
33. 我的“逃難”生涯（上）	202
34. “紅旗三〇三”	209
35. 戰火硝烟又起	216
36. 我的“逃難”生涯（中）	222
37. 我的“逃難”生涯（下）	228
38. 都是瘋子嗎？	236
39. 英雄的悲劇	243
40. 武鬥中的男女	249
41. 重慶崽兒	256
42. 人是怎樣變壞的？	263
43. 滿懷深深的懺悔	268
44. 贖罪的日子	273
45. 終於翻過山坳	281
46. 還在疼痛的傷疤	288
47. 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	295
48. 歷史是不能封閉的	302
附錄 A: 運槍記	311

目 錄

附錄 B : 花落花開	314
附錄 C : 願他在地下安息	322
附錄 D : 被押下車的情人	341
附錄 E : 一個强奸犯的故事	348
附錄 F : 一件勞保服	353
附錄 G : 一個亡命徒的故事	357
附錄 H : 謝華俊傳奇	362
 後 記	365

引子：“七二五”槍聲

1967年入伏較往年偏早，7月25日就已經進入二伏。那天，太陽很早就升了起來，火辣辣地灼烤著山城重慶，讓這個以“火爐”聞名的城市更加熱氣逼人。

一大早，我就匆匆趕到大田壩體育場。

按照預定的計劃，這天上午，重慶的反到底派要在大田壩體育場召開聲援武漢造反派的大會。7月20日，武漢爆發了“七二〇”事件，受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以及湖北省軍區獨立師的官兵們發動全市公開抗議示威，一批軍人衝擊東湖賓館，圍攻中央代表團成員謝富治和王力，甚至威脅到正在武漢坐鎮的毛澤東的安全，被毛澤東、黨中央堅決鎮壓下去。各地造反派紛紛舉行諸如集會游行、武裝示威之類活動，聲討“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禍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聲援武漢造反派。

文革開始後，重慶城三天兩頭都要開這樣的大會，一般安排在9點鐘開始。因為天氣熱，這一天的大會提前到8點鐘。雖然時間提前，開會的人還是像潮水一樣涌到大田壩。

我一趕到會場，就聽到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紅岩兵團的消息。

工業校地處化龍橋，卡在沙坪壩到市中區的交通要道上，早就被八一五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7月25日凌晨，八一五派從各個單位調集了兩三千名武鬥人員，從前後兩個方向包圍了工業校，用步槍、衝鋒槍和機槍向紅岩兵團進攻，決心攻下這個化龍橋地區反到派的重要據點。

那時，重慶的大規模武鬥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但這樣公然動用槍支的武鬥還是第一次，標誌著重慶的大規模武鬥已經升級，已經成為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

槍聲淒厲，劃破夜空，驚醒了化龍橋四周以及嘉陵江對岸從貓兒石到大石壩那些沉睡的居民。我有一個親戚住在化龍橋嘉陵江對岸的貓兒石。後來他告訴我，那天的槍聲把他們從夢中驚醒，翻身起來，從窗外往對岸看，只見那夜空中劃過一道道火光，讓人驚恐不已。

“七二五”的槍聲，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掀開了重慶文革戰爭的序幕。

大田壩離化龍橋不遠，直線距離不到五公里，清晨的槍聲肯定能傳過來，讓住在體育館的反到底派的頭頭們聽見。得知工業校被包圍的消息，反到底派的頭頭們臨時開會商量。有人提出取消大會，但開會的隊伍已經陸陸續續來到。于是臨時決定，大會改在體育館前的廣場上舉行。體育場出口小，萬一八一五派打來，幾個門一堵，就麻煩了。

十萬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大會總算按時召開，突圍出來的工業校紅岩兵團頭頭在大會上控訴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的罪行，激起了與會人員更大的仇恨。那槍聲不僅沒有嚇倒開會的人，反而激起全場數萬人更大的戰鬥熱情。大會草草結束，與會的反到底派立即行動，投入到緊張的擴軍備戰之中。

那天，我就在那廣場上的人群中，與那數萬反到底戰友一樣，熱血沸騰，鬥志昂揚，似乎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就要來臨，似乎人生就要進入一個輝煌燦爛的頁面，激動而又慶幸，緊張而又興奮。

會後，我匆匆趕回朝天門，回家拿了一套換洗衣服就跑了，“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空前絕後、荒唐透頂的文革戰爭。一晃就是近半個世紀。

如今，聽到看到一些人仍然在鼓吹文革，美化文革，讓經歷過那場浩劫的我匪夷所思。作為那場浩劫、那場戰爭的親歷者，我願意將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以及多年後的反思寫出來，奉獻給讀者，留給歷史，也算是對那些鼓吹文革、美化文革的人一個回應。

序：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

何 蜀

大約十多年前，在重慶市南岸區文聯辦的一份內部刊物《南山風》上讀到一篇連載多期的紀實文學《重慶武鬥瑣記》，作者署名李衡之，內容相當扎實，文筆生動，并蘊含有較深刻的反思，非親歷且有認真觀察與思考者不可能寫出。我向主持該刊編輯工作的楊金邦打聽，才知道作者真名李正權，是文革中反到底派的中學生紅衛兵，是當年武鬥的參與者。我于是與李正權聯繫上，從此成為朋友，有了對文革特別是武鬥歷史進行回顧、探討的多年交流。

進入新世紀後，我曾經打算編一本有關重慶大武鬥的資料書，想把李正權的《重慶武鬥瑣記》中一些內容節選編入，但考慮到擬編入書中的其他各篇都是親歷者的回憶或日記等資料，而這一篇却是以第三人稱寫的“紀實文學”，不大好混在一起，就建議他用第一人稱改寫成回憶錄。他當時還在一個政府機關上班，不願讓單位上的人知道他寫有這樣的“敏感題材”作品，更不願讓單位上的人知道他曾經參加過文革中的武鬥（這也是他在《南山風》上發表時用了“李衡之”化名的原因），所以就暫時擱下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後，他才着手改寫，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李正權的這部回憶錄，讓我看重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其內容的真實生動，二是其深刻的反思。

在當年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數億人中，參加武鬥的人只是極少數；而在參加過武鬥的人當中，能够清晰地如實回憶那些經歷的人又是極少數；在那些願意回憶武鬥經歷的人當中，能够自己動筆寫出來的也只有極少數；在這能够寫出回憶的極少數人中，

能够寫得細緻生動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來看，李正權的這部回憶錄就十分難能可貴了。

我接觸瞭解過一些文革造反運動的親歷者，發現在這些人當中，能够對文革特別是對自己參加過的造反運動進行反思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文革前就因所謂“家庭出身問題”而受到壓抑的人，他們因自身及家庭的遭遇而對毛澤東締造并力圖通過文革來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弊端有直接的切膚之痛，對於他們來說，反思那段歷史幾乎就是出于本能；另一類能够反思者，是那些雖然“家庭出身好”（所謂“根紅苗正”），但在文革之後能够始終堅持繼續學習，不斷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使自己思想認識不斷提高的人。李正權就屬於後者。

李正權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工人，“紅五類”中的頭一類。他的學歷也不高，文革爆發時只是個初中生。但他並沒有像有些自認為是“領導階級”的人那樣以“大老粗”為榮，因從小對學習的熱愛，特別是對文學寫作的愛好（文革武鬥期間他都在學着賦詩填詞），養成了不停頓地自學的習慣。即使後來下農村當知青，進工廠當工人，他都從未間斷過在逆境中自學。而且，全憑自學，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績，發表了不少小說、散文及許多文史隨筆，而且還在質量管理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出版了十餘本專著（含與人合作），成為國內知名的質量心理學專家。他寫的好幾篇短篇小說（見本書附錄），都是以文革武鬥為背景的，可見他對這段歷史的長期關注。

李正權這部回憶錄，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感受，他還以較為廣闊的視野，在親見親聞的基礎上加以調查採訪所得，比較全面地記敘了重慶文革從文鬥到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武鬥到後來炮火連天的“全面內戰”的發展演變，記敘了他所瞭解的武鬥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別是他曾經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那些專業武鬥隊中正當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以及從搶槍到交槍、從戰場廝殺到戰後殺俘、從勝利進攻到敗退逃難的武鬥全過程中許多重要情節，許多在正史中不會記載的真實生動的細節。這些都是他在親身經歷中經過長期的觀

察與思考積累起來的，可以讓人更加真實地把握那個年代的脉搏。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重慶文革武鬥的小百科。

我們這一代人（我比李正權大兩歲），從小是在革命與戰爭的教育中成長的，我們當時能够讀到、看到的文藝作品，只有諸如《青春之歌》、《戰鬥的青春》、《戰火中的青春》之類。這樣的文藝作品讓我們受到一種把革命、戰爭與青春聯繫在一起的浪漫思想的熏陶，以致讓許多人從小就嚮往、憧憬著獻身革命、投身戰爭，甚至以未能趕上戰爭年代而深感遺憾，很少會想到戰爭的殘酷，更不會想到戰爭對個體生命、對人性的摧殘，更不要說文革中的“全面內戰”這樣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戰爭了。李正權這部回憶錄，通過他自己以及他那些“戰友”的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的刻骨銘心的體會，對文革進行了較深入的反思。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以從中瞭解到許多教科書和文藝作品裏不會寫到的東西，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和啓示。

2014年2月9日于重慶風江閣

1. 被封閉的歷史

那年，我 17 歲，正青春年少，本應是人生最美好的年代。但是，作為兩派中的一名普通“戰士”，我和我的“戰友”們一起，喊著“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的口號，全程參加了那場荒唐透頂的戰爭，手持鋼槍打內戰，槍林彈雨忘生死，讓青春從那“史無前例”的文革戰火中走過。

那場戰爭讓我經歷了好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危險，雖然只讓我在手上留下了幾條不太明顯的傷痕，却在我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的創傷和沉沉的陰影，讓我經常惡夢纏身、夢醒惶惶，直到如今。

但是，那却是一段被封閉的歷史。

人們把那段歷史稱為是武鬥。

明明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却被稱為武鬥，武鬥似乎比戰爭好聽一些。

說起那場戰爭的起因，真是一個黑色幽默。1967 年 1 月，重慶的造反派響應毛澤東、黨中央的號召，投入“偉大的一月革命”，一舉奪了市委的權力，成立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但是，由於奪權過程中在溝通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或者是個別人在權力面前花了心，一部分造反組織就不承認這個“革聯會”，接著就宣布要“砸爛革聯會”。而在奪權中獲得實際利益的那些人，就要堅決“保衛革聯會”。於是，前者被稱為砸派，後者被稱為保派。

砸派名字不好聽，後來，由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副組長劉結挺提議，將砸派改稱為反到底派。保派名字也不好聽，為了顯示自己是正宗的造反派，保

派就自稱爲八一五派。

1966年8月15日，重慶大學（簡稱重大）與附近中學的4000多名學生前往重慶師專，聲援反工作組的同學，被稱爲“八一五”事件。因爲“八一五派事件”具有造反的性質，後來重慶的造反派就被統稱爲八一五派。造反派分裂後，保“革聯會”的一派沿襲了八一五派的名稱，以表示他們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砸“革聯會”的一派後來自稱反到底，實際上是暗示保“革聯會”的一派已經投降了。

不過，雙方稱呼對方，依然只叫砸派或保派，甚至稱爲“砸匪”或“麻匪”——因有一個“保”字，與運動初期的“老保”保皇派相似，而那些老保曾被人們稱爲“麻子兵”（據說是因市委曾給他們提供過夜餐充饑的麻餅而得名），因此凡被認爲“保”者都被稱爲“麻”。一般老百姓，包括那些沒有介入或介入不深的所謂逍遙派，往往也用砸派或保派來稱呼兩派。直到如今，那些年齡在60歲以上的老重慶人，說起當年的武鬥，也依然稱兩派爲砸派或保派。但是，砸派和保派畢竟不是正式的稱呼，而且也的確不好聽，因此本書一律稱爲反到底派或八一五派。

後來，“革聯會”被“市革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市革委”（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所取代，但兩派的爭鬥却更加激烈，從小打小鬧到全面武鬥，從全面武鬥到全面戰爭，打了將近兩年。雖然後來不再公開打了，兩派的組織也被解散，兩派的諸多頭頭被抓進監獄，沒有抓進監獄的也大多握手言歡，甚至結爲同盟，但具體到某個單位，兩派之間或明或暗的爭鬥，却藉助諸如“清隊”、“一打三反”、“批清”、“批林批孔”、“全面整頓”、“批鄧反右”、“揭、批、查”和“清理三種人”以及那十來年期間的歷次整黨等一系列運動，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直到現在，當年那些參與兩派爭鬥的頭面人物，特別是那些幫派頭頭，雖然大多都已年逾古稀，依然還在專政機關的秘密監視之下。

重慶大武鬥是從1967年5月開始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7年5月到7月下旬，兩派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棍棒、磚頭、石塊和鋼釘、長矛。鋼釘、長矛雖然也可以算是

兵器（冷兵器），但與如今人們觀念中的戰爭可能還有一定相距，還不好說那就是戰爭。在這個階段裏，兩派基本上打了個平手。

第二階段從 1967 年 7 月下旬到 1967 年 9 月上旬，步槍、機槍、大炮、坦克、軍艦都用上了，那肯定是戰爭形態了。因為反到底派占據了生產槍支的建設機床廠（簡稱建設廠）和生產高炮的望江機器廠（簡稱望江廠），在這個階段裏佔了“起手”（先手），贏得多輸得少。

第三階段從 1967 年 9 月上旬到 1968 年 8 月底，可稱為戰爭的持續階段。為爭奪地盤，戰爭時斷時續，邊打邊談，邊談邊打，大炮、坦克、軍艦沒有了，步槍、機槍只能暗暗使用或小規模使用（有時也公開地大規模地使用），再輔以棍棒、磚頭、石塊和鋼釘、長矛之類。因為八一五派得到駐軍五十四軍的大力支持，幾乎每一次戰鬥都是反到底派吃虧，八一五派總體上處於攻勢，贏得多輸得少。最後，在中央的強制壓力下，兩派都只好交槍，戰爭才終於完全停止下來。

附記：

說五十四軍支一派打一派，是有依據的。1985 年 3 月，時任五十四軍軍長的李九龍帶領走訪組專程回到重慶，看望受迫害受衝擊的老同志。在講話中，他承認五十四軍在重慶支左實際上就是支派，助長了派性，加劇了兩派的對立情緒。重慶文革戰爭期間，李九龍先是任團長，後任副師長，並曾任過九龍坡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對支持八一五派的情況有充分的瞭解。因此，他代表五十四軍黨委的談話還是實事求是的。

由於持續時間長，參加的人多，涉及的地方廣，影響又深遠，因此，在重慶人心目中，在重慶人嘴巴裏，武鬥與文革基本上成了同義詞。一說文革，就是說的武鬥；而一說武鬥，往往就是在說文革。

關於戰爭，“維基百科”的定義是：“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

織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爲。”“百度百科”的定義是：“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織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爲，是敵對雙方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進行的武裝戰鬥。”《辭海》的定義是：戰爭是“爲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武裝鬥爭”。

綜合起來說，戰爭一是有“政治目的”，二是“使用暴力”，三是“集體和有組織”。

按照這三條，重慶這場大武鬥的確就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武鬥中的兩派，雖然說著相同的語言，喊著相同的口號，却有各自的“政治目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政治目的”這一條肯定占了。

再說“使用暴力”，也就是所謂的“武裝鬥爭”。在人們的理解中，“使用暴力”或“武裝鬥爭”的核心就是是否動用了武器（兵器）。如果說棍棒、磚頭、石塊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武器的話，那麼鋼鉗、長矛就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武器了，更不要說步槍、機槍、大炮、坦克、軍艦之類了。

最後是“集體和有組織”這一條。1967年4月20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簡稱重慶師專，現重慶師範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就成立了“誓死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簡稱“捍紅指揮部”），成為名副其實的武鬥指揮部。接著，兩派紛紛成立自己的專業武鬥隊、敢死隊。到當年6月底，兩派都成立了能够統轄全市武鬥力量的指揮部，都有了自己的武鬥總司令。到當年8月份，兩派更是成立了諸如衛戍司令部、警備司令部之類直接指揮戰爭的機構。因此，把重慶大武鬥改稱爲是重慶文革戰爭，可謂名正言順！

那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兩派勢均力敵，陣地犬牙交錯。軍艦、坦克、大炮、機槍無所不用其極。連剛研製出來、尚未裝備部隊的像“三無”（無光、無聲、無烟）衝鋒槍之類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来，在戰場上大顯神威。戰役一個接一個，規模一個比一個大。那戰鬥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嶺；那戰鬥中的英雄，像董存瑞，

像黃繼光。其激烈程度，與後來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戰爭相比，也毫不遜色。如果從參戰人員的英勇程度或者說亡命程度來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參加過抗美援朝、參加過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一些老兵也暗暗嘆服。一個目睹了建設廠“八五”爭奪戰的解放軍連長，對我的一個同學說：“老子在中印邊界和印度兵打仗，也沒有你們打得這樣凶！”經歷過重慶這場戰爭的人，後來都喜歡看戰爭影片。但是，在電視上、電影裏看到諸如柬埔寨內戰、波黑內戰、也門內戰、盧旺達內戰、利比亞內戰、敘利亞內戰之類的戰爭鏡頭，都忍不住搖頭罵上兩句：“那也像戰爭嗎？人都沒看到就亂放槍，打起好要喲？”

那又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從 1967 年 7 月 25 日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正式拉開戰爭序幕，經過短短幾天的擴軍備戰，重慶這座好端端的大工業城市，到處燃起了戰火，擺開了戰場，陷入了全面內戰之中。楊家坪、九龍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觀音橋、大石壩、黃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槍聲不斷，炮聲轟鳴，你攻我守，我爭你奪，今天你殺過來，明天我殺過去，打敗了的尸橫遍野，打贏了的傷亡慘重，直打到 1967 年 9 月 3 日雙方簽訂停火協議，整整打了 40 天！這 40 天裏，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不知進行了多少次，不知打死打傷了多少人，燒毀炸毀了多少房屋！戰爭停火後，滿城傷痕，處處槍眼炮眼，解放碑附近的交電大樓、嘉陵江橋頭山坡上的二輕局大樓、渝州路上的河運校大樓、謝家壩的彎彎大樓以及楊家坪那昔日繁華的商業區，都成了一片廢墟！大坪到楊家坪的公路當時是柏油路，那坦克履帶的痕迹半年後都沒有消失。即使如今已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在某些還沒來得及開發的角落，說不定都還能找到那場戰爭留下的痕迹。後來雖然停火，但戰爭並沒有結束，斷斷續續再打，規模雖然小一些，却打到 1968 年 9 月，又打了一年多！論規模之大、參加人員之多、戰線之長、持續時間之久、動用的武器之先進，在重慶三千多年歷史中，還真找不到哪一場戰爭能够與這場文革戰爭相“媲美”的！真是“史無前例”！

那却是一場荒唐的戰爭。“為保衛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

蛋！”“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戰爭的雙方幾乎有著共同的信仰，喊著基本相同的口號，唱著同一首歌，甚至穿著同樣的衣服，戴著幾乎完全相同的袖章，戰爭的結果却是沒有勝利者。參加過那場戰爭的人，後來或者被批鬥，或者被下放，甚至被自己保衛的人送進了監獄，幾乎沒有幾個人逃脫了現實的或歷史的懲罰。或者，他們正是通過各自不同的形式，為自己的狂熱贖罪。

如今。那一代人都已進入老年，哪怕當年是一派組織中的“鐵杆”、“鋼杆”、“合金鋼杆”，哪怕當年表現得十分英勇，哪怕至今身上還留著累累傷痕，也沒有誰為此而感到一點點榮耀，感到一點點自豪。那一代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後來都下鄉當了知青，當過知青的人可以“青春無悔”，搞過武鬥的人却沒有誰敢說自己“青春無悔”。相反，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人人都否認自己曾經參與過那場戰爭，都要撇清自己與那場戰爭的關係，都要將那一頁歷史死死地封閉。實在否認不了的，也都要搖頭嘆氣，都要表示後悔，都要罵自己當初太單純、太幼稚、太傻了。

那好像是一場惡夢，似乎已經從現實中抹去。在報刊雜誌上你看不到那場戰爭，在人們茶餘飯後你聽不到那場戰爭，甚至在歷史書籍中你也找不到那場戰爭。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有人寫過有關這場戰爭的小說，重慶的《紅岩》雜誌就發過好幾篇。我也寫過一篇《願他在地下安息》，發表在1980年第1期《紅岩》雜誌上。當時，還上映過一部叫《楓》的電影，描寫一對正在熱戀的青年學生因為觀點對立，在武鬥中刀槍相對而造成的悲劇。劇本作者鄭義雖然是山西人，却在四川投入過這場戰爭。他本人也說，這部電影寫的就是四川的武鬥。可是後來，同樣題材的小說就再也不能發表，甚至研究文革、研究武鬥的論文也只有沉睡在學者們的抽屜裏了。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重慶市志》以及重慶市各區區志，按理說應當是“有聞必錄”的，但除了大事記中留下若干雪泥鴻爪外，也很難找到這場戰爭的踪影。有一年，《重慶晚報》用一個版的篇幅，刊載了對1967年8月8日“紅港海戰”（文革中曾將朝天門更名為紅港，所以稱為“紅港海戰”；

因那場海戰發生在 8 月 8 日，又稱為“八八海戰”的“舊聞”，就被勒令檢討，策劃該“舊聞”的編輯還被扣了獎金，以示懲罰。而重慶另外一家內部小報遭遇更慘，由於刊載了一篇報道，揭露了由這場戰爭引起的一個大冤案的來龍去脉，引起有關方面的震怒，被勒令停刊幾個月。後來還是那小報所在單位的主要領導親自出面認錯檢討，那內部刊號才沒有被吊銷。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現在。作為一段被封閉的歷史，眨眼間便過去了近半個世紀。

沒有真相，只有歪曲；沒有真實，只有虛假；沒有研究，只有臆想。沒有真相，沒有真實，沒有研究，也就更沒有反思。到如今，雖然包括這場戰爭在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早在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就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否定，但至今仍然被一些人美化，幻想著“再來一次”。

這真是一個異化的結果：因為那是極黑暗、極不光彩的一頁，所以要進行封閉，要人們遺忘；而越是封閉，越是要人們遺忘，就越沒有真相和真實，越沒有研究和反思，從而造成一些人去美化，去把那黑暗當作光明、當作光彩，還很可能造成歷史重演的嚴重後果！

其實，歷史就是歷史，是誰也封閉不了，也抹殺不了！自稱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就不應該因為自己屁股上有點屎巴巴，就否認歷史的真實，就封閉歷史，就不允許別人撩開歷史的面紗，透視那槍林彈雨背後的真相。

當然，要撥開那彌漫的硝烟，要撩開這沉重的一幕，需要勇氣。

讓我們鼓起勇氣，回首再看一眼吧。

2. 抹不掉的陰影

“七二五”的槍聲，激起了我巨大的“戰鬥激情”。我記得，在大田壠體育場開會的時候，主持大會的反到底派頭頭、工人造反軍司令黃廉在會上號召全市反到底派作好準備，迎接更大的戰鬥。由於太激動，或者是太慌張，他把“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喊成了“敵人不滅亡，就叫他投降”，連呼三次都喊錯了，引起廣場上好一陣騷動。我甚至對黃廉三次喊錯口號心懷憤恨，嘲笑他是膽小鬼。後來，有流傳說，在重慶文革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黃廉找了一個藉口，跑到武漢去了，更讓他在反到底派中威信掃地。事實上，1967年的整個8月期間，他都在重慶，只是沒有像其他幾個反到底派頭頭那樣直接指揮大規模的戰役，在那戰爭最激烈的階段有點“默默無聞”罷了。

當天，我就從望龍門過河，趕到位於南岸的柴油機廠，然後又和廠裏的反到底派一起，上了黃山，先當炮兵，後當步兵，操炮使槍，出生入死，勇敢地投入到這場荒唐透頂而又殘酷無比的文革戰爭中。

那時，我已經年滿17歲，已經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除了自命為黃山警備區司令的、號稱反到底派武鬥總司令的鄧長春，在交槍前讓我當了幾天黃山紅二連的副連長之外，在整個文革期間，我都沒有當過任何頭頭，也沒有策劃過任何戰役之類。多少參與過這場文革戰爭的重慶人，至少也有十幾萬吧。在那十幾萬人中，我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平頭百姓”，但我自認為幸運地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文革戰爭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經常自告奮勇，只要有戰鬥就要衝在前，就要表現自己的英雄氣概，就要顯示自己的英雄本色，結果却為

自己這一生抹上了一道洗也洗不掉污垢、忘也忘不了的陰影。雖然那場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不應當也不可能當作刑事犯罪來論處，但回首望去，我依然為自己在那場戰爭中所做的那些壞事感到後悔，感到內疚。

我應當懺悔。

為了讓自己在寫這本回憶錄的過程中能够盡可能平心靜氣一些，我應當把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所做的壞事（包括够不上壞事標準的“壞事”）先進行一個交待，順便也交待一下自己在整個文革中所做的其他“壞事”：

一是在文革戰爭中，我打了十來發子彈。其中三發是打靶，用的是蘇式步槍。那種槍射程遠，精度高，却沒有自動機構，要扳一顆打一顆，而且後坐力很大，不抵緊一點就可能把肩膀打腫。那是在黃山的炮臺山上打的，對著對面三塊石下的一根樹枝，可能有 100 多米遠吧，也不知我是否打中了自己瞄準的目標。另外五發是用 1956 式半自動步槍打的，那是在一個追悼會上打的。別人都打了十發，我只打了五發，我是為了解約子彈。那時，我一心只想“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不願意這樣放空槍。其實，那時我的子彈比別人多。我不吸烟，就用發的香烟與別人換子彈，十多個彈夾，把我挂在腰上的子彈袋裝得滿滿的。還有幾發是在交槍前打的，那就純粹是過槍癮了。

二是我炸了一個手榴彈。1968 年春，我們在專縣“逃難”，加入了由望江“金猴”頭目徐開華組建的“紅旗三〇三”。在井研縣擔武裝部時，一個同學搶到兩顆手榴彈。後來，這兩顆手榴彈被帶回重慶，到當年夏天第二次“逃難”前，我把那兩顆手榴彈偷偷拿回家藏起來。後來回到重慶，要“回校復課鬧革命”了，武器彈藥不能帶回學校，幾個同學就把那手榴彈拿來炸了，是在大田壩體育場炸的。我炸了一顆。手榴彈握在右手，左手拉下導火繩，只聽得“吱——”的一聲，那手柄上就白煙直冒。右手往後一伸，那手榴彈就在耳邊呼嘯著。本來也知道手榴彈從拉弦到爆炸有十秒左右的間隔時間，但那呼嘯聲第一次聽到，心中就有點慌了，等不得數完“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從看

臺上往跑道甩去，然後大家就一窩蜂跑到看臺出口下面躲起來。好像過了很久，都沒聽到響聲，于是有同學就說肯定是受潮了，炸不響了。正要出去看，“轟——”的一聲，手榴彈炸了。于是跑下去看，好容易才找到爆炸的痕迹，只有酒杯大的一個小坑，而彈片却一塊也沒找到。于是我知道了，手榴彈的殺傷力其實並不大，哪能像電影裏那樣，一炸就炸得幾個人跳起來，甚至炸死一堆人？所謂“手榴彈打敗原子弹”只是吹的神話。

三是我打了六發三七高炮炮彈，是分兩次打的，都是在黃山炮臺山上打的。第一次是晚上，對著朝天門港口大樓。那距離至少三四千米，已經超出三七高炮的射程。我不知那炮彈打到哪兒了。戰爭結束後，我回家路過港口大樓，看到那牆壁上有好幾個炮彈打出的窟窿。炮彈是望江廠檢驗高炮用的試驗彈，俗稱砂包彈，學名叫砂彈，實心的，不爆炸，因而那窟窿也不大，只有小碗的碗口大小，而且還沒有穿透那牆壁。黃山炮臺山上安的那門三七高炮經常往朝天門打，我也不知那幾個窟窿是不是我打中的，但心裏還是忐忑。我的同班同學徐平原就住在朝天門豐碑街（原址位於現朝天門汽車站地下），晚上在門外乘涼。他說，有一天晚上半夜時分，黃山那邊的炮彈打過來，剛好落在他睡的涼板附近，只差半米遠就落到他身上。那彈頭打在石梯上，濺起的石渣渣弄了他一臉。我不好給他說，那發炮彈說不定就是我打的。幸好沒事，否則我這輩子要後悔至死了。還有一次是白天打的，對著山下大石壩的西南製藥廠廠房打的。那距離就近了，如果打中了，肯定能夠穿透牆壁打進車間。不過，連續多日的炮擊，那廠裏肯定早就沒有人了，因此也是放的空炮。

四是參加過一次抄家行動，那是運動初期的事。1966年9月，因為放暑假，我才回到學校，雖然我的思想已經選擇了造反，但因為我是工人出身，有“紅五類”的驕傲，就申請加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正等著批准。那時，學校已經有了八一五戰鬥團，到處去造反，而“思想兵”是官辦的，一天到晚沒有事做，就組織人去抄家的“幹活”。那天把我也喊上，一群人連抄了好幾家。上午在海棠溪，下午在羅家壩。我們哪兒

知道誰是地富，誰是反壞？抄誰不抄誰，當然要派出所的民警來“點水”，由民警公開或背地裏指揮我們去抄誰的家，而且還要民警來護衛。我是編外人員，是“偏份”，本來對抄家也不感興趣，甚至多少還有些反感，於是就站在一邊袖手旁觀。在羅家壩，抄出好大一堆書。我拾起一本看，是《舊約全書》。再撿一本，是《馬太福音》。我知道是基督教的書，很好奇，好想偷偷弄一本回去看，但是終於不敢，只好眼睜睜看著其化為灰燼。那燒書的火熊熊燃燒著，至今一閉眼，好像都還能看到。

五是我差點殺死一個人。1967年9月，兩派簽訂停火協議後，我們回到學校。在那場戰爭中，雖然我們學校的兩派之間還沒有發生過正面衝突，但槍炮激起的仇恨却已經讓雙方劍拔弩張，幾乎天天都要發生辯論爭吵，甚至動手動腳，終於發展到武鬥。對方從外校請來援兵，把我們包圍在一幢學生宿舍裏。那宿舍一樓一底，是解放前某官人的別墅，因房頂很尖而被我們稱為尖尖房子。那是晚上，對方仗著人多，從房子後面的山坡上搭上木板，衝進樓來，占據了一個房間。在樓外亂晃的手電筒的光亮下，我看見對方衝在最前面的那人端著鋼針，那鋼針上插著閃著寒光的刺刀。我站在另外一個房間的門口，手上也端著鋼針，但沒有刺刀，只是將那鋼管頭部錘扁了一下。因為只注視另一個方向，他沒有看到我。我拾起一塊磚頭，向他擲去。雖然只有兩三步遠，可能是心慌，竟然沒有打著他。他正發呆時，我大吼一聲：“殺——！”一鋼針向他喉部刺去，正好刺中。只聽得他大叫一聲，丟下鋼針，雙手護著喉部，急忙退了回去。後來下鄉，後來招工，整個公社都傳遍，說我殺死了人。正好學校的工宣隊來公社調查，要我寫個證明材料。因為第一批招工名單裏沒有我，讓我好氣憤，就和工宣隊的人吵。他們為了安撫我，當著公社領導的面申明，我們學校武鬥中沒有死人（其實是死了一個同學的），也沒有誰打死殺死過人。如果那天晚上我拿的那根鋼針插得有刺刀之類，那人即使不死，可能也要在醫院住上好幾個月了。後來，我聽說那人是水泥廠民辦中學的，當時他駭慘了，從此再也不敢參加武鬥，回家當了逍遙派。

六是我打過一次人，和很多人一起打，那人最終被打死了。那是 1968 年 5 月，徐開華帶著主要由南岸的中學生組成的“紅旗三〇三”到了榮縣，準備去搶槍。我們剛到，就有榮縣的“土砸”來反映，說有一夥重慶來的爛污崽兒組成的團夥，在榮縣佔吃霸賒，欺壓百姓，亂攬女人，搶劫農民，激起當地人極大的民憤。我們也看見他們開著汽車，在街上橫衝亂撞，人不像個人，于是就氣憤。經過組織策劃，當天晚上，徐開華帶人突然包圍了那一夥人的住地，將其全部抓獲（其中還有兩個女人）。抓回來後，大家一涌而上，把他們痛打了一頓。其中一個是他們的頭，好像叫陳世倫，肯定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據說是個在社會上鬼混的傢伙，被關在縣委黨校的一間寢室裏。我本來沒有參與抓人的行動，吃了晚飯就跑到河邊洗澡去了。回來後聽說，就跑去看熱鬧。那寢室擠滿了人，那陳世倫龜縮在一張床上，不停地叫喚著，一群人還在你一脚我一拳地打。我也忍不住了，也擠進去參與，用腳踢了他幾下。不知是誰找來一顆教練用的手榴彈，往他身上狠狠地捶。捶了遞給我，我也捶了兩下，好像是捶到他大腿或者是屁股上。大腿或屁股上肉多，有彈性，我捶下去的時候，那手榴彈都彈了起來。然後就有人從我手中搶過那手榴彈，繼續捶。我出了氣，便擠了出來。後來，便聽說那陳世倫被打死了。對他的死亡，我不知道我應當負多大的責任，反正是“罪責難逃”，幾十年來一想起，心中就忐忑，就默默懺悔。

3. 從批鬥老師開始

對於重慶（也許不僅僅是重慶）的一般老百姓來說，一部文革史就是一部武鬥史！從運動初期批鬥老師、批鬥地富反壞右開始，到後來批鬥走資派及某爪牙，就已經開始用“武”了，就已經有了武鬥。

武鬥一詞最早產生于何時，沒有考證過，不敢妄斷。但查《辭海》、《辭源》、《現代漢語詞典》等書，均未收武鬥一詞，連解釋武字的例詞中亦無武鬥二字。文鬥是武鬥的反義詞，與武鬥一樣，也不知產生于何時。在我印象中，文鬥和武鬥這兩個詞最早都是在《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出現的。其中第六條說：“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十六條》是由陳伯達負責組織起草的，這文鬥、武鬥兩個詞的發明權大約要歸之于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理論家吧？因此，“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解釋，都把武鬥限定在文革中，其定義都是：“武鬥，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從最開始的棍棒，到自製步槍、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

其實，說武鬥“最早在上海開始，後擴大到全國”，是不確切的。首先，文革一開始，全國各地就有了批鬥型的武鬥，北京可能發生得最早。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可能是被批鬥型武鬥打死的第一個人。其次，即使從“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的角度來說，上海也不是最早。上海安亭事件雖然發生在1966年11月初，但並未發生大規模武鬥。王洪文組織攻打上海柴油機廠的“八四事件”發生在1967年8月初，那時重慶的武鬥早已進入了戰爭狀態。如果從“不同造反派

組織之間相對於文鬥的武裝衝突”這個角度來看，最早的武鬥可能是在重慶開始的。

既然是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當然就應當文鬥，但運動一開始，就有了“武”，就有了武鬥。如今，歷史學家把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作文革正式發動的標志，把這次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的綱領性文件。而對我們這些當年當學生的人來說，文革是從1966年6月1日廣播了聶元梓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後開始的。

可能是有些早熟，我很小就開始關心政治，讀小學時就讀過諸如《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之類的文章。進中學後，又讀過《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以及那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簡稱“九評”）之類。我不敢說我們這一代人都像我一樣，是吃著這些“狼奶”長大的，但我們最早接受的政治理論，最早接受的政治觀念，都深深地打下了反修的烙印，實際上就是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當然，這些所謂的反修文章，作為一個小學生，作為一個初中生，我肯定沒有读懂，也不可能读懂，我們這一代人中可能也沒有幾個人真正读懂過。我們可能只是抓住了一鱗半爪，但那對我們的潛意識造成的損害，半個世紀之後也沒有完全消除。

不能說毛澤東發動與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論戰，其本意就是為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理論準備，但的確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語言，使用的邏輯推理方式，使用的寫作風格，甚至使用的一些句式、句子之類，幾乎都可以在“九評”之類的文章中找到。例如“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莫謂言之不預也”、“如喪考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獎勵一頓重的大勳章”之類句子，就是從這些文章裏照抄來的。其影響所及，甚至在如今的一些文章中也時有所見。

我從小喜歡看書，好像是小學五年級吧，我就讀過《毛澤東選集》。我家窮，母親是文盲，父親只讀過一年半的書，家中沒

有藏書，只有一本《毛澤東選集》，好像是第二卷，可能是父親單位上發的，或者就是他得的獎。無書可讀的時候，我就拿來翻。那是 1952 年出版的，豎排本，走路看方便，我就放在書包裏，上學放學在路上邊走邊看。雖然完全不懂，但却知道了諸如持久戰、游擊戰之類的名詞，而且也激起了我對打仗的興趣。我最早讀的小說是《地道戰》，是《烈火金剛》，是《山河志》，都是寫抗戰的。後來就不看小說看革命回憶錄了，《星火燎原》、《紅旗飄飄》不知看過多少集，還有《解放戰爭回憶錄》之類，以至小學畢業時，就能一口氣數上二十多個上將的名字來。同班有個同學的父親是軍人吧，他數得比我多，我就不服氣，就到處借書來看，想超過他。雖然連槍也沒摸過，十二三歲却好像就成了軍事家。

我成績好，學校本來推薦我考三中（即現南開中學，當時是重慶最好的中學），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拐，我們幾個準備考三中的同學都沒著落，全部發配到孬學校。我被分配到南山中學，那是一所不按數字編排的中學，一聽名字就差勁，讓我接到通知書後大哭一場。那年，南山中學招了兩百多人，四個班，據說我的成績是第一。于是，班主任老師張珂亮就讓我當了班主席。

南山中學坐落在南山半山腰的向家坡上，面對長江，背靠文峰塔，林木葱郁，風景秀麗，那校門，那辦公樓、教學樓、大禮堂以及那學生宿舍都掩映在濃濃的林蔭中。抗戰時期，不少達官貴人在向家坡上修建了別墅，這些別墅就成為老師們的住宅。解放前，這兒就曾經是一所學校，叫重華法商學院，好像是私立的，從上海遷來的，當年還很有點名氣。解放後，這兒成了西南合作幹部學校，據說是“西南革大”的一部分。“西南革大”是“西南革命大學”的簡稱。1950 年 3 月，為培養急需的建設人才，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開辦“西南革大”，其實只是幹部的短訓班。到 1953 年，“西南革大”取消，以其政法系為基礎，組建了西南政法學院，現改稱為西南政法大學。到 1957 年，西南合作幹部學校停辦了，校舍之類就交給了市教育局。1958 年大躍進，教育也大躍進，那一年重慶新辦了好幾所中學，都沒有按數字編排，南山中學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是“高完中”（有初中部、高中部）。

我進南山中學雖然已經是 1963 年了，但學校的辦學環境和辦學條件依然還相當差勁，只有“西南革大”留下的禮堂還算勉強。到 1980 年代，因學生大減，南山中學被撤銷，與山下的十七中合併，原址成為重慶教育管理學校。如今，包括向家坡在內的那一大片南山山麓，被一個香港老闆買去，拆得光兮兮的，正在開發，那教育管理學校也不知遷到哪兒去了。

雖然我對考進這樣一個學校曾經極端失望，但南山中學依然給我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我在這兒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那三年的學習生活和兩年多的文革生涯至今也難以忘懷。2012 年 5 月，南山中學校友們要編一個什麼文集，我也湊了一首打油詩送去：

正是災荒年，
建校在南山。
文峰塔下美，
向家坡上寬。
林掩教學樓，
花開操場邊。
宿舍有圍牆，
房子名尖尖。
更有小別墅，
夜來聽竹喧。
夏夜山風涼，
冬霜初日寒。
岩上黃桷蒼，
山腳小溪歡。
良師齊相聚，
優生來校園。
晨曦聞朝讀，
夜習燈闌珊。
論辯林蔭道，

笑談眠洞前。
 春來植樹忙，
 秋收支農田。
 遠看山城霧，
 近享明月圓。
 游泳尋山澗，
 攀岩捨蜿蜒。
 無油“機動湯”，
 腐乳罐罐飯。
 清苦肚皮餓，
 宏偉信念堅。
 學業爭先進，
 英才出少年。
 在校雖三載，
 憶舊幾十年。
 休說功成就，
 起步在南山。
 心存感恩意，
 今日笑聲甜。
 此情何悠悠，
 狂歌醉情緣。

詩中所說的“罐罐飯”是用陶罐蒸的飯，“機動湯”就是清水大鍋湯。當年，學校食堂三餐都是罐罐飯，早餐只有一塊豆腐乳，中餐、晚餐才有“機動湯”，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

讀到初二年級時，換了班主任老師，是教政治的，姓陳。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為什麼一接手就反感我，總是想方設法給我設置障礙，給我小鞋穿，用重慶話說就是對我“不感冒”，就是“卡拿”我，“夾”我的“毛鋸”，到後來竟然撤了我的班主席，只讓我當她的科代表。那樣一個年齡，又曾自以為了不得，却受到這樣的打擊，想想也知道那對我的刺激有多大了。在那一兩年時間裏，我相當

痛苦，思想波動極大。那時，已經開始提倡讀毛主席著作，我就通過讀毛澤東的書來排遣思想上的苦悶。記得那年春節，我竟然哪兒也不去，關在家裏讀了幾天剛出版不久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過了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當然也讀不懂，但書中的那些注釋却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知道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還曉得了“十大軍事原則”之類。後來，我還動用自己的生活費，去買了一本《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來讀。到初中畢業時，我已經讀過《矛盾論》、《實踐論》了，嘴巴裏已經有了一串串哲學名詞，知道矛盾是可以轉化的，這可能多少讓我減輕了一點負擔，也使我對“毛著”真的有了熱愛之情。

那時，每天下午自由活動時間，我都往圖書室裏鑽，去讀報讀雜誌。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我就看了。當時，我覺得他把話說得太死了，太過分了。後來，《文匯報》對此展開討論，有個高中生發表文章說，他回鄉時，看到那些搞反攻倒算的人拿著《海瑞罷官》當武器。我驚了一跳，才覺得自己的覺悟太低，還沒學會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看問題，比別人差遠了。這又促使我更加努力去“提高”自己，去重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重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可能是為我投入文化大革命進行的最後一次思想準備，隨著那暴風雨的臨近，我也逐漸興奮起來，激動起來。

那天，好像是196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們正在學校附近的農村開展學農勞動，為農民收割小麥。中午回學校吃飯時拿到當天的《重慶日報》，上面有何明、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我一反常態，飯也不急著吃了，把文章看完，飯都冷了才刨進肚皮。當時的情景我至今還記得，好像自己真的感覺到革命的暴風雨就要來了，一個人拿著報紙，呆在那空蕩蕩的食堂裏，腦海中浮現著高爾基《海燕》的形象，耳際似乎有“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的喊聲，直到下午重新出工。

1966年6月1日，廣播了聶元梓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接著學校就組織我們到羅家壩、海棠溪游行，然後

就動員學生給老師寫大字報，然後就開始批鬥老師，給揪出來的小“三家村”的黑幫分子挂黑牌，戴高帽，接著就是沒日沒夜的審訊，罰站，按腦殼，扇耳光，塞冷錘，用腳尖踢，用皮帶打，用鞭子抽，用大燈泡烤，開始了最初的那種武鬥。

南山中學第一屆高中畢業生很多都留校當了老師，教政治課的謝如凡甚至是高中畢業教高中，而且當班主任，課也教得好，其他老師信服，同學也喜歡，還是學校黨支部培養的接班人。只因元旦節文娛演出他扮演過阿Q，便成為首批挨打對象。他被班上同學揪去，鋸去頭髮，臉上塗上墨，挂上“我是阿Q”的大黑牌進行批鬥。不知是誰，審訊時竟舉起一條長凳，向他腰杆打去。只聽哎喲一聲叫，那腰再也直不起來。一個運動員的身體，從那後便萎縮下去，咳咳吭吭，甚至吐血。

我現在都沒有想通的是，文革開始時，那些最敢出手的，竟然都是那些所謂的好學生，像團支部書記、班主任、學生會委員之類。此前，他們甚至不和人爭吵，更不打架鬥毆，在老師面前溫順得像小綿羊。但是，一夜之間，他們竟然完全變了一個人，鬥起老師來，打起老師來，比誰都厲害。謝如凡那個高二年級班上的班主任鄭望生，在學校是紅極一時的好學生，出身工人，人聰明，成績又好，初三時便當上團支部書記，還是學生會的副主席，幾乎所有的老師都誇他。誰知，在學校，他是最先出手打人的，而且下手狠，打了人還若無其事，還洋洋自得。

鬥老師打老師，當然是得到學校黨支部的點撥和默許的，很多材料都是從檔案中泄露出來的。學校黨支部有個姓李的女秘書，人年輕，長得也漂亮，據說就是她在背後進行操縱的。但是，運動一旦被啟動，就不以任何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了。不到半個月，走資派及其爪牙也一個個被揪了出來，黑牌做得更大更重，高帽做得更高更尖，文鬥尚未開始便進行武鬥了，打也挨得更多。那女秘書被塗上花臉，被戴上高帽，被打得更慘。

我們是初三，要準備參加高中考試，開始時還不能像高中同學那樣停課去批鬥老師。後來，宣布廢除高考制度，我們是否還要參加高中考試也就懸起了，于是也開始停課鬧革命。奇怪的是，

平時調皮搗蛋的、喜歡打架鬥毆的“壞學生”們，既不參加文鬥，也不參加武鬥，趁大亂之機，放開膽子睡懶覺，然後上山捉麻雀，下河溝捉螃蟹，跳進堰塘水庫游個痛快。在班主任陳老師眼中，我不是好學生，當然也就得不到信任，但我出身好、成績好，自認為不得了，而且又關心政治，有理想，當然不能那樣逍遙，就開始不停地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

好笑的是，班主任陳老師最喜歡的那幾個同學，也就是班上那幾個團員，在團支部書記（他母親給陳老師帶小孩）的帶領下，突然要給她寫大字報了。稿子寫出來了，標題是《揭開母老虎陳某某的畫皮》，要用全班同學的名義貼出去。雖然我不是班主席了，也不是團員什麼的，但在班上還是有點威望的。那團支部書記來找我商量，我堅決不同意。我說：“她只是有錯誤的人，不是‘三反分子’，不是敵人。”在我堅持下，大字報的標題改為《陳某某何許人也》，內容也全部改了，只提問，針對她平時的言行上綱上綫質問，好像提了二十多條問，但最後也沒有給她下結論。當然，也沒有批鬥過她。後來我才曉得，要給她寫大字報，是學校領導決定的，通過學校團委布置下來。班上那幾個團員知道她整過我，以為我就恨她，能够把大字報搞得更火藥味一些，哪知道我竟然保她，這讓他們一直疑惑，搞不清楚是為什麼。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是否將此事告訴給陳老師，也不知道陳老師後來是否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反正我也沒有告訴過她。

由於陳老師的緣故，我入不了團，又被撤了班主席，因而也就處於“體制”之外，不受學校領導控制，對“武”“鬥”老師也就不感興趣。在整個文革期間，我沒有對任何一個老師動過手腳，也算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想來還應當感謝陳老師了。否則，黨支部喊我打哪個，我能不打嗎？我能違抗嗎？

4. 批鬥型武鬥的特點

不過，批鬥老師時那樣動手動腳，還不能稱爲是嚴格意義上的武鬥。武鬥是《十六條》所用的詞語，而《十六條》是1966年8月8日才公布的，批鬥老師却是從此前的6月份開始的，因此那時還沒有武鬥一說，人們甚至還不知道有武鬥這個詞。武者，從止從戈，本義爲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表示行；征伐者必有武器，戈即表示武器。因此，武的本義就是征伐，就是作戰。鬥者，卜辭像兩人徒手相搏，繁體字則是兩士相對，兵杖在後，本義爲搏鬥打架。從字面上來解釋，武鬥就是動用兵杖（兵器）之類，相互打架爭鬥。雖然運動初期批鬥老師、批鬥地富反壞右、批鬥走資派及某爪牙時，還沒有動用嚴格意義上的“兵杖”武器，但挂黑牌，戴高帽，按腦殼，扇耳光，塞冷錘，用腳尖踢，用皮帶打，用鞭子抽，用大燈泡烤，已經用了“武”，“鬥”得也够厲害的了。只是被“武”“鬥”的一方只有挨鬥的份，不僅沒有還手的可能，甚至沒有申辯的可能。這種只有單方面才能够用“武”去“鬥”的武鬥，我們暫且稱其爲批鬥型武鬥。

從表面上來看，批鬥型武鬥是群衆自發的使用武力來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開批判會，開鬥爭會，說到痛苦處，說到激動時，說得氣憤了，說的人就可能忍不住動手動腳。這種武鬥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土改時期。土改工作隊爲了發動群衆，就要召開訴苦會，把地主弄到臺上，讓受過地主剝削壓迫的貧下中農來控訴。地主往往有錢有勢，往往也做過不少欺窮壓貧的事，甚至劣迹斑斑，令人憤慨。上臺去控訴的人，想到自己受欺壓的事，想到自己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慘狀，想到自己被逼死了的親人，怎能不激動？怎能不氣憤？在這種情況下，出手打那地主幾下，似乎

也在情理之中。臺上控訴的人動了手，臺下聽的人也就可能忍不住，也就可能衝上臺去，一起動手。于是，武鬥就“順理成章”了。

但是，這種群衆性的自發性的武鬥，却正是土改工作隊所期望的。不這樣，群衆就發動不起來，地主就可能打不倒，土改的任務也就可能完不成。群衆控訴的時候，被批鬥的地主是不能解釋的，更不能反駁。如果要解釋、要反駁，就會被看作是反攻倒算。被群衆武鬥的時候，地主如果敢反抗，哪怕是輕輕動了一下手脚，哪怕是出言威脅了一下，甚至只是自我進行了一點辯護，那就死得更早。土改工作隊是有槍的，土改的法庭隨時都可以判決地主的死刑，立即就可以把你拉到會場外面，“砰——”的一槍，堅決鎮壓下去。莫言小說《生死疲勞》中那個叫西門闊的地主，甚至沒有動一下手脚，只是喊了幾聲冤枉，就被這樣拉出去槍斃了。我下鄉當知青時，也聽公社一個姓萬的書記講過土改的事。當時他是民兵，是積極分子，就這樣槍斃過地主。正是因為階級立場堅定，他才被提拔起來當了幹部。因此，所謂群衆性的、自發性的，只是表面現象，背後必須有強大的專政力量，而且要在專政力量的默許下，甚至要靠專政力量在背後進行發動，進行組織，才能出現這種批鬥型武鬥。

從解放初期的土改開始，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裏，不知搞了多少運動。任何一個運動，都要搞批鬥，也就要搞武鬥。我是 1957 年開始讀小學的。進學校不久，一個教手工的女老師就被劃成右派，其中罪行之一，就是她給我們講過白雪公主的故事。那天，在我們這些七八歲的孩子面前開她的批鬥會，就有人按她的腦殼，把她那一頭美麗的頭髮弄成了亂鷄窩。還讓我們跟著呼口號：“打倒右派！”在那個年代，只要上級布置了運動，或者只要本單位遇到了重大問題，實際掌握大權的黨組織就會發動群衆，揪出若干批鬥對象來，然後組織批判會。于是，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發動群衆，組織批鬥，成為各級黨組織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也成為各級黨組織解決本單位重大問題的一種最重要的管理方法，而且是立竿見影的方法。即使是由其他什麼原因沒有能够完成上級下達的工作任務，也會採取這種方法，通過“抓階級

鬥爭新動向”，通過“抓破壞分子”來解決。奇怪的是，有時也真的能夠見效。畢竟，誰都害怕自己成了“階級異己分子”，誰都害怕被這樣批鬥。

批鬥型武鬥就是要造成一種“紅色恐怖”，讓挨批鬥的人不敢有絲毫反抗的行爲，甚至不敢有絲毫反抗的意識。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誰還敢、誰還能與文革對抗？與紅衛兵對抗？

事實上，文革中，取名“紅色風暴”、“紅色恐怖”，甚至“紅色暴徒”的戰鬥團、戰鬥隊多如牛毛。重慶十一中的“紅色暴徒”戰鬥團，全市都有名。按那時的邏輯，只有地富反壞右，只有帝修反，才會害怕這“紅色恐怖”，才會咒罵“紅色暴徒”，誰還敢站出來說半個“不”字呢？

從批鬥老師開始，這種批鬥型武鬥一起貫穿於整個文革中，甚至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批鬥的對象，先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是老師，是地富反壞右，是走資派及其爪牙，然後是反工作組的學生，是造反派，然後又是保皇派，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然後就是兩派相互批鬥，掌權的一派批鬥沒有掌權的一派，然後就是幾乎所有參與過批鬥走資派及其爪牙的人被批鬥。只要是批鬥，就不可能不被用這樣那樣的“武”來“鬥”一“鬥”的。不被“鬥”死“鬥”殘，算你幸運。“鬥”死“鬥”殘了，算你活該。從1966年6月到1979年，整整十多年的時間裏，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不管是什麼運動，反正都要拋出一大批“運動對象”來，進行批鬥，還要辦“學習班”，“全托”（即隔離審查）在諸如防空洞之類的地方，挂黑牌，戴高帽，按腦殼，扇耳光，塞冷錘，用腳尖踢，用皮帶打，用鞭子抽，用大燈泡烤。十多年時間裏，不知有多少人被這樣“武”“鬥”過！我是1971年10月從下鄉落戶的忠縣農村被招工到望江廠的，那是一家生產高炮的兵工廠，也是重慶武鬥（戰爭）中打得最厲害的工廠。我所在的車間只有100多人，被這樣“武”“鬥”過的人至少也在四五十人之多（當然也包括我），幾乎占了一半。今天“武”“鬥”別人的人，明天就可能被別人“武”“鬥”。真是你“武”“鬥”過來，我“武”“鬥”過去。雖然每次“武”“鬥”都是單方面的，但如果從歷時性角度看，

除了少數從來沒有條件或沒有權力（例如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之類）“武”“鬥”別人的人之外，這樣的“武”“鬥”，依然可以看作是雙方相互在武鬥。

在文革初期那些日子裏，我批鬥過老師，但我却沒有對老師動過手脚。可能是我曾經認真學過有關“四清”運動（即1963-1966年在中國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運動，又稱為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的《二十三條》（即中共中央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懂一點政策，也可能是我對那些挨打的老師還有一些感情，覺得他們雖然有錯却還不是敵人，而是可以團結的對象，因此我對“武”“鬥”老師多少有些反感，甚至很“不感冒”。那時，一有空，我就去看高中同學寫的大字報，去看他們批鬥老師，去感受那“火熱的戰鬥激情”。晚自習時，我到高中教室去看，好多老師被學生打得驚叫喚，我心中不以為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說“不虐待俘虜”，何必要打呢？有一天晚上，我在高三教室看他們打老師，一個年紀很大的老師被打得驚叫喚，我覺得有些過分，還喊了一句：“不要打嘛！讓他說嘛！”

文革前，學校就已經開始貫徹毛澤東的“春節談話”和“七三指示”，老師對學生至少在態度上是很謙和的。所謂“春節談話”，是指1964年2月13日（正是農曆大年初一）毛澤東就教育問題召開座談會上的談話。他指出，教育方針是正確的，教育方法不對，要求改革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主張縮短學制。所謂“七三指示”，是指1965年7月3日毛澤東給陸定一寫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學生負擔過重，影響健康。”他建議從學生活動總量中砍去三分之一，使學生有充分的休息時間和自由支配的時間。南山中學的老師分為兩類，一類是年輕老師，不少還是留校學生，思想相對開放，對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也能理解貫徹。那時我成績好，特別是平面幾何的成績特好，思想也活躍，很是擁護毛澤東的指示。有一次考試平面幾何，我前面的題一道也不做，只做最後一道難題，想試試老師。那是一道證明題，我用了五種方法來證明，沒想到老師依然給我打了100分。他在講評時說：“我

的教案只準備了四種，如果他只做了四種，我就只給他 60 分。”另一類是解放前就開始教書的老教師，思想陳舊一點，却胸有韜略，對學生也不錯。師生之間雖然也有矛盾，但至少不像現在這樣尖銳。雖然學生中也有像我這樣受到個別老師不公正對待的，但畢竟不多，更說不上仇恨。哪知“一個號召”，學生就成了暴徒，就對老師大打出手，而且越是“好學生”越殘暴，這其中包含的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教育的根源，至今也沒有人能够說得清楚。這不僅是我所在的那所孬學校，全國幾乎所有的中學，包括像北京四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師大女附中這些全國知名的學校，也都是這樣。北京更厲害，打死了好多老師。像北師大女附中，竟然把德高望重的副校長卞仲耘都打死了！我有時想，這或者因為我們都是吃“狼奶”（那一套挂著反修招牌的假馬克思主義）長大的，那“狼奶”改變了我們的基因，一旦條件成熟，就把我們變成了“狼”。如果這種推測能够成立，那些不讀書、不看報的“壞學生”，運動來了趁機“逍遙”，反而不像“好學生”這樣殘暴，也可以多少得到一點解釋。

這種“狼奶”的基因甚至影響了我們一輩子，直到現在，我們頭腦中所“裝”的馬克思主義，可能都還沒有擺脫“九評”之類文章的影響，當然也包括文革中繼續增加的“狼奶”的影響。即使我們這一代人中那些已經當了高官的，也基本如此。例如薄熙來張口閉口“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典型。雖然他口中也增加了諸如民生之類新的詞彙，但指導他思想的基礎理論或基本理論，依然是當年和我們一樣吃的那些“狼奶”。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可能各有不同，但往往都是在很年輕時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要改變往往很難。即使要改變，原來的那一套也會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影響著改變的方向和力度，給後來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打下深深的烙印。

現在流行的一個詞是“洗腦”。解放後，共產黨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讓全國人民“鬥私批修”，被一些人稱為是“洗腦”。其實，“腦”是不好“洗”的，腦子裏本來已經形成的基礎理論或基本理論，也就是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

價值觀，要完全消除，要“洗”“乾淨”，往往是很困難的。要徹底轉變，或者說要從根本上“洗腦”，不經歷重大的磨難，不在煉獄裏磨練，不在思想上脫胎換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包括工人、農民，更不用說知識分子了，雖然也試著用新的名詞、新的術語來表達，但腦子裏已經存在的那些“基礎理論或基本理論”，却沒有改變多少。因此，在文革中，他們並不像年輕人這樣瘋狂，往往還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道德觀念來處理面對的各種問題。他們中間參加武鬥的人極少，即使參加了也不像年輕人那樣沒有底線，看到無故打人往往還要反對還要干涉。

毛澤東可能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提出要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口號。文革中跳得最高的，幾乎都是年輕人，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和青年工人，都是“紅旗下生紅旗下長”或者至少是“紅旗下長”的人。正是這些人，在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時候，遇到了共產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遇到了反修防修教育，吃了“狼奶”，注入了“狼”的基因，成了“社會主義新人”，因而才那樣“敢于革命，敢于鬥爭”，在文革中“衝鋒陷陣”，做了壞事，害了別人，害了國家，也害了自己。這並不是“洗腦”的結果，而是一開始就塑造的結果。

事實上，要通過“洗腦”，“洗”出個“社會主義新人”來，往往是不可能的。如若不信，那你去做一個試驗，去把一個怕死的人“洗腦”“洗”成一個勇敢的人，或者去把一個很貪財的人“洗腦”“洗”成一個慈善家，看你要花多大功夫。我敢說，在現在的條件下，基本上沒有可能。如今，報刊雜誌、大小會議不停地“洗”，但又有哪一個貪官是被這樣“洗”得清廉了的呢？

當然，“腦”也是可以“洗”的，但那必須具備幾個條件：一是腦子裏那些“基礎理論或基本理論”本來就包含著若干被“洗”的因素；二是來給你“洗腦”的人必須具備相應的強制力，能够消除你的“抵抗”；三是來給你“洗腦”的人還要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再加“行之以力”，各種手段一起上。而被“洗腦”的人則要經歷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那就像在地獄裏磨難一樣，不

死也要脫層皮。那時候，動不動就用“脫胎換骨”來形容這樣一個過程。你想想“脫胎換骨”這四個字，可能就能理解被“洗腦”的痛苦了！四人幫倒臺後，我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讀者看看本書第45章《終於翻過了山坳》，就會知道那是一個多麼痛苦的經歷！

學校已經混亂，高考和高中考試都廢除了，于是讓我們填了個自願，就讓我們放假回家，只留下高三的同學，其中之一半和老師一起集中學習，搞文化大革命，另一半則弄到農村去搞“四清”。那時正是文革逐漸進入高潮的時候，幾乎所有積極投入運動的“好學生”都對放假不滿，強烈要求留在學校繼續搞革命，但是沒有人理睬。7月初，我們就打起鋪蓋捲回家了。

後來，當我得知讓中學生放假回家是市委的決定時，我立即接受了這是市委陰謀，是市委妄圖壓制文化大革命的說法，立即對市委產生了反感，從而使自己的觀點傾向了造反派，後來我也真的成了造反派。

5. 由辯論引起的武鬥

鬥老師，鬥走資派及某爪牙，鬥地富反壞右，以及其他所謂的批鬥型武鬥，雖然也用了“武”，但如果按《十六條》的定義來說，還不能稱之爲是嚴格意義上的武鬥。《十六條》說：“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那隱含的意義很明白，對敵人用點“武”來“鬥”無所謂，而在革命群衆內部進行辯論的時候，則不要武鬥。《十六條》是1966年8月8日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那時候，至少在重慶，革命群衆還沒有分成兩派，即使用了“武”來“鬥”，也還不能稱其爲武鬥。

到1966年8月中旬，重慶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發展到“炮轟省市委”了。省市委畢竟是共產黨的省市委，畢竟是省市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著黨，怎能隨便“炮轟”？一方面，相當大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工農群衆難以理解，難以接受；另一方面，省市委還有各種渠道，指派甚至密令各級基層組織，採取自我保護措施。于是，“炮轟省市委”的口號一出，群衆中立即分成了兩派，“誓死保衛省市委”的口號便針鋒相對喊了出來。于是，也就出現了與造反派對立的保皇派。兩派對立，展開辯論，辯論一旦激烈，也就引發了武鬥。

現在的人們可能搞不清楚，文革時又沒有皇帝，何來保皇派？要說有皇帝，那就是毛澤東了，未必保毛澤東還不應該？其實，保皇派是造反派對那些支持省市委、支持本單位當權派的人或組織的鄙稱。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保皇派這個詞就開始流行。到當年8月下旬和9月初，省市委看到造反派已經有了組織，於是就在暗地裏組建起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工人糾察隊之類。這些

官辦的群衆組織，當然就要支持省市委、支持當權派的了，也就被人們稱為保皇派。一開始，保皇派的勢力相當大，到處圍攻造反派，武鬥也就難以避免了。

辯論引發武鬥，不僅有政治的、社會的等各種原因，也有著深刻的心理學原因。辯論就是辯駁爭論。持不同意見的雙方或多方通過辯駁爭論，或者統一意見，或者意見雖然沒有統一却能讓第三者知道誰對誰錯、誰對得多誰對得少。人天生都喜歡自己正確，一旦參與辯論，往往就會產生“我指點江山、別人來附和”的感覺，給自己的心理帶來極大的滿足感。但是，辯論的雙方觀點對立，要駁倒對方，就要在辯論中主動進攻，主動發問，甚至要抓住一點不及餘，要死纏蠻纏橫不講理。辯論中，對方在不停地向你耳朵裏灌進諸如“你是錯的”之類的話語，給你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壓力。而在聽到“你是錯的”之後，人的生理往往就會立即發生反應，先是激動，然後是血氣直衝腦門，甚至渾身發抖。如果這時候不能用理智和涵養來壓制自己，就會對對方產生厭惡感，本來打算說服對方的，也會發展到想方設法去懲罰對方。懲罰的方法，首先是譏諷，然後很快就會發展成辱罵，最後很可能就是動手打架。相當多的時候，這樣的一個過程可能都還不能完整地走完，甚至一開始就可能出手打人了。比如我們最常見的是，父親聽到孩子的反駁後，很可能大吼一句：“不許和大人頂嘴！”然後就直接一個耳光扇過去，把孩子壓服。如果在辯論中你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劣勢，或者認識到自己真的是錯了，那就更容易惱羞成怒，很可能就會用手腳來支撐自己的嘴巴，來掩蓋自己的難堪。因此，辯論的過程，往往就是一個“平和——尖刻——辱罵——動手”的過程，最後往往就難免打架鬥毆。

如今我們在電視上經常看到諸如臺灣、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議員們打架鬥毆的鏡頭，覺得很好笑也很好耍。其實，只要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水平還沒有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就不能避免這種因辯論引起的武鬥。事實上，就連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議會裏，歷史上也發生過很多因辯論而引起的打架鬥毆事件。建國後，美國參眾兩院一直是亂糟糟的，議員在院內相互

攻詰、謾罵甚至拳腳相向的事司空見慣，一些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個別人甚至向對手拔出手槍。雖然如今美國議會裏已經基本上沒有這樣的現象了，但在另外一些國家裏，雖然其議會歷史也有了幾百年，但至今也沒有完全免俗。因此，可以說，辯論中出現武鬥也是很正常的。

文革中的辯論，往往是在大街上進行的，聽衆更多，辯論雙方的情緒也就更加激動。“炮轟省市委”和“誓死保衛省市委”，不僅尖銳對立，而且事關政治大方向，弄得不好，“炮轟”的一派就可能成為反革命，就可能被抓進監獄，而“保衛”的一派恰恰把“炮轟”當作反革命，把造反派當作階級敵人，辯論也就異常尖銳激烈。從高聲叫喊到尖刻辱罵，從指手畫腳到口沫飛濺。參加辯論的人，誰也不願，誰也不敢在對方的進攻面前後退一步，往往更加固執己見。而且，重慶人火氣大，偏偏又愛帶把子，辯論中往往不知不覺就會帶上“老子”、“龜兒”、“X媽”之類髒話。你一旦這樣帶了“把子”，對方就會抓住不放，甚至立即就給你一耳光。在大街上辯論，又不可能事先制訂辯論規則，更不可能有主持辯論的裁判，人多嘴雜，即使辯論的人能够冷靜地擺事實，說道理，圍觀的人也可能瞎起哄，甚至推推搡搡，破壞辯論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不發生武鬥才是怪事。加上各級黨委暗中操縱，武鬥往往就成為辯論的最終結果。

開始，造反派畢竟人少，勢單力薄，不管是北京來的，還是本地的，到處串聯，煽風點火，便到處受阻，到處挨圍攻。人多嘴雜，你推我擠，難免不磕磕碰碰，難免不抓抓扯扯，于是便有了《十六條》所定義的那種武鬥了。真不知道《十六條》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提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要求，究竟是為了預防兩派發生武鬥，還是在暗示兩派要武鬥！

“八一五”事件是重慶文革中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造反行動，雖然也發生了衝突，但還不能說已經進行過武鬥。8月28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一夥人到江北城串聯，在街上貼大字報，寫大標語，與工作組組織來圍攻他們的教師們發生衝突，本來也還不能稱為是武鬥，但在市委的幕後策劃下，這一事件被迅速誇張

爲“八二八”慘案。事件的來龍去脈現在可能已經難以查清了，雙方抓扯、揪鬥、打人、按腦殼強迫認罪，甚至給對方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可能都有，但嚴格意義的武鬥肯定子虛烏有。但是，此事被當作打擊鎮壓造反派的契機，第二天全市便傳遍，說江北城發生了血案。據說，有好多人被八一五“暴徒”打傷，被送進紅十字醫院，其中還有人被打成了“脾破裂”，那是可能死人的致命傷。一時間，滿城張貼著所謂“八二八”慘案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散發著鉛印的傳單，鬧得人心惶惶。那時我的觀點已經是造反派了，當然不相信保皇派造謠。不過，可以說，這不應當稱爲武鬥的武鬥，却是重慶最早的武鬥了。

在那段時間，類似“八二八”慘案這樣的武鬥還有好幾起。8月29日，南岸發生了“八二九”事件。據官方說，是造反派批鬥區委書記，把區委書記打成了重傷。其實，那天去批鬥區委書記，是北京來的大學生組織的，我們南山中學留校的高三同學是主力。後來，我聽他們說，哪裏打了他嘛，連腦殼也沒有按一下，完全是保皇派造謠。不過，在1967年8月、9月那段時間裏，這樣誇大其詞的“慘案”和“事件”層出不窮，解放碑的大字報也就不斷更新，使整個城市開始躁動起來。

解放碑是重慶的商業中心，東南西北四條街，商店無數。十字中心那高高聳立的紀念碑，是抗戰勝利時修建的，本名“抗戰勝利紀功碑”，解放後才改爲“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那時，解放碑幾乎是重慶唯一的“商圈”，郊區的人進城要來逛，城裏的人有事無事也要去逛，因而總是人流如織，摩肩接踵。文革一開始，那商店門外的牆上，那解放碑的碑座上，就貼滿了密密麻麻的大字報，那路邊往往還停靠著好幾輛廣播車，于是就成爲重慶人獲取“革命”信息最重要的源頭，因此也就更加熱鬧。那時，隔幾天不去解放碑看看，好像就會落伍，不少人就會感覺不舒服。我可能也是這種人吧。

記得是那年9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到街上去看大字報，解放碑臺子上正在辯論。一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正在臺上演講，剛剛說了一句“我們要懷疑一切”，立即就衝上去幾個人去，圍著他質

問：“你敢懷疑毛主席？你敢懷疑黨中央？”于是就開始辯論。北京來的大學生只有三五個人，衝上臺去的有好大一群，把那些北京來的大學生團團圍住。北京來的大學生說，“懷疑一切”是陶鑄同志提出來的，陶鑄是中央文革的顧問，是傳達毛主席的聲音。那圍攻他們的就說，我們只聽毛主席的，不聽什麼陶鑄的，還硬說他們在懷疑毛主席，在懷疑黨中央，是反革命。說著說著，圍攻的人就開始動手，先是推推搡搡，然後是揮拳相向，不一會兒，那幾個北京來的大學生就鼻青臉腫了，敗下陣去，辯論也就結束。

有一次，我在解放碑看大字報。不知是怎麼引起的，一堆人爲那大字報上的內容發生了辯論，我也參與其中。哪知，看大字報的人中，“保皇”的觀點占了多數，我們幾個持造反觀點的人就被圍在中間。我嗓門大，聲音高，就成爲對方攻擊的重點。我還沒有說上幾句話，後面就有人一拳頭向我打來。人多擁擠，那拳頭落在我身上時，已經被不少人的肩頭阻擋，基本上沒有力了，也就是說沒有打到我。但這却讓我很氣憤，我指著對那出手的崽兒說：“你說不過就要打人，說明你沒有道理！”他提勁：“打了你啷個？”我看他和我差不多大小，也提勁：“要打就打！未必我還怕你了？”幸好人也太多，擠來擠去，我們也被擠散了，架就沒打起來。其實，我從小就不打架，打起架肯定是不行的，但我有力氣。我父母都是搬運工人，我從小就給母親“打薄”。“打薄”是重慶碼頭搬運工人的行話，指爲挑擔的人減輕負擔，使其擔子輕一點。我母親在碼頭上下力，只要我不上學，我就要給她“打薄”，先是背，後是擔，搬磚搬瓦，到文革開始時，我已經16歲，可以挑200斤爬坡上坎了。憑我的力氣，和那打我的崽兒對打，我可能也不會吃虧的。

不過，文革初期的人們還比較單純，對打架鬥毆很是反感。即使強烈反對對方的觀點，只要沒有人在背後挑動，只要對方沒有帶把子罵人，主動出手打人的也極少。如果辯論雙方可能動手腳了，或者已經開始動手腳了，圍觀的人也會來勸解，也會一致譴責那帶把子的或首先出手打人的人。圍觀的人往往是沒有“觀點”的人，或者多少有點公道之心，這就讓帶把子的人或首先出

手打人的人心虛，往往就會停止手脚的動作，一般都會悻悻地鑽出人群走開，于是辯論也就中止。因此，與後來的武鬥相比，這種因辯論引起的武鬥也并不多，都是極個別的，也沒有什麼規模。

6. 從抓流氓到造反

那時，我家住在朝天門白鶴亭（原址位于現朝天門海客瀛洲地下）。那是城牆外的一條陋巷，一面是城牆，一面是臨江的吊腳樓、捆綁房、爛窩棚。一條麻石板小路順著城牆蜿蜒，窄的地方，兩人對面便要撞翻一個。陋巷外有一條爛馬路，馬路外就是長江。陋巷裏陰暗、潮濕、擁擠、渾濁，唯有那城牆上的黃桷樹灑下一片綠蔭來，為陋巷增添了些許生機。巷子裏住的都是社會最底層的搬運工、建築工、小商販、無業貧民之類，貧窮、粗野，雖然經常吵嘴打架鬧得不可開交，却又充滿著濃濃的鄰里人情。

學校放假後，我們只有回家。可能是市委統一安排，派出所就把放假的中學生組織起來，由地段上的戶籍民警天天晚上帶著去巡邏守夜，去抓流氓。那時，重慶城裏要個朋友（戀愛）都沒個地方，不少人就躲到陋巷附近的那些夾竹桃林裏，搞些小動作，也就被當作流氓。有一天晚上，我鑽進那夾竹桃林裏去，看到一男一女正摟抱在一起，就大喝一聲。那男的跳起來，那女的急忙扣上衣服扣子。男的又凶又惡，撲上來要打我。我把手中的棍棒緊緊捏著，只要他出手，我就會給他一棒。地段上的戶籍民警姓廖，我們叫他廖戶籍。廖戶籍聽到聲音，立即趕過來，喝道：“你要幹什麼！”看到是民警，那男的立即就萎縮下去，掏出一張軍官證來。廖戶籍看了看，把他訓斥一通，才讓他們走了。

那個年代，要朋友（戀愛）就是流氓，就是罪惡。那時，解放碑附近很難找到一個隱蔽的地方，人民公園、一號橋頭的一匹山、滄白路的城牆邊竟成了戀愛男女幽會的“聖地”。記得我還在讀小學時，晚上就和一些同學專門到那些“聖地”去蹣跚，看到有男女走在一起的，就故意從他們中間穿過去；看到有男女坐

在一起的，就遠遠就向他們擲石塊，做了不少壞事。

其實，隨著年齡增大，不管是誰，都會產生男女之情。記得讀小學時，我就對一個女生產生過莫名其妙的好感。進中學後，晚上睡不著，一個寢室的男生就胡吹班上哪個女生長得乖，甚至把某個男生與某個女生搭配起來，亂點鴛鴦譜。後來不知老師怎麼知道了，把我們弄到辦公室，訓得個狗血淋頭。只是後來我有了“階級觀點”，又有些高傲，沒有把班上女生看上眼，所以沒有要朋友（戀愛）的經歷。但就在廖戶籍組織我們巡邏的時候，一個女生竟然對我發出溫情的通知了。

那天晚上，不知廖戶籍為何要安排我們在巷子裏守夜。雖是夏天，但夜深了還是有點冷。那個女生把自己的外衣脫下，硬要披到我身上。夜深人靜，燈光暗淡，我們坐在樹影下的石凳上，她緊緊靠在我身邊，讓我感覺她身上的溫暖，却又讓我不敢動了，連出氣也粗了許多。後來，她就把身子偎依到我懷中來了。雖然心中好想伸出手去抱她，但我却更不敢動作了。其實，她住在另一條街上，我連她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我們就這樣相依相偎，直到巷子裏傳來脚步聲，她才我懷中跳起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親密接觸異性，好幾天都激動不已。不過，後來她就再也沒有來參加過巡邏，我也沒有去找過她，到如今連她的姓和她的相貌我都記不得了，更不知道她後來如何。

廖戶籍是轉業軍人，老婆在長壽縣農村，看年看月他才能回去一次。後來，不知他想的什麼辦法，就調回長壽去了。我從農村調到望江廠之前，廠裏的人到朝天門派出所去“政審”我。他是八一五派的，雖然不是鋼杆之類，却明明知道我曾經衝擊過派出所組織的批判大會會場，知道我是反到底派的鋼杆，知道我在黃山上參加過武鬥，却有意放我一馬，對那兩個“外調”的人說：“這娃兒不錯，沒做過壞事。”如果他給我下點“爛藥”（重慶話，意思是背後打“小報告”，說別人的壞話，破壞別人的好事），我肯定還要在農村多呆上幾年了。藉此機會，我要向他表示感謝！

1966年8月8日，報上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街道組織我們到市委去表決心。我記得是8日那天晚上去的，市委

所在的中山四路擠滿了人。我看到那街邊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那“炮轟”、“質問”之類的標題觸目驚心。有一張的標題是“讓中學生放假是市委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大陰謀”，立即引起我極大的共鳴。我想擠過去認真看看，那維護秩序的軍人却把我們推出來，讓我們馬上離開。由於人太多，我也只好回家。

8月18日，學校通知我們初三年級的同學回校重新填報考高中的自願。班上同學告訴我，北京的中學生組織了紅衛兵，中央文革支持他們起來造反。還告訴我，就在此刻，毛主席正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百萬紅衛兵呢。那時沒有電視，連收音機也沒有，我孤陋寡聞，這些信息讓我再一次激動起來。可是，我們填了志願表，學校又讓我們回家。

後來，學校通知團員們回學校，學了一陣文件，就沒事幹了。不知是誰提議，去把老君洞那些“四舊”（即所謂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玩藝兒砸了，立即得到大家贊同。於是，由高一某班一個姓王的同學（他是學校團委副書記、學生會副主席，是學校黨支部培養的對象）帶頭，提著榔頭二錘之類，集合了二三十人的隊伍，翻山越嶺趕到老君洞。那些道士見了那紅旗紅袖章，哪裏敢阻擋？頃刻之間，那太上老君塑像，那精美石刻，那龍飛鳳舞的門廊石柱，便粉身碎骨。然後便徹底搜查，那成捆的纖語，那成堆的書籍，扔在大院，付之一炬。這群中學生沒有想到，在那密室中，竟搜出了幾把大刀、幾杆長矛、幾面銅鑼、幾個金像。好，變天復辟的鐵證！武裝暴動的鐵證！他們興奮異常，把道士們集中起來，狠狠地訓，當然免不了按腦袋，踢腳尖。然後，帶著戰利品下了山，將其全部交到區委。區委辦公室開的收條，至今還保留在那姓王的同學手中。

第二天，還是這幫子人，又趕進城去，砸了那羅漢寺的八百羅漢！

我不是團員，沒有回學校，這些事是後來才知道的。

那時，已經開始批鬥地富反壞右了。我們那陋巷裏有個姓駱的，解放前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在所謂“師管區”受訓時，因身強力壯又有點文化，被任命為副連長，于是就成了“反革命分子”。

廖戶籍組織我們抄了他的家，那是個一貧如洗之家，連那床鋪蓋也又爛又髒。兩個長得高大的學生意要給他挂上黑牌，他不讓，身子扭，手臂拐，竟把那兩個學生絆倒在地。跟在後面的廖戶籍是轉業軍人，馬上衝過來，抓住他的手臂一扭，他就再也扳不動了。他被鬥了大半天不說，還被抓到派出所關了一夜。姓駱的還算幸運，那年月像他那樣的人，被送進監獄，被判十年八年，真不知有多少啊！那貼滿街頭巷尾的布告，早已在他那樣的人群中形成一片恐怖，那就是“紅色恐怖”。

幸好後來鬥爭矛頭轉向了走資派，那姓駱的好像後來再沒有再挨過這樣的批鬥，也沒有再受過多少責難。改革開放後，他在朝天門碼頭邊開了一家小餐館，成了我們那條陋巷裏最早富裕起來的人，讓左鄰右舍好羨慕。

我們那條陋巷完全是貧民窟，家家都很窮。我家雖然也窮，但相對來說還算好的。到月底了，有的鄰居揭不開鍋，還來找我母親借錢。我母親是地段上的“積極分子”，是居民委員，肯幫助人，但嘴巴有時也不饒人，可能也得罪過人。不知是廖戶籍在背後點撥還是有人趁機報復，一個地段另一條街上的兩個學生突然襲擊，把大字報填到我家門口，罵我母親是“母老虎”。我看到後氣憤極了，真想幾下撕下來，却又覺得寫大字報是別人的權力，我不能破壞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家，立即找來紙和筆，另外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那大字報旁邊。我表面是批評母親，實際上是對那張大字報一一進行批駁。兩張大字報都只存在了一天多，就被人偷偷撕掉，拿去當生煤爐的引火紙了。但是至今，兄弟和妹妹一說起都還罵我，說我給母親寫了大字報，造反造到母親頭上，沒有良心。

後來，我們就回學校“鬧革命”了。

那時，學校已經有了“思想兵”，有了八一五戰鬥團。我當然想參加八一五，參加八一五不講出身成分，參加“思想兵”要講，出身“紅五類”的當紅衛兵，出身其他成分的當赤衛軍。我想先證實自己是工人出身，于是就報名參加“思想兵”。哪知他們一查檔案，我的出身竟然是“待定”，只能讓我先在赤衛軍裏

呆著。原來，我父親單位的“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所有人的成分都還“待定”。這讓我急了，我把已經當上“思想兵”的同班同學徐平原（他在初三時接替我當了班主席）叫起，去找我父親解放前的同事、鄰居調查，以便證明我的出身真的是工人。雖然我們搞了好幾份調查報告，但“思想兵”的頭頭却依然要我等到起。和我一樣遭遇的還有高三一個叫彭興元的同學，他也是“潛伏”的造反派。我們臭味相投，一起討論，由我起草，他來書寫，接連寫了不少大字報，炮轟市委，批判“思想兵”，在學校引起不大不小的轟動。于是，“思想兵”就把我們開除了赤衛軍，而八一五戰鬥團馬上就接收了我們，我們還被譽為“戰鬥在保皇派心臟的造反派”。

可能正是因為此事的刺激，使我對血統論就開始反感了。我寫了好幾張大字報，批駁血統論，不少同學都在上面批注，表示贊同。後來，我在交朋友時，再也不管別人出身如何，其中要得最好的幾個朋友，其父不是所謂“匪軍官”就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者”，或者就是小商小販之類。

我們學校地處郊外，信息閉塞，因為是住讀，同學之間也比較友善，而且學校的保皇派勢力弱，造反派與保皇派辯論不多，幾乎沒有什麼大的爭鬥，更沒有拳頭相向搞武鬥。對正處在青春期的中學生來說，這就沒有刺激，也就好沒意思。於是，大家紛紛找藉口外出串聯。我和同班幾個同學邀約在一起，“跨山越水上北京，咱們去見毛主席”（我在火車上寫的詩句）。對絕大多數學生來說，那年代的大串聯實際上就是免費旅游，只是一般不去風景區游山玩水，而去大學和展覽館之類地方，看大字報，看展覽，接受“革命教育”。

那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門，雖然在路上也遇到不少麻煩，但始終興奮異常。從簡陽到成都，火車一直走走停停，在紅花塘甚至停了大半天，也沒有引起我們的煩惱。火車相當擁擠，在廣元停車時，擠上來幾個穿皮衣服的出差人員，一上車就鑽到我們的座位下，立即就鼾聲如雷。他們醒來後，火車已經越過秦嶺。他們拿出一包牛肉乾請我們，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樣美味的東西，我

們竟然不顧臉面，幾下就將其全部消滅。火車到北京，已經是第四天傍晚，下了火車，我們才知道那是西直門站。走出車站，天色已晚，留給我的印象是那高聳的城門，彷彿回到了中世紀。

在北京，我們住在外交部新修的招待所，沒有飯堂，只有吃乾糧。領窩窩頭時，要交錢交糧票。開始，我們老老實實交了。後來看別人都不交，也不交了，謊稱帶出來的錢糧已經用光，接待站就要我們打借條。1969年我們下鄉前，那借條竟然寄到學校來了，要我們歸還。其實，只要我們來個不認賬，也就算了。我却把當時一起去北京的同學找來，要大家一五一十拿出來，交到了學校。後來到了農村，他們都罵我是“哈兒”（傻瓜）。

在北京，遇到幾個吉林白城來的學生，見他們身上長滿虱子，還把多領的窩窩頭裝好帶回去，讓我知道了東北人比我們還窮。在北京，我天天跑到大學去看大字報，中關村附近的大學都去了，似乎也沒看出個所以然。那時，北京的大學裏擠滿了像我這樣外地去的學生，不少人都在摘抄大字報。我記得，我到北京大學去的時候，正趕上他們在貼全國第一批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

我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兩次接受毛澤東檢閱。第一次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因為靠後，看不真切，只能聽到他從麥克風傳過來的“人民萬歲”的聲音。檢閱結束後，幾十萬人涌到城樓下，毛澤東一行人却已經離開，滿地都是被踩掉的鞋子，據說後來拉了一卡車走。不過，當時也的確激動，立即寫了一首詩，記得其中有幾句是：“主席和林彪，對咱把手揮。激動咱心兒，朝著城樓飛。”第二次是步行通過天安門廣場，正好靠近城樓，終於看清楚了。毛澤東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座雕像，眼睛覲著，面無表情，舉著右手向我們揮了揮，就定格在那兒了。

後來，我們就分手，我和另一個同學到了成都，聽說重慶發生了“一二·四”事件。

我們在外面串聯，重慶的造反派與保皇派的鬥爭却越演越烈，因辯論引起的武鬥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厲害。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的工人糾察隊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號稱十萬人，在大田壠體育場召開大會，造反派的工人造反軍和二七戰鬥團派人去衝擊

會場，於是發生衝突。人那麼多，擠擠攘攘的，秩序維持不好都要出事，都可能踩傷踩死人，何況還有人來干擾來破壞！重慶人脾氣大，性子急，好爭鬥，在那種場合，誰也說不清是哪一方先出手，於是就有人受傷。不知是誰想出的餽主意，便詭稱保皇派打死了人，標語大字報貼滿全城。但是，死人要見尸，否則就難以說服人，於是又派人到石橋鋪火葬場搶尸體。不知是因為對方在火葬場戒備森嚴，沒有搶到，還是沒有合適的，於是又有人想出一個餽主意，找來一個活人，蒙上白布，只露出腳來，當作死人，在全城進行抬尸游行。偏偏那活人忍不住，那腳不停晃動，露出了馬腳，成了一個大笑話！

其實，後來才知道，“一二·四”事件發生後，火葬場就被造反派的二七戰鬥團接管。他們從 14 具正待火化的尸體中搶出 4 具“可疑尸體”，又從工人醫院搶出一具病故學生的尸體，擺在體育場展覽。我回重慶後，曾聽到街道上一個也是造反派的同學說，抬尸游行時他參加了，他的確看到那尸體的腳在晃動。其實，略一推敲，那尸體放在汽車上，汽車再慢，也要顛簸，那腳有些晃動也很自然，工人糾察隊以此來攻擊造反派也不足為奇。

笑話是笑話，却起到了謠言的作用。成都的造反派（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八二六”、“紅成”）在省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聲援重慶造反派，會後又游行。那花圈，那大標語牌，竟逶迤十餘里。有人還從印刷廠找來白紙花，撒得滿城白茫茫一片。在成都的重慶造反派當然也要參加。游行時，按照安排，我抬著一塊標語牌，走在游行隊伍前列，一路喊口號，把嗓子都喊啞了。

回到重慶，街道上的造反派就來找我。“一二·四”事件後，重慶的保皇派已經陣腳大亂，也開始組織批鬥走資派的會了，不過在我們看來，那都是假批判真保護。於是，我們就到處去衝擊他們的批判會會場。有一次，朝天門派出所在運輸電影院開批判大會，我們只去了三個人。開始還在下面聽，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就商量一起衝上去揭露他們。我衝上主席臺，那派出所所長正在發言，我從他手中搶過話筒，對著會場的上千人大喊：“他們是

在假批判真保皇！”那所長又從我手中搶去話筒，我們就在主席臺上搶起來。可能是保皇派已經失勢，雖然我看到那所長氣得滿臉鐵青，拳頭都捏出了水，但却不敢動手打我。于是會場大亂，批判大會也不了了之。好笑的是，我們竟然有了成就感，一說起就得意洋洋。

7. 一不小心成了砸派

1967年1月底或2月初的一天，反到底派（當時還叫砸派）在大田壩體育場召開誓師大會，被八一五派（當時還叫保派）衝得七零八落。砸派集合起散兵游勇進城游行，一路又被保派圍攻，到天黑時才游到解放碑，却再也走不動了。于是辯論，于是吵架，于是推推攘攘。幾個保派崽兒衝上去，將那宣傳車的喇叭砸爛。于是就發生武鬥，那宣傳車上的人一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血流滿面，不一會兒便有好幾個人被送到醫院去。

那天，我正好在解放碑。按《十六條》關於武鬥的說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算得上有點規模的武鬥。

雖然我的名字中有一個“權”字，但我對“權”却不感興趣。可能是因為吸取了班主任陳老師撤我班主席職務的教訓，不僅對“權”不感興趣，而且對“頭”啊“官”啊之類也不感興趣。文革十年，我什麼“頭”也沒當過，也沒想到要去當，心底裏也不願意去當。可能正是這樣的思想，我對“一月奪權”也就沒有興趣。奪權的時候，我又邀約了幾個同學，一起去步行串聯，沿著當年成都到重慶的“東大道”（驛道），從重慶走到成都，走了十天。最多的一天走了120里路，從大足中敖走到安岳龍臺，從早上8點多鐘走到晚上10點多鐘。步行串聯回到重慶，“革聯會”已經成立，砸派、保派已經形成。那時，我對“革聯會”還沒有“觀點”，或者說我還在騎牆，既認為“革聯會”有些問題，又認為不應該隨便就喊“砸”。但是，親眼看到砸派的宣傳車被砸、人被打，可能是同情弱者的心理作祟，竟然立即就把觀點偏向了砸派，後來竟成了鋼杆，雖然沒有當過什麼頭頭，却出生入死，挨批挨鬥，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價。

在重慶，砸派，或者說反到底派一直是少數派，一直受到各級當權者（從當時的駐軍到後來的各屆市委以及各單位領導）的欺壓，直到現在可能都還讓不少參加過反到底派的人感覺不公平。即使是文革結束十幾年後出版的《重慶市志》以及各區縣志、各部門志、各單位志，從那大事記裏，從那有關文革的敘述中，你都還可以感覺到對兩派也沒有“一碗水端平”。雖然字面上不再提哪一派了，但却往往有意無意地掩飾八一五派的“罪行”，對反到底派的“罪行”却疏而不漏。

可以說，參加砸派的人，相當多的人可能和我一樣，都是這樣“一不小心”成了砸派的。我後來問過不少人，追溯他們成為砸派的最初原因，有的比我還好笑，其中竟然有不少人僅僅是嫌“革聯會”三個字不好聽，才參加砸派的。其實，參加保派的人，大多數可能也是這樣“一不小心”成了保派的。1967年春節前後，是重慶人分化成“砸”“保”兩派的關鍵時期，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了自己的“觀點”。或者因為同學朋友是某一派，自己就成了某一派；或者因為和某人關係不好，對方參加了某一派，自己就偏要參加另一派；甚至是對某一派的某個人看不順眼，就反過去參加了另一派。那時，保皇派剛剛垮臺，如果本單位的造反派是砸派，保皇派就肯定投入到保派中；反之，就可能成為砸派。甚至某個單位的某個戰鬥團，也是這樣“一不小心”就成了砸派或保派的。如果讀者不信，可以去問問現在那些年過花甲的老重慶人，問問他們為什麼要砸“革聯會”？或者問問他們為什麼要保“革聯會”？我敢說，肯定難以找到一個能够說得清楚說得明白的！雖然也有人不承認自己是“一不小心”，甚至可以給你說個一二三來，但那理由肯定有些莫名其妙，難以讓你信服。

當然，也有人是很自覺很理性地加入到某一派的，不過這樣的人可能很少，其中的一些人可能還摻雜著對權力的某種渴望。

但是，即使說不清楚，即使是“一不小心”，即使は莫名其妙，一旦參加了某一派，便像坐上了從高處滑向低處的冰道車，要想退出，要想改道，要想停下，都難，甚至不可能。速度越滑越快，派性就越陷越深。因為派性，相互爭鬥，相互武鬥，相互間又產

生又增加了仇恨，派性也就更厲害，也更難以消解。

在那個年代，如果誰沒有“觀點”，誰要繼續騎牆，肯定要被“革命潮流”所淘汰。南山中學八一五戰鬥團的頭頭鄭望生，其“觀點”本來傾向于砸派，但他不願表明態度，兩派的活動都不參加，被保派認為是“叛徒”，被砸派認為是“投機分子”，結果兩派都不再理他。他又不甘心回家“逍遙”，繼續留在學校，看守學校的財產，到食堂幫師傅打打雜，終於“消沉”下去。幸好他人緣關係還算好，兩派都不去找他的麻煩，算是對他的尊重。文革一開始，他是最早造反的。可惜，這樣一個“風雲人物”，就這樣被“革命洪流”所拋棄，再沒有人理他。後來下鄉，可能是因為好久沒有吃肉了，用重慶話說就是好久沒打牙祭了，那天趕場買了肉回來，或者是肉沒煮熟，或者是吃得過多過快，吃了沒多久就肚皮痛，突患絞腸痧，被同學和農民連夜送到縣醫院。哪知縣醫院能夠動手術的醫生都下鄉“改造”去了，結果被活活痛死，可悲可嘆！

雖然是“一不小心”，一旦分成兩派，就對立起來，就開始衝突。“革聯會”有駐軍支持，掌握著權力，于是就宣布某某組織是“反動組織”，就動用專政工具抓人，開始了“二月鎮反”，很快就把砸派打了下去。沒有被抓進監獄的砸派，就被保派抓來批鬥，與批鬥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差不多，文鬥中夾著武鬥，武鬥之餘又加文鬥。

我成了砸派，就把在城裏找來的砸派傳單什麼的帶回學校。我和同班同學盧光忠虛張聲勢，兩個人竟然成立了兩個戰鬥隊，取名“排山倒海”和“雷霆萬鈞”，把那些傳單抄寫成大字報貼出去，或者就直接貼出去。由於是住讀，留在學校裏的同學不多。鄭望生也縱容我們，不來干涉。但是，“鎮反”一來，我們的“排山倒海戰鬥隊”和“雷霆萬鈞戰鬥隊”就被取締，雖然沒有人組織批鬥我們，但却勒令我們不許“亂說亂動”，不許我們隨便離開學校。那是一段相當灰暗的日子，一個觀點和我們相同的叫蔣孟孟的高三同學和我們住在一起，有事沒事就拿起二胡，拉“江河水”。那悲涼的音調，讓我受不了，和他吵了幾次，他還是繼續拉他的，讓人感覺胸悶難受。記得有幾個初一年級的女同學也

是砸派觀點，在那沉悶的日子裏，大家聚在一起發牢騷。其中一個叫王琴的，把桌子一拍：“老子總有一天要復辟！”引起我們大笑，算是調節了一下氣氛。

王琴的話也真靈驗，沉悶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不到一個月，中央文革就開始反擊，“二月逆流”便被批判，“二月鎮反”便被否定。

所謂“二月逆流”，是指發生在 1967 年一二月期間中共中央的一場政治鬥爭。先是在 1967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軍委會議上，後是在 2 月中旬于懷仁堂召開的兩次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與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人之間發生衝突，互相指責，當時被稱為“二月逆流”，後被中共稱為文革初期一次黨內公開的抗爭。這次抗爭，直接導致了四川、青海等地的“二月鎮反”。

風向一改，砸派又活躍起來，開始“復辟”。那被抓進監獄的，像英雄一樣被放出來，受到歡迎。人們往往同情受壓的一方，於是砸派隊伍速迅擴大，重新與保派爭霸。南山中學也成立了井岡山戰鬥團，人數陡增。我接連起草了好幾張傳單，記得其中一篇是《論偽》。砸派把“革聯會”罵成“偽革聯”，有保派寫了《駁偽》的傳單。我就針對那傳單，用“偽者，假也”，“偽者，不合法也”，“偽者，反動也”之類給予證明。那時，我們已經把油印技術練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張鐵筆刻的蠟紙，竟然可以印出上千份傳單。我們把傳單拿到解放碑去張貼去散發，說不定現在還有人記得那篇《論偽》的文章呢。

我至今也沒想明白，大家幾乎都是“一不小心”成了的砸派或保派的，也就是說，并沒有多大的原則分歧，并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只是“觀點”不同，為什麼在十多年的時間裏（從 1967 年初開始，至少持續到四人幫垮臺後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運動），那樣對立，你死我活，非要把對方打倒，非要對方認錯認罪，甚至非要把對方弄進監獄，更不用說在那武鬥中更要把對方置于死地了。

後來我進了望江廠，這是重慶文革戰爭中打得最厲害的兵工廠之一，廠裏的兩派對立特別嚴重，不少夫妻、兄弟、父子各是一派，竟然把“武鬥”帶回家中，大打出手。我有一位師兄弟，他父親是反到底派，他母親是八一五派。1967年九、十月份，八一五派被趕出工廠。天氣涼了，他父親擔心他母親著涼，便帶了一包衣服，趕了十幾里路，給妻子送去，順便也想去看望一下。沒想到，那當妻子的不僅不買情，反而“點”了丈夫的“水”，把丈夫當作探子抓起來。又不曉得是爲哪樁，大約是把一派人挨打被趕的氣出在這個老工人頭上吧，那丈夫又被稀裏糊塗拉去槍斃了。他既不是反到底的鐵杆鋼杆，又沒直接參加過武鬥，更沒有拿過槍操過炮。一個老實巴交的老工人，遭遇如此下場，而且是妻子喊人來抓捕的，豈不悲乎？在望江廠，我有一個鄰居，夫妻之間爲家裏一件瑣事吵了嘴，只因丈夫是反到底派，妻子就堅決去參加了八一五派。武鬥的時候，那丈夫因家事把妻子打了幾下，妻子一氣之下，竟約上自己一派的人，把丈夫堵在路上，捶了個半死。又不知打到什麼當道的地方了，造成丈夫長期癱瘓在床。後來，妻子服侍丈夫三十多年，丈夫也不寬恕。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幾乎每個單位都有，并不只是望江廠。作爲一個過來人，我都無法理解，如果講給現在的年輕人聽，他們絕對認爲我是在胡說八道，是在編“神話”。可是，這却是實實在在的現實，一點兒也沒有虛誑。

我“一不小心”成了砸派，成了反到底，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兩派爭鬥中，捨生忘死，義無反顧，在派性的道路上越滑越遠，葬送了自己的青春。萬幸的是，雖然我經歷過多次危險，但還沒沒有葬送掉自己的生命。與那些送掉自己性命的人們比，例如與後來被打死的同學盧光忠比，我也算不幸中的大幸吧。

8. 武鬥全面開花

被“二月鎮反”打壓下去的反到底派，趁著政治風向變動的機會，紛紛找當權的“革聯會”平反。八一五派却在駐軍的安撫和支持下，成立了“捍紅指揮部”。兩派都多次組織誓師大會、示威游行，你開會我衝擊，我游行你破壞，整個 1967 年 4 月期間，幾乎到處都在發生衝突，武鬥也在所難免。不過，那時的武鬥還主要是拳頭腳尖，再加上旗杆之類，還沒有人事先準備武器，只能算是戰爭的前兆。

1967 年 4 月 27 日，反到底派的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政法兵團到重慶大學校內去示威游行，與重大八一五發生衝突，可能是吃了虧，次日，政法兵團就到“革聯會”大院（即市委大院）內靜坐抗議，要求“革聯會”懲辦凶手。其他反到底派聽說後，也紛紛前往支援。南山中學雖然地處偏遠，但絕大多數學生都住在城裏的解放碑周圍。得到消息後，剛成立的井岡山戰鬥團就組織人馬，也于 29 日趕到“革聯會”大院，加入靜坐示威的行列。我那時已經是鋼杆反到底了，雖然沒有“一官半職”，却“上串下跳”，很是積極，當然也就去參加了。

市委大院原名德安里，是上個世紀 20 年代修建的，抗戰時期曾作過蔣介石的官邸。院裏別墅成群，林蔭蔽日。解放後，蔣介石曾經住過的那幢別墅成了市委書記兼市長任白戈的家。1958 年毛澤東路過重慶，任白戈還將其騰出來，讓毛澤東住了一晚上。文革前，那市委大院戒備森嚴，給人神秘的感覺。文革興起，什麼人都可以進去走走看看。為揭露任白戈的腐敗，還在他住過的那幢別墅舉辦過展覽。其實，那拿出來展覽的東西，還不如如今普通家庭擁有的。

參加靜坐的可能有上萬人，把那大院擠得滿滿的，堅持了幾天，人也逐漸減少。不少人白天來，晚上就回家。我家雖然就在城裏，但偏偏熱血沸騰，堅守“崗位”。那時沒有什麼礦泉水之類，渴了就跑到廁所，嘴巴對著水龍頭，喝自來水。大院裏有食堂，食堂裏也有反到底派的人，餓了就去食堂吃飯，但照樣要給錢給（糧）票。那幾天，雖然沒有下雨，但晚上依然春寒料峭，我還專門準備了一件絨衣，晚上冷起來就穿上。靜坐的人情緒激昂，不斷有來支援的戰友跳到那市委大樓的臺階上發表演說，宣讀決心書。晚上留下的人不多了，大家就唱歌。那段時間，反到底派最愛唱的歌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是“遠方的大雁你快快飛，捎個心兒到北京”。有一天晚上，電影公司反到底派的還帶來電影機，放了一場電影給我們看。

一個個子很高的女生穿著舊軍裝，紮著武鬥帶，揮著雙手指揮我們唱歌，給我留下好深的印象。後來，我知道她是十九中延安公社的頭頭，叫李闖（肯定是文革開始後改的名字）。後來八一五派來衝擊我們的時候，我把裝有絨衣的書包遞給她，讓她幫我保管，哪知我們却被衝散了。那時，一件絨衣太值錢，我怕父母吵，還專門跑到地處江北董家溪的十九中去找過她，却沒有找到，那絨衣也就永遠失蹤了。

除了那幢辦公大樓外，市委大院裏都是一些別墅型的房屋，林木蔽蔭，還種有花草，本是很優雅的地方，風景比當時的人民公園、枇杷山公園都還要好，被我們這樣一鬧，也弄得“髒亂差”了。那大樓的廁所後來被堵塞了，污水橫流，只好搭上磚頭進去解手。

靜坐期間，反到底派內部也發生了分歧。既然說“革聯會”是“偽革聯”，那還找“偽革聯”“平”什麼“反”？在靜坐現場，我聽到不少人在辯論，馬上就同意了這種意見。可能是同意這種意見的人占了多數，於是準備撤退。但是，八一五派却組織了數萬人，將“革聯會”大門以及中山四路一帶全部堵住，並且準備衝進來。眼看出不去了，靜坐的反到底就派人出去請求支援。5月2日一大早，反到底派組織了幾萬人，趕到中山四路，衝破八一五派的阻攔，將圍在大門外的八一五派驅散，將院內反到底

派的人營救出來。我隨著大隊人馬衝出大院，看到兩邊路上擠滿了人。來支援我們的戰友中，不少人手中都拿著棍棒扁擔之類，正在阻止擁擠的人們往中間衝擊。後來我聽說，他們來的時候，和八一五派發生了衝突。八一五派沒想到來支援的反到底派會帶著棍棒之類有備而來，更沒想到他們會揮舞棍棒強行驅散堵住大門的人，因此只好散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武鬥也就難免了，據說八一五派中有上百人受了傷，不過我在大院裏，沒有看見那武鬥的場面。

因為是有組織的、有預謀的，而且事先準備了“武器”，規模又相當大，後來，不管是反到底派還是八一五派，都把這一場武鬥當作重慶全面武鬥的開端。

衝出中山四路，靜坐的人就散開了。馬路上到處都是人，交通也斷了。幾個晚上基本沒睡覺，好疲倦，我只好回家。但是，因為發生了武鬥，公交車也停了，只好走路回家。我邊走邊打瞌睡，穿穿倒倒的，像喝醉了酒，路上人又多，于是就不停地撞人，撞一下醒一下，然後又睡。那時，我竟然想起看過的革命回憶錄《行軍捎帶睡大覺》。從上清寺回朝天門，有多里路，我也不知道我走了多久，回到家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才起來。

馬克思說：“革命是人民群衆的盛大節日。”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城市就充滿了這種“節日”的氣氛。解放碑周圍，到處都是大字報，到處都是人群。開始，大字報還很有內容，既有長篇大論，又有小品拾零。記得 1966 年 9 月期間，二十九中的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曾經在三八百貨商店（現重慶百貨商店）旁邊的牆上，定期張貼他們寫的《山城拾零》，文章短小，內容幽默，很受看，一貼出來就人山人海的擠著看。那時，人們圍繞大字報議論和辯論，都還比較講規矩。但是，到了 1967 年 5 月，大字報已經開始減少，代替大字報的是大標語。不管哪個貼出的大字報，一轉眼就會被對方用大排筆在上面塗抹成大標語。於是，滿城都是“熱烈歡呼……！”“強烈抗議……！”“嚴正警告……！”“誓死捍衛……！”“堅決砸爛……！”之類。圍繞大字報進行議論和辯論的也沒有了。即使有一兩個不怕事的，出來說一兩句，馬上

就會遭到不同觀點的人反對，“文鬥”也就很快會演變成“武鬥”。雖然如此，人們還是那樣激情滿懷，在解放碑轉悠，感受那種“節日”氣氛。

1967年的整個5月份，形勢真是大起大落。5月16日，中央出了“紅五條”（即《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宣告“革聯會”“壽終正寢”，引起八一五派不滿。然後又有毛澤東表揚駐軍的批示，又給八一五派打了強心針。由於駐軍堅決支持八一五派，八一五派實際上掌握著大權，反到底派往往受壓。因為受壓，就更不服氣，爭鬥也就更加厲害。接著，“省革籌”的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又分別跑到重慶來。雖然張國華不表態，但梁興初却公開支持八一五派，劉結挺、張西挺又公開支持反到底派。他們各自暗中活動，使兩派更加對立，爭鬥也就更加激烈。

我們學校在南山的半山坡上，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可能是由於原八一五戰鬥團團長鄭望生在“砸”和“保”中騎牆，學校裏兩派之間矛盾並不激烈，相處也還算友好。因此，兩派的人都覺得呆在學校沒意思，不能感受“大好”的革命形勢，於是紛紛到周圍的工廠去“學工”，名為參加勞動，實為參加武鬥。我們井岡山戰鬥團聯繫了三聯柴油機廠（後改為重慶柴油機廠），這個廠在海新街上，離南岸區區政府所在地上新街很近，反到底派的人多且又掌權，有一幢單工大樓，在廠裏吃食堂也方便便宜（要自己掏錢）。“學工”期間，我們幫他們寫大字報，連車間也沒進過幾次，何談勞動。沒過多久，風聲就緊張起來，不少同學就紛紛回家，我却堅持下來。為了應對武鬥，廠裏的年輕人就用廢銼刀之類在砂輪上磨匕首。銼刀很厚，要磨成匕首需要耐心，也還需要一定的技術。聽說有人勁使大了，把砂輪也打爛了，幾乎傷到人。我也去磨了一把，還沒磨好，聽說這樣的事，也就放棄了。

那時重慶還沒有長江大橋，過河過水不方便，南岸也就相對落後。上新街一帶，反到底派居多，也就相對風平浪靜。我家住在朝天門，覺得廠裏呆著沒意思了，我就回家，進城看大字報，聽小道消息。那時的大字報已經很少有揭露批判走資派的內容了，

大多是哪兒發生了武鬥，哪兒又打傷了多少人之類。雖然還沒有開始動槍動炮，但讓人感覺到戰爭似乎已經打響。雖然到處都在武鬥，不知為何，却沒有引起人們的恐慌，反而讓人們興奮不已。如果哪兒真的發生了武鬥，人們不但不躲避，反而要圍上去看熱鬧，有時候也有人因此被誤傷。但只要有武鬥，圍觀的人總是那麼多，甚至比參加武鬥的人還多，成為當時重慶城的一大怪現象。

1967年6月5日，北碚的西南師範學院（簡稱西師，現西南大學）發生大規模武鬥，反到底派的西師八三一圍攻八一五派的春雷兵團占據的圖書館大樓，春雷兵團向重大八一五求援。6月7日，重大八一五組織武鬥人員前去解圍，終於打退西師八三一，解了春雷兵團的圍。6月8日，為防止遭受報復，八一五派決定撤離北碚。他們剛剛撤退，反到底派的援軍也趕到了，立即跟蹤追擊。反到底派去支援的人大多來自軍工企業的軍工井岡山，在施家梁追上八一五派的支援大軍，一場截擊戰，八一五派吃了虧，重大八一五總團負責人、“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獲。這場武鬥從6月5日到6月8日，前後持續四天之久，先是八一五派得手，後是反到底派獲勝，規模巨大，影響深遠。事後，兩派都在思想上、組織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總結經驗教訓。像八一五派的重大三〇一、反到底派的望江“金猴”等專業武鬥隊，都是在那以後不久成立的。因此，這場戰役被許多人稱為是“揭開了重慶造反派兩派大規模武鬥的序幕”。其實，“序幕”在5月2日反到底派解救靜坐“革聯會”戰友時就已經揭開，“六五”事件表明武鬥已經升級，規模已經擴大到全市。

過了幾天後，反到底派在體育館開大會，會後我和學校幾個高中同學搭西師八三一的車到北碚去，參觀了“六五”事件的現場，只見那圖書館大樓房頂的瓦片全部被打爛，一片狼藉，可以想見當時戰鬥的激烈程度。西師主要是文科，女生又多，學生應當相對文弱一些，却也這樣“英勇戰鬥”，讓我們感慨不已。

北碚在重慶市區西北，離市區有四五十公里，背靠縉雲山，面臨嘉陵江，因風景秀麗并有北溫泉而著名，很早之前就被稱為“重慶的後花園”。西師就在縉雲山下，即使在搞武鬥，那校園裏

依然大樹參天、綠蔭蔽日，隨處都還可以看到花紅草綠的景象。我們大多都是第一次去北碚，武鬥的事並沒有耽誤我們的耍心，第二天我們就跑到北泉公園去游玩。第三天我們回城裏，那時從北碚坐公交車到牛角沱要一元多錢，雖然大多數人荷包裏可能都有，但却捨不得，都說沒有錢，于是就決定走路進城。走到半路上，有的人强行爬車，有的人悄悄搭公交車走了，只剩我和一個叫蘇祖斌的高三同學繼續走。走到同興，我去了一个親戚家，他則走回井口他的家。

“六五”事件後，武鬥的衝擊波更是四下漫開，開始席捲全市各個角落，文鬥也就逐漸被武鬥所淹沒。哪個單位、哪個地區如果沒發生過武鬥，那肯定是其中一派勢力太弱，人數太少，只好偃旗息鼓任別人擺布，或者就逃之夭夭。一個單位也好，一個地區也好，如果兩派勢均力敵，那武鬥肯定激烈而精彩。于是，那大街小巷的大字報、大標語也全改了內容，幾乎充滿了清一色的火藥味：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向×派討回血債！”

“人血不是水，血債要用血來還！”

“強烈抗議……！”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歸然不動！”

.....

先是棍棒加磚頭、石塊，然後是鋼針、長矛加“騎兵進行曲”，然後是步槍、機槍、大炮、坦克、軍艦……于是，武鬥就逐漸演變成戰爭。

9. 拼鋼釺

“六五”事件後，雙方都開始緊張備戰，準備木棒、鋼釺，囤積磚頭、石塊，修築工事、戰壕，組建武鬥隊、敢死隊。雖然駐軍不斷發通告，要制止武鬥，但越制止武鬥越厲害，到後來，駐軍中也有人陰悄悄地參與到武鬥中來了，或明或暗地支持某一派，甚至成為武鬥當事的一方。大坪、石油路、袁家崗這三角地帶，有河運校、石油校和機製校、五一技校等好幾所技校，還有重慶醫學院（簡稱重醫），兩派勢力相當，加上技校的學生有力氣，本來就愛打架鬥毆什麼的，武鬥也就特別厲害。

重慶文革戰爭是從拳頭到棍棒，從鋼釺到槍炮到軍艦、坦克，一步步升級起來的。人類完成上述升級過程，經歷了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而重慶人却只用了一兩個月的時間，便走過相同的歷程。拳頭棍棒小意思，不必說了，只說拼鋼釺，那氣勢那陣仗，也足以令現而今的武打片相形見绌。

所謂鋼釺，其實就是長矛，用直徑 20 毫米左右的鋼管做成。水管要不得，太重，揮舞起來不靈活。鋼管的一頭要錘扁，以增強殺傷力。這樣的鋼釺可以刺，可以打，但一般難以致人于死地。像我在第二節所說的那次武鬥中，那人被我用這樣的鋼釺猛地刺中喉頸處，雖然痛得他急忙捂住那喉頸，退了下去，揉一揉，却也無所謂了，于是又可以端著鋼釺殺上來。後來，為了增加殺傷力，又在鋼釺上面插一把刺刀。那時，建設廠大量生產半自動步槍，那槍上要裝那種約兩尺長的帶血槽的三棱刺刀，于是便拿來裝備鋼釺。找不到這種三棱刺刀的，便用三角刮刀代替。連三角刮刀也找不到的，便找來鋼條、鋼帶或廢銹刀之類，在砂輪上磨成帶尖帶刃甚至帶血槽的家伙，固定在鋼釺上。有的甚至還把那刺刀

磨一兩個倒鉤，相似于古代的那種鉤鎗槍，一旦刺進人肉裏再扯出來，就會帶出一大塊肉。與古時候趙雲、岳飛之流使用的什麼金槍銀槍相比，那鋼針更加了得，也更加管用。雪亮雪亮的刀尖槍刺在陽光下閃著寒光，誰不虛他三分？

拼鋼針講究人多勢衆。一排排人，穿著清一色的勞保服和勞保皮鞋，藤帽壓得矮矮的，有的還戴上一個大口罩，一人握一根鋼針，在口哨聲中一起進一起退。文革中，到處都是高音喇叭。武鬥一開始，便放“騎兵進行曲”、“解放軍進行曲”之類旋律激昂的音樂。也有的武鬥隊有自己的戰歌，武鬥時就放那戰歌來助威。反到底派的河運校航鋒戰鬥團，把“水兵進行曲”作為自己的戰歌：“紅旗飄舞隨風揚，我們的歌聲多麼嘹亮。人民海軍向前進，保衛祖國海洋信心強……”那旋律也很激昂。這樣，在氣勢上便先勝一籌，那表面上的威風也足以嚇倒膽小的人。

隨著武鬥升級，鋼針做得越來越長，有的竟達一丈餘。拼鋼針的戰術技術也日益改進，漸趨完善。那年月，“全國學解放軍”，工廠學校都要進行軍事訓練，年輕人誰都會幾手拼刺刀的動作，誰都知道“二百米內硬功夫”、“刺刀見紅”等軍事術語。

“突刺——刺！”

“殺——！”

“防左——刺！”

“殺——！”

“防右——刺！”

“殺——！”

各個學校的操場上，都可以見到演練的武鬥人員。重慶的軍校多，那時，軍校的學生和教員也分成兩派，他們主動到各個學校去當軍事教官。教官耐心教，武鬥隊員認真學，哪怕烈日當頭，哪怕他滿頭大汗渾身濕透，也不喊苦不叫累。于是，戰鬥技術大長進，戰鬥力也逐日增強。

拼鋼針，雙方面對面，關鍵在於不要虛，不要怕，要有敢拼敢打的氣勢，當然也要有力氣。兩軍對壘，扎斷馬路，各吹各的口哨，一起進，一起退，不戰上十來個回合，不會收兵。拼鋼針時，

即使害怕，也千萬不能丟掉鋼釺轉身逃跑。如果那樣，屁股上絕難逃脫被戳幾個窟窿的下場。而且，一人逃，便會影響整個戰鬥隊，非吃敗仗不可。因此，一般情況下，總是讓身強力壯的、不怕死的大個子站第一排。只要這第一排亡命往前衝，把對方的隊伍衝散衝亂，就能獲勝。

1967年5、6、7三個月，重慶到處都在進行鋼釺大戰，冒出好多“武鬥之花”。特別是那些技校的，很是了得。鋼技校的，一律白色勞保服，可能最威風。石油校的，則戴清一色的鋁盔，可能最管用。機製校是八一五派，河運校是反到底派，兩個學校又相距不遠，戰鬥力特強，也就最出名。石油路、袁家崗一帶經常擺戰場，三天竟有兩次，一打起來便不分勝負不收兵。于是，雙方都有傷亡。

後來，為了減少傷亡，有人發明了盔甲。那是用一塊鋁板做的，吊在胸前，銀光閃閃，足以抵擋那刺刀槍刃。其實，吊一塊鋁板，人不靈活了，反而容易被對方刺中。不過，那鋁板鋁盔的武裝，在氣勢上似乎又略勝一籌了。

拼鋼釺除了在馬路上對陣，更多的是進攻和防守武鬥據點。學校的教室大樓往往被某一派所占，樓梯口用桌子椅子堵死，只留一條彎彎曲曲的低矮通道，叫做工事。窗口也用磚封死，只留一些小口好投擲磚頭石塊。屋頂則堆滿磚頭石塊，那是守方的主陣地。不知是誰最先發明了那種大彈弓，真可以記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彈弓架用大板凳做，那橡膠帶足有手掌那樣寬那樣厚。大板凳固定好，三五個人一起來拉那橡筋帶，竟能將半截磚頭或拳頭大的鵝卵石射出好幾十米遠。用作進攻，用作防守，都行。

武鬥據點戒備森嚴，易守難攻，加上又有高音喇叭，可以呼喊本派的戰友來支援，因此往往是進攻的一方吃虧。磚頭石塊從樓上雨點似地飛下來，就是戴了藤帽，往往也受不了。一旦吃虧，還不好說，畢竟你是主動進攻，撞進了別人的地盤。所以後來攻打對方武鬥據點的戰鬥便逐漸減少，除非那個據點的確太當交通要道，太有戰略意義，非拿下來不可。

萬一哪個武鬥據點被攻下，那防守的一方就慘了。挨一頓飽

打不說，被關進黑房子不說，甚至被拉出去游街示衆也不說，只說逼你寫悔改書，寫反戈一擊聲明，就叫你受不了。那時候的年輕人，誰沒讀過《紅岩》？誰沒看過《烈火中永生》？誰沒有參觀過渣子洞、白公館？誰不知道特務逼地下黨志士使用的那些酷刑？于是，便借用來對付俘虜，而且還有新的“發明創造”！最典型的是坐“土飛機”。俘虜被押到操場上，四個彪形大漢一人捉一隻手腳，一起高喊“一一二二三”，然後往上一拋，然後手一鬆，那俘虜便被扎扎實實摔在水泥地上，就像砸夯墩一樣。一下兩下，那俘虜還清醒，還儘量把頭向上抬，儘量讓屁股去觸地。三下四下，那骨頭便散了架似的。五下六下，俘虜終於昏死過去了。

還有一種酷刑叫鑽“工事”。把俘虜雙眼蒙住，拉著往前走。喊“伏倒”，其實什麼也沒有。俘虜剛把頭抬起，“砰！”碰到了桌子，眼冒金花。左彎右拐，上上下下，或輕或重，腦殼不知要撞多少下，整得昏昏沉沉，癱倒在地才會讓你歇氣。

有幾個人受得了這樣的酷刑？于是便在那寫好的悔改書上簽字，在那反戈一擊的聲明上按手印。那年月，到處都貼滿這種悔改書和聲明，但誰也不信。一旦被釋放，便揭露，便控訴。除了極少數，大多反而更“鋼”，武鬥起來更亡命，不報仇雪恨不罷休。

不能說沒有膽怯的人。真正膽怯的人大多離開學校，回家跳“鍋邊舞”（煮飯）去了。留在學校搞武鬥的，多少都有些英勇。拼鋼釘時，丟了鋼釘逃跑的，畢竟很少。相反，倒有不少“英雄”演出了一幕幕壯劇。據說，重醫有個反到底派的武鬥人員，在袁家崗的一次戰鬥中被衝散，一個人被對方七八個人圍住。那時，他的肚皮已經挨了一鋼釘，腸子都流了出來。只見他靠著一根電杆，手不丟鋼釘，只用那手倒拐把那流出來的腸子按進肚子裏去。然後，猛地一聲大叫：“殺——！”把那七八根鋼釘從左到右，從右到左，一下子全撥開，然後向前猛衝過去。那七八個人竟被他那一聲大吼震住，全都發楞，讓出道來。他衝過馬路，衝回自己一派的陣營中，方才倒下——腸子雖然流出來，却未死。不知其人現在何方。

拼鋼釘既要勇敢，又要有力氣，竟然也會有女生參加。那

時，南岸黃桷垭的四中是一所女子中學，學生全是女孩，也分成兩派，也要搞武鬥。其中一派打不贏了，便到山下去請三十九中的戰友來支援。三十九中的一夥人上了山，只見公路上排了好幾排人，那手握的鋼釺好長好長。又是晚上，月黃星疏，看不真切，三十九中的人先自虛了一頭。轉身逃跑，在女戰友面前似乎又太丟面子（重慶話叫髒班子）。好歹還是男子漢，于是又雄起，硬著頭皮殺上前去。一交手，才發現對方全是女生。穿的是勞保服，頭髮又全攏進藤帽裏，哪能分清是男是女！畢竟女生力弱心怯，鋼釺剛剛才與對方的接觸，便有人尖叫起來。只兩個回合，就有人丟下鋼釺轉身逃跑。三十九中的男生一個衝鋒，便將其衝散，看著對方四處逃跑，也不追趕，只在後面哈哈大笑。

當然，女生中也不都是這樣的，也有女中豪傑。特別是在河運校、五一技校、機製校、工業校這樣的一些技校裏，有些女生長得牛高馬壯的，往往又有一身男娃兒脾氣，照樣搞武鬥，照樣拼鋼釺，并不比男生差。拼鋼釺講究集團作戰，穿上勞保服，戴上藤帽，混在那武鬥隊伍中，哪個又能分別出是男是女？“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當年傳說，某技校反到底派中就有這樣一個女生，長得牛高馬壯不說，還有一副俠義心腸。讀書時，就曾和好幾個男生打過架，竟然能贏，以至再沒有男生敢惹她。背地裏，男生罵她是“母老虎”，是“孫二娘”，是“顧大嫂”，當面却只有嘻嘻哈哈討好。武鬥一開始，她就介入，把頭髮剪得很短很短，扣上藤帽，套上勞保服，竟然分不出是男是女。却說有一次拼鋼釺，雙方各占一邊馬路，整整齊齊列著隊，人人手中握一根鋼釺，爲首的吹著口哨，一起進一起退，很有些古代戰爭的味道。更絕的是，雙方接近後，並不立即廝殺，而是各出一名“大將”，先進行比試，與《三國演義》、《水滸》、《說岳傳》等書上所寫相同，只是沒有馬戰，沒有戰馬嘶鳴罷了。高音喇叭裏播放的“騎兵進行曲”和“水兵進行曲”，可能比擂戰鼓還要叫人熱血沸騰。這女生自恃力大勁足，硬要去充那先鋒大將，當頭的拗不過，只好同意。對方出馬的是一大漢，矮墩墩的，黑蠻蠻的。待他接近細看，發現對手竟是一

女生，不明究竟，取勝心切，大吼一聲：“殺——！”便將那鋼針直刺過來。那女生一下閃開，那大漢刺了一個空。不待那大漢將鋼針抽回去，那女生竟將自己手中的鋼針一丟，雙手抓住對方刺來的鋼針猛地一拉，差點兒把那大漢拉一撲爬。對陣的人見了，竟忘了衝殺，齊聲喝彩。那大漢沒見過這樣的戰法，好容易穩住腳，與那女生拉扯起來。那鋼針你拉過去，我扯過來，兩人在那陣前拉拉扯扯，竟轉起圈子來。對陣的人全都看神了，就讓他二人鬥。那大漢見鬥不過一女生，覺得好沒面子，好髒班子，便猛一使勁。沒想到，那女生却忽地一鬆手，那大漢用力過猛，一個仰翻叉，跌倒在地上。剛好他又轉到對方一派的陣前，不待他站起，便被一涌而上的對方武鬥人員捉住。大漢一方的人見狀，一起撲過來，于是便開始一場大戰。只見鋼針刺來刺去，叮叮噹噹亂響。那女生却趁機溜到陣地後面，坐在馬路邊喘氣去了。從此，那女生名聲遠播，人們說起，都只用一個字評價：“凶！”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或許值得懷疑，但女生參與武鬥的現象，在兩派中都很普遍，有的甚至還當上頭頭，直接指揮武鬥。到後來動用槍炮，不再只是拼力氣了，女生在戰爭前線參與拼殺的也就更多。

10. 我的第一場武鬥

父母從小把我約束得緊，我沒有和別人打架的習慣，也幾乎沒有和別人打過架。讀小學，讀初中，雖然也和同學發生過矛盾衝突什麼的，但我都是憑自己的好成績和好出身來炫耀自己，從來沒想到過要用拳頭。我從小下力，有力氣，如果真要打架，至少在力氣上要占個“起手”（先手）。但我覺得，用打架來炫耀自己，那就太低級了。

1967年2月，“二月鎮反”還沒開始的時候，幾個同班同學回到學校來，我不知道我和盧光忠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得罪了他們，他們也沒說，就把我與盧光忠攔住，把盧光忠鼻子打流了血，我也挨了一耳光。後來才知道，他們在家裏操了“扁褂”（練武術），想回到學校來顯一下威風。學校裏只有我和盧光忠在，讀書時我又很強勢，說話水衝衝（四川俗話，指高傲、好出風頭、說話得罪人）的，讓他們對我不滿。他們人多，我和盧光忠都沒有還手。但是，我們一旦逃出來，馬上向高年級的同學報告。那時，人們對操“扁褂”人很不“感冒”，甚至把他們當作流氓。這樣的人竟然敢于到學校來耀武揚威，破壞文化大革命，哪還得了？於是，就把他們全都抓了起來，關在教室裏，狠狠地教訓了一通。即使這樣，我也沒有動手，只是對他們說：“在學校你們是操不走的！”可能正是因為這樣，後來他們都和我成了好朋友，其中幾個甚至下鄉時都硬要和我走到一起，到了一個大隊落戶。

後來“回校復課鬧革命”了，又有同學想把我壓下去，甚至還找人帶信來威脅我，我也不理他們。有一次在上新街開大會，他們幾個和我走在一起，只見一路上和我打招呼的人太多，甚至還有人專門買來包子之類給我們吃，讓他們吃驚。後來，他們告

訴我，你的兄弟夥（朋友）太多，不敢和你踩手踩脚了。

我這樣一個從來不打架的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偏偏成了武鬥的參與者，而且在武鬥中，在戰爭中那樣英勇，那樣亡命，一有什麼任務，一有什麼危險，都要自告奮勇，都要爭取前往，這讓我至今想來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後來在黃山紅二連，我當了班長。有一次去汪山，遇到城建兵團一個外號叫“疤子”的。那人是南岸泡石廠的工人，那泡石廠就在我們學校後面，我們認識。他瘦小不說，那臉不知是被燒傷過還是生來如此，讓小孩看了就害怕。他弄了一個駁殼槍的槍盒子，背在身上，吊在屁股邊，在街上走來走去，耀武揚威，像電影中的漢奸特務。我見了，對他說：“你這槍盒子裏連槍都沒得，出什麼洋相喲？”他還嘿嘿笑，然後問我：“你真的敢打槍啊？”他知道我喜歡文學，會寫詩（當時只能寫打油詩），以為我和他一樣，背一隻槍在身上只是裝腔作勢。我好生氣，把背上的半自動步槍取下來，向他一揚，說：“未必我這‘半自動’是燒火棍？”

其實，非但是我，相當大一部分參加過武鬥的人，可能都與我一樣。特別是那些當頭頭的，很多人原來可能踩死一隻小蟲蟲也會驚叫喚。例如我們南山中學井岡山戰鬥團的一號頭頭，高高的，瘦瘦的，讀書時就是一個才子，溫文爾雅，一副學者派頭，後來也的確成了教授學者，武鬥中他却那樣英勇，從來沒有看到他畏縮過。還有二中有個叫“假姑娘”的男生，一個娘娘腔，一副女生動作，後來竟成為中學生反到底司令部的頭頭，在武鬥中叱咤風雲。這也是文革中說不清楚的一件怪事。

我經歷的第一場武鬥是在柴油機廠。好像是 1967 年 6 月底的一個晚上，我住在柴油機廠的單工宿舍裏，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陣喊叫聲驚醒。我一睜眼，只見窗外的山坡上手電筒光晃來晃去，石頭磚塊從那山坡上飛進來。有人在喊：“‘老保’打來了，快起來！”我立即從床上躍起來，抓起床頭的一根鐵棒就衝到樓梯口。

由於在廠裏占多數，又掌著權，柴油機廠的反到底派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人來進攻，也就沒有認真備戰。哪知這天晚上，以二機床廠的人為主力，八一五派突然來偷襲。二機床廠又叫惠工機

床廠，廠址在南坪，離柴油機廠不遠，雙方雖然沒有交過手，但同屬機械局管，可能是自恃力量強，便主動進攻。幾輛卡車開到樓下，從車上跳下的人拿著鋼釘之類，就往樓裏衝。幸好因為天熱，樓下還有不少人沒有睡覺，把偷襲的人擋了一下。隨著叫喊聲起，就有人起來阻擋。我衝到樓梯口時，偷襲的人已經衝上二樓，三樓樓梯口只有黃景華一個人在阻擋。由於那樓梯口很狹小，攻樓的人只能一個人在前面，後面的人也幫不上多少忙。只聽見鋼釘鐵棒敲擊的聲音，乒乓乓的。突然，黃景華“唉喲”一聲叫，丟掉鋼釘急忙退回，只見他用手捂著頭，鮮血直流。原來，他被窗外射來的一顆石子打中受傷。這時，進攻的一方已經退去。

黃景華是柴油機廠的工人，據說參加過抗美援朝，開過坦克。他身強力壯，總是一張笑臉，又愛幫助人，在廠裏很有威望。如果不是他堅持阻擋，八一五派可能已經衝上樓來了。見到他那滿臉鮮血，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立即高大起來，成了英雄。可能是因為那時我還年輕，也可能是因為我心中本身就有很強的英雄情結，我真的把他當作了英雄。

我不知道黃景華在朝鮮戰場上立沒立過戰功，但整個武鬥期間，他的所作所為，的確表現出了一種英雄的氣概。後來到了黃山，黃景華成了黃山炮兵排的司機。有一次，他開車從望江廠拉一車炮彈上黃山，在那九彎十八拐的山路上，卡車駕駛樓頂原來因架設機槍而放在上面的一床草墊，被抖得掉落下去，剛好落在那排氣管上。盛夏季節，那排氣管幾乎發紅，不一會兒那草墊便燃燒起來。正是快天黑的時候，黃景華從後視鏡裏發現有火光，急忙停車檢查。車上的人看車停下了，才發現失火，嚇得跳下車四散亂逃亂躲。黃景華却鑽進車肚皮裏，去扯那燃燒的草墊。草墊已經燒爛，一扯只有一點點。火勢熊熊。一旦竄進車廂，後果不堪設想。可是，他却不聽其他人的喊叫，又是撲打又是亂扯，身上手上被那火燒成一個個大泡也不退後，終於將那燃燒的草墊全都扯了出來，奇迹般地把那火撲滅，一場慘禍得以避免。你說，這不是一種英雄行為嗎？

四人幫垮臺後，黃景華被當作幫派分子抓起來，被判刑，被

關進監獄好幾年。雖然後來得到平反，但肯定沒有人把他當作英雄的。如果撇開政治因素，我敢說，就是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他的那些行爲所包含的英雄性質。我一直被他所感動，1969年初，我們當學生的被下放到農村之前，有段時間無事做，我還專門爲他寫過一個小說。只可惜那小說底稿不知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也就再也寫不出來了。

可能是黃景華那滿臉鮮血激發了我的戰鬥激情，我不但沒有害怕，反而提著那根鐵棒就衝下樓去。進攻的八一五派已經乘坐汽車跑了，馬路上到處都留下磚頭石塊。後來聽說，二機床廠的一個八一五派崽兒被樓上投擲的磚頭打中頭部，當場死亡，這才逼迫進攻的八一五派撤退。如果不是這樣，八一五派有備而來，我們要守住那大樓肯定很難。一旦他們衝上樓來，那我們就慘了。

這是我經歷的第一場武鬥。從被人叫醒，到衝下樓去，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雖然我沒有和對方廝殺，甚至沒有投擲過磚頭石塊，但我却沒有感覺到一點兒害怕，反而情緒高漲，鬥志昂揚，一股英雄情結油然而生。我這樣的英雄情結，現在看來的確有些好笑，但在當時，却激勵著成千上萬像我這樣的人。

八一五派的偷襲，讓柴油機廠的反到底派加強了戒備，樓梯口修築了工事，面向山坡一面的窗子也用磚堵上，樓上也準備了鋼針之類。看到柴油機廠已經成了前線，有的同學(主要是女同學)紛紛回家，而我却留了下來，在廠裏堅持。

過了幾天，突然聽說八一五派又要來進攻。爲了迎戰，廠裏的頭頭決定把廣播器材轉移一下。我去搬擴音機，哪知一下就把電線接頭拉斷了，那線頭正好被右手握住。由於匆忙，搬動前又沒有關掉電源，我只覺得那電流在手上燃燒，渾身劇烈顫抖起來，於是便“唉喲唉喲”大叫起來。一個同學見了，急忙把燈關掉，哪知那電源並不來自於燈泡開關，我繼續大叫著。那時，我頭腦還相當清醒，想用左手去扯掉電線，但燈一關，室內就黑暗了，我不敢亂動，怕再拉到一根電線就更糟糕了。聽見我的叫聲，又有人去關掉閘刀。哪知他關掉的又是那巷道對面一排房間的電源，我依然大叫。黑暗中，另一個同學提起一根板凳，在地上亂撥拉

一通，終於把電線從我手上拉開，我才解脫。

這是在武鬥中經歷的第一次危險。

被電擊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被大家送到工廠背後的南岸區第二人民醫院（現港口醫院），躺在座椅上，心咚咚亂跳。醫生來聽診，說我心跳每分鐘達到 200 多下。這可能是電擊造成的，也可能有我心情緊張的因素。後來我分析，我握住的可能是兩股線，火線和地線在手上短路，電流不再通過心臟，否則我就可能因觸電而身亡了。那電流在我手上燃燒，把我的手燒得糊糊的，一股糊臭味，食指、中指和大拇指腫得像三根甘蔗一樣粗，但却沒疼痛的感覺。醫生只是簡單地給我處理了一下，可能是上了點消炎之類的藥，就讓我走了。因為是右手，連吃飯都麻煩，我只好回家。養了幾天，炎就消了，也就沒事了。

武鬥期間，我經歷過好幾次危險，但每次都能幸運地逃脫，只有這一次留下了傷痕。不過，那僅僅只是在手上留下的幾條小傷痕，如果不注意，甚至也看不到。因此，別人都說我命大福大。

11. 武鬥升級為戰爭

武鬥加劇了兩派之間的仇恨，仇恨反過來又加劇了武鬥，促使武鬥不斷升級。當拳頭打不過對方，就可能拿起棍棒；當棍棒也打不過對方，就可能使用鋼針；如果鋼針也不能占到優勢，那麼槍炮等熱兵器就呼之欲出。經過兩個多月的武鬥“實踐”，兩派都積累了經驗，都在加快走向戰爭的步伐。

重慶武鬥中，第一次使用槍支是1967年7月7日。那天，八一五派的六中三二一一戰鬥團進攻地處嘉陵江橋頭的反到底派二輕兵團。二輕兵團眼看守不住了，就把保衛科的小口徑步槍拖出來，打中了正在翻越圍牆的兩名八一五派進攻者，守住了占據在橋頭的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

那時的小口徑步槍主要用于體育訓練，機關、企業、學校都有。我沒有打過，但上體育課時，老師拿來給我們看過，教我們如何瞄準。這種槍結構簡單，子彈直徑很小，裝一顆打一顆，據說射擊精度不錯。高中同學用這種槍進行體育訓練時，我們去圍觀過，那槍聲不大，好像射程也不能太遠。雖然如此，但畢竟是槍。在兩派的武器都還是鋼針時，有一支這樣的槍，已經十分了得，超越了人們能理解的有關武鬥的範疇。因此，聽說動用了槍支，駐軍立即派了幾車全副武裝的士兵前去收繳。收繳好像沒有成功，但却迫使二輕兵團撤出嘉陵江橋頭。八一五派用一條人命的代價，在駐軍支持下，占據了這個戰略據點。

雖然有這次動用槍支的武鬥，但那還只是個孤立事件。重慶武鬥升級為戰爭的標志，還是八一五派使用槍支進攻工業校的“七二五事件”。

工業校紅岩兵團原來名叫八一五戰鬥團，是一支老牌的造反

派隊伍。因為反對“革聯會”，于1967年4月上旬正式倒戈，加入到反到底派行列，并更名為紅岩兵團，成為鐵杆砸派。工業校堅持保“革聯會”的人為數不多，早已“主動”撤離，學校便成了反到底派的一個重要武鬥據點。化龍橋地區的二中、幼兒師範學校（簡稱幼師）、汽車二十二隊等單位的反到底派在本單位呆不住的，也聚集在工業校，平時據點裏或多或少都有兩三百人。

紅岩兵團這個名字得名于紅岩村。紅岩村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所在之地，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都曾長期在此住過。1945年毛澤東從延安來重慶談判，也曾住過紅岩村。因此，紅岩村很早就建得有紀念館。工業校就在紅岩村附近，離紀念館那幢大樓不遠。紅岩村地處沙坪壩到市中區的交通要道邊，每次八一五派的隊伍路過，紅岩兵團都要出來挑釁，出來攔截，早就被八一五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就在7月24日，這兒就發生了兩起衝突，八一五派在衝突中都吃了虧，還有車輛和人員被扣。後來，紅岩兵團雖然放還了被扣的其他人員，却把生產高射機槍子彈的嘉陵機器廠（簡稱嘉陵廠）的一名軍代表扣下，說是要交“警司”（重慶警備司令部，後改為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即重慶駐軍五十四軍部）處理。早在幾天之前，八一五派就已經策劃了這次進攻，紅岩兵團扣押了解放軍，正好成了進攻的藉口。

槍聲響起的時候，紅岩兵團的人還在睡夢中。被驚醒後，一個崽兒趁着夜色，爬到大樓房頂上去觀察。他的腦殼剛剛冒出屋脊，一顆子彈飛來，正好打中他，頓時腦漿四濺，當場斃命。跟在後面的人只聽得一聲慘叫，駭得連滾帶爬，急忙退了回去。

其實，從大規模武鬥開始以來，工業校就多次遭受過八一五派的攻擊。但是，紅岩兵團依仗著學校地形和武鬥隊人多和亡命，每次都能“巍然不動”。雖然已經有人被打死，却沒有人感到害怕，反而激起了辦公大樓裏那些武鬥人員更大的戰鬥激情。

廣播裏吼著：“保麻兒，來啊，衝啊！小心地雷喲……”

從全市各個單位調來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從前後兩個方向包圍著工業校。可能是真的害怕踩響地雷，或者是因為其他什麼

原因，八一五派並沒有發起衝鋒，只是躲得遠遠地，不時放上幾槍過過乾癮。到後來，槍聲也漸漸稀疏下來。

天亮以後，八一五派的幾名軍人進入紅岩兵團堅守的辦公大樓，要求帶回被扣押的軍代表。紅岩兵團見來的是軍人，只好釋放。軍人們趁機對大樓裏的情況進行了仔細的觀察，沒有發現大樓裏有槍支彈藥。退出大樓後，又對地形地勢進行了仔細觀察，哪有什麼地雷！此時，由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的專業武鬥隊三〇一帶隊，沙坪壩區的武鬥隊也趕來了，進攻的隊伍陡然增加到上千人。於是，八一五派開始第二輪攻擊。兩挺機槍，一輕一重，開始掃射。這一次，衝鋒的人相當大膽，吶喊著向大樓進攻。他們大多手持鋼鉗，也有的手持七九步槍，槍上的插著刺刀。還有的手持1950年式（俗稱“格蚤龍”）衝鋒槍，大多沒有子彈。樓上的人用石頭磚塊還擊，哪能阻擋得住進攻的浪潮。

于是有人大喊：“快把槍拿出來！”

幾天前，便有人向市裏的反到底派頭頭們建議，要求將建設廠生產的槍“提”出來，發給大家，以備無患。反到底派的頭頭們商量來商量去，終於膽怯，不敢下決心。此刻，工業校據點裏只有幾支小口徑步槍，而且大多還打不響。在步槍、衝鋒槍、機槍面前，這小口徑步槍簡直就像一根吹火筒，拿出來又能起多大作用呢？放了幾槍，子彈便完了，也不知打沒打中對方的人。據說，進攻的八一五派中有兩個人被打死，但不知道是不是這小口徑步槍打死的。由於死了人，八一五派又停止了進攻。雙方對峙，一混又是幾個鐘頭。

終於，進攻者發怒了，一聲令下，機槍、步槍子彈一齊朝防守者扼守的大樓射擊。

一發土製炮彈打中了教學樓三樓的一個窗臺，當場炸死幼師的一名女生。

槍聲却越來越密，衝鋒的吶喊聲一浪高過一浪。

於是，據點裏的紅岩兵團垮了。戴著“八一五”袖章的武鬥人員端著槍，端著鋼鉗衝進了大樓，紅岩兵團的人只有舉手投降，每個人背上都免不了挨槍托，挨鐵棒，挨拳頭，連女生也不能幸

免。罵聲、哭聲、叫喊聲此起彼伏。接著，200 多人便被押出大樓，押上卡車，押回八一五派的根據地沙坪壩。

這一仗，反到底派被當場打死九人，後來還有一人被俘虜後因傷勢過重又得不到醫治而死，八一五派大獲全勝。

這一仗，拉開了重慶文革戰爭的序幕。《重慶市志·大事記》說：“其後，全市各地相繼發生搶劫國防工廠和駐軍武器、彈藥事件，全市武鬥升級。”

插曲：

紅岩兵團的一個頭頭，號稱“武鬥之花”，在大樓被攻破之前片刻，獨自溜到樓底，躲在那廁所裏。那廁所早已被堵住，污水積了一尺多深，又黑又暗。爲了活命，哪顧得髒，哪顧得臭，一咬牙，趴了下來，伏在那污水中。兩個獲勝的進攻者提著一支衝鋒槍、一根鋼針來搜漏網的“魚”。那廁所太髒太臭，污水又那麼深，看也看不清。一個說：“管他的，掃他一梭子！”那伏在污水中的“武鬥之花”聽見，七魂飛了六魂，只等槍響即死。那提衝鋒槍把槍栓嘩地拉了一下，端起槍正要掃射，又將槍放下，說：“算了，只有兩發子彈了，這樣打了不划算。”另一個說：“哪啷個辦？”提槍的道：“把鋼針給我。”然後接過鋼針，站在那廁所門口，在那污水裏劃了幾下。“武鬥之花”躲在最裏面，鋼針沒能碰到他。兩個勝利者以爲沒人，轉身走了，那“武鬥之花”才撿回一條命來。後來，我們“逃難”到成都，住在省機械工業廳，一天吃飯時，有朋友指著一個腰間隱隱約約可以看出插著一支手槍的重慶崽兒告訴我：“就是他！”可惜，那時這樣的故事我聽多了，也沒在意，如今留下的印象只是他那滿臉的殺氣和疲憊。

1969 年 9 月，我在忠縣望水公社當知青，因勞動積極表現好，被推薦爲知青代表，前往萬縣參加萬縣專區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結識了一個來自雲陽的原重慶二中的知青。會議期間吹開龍門陣時，說到這個故事。他說，這肯定只是一個

傳說，絕對不是真實的。當時，他也參與了進攻工業校的戰鬥，手上也有一支“格蚤龍”衝鋒槍。他告訴我，那槍裏根本就沒有子彈，打不響，只是駭人的。他說：“我們衝進大樓已經是下午了，那廁所裏怎麼可能藏得住人喲？”後來，他從農村調回重慶，在微電機廠工作，攻打工業校的八一五派前線總指揮陽增泰就是微電機廠的工人。

不過，工業校辦公大樓裏有300多人，八一五派攻下後只俘虜了200多人，除了事先跑掉的以外，肯定還有不少人躲藏起來，或藉著混亂或採取其他方法逃了出來。因此，這個故事在那幾年流傳很廣，也可能有一定的事實為基礎。

不知是老天爺的有意安排，還是歷史故意要留下一個迷團，1968年9月12日，紅岩兵團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從逃難中的駐地體育館“殺”回學校，要和八一五派搞“革命大聯合”，成立學校的革委會。可能是學校的八一五派力量依然不能壓倒紅岩兵團，也可能是為了報復反到底派曾經對他們的打擊，當紅岩兵團的人排列著隊伍，吹著口哨，雄糾糾氣昂昂地沿著那上坡的公路走向校門時，突然槍聲大作，遭到留守學校的八一五派伏擊。這是重慶文革戰爭中最後一場慘劇，紅岩兵團當場被打死三人。

12. 撤上南山

1967年7月25日，在體育館開完大會，我回家拿了一套換洗衣服，就匆匆趕到柴油機廠。那時，南岸的形勢也開始緊張起來。八一五派搶了武裝部（實際上是武裝部“送”），手上有了槍。柴油機廠是八一五派的眼中釘，肯定是首先打擊的對象。于是，廠裏的頭頭決定撤出廠區，上汪山去。

從地質構造來說，重慶地處川東褶皺帶，市區內分布著好幾條東北 - 西南向的背斜構造，自東向西分別是銅鑼山脈、歌樂山脈、縉雲山脈，而且均發源于華鎣山脈。銅鑼山脈被長江截斷，江北是鐵山坪，江南稱為南山。汪山、黃山、涂山、真武山以及南泉那邊的建文峰都是南山山脈的一部分，是重慶的風景區，也是重慶城最重要的“肺葉”。汪山在南山公園那一帶，是南山公社所在地，與黃山相鄰，從東面下山就是望江廠。南山公社與柴油機廠曾是工農聯繫單位，柴油機廠曾經支援過南山公社，而且柴油機廠還有一些工人找的老婆就是那兒的農民，家也安在那兒。

我和同班同學羅朝忠決定跟他們一起走。

如果說我是主動地自覺地介入了武鬥，走進了戰爭，那麼羅朝忠則是被我拉進戰爭的。的確，參與這場戰爭的人中，像我這樣主動、自覺和積極的可能是大多數，但依然也有一些人是“一不小心”走進戰爭的。讀書的時候，羅朝忠也不是“好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有時也調點皮，也被那姓陳的班主任老師劃在第三類裏。他家貧困，家裏不能為他準備蚊帳。學生宿舍窗外就是崖坎，衛生條件也差，蚊蠅特多，沒有蚊帳，也沒有蚊香之類，晚上經常被蚊蟲叮咬得睡不著。我學雷鋒，就讓他和我一起睡。盛夏時節，兩個年輕人擠在一張只有兩尺來寬的單人床上，熱得

都睡不著，只好把脚手伸到蚊帳外面去，結果反而被叮咬得更厲害。文革開始後，羅朝忠不像我們這樣積極，幾乎就沒有認真參與過什麼活動，屬於那種半“逍遙”的人。那天，他好像是回了一趟學校，看到學校沒有多少人，特別是沒有幾個同班同學，覺得不好耍，就想回家去。如今想不起他是為什麼事要來找我，就到柴油機廠來了。正好柴油機廠的人要撤退，我就把他拉上了，他就這樣“一不小心”走進了戰爭。

其實，像他這樣“一不小心”走進戰爭的人也不少。我的同班兩個女同學和同年級的另外兩個女同學去交院找個熟人，結果戰爭打起來了，交通中斷，于是只好留下，後來也拿起槍來。走進戰爭的人，有的是被同學朋友從家裏喊去的，有的是在路上遇到同學朋友跟著去看熱鬧的，當然也有覺得打仗好耍主動找上門去的。不管是怎樣參與進去的，只要一參與，就再也不願退出，甚至也沒有人感到過害怕，更沒有聽說過誰因為害怕而當了逃兵。比如被我拉進戰爭中的羅朝忠，可能比我還亡命，打仗總是衝前面，從來沒有萎縮過。

從上新街到黃桷壩的龍黃公路是大躍進年代修的，但還沒有修通，就因為“三年困難時期”而停工。那時，除一棵樹（現觀景臺附近）以上已經有了一個毛坯路外，還不能行車。而且，柴油機廠那時也只有一輛卡車，而且還壞了，要撤退到南山，只有走路。那天下午，我們幾十個人拿著鋼鉗之類武器，從所謂的黃桷古道上山。

離開廠區，要經過一所叫新建的小學，而柴油機廠的八一五派就占據著那小學的教學大樓。看到我們人多，八一五派沒有出來，但頭頭怕八一五派趁我們不注意，從後面追趕上來，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於是決定留三個人在後面監視和掩護。我自告奮勇，提了一根鋼鉗，拿了兩個燃燒瓶留在後面。

所謂燃燒瓶，就是瓶子裏裝上汽油，汽油裏放一塊白磷。燃燒瓶投出去後，如果玻璃瓶被打碎，那白磷露出來，在空氣下就會燃燒，就可以點燃汽油。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就用這樣的燃燒瓶去攻擊德軍的坦克。其實，在小規模（例如幾十個人）

的戰鬥中，燃燒瓶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一是因為白磷在空氣中燃燒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不是立即就能燃燒的；二是白磷要點燃汽油也並不那麼容易，汽油如果流得太遠了就可能點不燃；三是即使點燃了汽油，人要跑開也很容易。不過，這樣的燃燒瓶如果用于進攻，去燃燒對方的“工事”（例如那些堆積在樓梯口的桌椅之類）也還是可以的。工廠搞化驗，學校教化學，都可能使用白磷。因此，不管是工人還是學生，兩派都自製了不少的燃燒瓶。

可能是看到我們只有三個人，大樓裏的八一五派就提著鋼針追了上來。我叫另外兩個人走，但其中那個叫劉新庭的却不走，我也只好留下。眼看十多個八一五派殺了過來，我急忙將兩個燃燒瓶都擲過去。那是一片田土，玻璃瓶沒有打碎，當然也就燃燒不起來。我又撿起幾塊石頭，居高臨下往下擲，但也沒有擲中。眼看那鋼針就要逼攏，我和另外一人只好轉身向山上跑。如果此時我們都跑，肯定能够跑脫。但是，那劉新庭却大喊一聲：“你們快跑！”然後提著一把一尺多長用銼刀磨成的砍刀，就朝那衝到最前面的一個八一五派迎去。只見他一把抓住那鋼針，揮刀就向那八一五派砍去。那八一五派嚇了一跳，丟下鋼針就往後跑。劉新庭趁機奪過鋼針，左右一橫掃，竟使那衝上來的十幾個八一五派一下楞住了。于是，他一個人大戰十幾人。邊戰還邊大喊了幾聲：“你們快跑！”我和另外一人只好匆匆往山上跑，也可能是劉新庭的英勇阻擊為我們贏得了時間，我們跑脫了，并很快就追上了大隊伍。頭頭聽了我們的報告，也沒有辦法，只好把這筆賬留下，今後再算。

劉新庭是新招進廠才三個多月的學徒工。1967年3月，正是“二月鎮反”高潮期間，柴油機廠在市中區下半城一帶招收了一批新工人。這是重慶文革前期（1966-1970年）唯一的一次招工，100多幸運兒從“社青”（社會青年）成了“領導階級”。負責招工的是柴油機廠掌權的是反到底派，因此，招進廠來的青工大多數也成了反到底派。

我邊跑邊回頭張望。劉新庭雖然身高力壯，但畢竟寡不敵衆，他終於挨了兩鋼針，身子彎了下去，鋼針雖未丟下，却再舉不起來，

于是被活捉了。

武鬥期間被對方捉住，肯定免不了挨一頓飽打。但是只要跪下求饒，寫一張“反戈一擊”聲明，或在寫好的聲明上簽個字、按個手印什麼的，那頓打便會減輕許多。劉新庭腳上身上各挨了一鋼針，雖刺得不深，血也流得不多，但畢竟疼痛。他被抓進那武鬥據頭後，打“耙和”打便宜的人便一擁而上，拳打腳踢，皮帶木棒齊下，但劉新庭却咬著牙忍住，竟不叫喊。這更激怒了打人的人，于是下手更重，打得更厲害。劉新庭只是抱著頭，將頭埋在膝蓋之間，護著胸膛下腹，縮成一團，任他們怎樣打也不求饒。後來，他終於被打得昏死過去，那些人才住了手。

那時，劉新庭已經二十多歲了，初中畢業已經在社會上混了好幾年，還曾經到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等單位做過臨時工之類，據說也在社會上操過“扁褂”，所以知道如何抱頭護胸，所以怎麼打也不求饒。

劉新庭這一昏就昏得有些厲害，到晚上也未醒來。那八一五派頭頭鑽進關押他的房間看了幾次，只見他身上血迹斑斑，到處紅腫，摸一摸，渾身又火一樣發燙，于是心中便有些虛了。畢竟是一個廠的，畢竟是抓住打死的，運動後期要清查起來，很可能脫不了干係。于是，那頭頭便叫人將劉新庭抬出據點，丟在馬路邊。

那時已是深夜，下著傾盆大雨。劉新庭躺在馬路邊，終被雨水淋醒。渾身火辣辣地痛，又發燒，燒得昏頭昏腦的，根本動彈不得，後來便又昏過去了。柴油機廠一個上夜班的老工人張師傅下班回家，黑暗中看不見，一脚踢到他，差點摔倒。那張師傅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大姐，認得劉新庭。見他被打得那麼慘，忍不住掉下淚來。深更半夜，大雨傾盆，張師傅好不容易把他喚醒，然後便將他背起來往家裏走。幸好那張師傅力氣好，還背得動他。但兩隻手托著他的屁股，再也分不出手來拿傘，只好光著頭淋雨。片刻功夫，渾身便濕透。好不容易背回家裏，喊醒老伴，將劉新庭放在床上，又給他脫去那血迹斑斑的勞保服，給他擦洗傷口，一直忙到大天亮。

文革中，哪怕武鬥再厲害，不少老工人還是堅持上班。特別

是那些事關重大的電房、打水站、鍋爐房等崗位，是不能離人的，往往都是老工人在頂著。我父親是搬裝公司朝天門站的業務員，在朝天門港口大樓裏上班。即使是“八八”海戰那天，他都在辦公室堅持。正是這些老工人的堅持，才使重慶城保持了水電供應，維持了最基本的生活秩序。他們才是那動亂年月裏撐著共和國大廈的棟梁！

第二天，張師傅想方設法，找到一輛卡車，將劉新庭送到袁家崗的重醫附一院去。那時好在混亂，聽說是本派的戰友，醫院也就收下了。重慶衛校（衛生學校）和重醫護校（護士學校）的兩個女學生聽了張師傅的介紹，主動要求來護理劉新庭，張師傅才回廠去了。回到廠裏，便有八一五派找上門來。張師傅嘴硬，一陣亂吵亂罵，那幾個年輕人也沒法，便灰溜溜走了，好歹沒有再給這好心人添麻煩。

劉新庭被打得很慘，連小便也帶血。兩個女學生輪番為他端屎端尿，喂藥喂飯。幸好都是學護理的，不怕羞，劉新庭動彈不得，兩個女生都主動為他提尿壺。好在劉新庭身體素質好，或者是他操過“扁褂”，才七八天時間便可下床活動，于是他便要求出院。那時又沒有人管，他就溜之乎也。回到家，找人帶信到山上，說他要上山來。于是，當頭的就派我和另外一個人下山過河去接他。

我一見到他就問：“我喊跑，你啷個不跑喲？”他說：“別人都衝得那麼近了，我也跑，你們跑得脫喲？”我只得悻悻地說：“那不一定。”他說：“反正你們沒挨就行了。”然後拍拍我的肩，詭詐詐地笑了笑。

他是不是英雄，他有沒有和我一樣的英雄情結，可以不論。但是，誰能否定他那犧牲自己保全同伴的行為？誰又能否定那捨己救人的張師傅以及那兩個護理他的女學生？這樣的行為，這樣的精神，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贊揚的吧？

却說那天快黑了，我們才走到汪山。吃過飯，南山公園的反到底派把我們帶著，在梅桂園裏轉來轉去轉了好幾圈，才讓我們在原蘇聯大使館那幢房子裏住下。

在山上，我們按照軍隊模式進行了改編，指定了幾個排長，

我也被指定為班長。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們就起來，沿著公路操練跑步。“一二一！一二一！”哨聲喊聲在那樹林中驚起成群成群的雀鳥，合著我們的脚步，嘰嘰喳喳叫著唱著。那真有點“曙光初照練兵場”的意境。我記得，那時，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本《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真的還認真地讀了一遍。站在山巔，望著那茫茫群山，我甚至想，如果打不贏，我們就去那群山中打游擊，說不定還能創造很多英雄故事呢。

由於走得匆忙，頭頭們又決定派黃景華帶幾個人下山去拿東西。我不是廠裏的人，可能不打眼，也自告奮勇要去。可能去得突然，也可能廠裏的八一五派還有所顧忌或畏懼，我們沒有遭到阻攔。半路上，黃景華就決定要去找個車。太陽又大，走了大半天，我們來到三公里半的朝陽化工廠附近，再也走不動了，就決定在那馬路邊攔車。除了幾把匕首和在路邊撿到的幾根木棒，要攔車也難。於是就去找來一個滅火器，還找來一個噴霧器，在路邊“守株待兔”。正好有一輛空載的嘎斯車從海棠溪方向駛來，我們大聲吼叫，做出一副嚇人的樣子，那司機便把車停下來。黃景華上去和司機商量，要他把我們送到黃桷壩。那司機已經駭得身子都在發抖，只好答應。車開到地處黃桷壩的重慶郵電學院（簡稱郵院，現重慶郵電大學），趁我們去食堂吃飯的機會，那司機就悄悄逃走了。他走了，正好符合我們的意思。黃景華當過坦克兵，也會開車，我們吃過飯就坐車回到汪山。

就這樣，我們走進了戰爭。

13. 黃山炮兵排

我們這撥人是最先上南山的，對於後來鄧長春把黃山作為“根據地”起到了先鋒作用。跟著，望江“金猴”也派人到了黃山，成立了指揮部，鄧長春自任總司令，統轄在南山上的反到底派隊伍。因為黃山這個名稱比南山好聽，而且那兒又曾經是蔣介石住過的地方，後來鄧長春就把指揮部改稱為“黃山警備區司令部”。他統轄的武鬥隊，開始稱為軍工紅一連、軍工紅二連，後來也改稱為黃山紅一連、黃山紅二連。據說是鄧長春決定的，柴油機廠這撥人組建為黃山炮兵排，進駐黃山。於是，黃景華就開著搶來的那輛卡車，去望江廠拖炮，我也跟著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望江廠。後來，我下農村當了兩年半的知青，偏偏遇到望江廠來招工，我又偏偏被招進望江廠，竟然與望江廠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到 1997 年才調離，但心似乎再也離不開了。在望江廠，我“紅”過，我苦過，我被批鬥過，我受過處分，我也得過獎，我為廠裏做過貢獻，廠裏也對我關照過，甚至還有人把我譽為“望江第一才子”。幾任廠領導都想提拔我，我都拒絕了。好幾個單位來調我去，却被廠裏卡住，甚至讓我死了心，甚至讓我寫了一篇題為《觀廬賦》的短文：“觀就觀吧，看別人下海，看別人發財，也是一種樂趣呢。自己則守窮守貧，或者再加上一個守道（非道觀之道，也非道德之道）而已。”後來廠領導換了，我才得以逃脫命運的羈絆，離開了望江廠。但是，望江廠對我此生此世的影響，却是想抹也抹不去的。如今年過花甲，想起望江廠的那些日子，心中就有說不清楚的感情。此是後話，且按下不表。

從朝天門沿長江東去 30 里，迎面一座大山擋住去路，江水拐一個 90 度的彎，再拐一個 90 度的彎，才從那大山縫隙中鑽過

去，那縫隙就是銅鑼峽。被銅鑼峽截斷的大山就是銅鑼山脉，北為鐵山坪，南為南山。峽裏是唐家沱，有東風船廠；峽外是郭家沱，望江廠就在峽外。那十里峽區，山壁陡峭，怪石猙獰，林木蒼翠，清風徐徐。若是漲水季節，那江水嘶嘶，泡旋如火山噴發，波濤似岩漿喧囂，漩渦像惡魔巨口，激流若萬馬奔騰。浪打岩石，水珠飛濺千堆雪。汽笛聲響，浪遏飛舟走蛟龍。江南岸的紫山溝裏，一條瀑布從山縫中瀉下，銀練閃耀，霧氣蒸騰。真有一番好風景。

銅鑼峽自古以來都是重慶的東大門，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戰爭。明朝末年，張獻忠溯長江西上攻打重慶，被銅鑼峽擋住，久攻不下，遇阻數日，腦瓜子一轉，留下大部隊繼續佯攻，自己却帶著少數輕騎，抄小路疾馳 150 里，奇襲江津，然後順流而下，攻下重慶城，銅鑼峽的明軍才不戰而潰。但是，直到現在，望江廠所在的郭家沱，還一直被重慶人認為是很偏僻的地方。

望江廠的前身是廣東軍閥陳濟棠創辦的廣東第二兵器製造廠，後來被國民政府接收，抗戰初期從廣東遷來，更名為五十兵工廠，主要生產迫擊炮、無後坐力炮之類，號稱“模範兵工廠”。解放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望江廠成為小口徑高射炮的科研和生產基地。當年生產的三七高炮，大批量援助越南，打美國飛機，戰績不錯，甚至被譽為“萬歲炮”。文革前，兵工廠都很神秘，加上地處偏遠，知道望江廠的重慶人并不多。文革戰爭開始後，望江廠才開始在全市出名。以至後來，一說到望江廠，重慶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金猴”，就是“八八”海戰。改革開放後，望江廠開發了不知多少產品，但由于國有企業積重難返，加上幾任廠領導原來都是技術人員，缺乏能力又缺乏胸懷，每一任上臺就否定上一任開發的產品，要自己開發新的產品，往往又不成功，終於弄得病入膏肓，垂死掙扎，最後只好搞“部分破產”，從最多時的 12000 多人減少到現在的 3000 多人，勉強把“望江”這塊招牌保留下來，只是害了那麼多的下崗工人！

“金猴”是望江廠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的武鬥隊，據說人數達上千人。西師“六五”事件後，反到底派組織武鬥人員前去支援，望江“金猴”是主力。“金猴”中的亡命徒特別多，又亂來，

僅後來被拘捕的，就有好幾十人。最令全市震驚的是，“金猴”敢于與駐軍直接衝突。為制止該廠武鬥，1967年6月25日，駐軍派部隊去該廠，“金猴”將部隊堵在船上，不許上岸，達幾天幾夜（後來聽說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就在那船上）。後來雖然讓部隊上岸，“金猴”又組織人員，手持鋼釘，夾道“歡迎”，想給部隊一個下馬威。1967年8月3日，一艘駐軍的交通艇從城裏去該廠，“金猴”以為是八一五派來襲，要求交通艇靠岸接受檢查，但正逢長江漲水，銅鑼峽裏浪聲喧天，哪能聽見？加上交通艇又開得快，眨眼間就衝過了“金猴”的警戒線。那船還未駛出峽口，“金猴”就開槍開炮，結果將交通艇擊沉，艇上三名解放軍戰士全部遇難。十天以後，8月13日，“金猴”又和駐廠部隊指揮部（該指揮部與該廠八一五派一起占據著一個制高點）發生武鬥衝突，結果，部隊打死十名武鬥人員，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兩名戰士也被打死，駐廠部隊只好撤走。重慶文革戰爭進行了兩年多，兩派都和部隊發生過糾紛，由於駐軍或明或暗支持八一五派，因而反到底派和部隊發生的衝突最多。但是，像“八一三”事件這樣與部隊正面發生武裝衝突，雙方均有傷亡的，大約只有望江廠。敢于向部隊發“最後通牒”的，敢于和部隊正面對打的，大約也只有“金猴”才這樣猖狂。

之所以這樣猖狂，當然是有些原因的。1967年7月下旬，“省革籌”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到該廠視察，劉結挺竟佩戴“金猴”袖章，與“金猴”們合影。“省革籌”支持我們，你說這給“金猴”多大的鼓勵？其實，兩派武鬥，背後都有這樣的支撐，甚至還有切切實實的幫助，包括給槍枝、給彈藥、出謀劃策等等，甚至直接指揮作戰。否則，武鬥哪會那樣厲害，哪會一再制止不了！

我們去的那天，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還占據著山上的郭家沱中學，可以居高臨下射擊，因此形勢也有些緊張。黃景華開著車，從庫房拉了一門雙管三七高炮和一車炮彈，我們就回到黃山。

過了一兩天，又從望江廠拉來一門雙管三七高炮和一門五七高炮。三七高炮的炮管口徑是37毫米，五七高炮炮管的口徑是

57 毫米。不要小看五七高炮的口徑只比三七高炮增加了 20 毫米，其自重，其射程，其威力都增加了好幾倍。由於那五七高炮太大，炮彈太重，不適用，在黃山療養院大門外放了兩天，就被拉回望江廠去了。兩門三七高炮，其中一門被拆卸開來，讓也駐在黃山的鷄冠石的反到底派的農民抬到炮臺山上，重新裝好，另一門則安放在黃山療養院大門外，作為機動。望江廠還派來一位外號叫“黃金棍”的老工人，是總裝車間的，來負責三七高炮的拆卸和裝配，並教我們怎樣打炮。

炮兵排成立沒兩天，就有人帶信來說，劉新庭已經出院回到儲奇門的家裏，要我們派人去接他上山來。我一聽說，就主動申請下山去，頭頭就同意了。我和另外一個知道劉新庭家的學工一起，從清水溪下山。兩個年輕人，從山上下去，又穿著勞保服，一路上都引起別人的異樣眼光。那時，山下已經被八一五派控制，從彈子石到上新街到海棠溪，公路上經常有八一五派的巡邏車和巡邏隊巡邏。我們穿越下浩附近的公路時，正好有一輛巡邏車路過。那車上有七八個持槍的和拿鋼針的武鬥人員，全戴著藤帽。車頭上架著一挺捷克式輕機槍，那個戴著鋼盔的伏在車頭上，做出一副馬上就要開槍的動作。我心裏一虛，急忙拉拉同伴，站在路邊不動。可能是車速太快，也可能是車上的人沒有注意到我們，我們躲過一劫。巡邏車一開走，我們就急忙穿過公路，鑽進小巷，趕到江邊，坐輪渡到了望龍門。

我家離望龍門碼頭不遠，我就回家去了一趟。父母都上班去了，我只給弟弟妹妹交代了一下，就匆匆趕到花街子，接上劉新庭，從儲奇門過河到海棠溪，沿著黃桷古道往山上爬。劉新庭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雖然走路還有點跛，但不需要我們攬扶。他是個好熱鬧的人，嘴巴也會吹，一路上竟然不停嘴地說。雖然受了傷，住在家裏，他却閑不住，竟然也敢拖著受傷的身子上街去看熱鬧。路上，他給我們講了發生在儲奇門的一件事：

望龍門的望江飯店是反到底派財賈九二一的窩子。就在前兩天，他們開了一輛卡車到建設廠去，“提”了幾十支槍回來，一路上闖過了好幾個關卡，儲奇門十字路口是最後一關。凱旋路

中學（當時叫紅岩三中）的八一五派在那兒布置了嚴密的警戒，路中間還安放了一大包炸藥。那卡車罩著布篷，從西向東開來，八一五派崗哨老遠老遠就去攔。那卡車却不減速，對直衝過來。車上突然出現一排排黑洞洞的槍眼，子彈亂飛。八一五派是那種打一顆上一顆子彈的老式步槍，哪能與半自動步槍對抗，急忙散開。那卡車便躍過那路中間的連兒石（條石），衝了過去。衝到十字路口前，那司機見那路中間堆著什麼，情知不好，又一個急剎車。說時遲，那時快，那管起爆炸藥的人已經將電閘往下一按了。只聽得“轟隆”一聲，炸藥爆炸了。不知為什麼，那炸藥却沒有傷著卡車。司機略一猶豫，把剎車一鬆，油門一加，便衝了過去，回到望江飯店。八一五派望著那遠去的卡車，只有在後面胡亂開了一陣槍出氣，然後就大罵那管起爆炸藥的傢伙是笨蛋，是“孬火藥”。

那望江飯店是一幢西洋建築，原是重慶最早的民營商業銀行聚興誠銀行的總部，雖然年代有點久遠，却相當堅固，因而成了反到底派一個重要的武鬥據點。如今，那幢已經有百年歷史的洋樓已經成了文物保護單位，不僅見證了重慶的發展歷史，而且也見證了重慶的文革戰爭。

可能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故事，又引出了後面的故事。我們爬上山，肚皮早已餓了，就先去郵電學院吃飯。那時，武鬥人員在郵電學院，在黃山，在汪山，在四女中等幾個武鬥據點吃飯已經不要錢了，只要說明是哪個單位的，都能在食堂找到飯吃。那天，郵電學院食堂有紅燒肉，那肉切成很小很小的，加了紅糖，燒得紅亮亮的，很好吃。我們還沒吃完，就聽說八一五派的人從山下打來了。遠遠望去，黃桷壩老街那兒還真出現了一大隊人馬，而且都扛著槍。我們急忙丟下飯碗，從旁邊的小路繞過黃桷壩街上，匆匆趕回黃山。

回到黃山，我們立即大喊，說保派從山下打來了。療養院大門外的那門三七高炮立即把炮管對準那路口。一會兒就聽見汽車引擎聲了，就看到汽車開過來了，我立即大喊：“開炮！開炮！”但作為指揮的排長楊廣德却沒有發令，坐在炮位上的人也在猶

豫。汽車已經開近了，車上的人看到炮管對著他們，急忙大喊：“自己人！不要打，不要打！”結果真的是自己人，而且還是司令鄧長春帶領的望江“金猴”。幸好車上的人不知是我在胡亂指揮，否則不捶我一頓才怪。

原來，鄧長春帶著“金猴”一幫人去建設廠“提”槍回來，也是在儲奇門過的河。他們可能也知道頭兩天發生在儲奇門的精彩故事，車子開到金紫門後就下了車，從小路趕到輪渡碼頭。輪渡上的人看到這麼多拿槍的人，早駭得四處逃竄。“金猴”中不少人曾經在輪渡公司的修船廠當過學工，會開船的不少，便自己開船到了海棠溪，然後也沿黃桷古道上山，只是我們比他們早了一個多小時。受了一點驚嚇，幸好沒造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誤會。後來想一想，如果那炮打出去，只有幾十百來米距離，肯定把那汽車打翻，車上的人肯定會死的死傷的傷，那後果就慘了，我不被鄧長春槍斃才怪！

14. “我愛黃山是戰場”

黃山是重慶著名的風景區，山巒重疊，溪流叮咚。遠望，氣勢磅礴；入山，秀麗異常。春來百花爭艷，夏日濃陰蔽日，秋時丹桂飄香，冬季臘梅傲雪。抗戰時期，蔣介石曾住在黃山，黃山成了禁區，那山上到處都修得有工事，有蜿蜒的戰壕將那些工事連接起來，還留有機槍、高射炮、迫擊炮陣地。據史書記載，1941年8月，日本飛機數百架次，以每次六小時的間隔，對重慶城進行“疲勞轟炸”，黃山也被炸得坑坑凹凹的。據說，當年日本人曾有計劃，要派出特種部隊，在黃山空降，來活捉蔣介石，然後逼中國投降。蔣介石聽說後，急忙逃上峨眉山，日本人才作罷。解放後，黃山改成了市政府的幹部療養院。改革開放後，市政府又決定將那療養院遷走，將黃山建成陪都遺址紀念館，1997年起正式對外開放。

站在重慶城裏往南看，最東邊那幾個山頭就是黃山。黃山是南山山脈的一部分，但不是因為“黃”才叫黃山。黃山得名和汪山一樣，汪山是因為其原主人汪代璽姓汪而得名，黃山也是因其原主人黃雲陔姓黃而得名。這黃雲陔是民國初年重慶有名的富商，有了錢，就廣置房舍田產，在南山上買了幾座無名山頭，修別墅，建彈子房，築網球場，并對外開放，成了那個時候重慶富人游玩度假的好地方。以其姓名之，遂稱黃山。黃雲陔最小的小老婆生的一個女兒，還是我初中時的同班同學，我們給她取了個外號叫“大黃狗”。抗戰時期，黃雲陔出于愛國熱忱，將黃山獻出，送給國民政府。蔣介石便將山中的雲岫樓作為自己的別墅和官邸。宋美齡、孔氏家族、何應欽等則分別占據了松廳、孔公館、雲籍閣等。後來美國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兩黨內戰，就住在黃山

的草亭。至今猶存的蓮宵樓，是美軍顧問團的舊址。我們在黃山時，住在雲峰樓，據說那是蔣介石專門為宋慶齡修的，但宋慶齡從來沒有去住過。

黃山成了反到底派的大本營，由於地勢好，供給足（有從望江廠運來的物資），連市中區撤退出來的反到底派也輾轉來到黃山上。市歌舞劇團的反到底派頭頭李天鑫還寫了一支“黃山戰歌”，到處傳唱：

都愛黃山好風光，
我愛黃山是戰場。
山下長江炮聲響，
山上松林紅旗揚……

“山下長江炮聲響”，是指“八八”海戰，也是指我們炮兵排炮打朝天門。“黃金棍”師傅用安放在炮臺山那門雙管三七高炮訓練我們，我們練習打炮，就往山下打，往朝天門打，往長江嘉陵江裏的輪船打。不過，因為距離太遠，朝天門已經超出三七高炮的有效射程，大多數炮彈可能都沒打中目標。而且，打的都是砂包彈，不爆炸，除了在心理上給八一五派造成壓力外，也沒有多少實際效果。

1967年離抗戰時期還只有二十多年，蔣介石修的那些工事、那些戰壕都還殘留著。炮臺山上光禿禿的，幾根馬尾松只有一兩米高，三七高炮就安放在當年留下的一個炮兵陣地上。炮臺山前面的山頂上有三塊聳立的石笋，稱為三塊石。山下是大石壩，是彈子石，然後是長江嘉陵江交匯處，然後才是朝天門。白天，太陽太烈，那炮上的鋼板曬得像炒菜的鐵鍋，於是只留下兩個人站崗守衛。晚上，站在炮臺山上，俯瞰山城。燈山燈海的夜重慶，那時却到處一片漆黑，沒有聲響，死氣沉沉。夜色中，從南岸，從江北打出的炮彈，在空中東劃一條紅綫，西劃一條紅綫，火紅的彈頭一個接一個飛來飛去，好幾處正在燃燒，火焰衝天……雖然距離遠，聽不到“炮聲響”，但却讓人能够真切感受那“炮聲響”

的意味。

李天鑫是當年重慶著名的歌唱家，戴一副黑色寬邊眼鏡，像電影《烈火中永生》裏的地下黨市委書記李敬原。1966年“一二·四事件”後，他就寫了一支“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裏”的歌，那旋律的確好聽：

讀著毛主席語錄想起了你，
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裏？
那天我們一同去開會，
會場上我們就失去了你，我們的好同志！
你上臺揭露了重慶市委，
你發言戳穿了陰謀詭計，
你面對邪惡敢于鬥爭，
你站在毛主席像前傳播真理，
你勇敢戰鬥，你英勇無比，
誰知那一雙黑手把你青春奪去……

1967年8月3日，反到底派的南岸城建兵團武鬥隊從建設廠“提”槍歸來，在黃桷坪新市場附近遭到八一五派伏擊，當場被打死十人，被打傷十多人，十幾支半自動步槍也被搶走。據說，這夥人在路過交通學院（簡稱交院，現重慶交通大學）時，曾經給黃山上的人打電話，報告他們什麼時候、由哪條路回黃山來。那時，南岸還是手搖電話，所有的電話都必須經過總機的接線員接轉。可能是接線員偷聽到這個消息，向八一五派報告了，八一五派就派出一支突擊隊，在新市場設下埋伏。後來又聽人說，那天是長江廠八一兵團派人上山來偷襲，正好遇到城建兵團的人，當場就打了起來。因為城建兵團的人槍還沒有開封，沒有還手之力，幾乎成了別人的活靶子。

伏擊打響後，車上的反到底派還在喊：“不要打！不要打！自己人！”他們還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就吃了大虧。

說起當時南岸的電話，至今都叫人搖頭。我上山後，曾在南

山公社辦公室給父親打電話，想把我的行踪告訴家裏，結果花了一兩個小時，也沒打通。可能是那接線員把那插頭拔了出來，反正是忙音，讓你乾著急。

那天，我們正在炮上訓練。聽說自己人中了伏擊，指揮部立即派人前去支援，哪知八一五派得手後早已撤走，只好收拾戰場，把那些受傷的、打死的人拉回黃山來。炮兵排的人也全部動員起來，去背傷員，去抬尸體。南岸城建兵團是南岸區城建局和各建築社的反到底派組建起來的。南山中學後面山上有一個泡石廠，也屬於城建局管，那死傷者中大多是泡石廠的工人，我們還往來過。我們背起那些死傷者就往醫務室跑，也不知背上的是死是傷。背到醫務室，醫生看了，才知道人已經死了。那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死人，但却沒有一點兒害怕。據說人死後更重一些，但我好像也沒有感覺。在那段戰爭的日子裏，我——可能大多數武鬥人員也一樣——不知腦殼裏在想些什麼，“死”字幾乎成了沒有意義的概念。不管是看見人死還是看見死人，更不用說聽到誰死了誰受傷了，似乎都沒有什麼感覺，甚至不知道“死”意味著什麼。後來，那天背過死人的一些人晚上都做背鬼上山的惡夢，我可能是因為不相信鬼神之類，所以沒有做惡夢。

手中有槍，死人的事就是經常發生的了。那天晚上我在炮臺山上呆了一晚，天亮了也沒有人來接班，我就用毛巾蓋住眼睛，在那小松樹下仰面朝天睡了一覺。可能是太疲倦了，竟然一覺睡到太陽快當頂了，接班的人才來換我。我從炮臺山走下來，突然聽到前面一聲槍響，不知出了什麼事，立即趕過去。原來，一個站崗的人擺弄手中的槍，哪知那槍中有子彈，弄得走火了。正好有人從他面前經過，那子彈便從那人的左胸前打進去，從右胸前鑽出來。我趕到的時候，那人已經倒在地上。那左胸槍眼處沒有流一滴血，那右胸槍眼處也乾乾的，只是那肉翻出來，烏紅烏紅的，像一坨紅燒肉。醫生正好也趕過來了，滿頭大汗，急忙給他打強心針，針却已經扎不進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死了的人是鷄冠石公社的一個農民，還是我一個從來沒有往來過的遠房親戚。

重慶文革戰爭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人認真統計過。

有人估計有一兩千人，也有人估計有上萬人，但都沒有切實的來源和根據。在網上查找，在百度·百科“重慶”條目中發現，有“由於兵工廠衆多，重慶是全國武鬥最嚴重的地區，共計死亡 1170 人，傷 7000 餘人，失蹤 600 餘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 2 億元，其中發生在九龍坡區幾個軍工企業間的楊家坪武鬥轟動全國，現沙坪壩區沙坪壩公園保留有全國唯一留存的紅衛兵公墓”的內容，却不知這樣的統計數據來源于何處。研究文革歷史的專家何蜀先生編輯的《重慶武鬥死難者情況》，已經羅列了 1000 多名死難者名單，但何蜀先生自己也認為，這依然很不完備，可能還只是死難者中的一小部分。據《重慶公安志·大事記》記載，1971 年，省革委“人保組”（人民保衛組）的一個工作組曾對重慶兩派殺死俘虜的情況進行過統計，被殺死的俘虜、探子和“叛徒”就達 1737 人！即使按最一般的推論，戰場上死亡的人也肯定比這個數字大得多。兩者相加，那數字肯定相當驚人了。但是，由於時間已經久遠，當年又極其混亂，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場戰爭，可能永遠也弄不清楚了。

此且不論。只說走火打死的人，都不知有好多！

江青曾說過“小青年愛玩槍”的話，諸不知，除了參與武鬥的軍人或轉業退伍的軍人，搞武鬥的這些小青年畢竟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絕大部分原來都沒有真正摸過槍。一旦槍在手，那好奇，那興奮，那得意，是沒有擺弄過槍的人難以想像的。雖然請了軍人來講解，來培訓，但短時間哪能搞得那麼清楚？即使搞清楚了，要防止走火，在那樣的條件下，又談何容易！因此，走火打死人的事就經常發生。武鬥中，不知道發生過多少起走火事件。走火打死的人，按我的估計，至少也有上百人。在 1967 年 8 月前後那一個多月裏，僅僅在南山上，反到底派走火打死人的事件至少也有五六起。最離奇的兩起發生在我後來所在的黃山紅二連，那時我已經成了副連長。一個傢伙坐在桌子上擦槍，忘了槍膛裏還有一顆子彈沒有退出來，一不小心摃動了扳機，於是走火。砰——！那子彈朝斜下方射出，打在桌子上。不知是桌子的木材太硬還是射入的角度太小，那子彈鑽了幾下，却未能鑽進那桌子裏去，又

從桌子上跳起來，鑽進坐在一邊的另一個人的腦殼裏，再沒有鑽出來。那人當場被打死，鮮血濺了那闖禍人的一身。還有一個傢伙在樓下耍槍走火，子彈穿過樓板，穿過樓上的桌子（那桌子是被當作床來用的），穿過躺在桌子是上的那個倒霉鬼的肚皮，將其打死。當然，還有更離奇的，是自己的手槍走火，結果把自己打死了，那故事有點曲折，我後面再講吧。

15. 槍炮打爛重慶城

炮兵排有三四十人，只有一支蘇式步槍。蘇式步槍射程遠，精度高，後坐力大，但却是單發，要扳一下才能打一顆子彈。看到其他人都拿著的半自動步槍，我們好羨慕。

拼鋼針，兩派基本上勢均力敵。一開始打槍，反到底派便略占優勢。這是因為反到底派占據了建設廠廠區，特別是占據了工廠庫房和總裝車間。建設廠地處重慶西郊，抗戰時期由從南京、武漢以及河南靈寶等地遷來的兵工廠聯合組建而成，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李鴻章開辦的江南造船局。該廠是造槍的，手槍、步槍、衝鋒槍、機槍都造，還造四聯高射機槍，又庫存有大量的試槍用的子彈。那時，半自動步槍連許多部隊都還沒有裝備，却被“提”了出來。所謂“提”，也就是搶，只是可以“有條不紊”的搶。全市反到底派紛紛派人到建設廠“提”槍，很快便武裝起來。1967年七八月間，反到底派究竟從建設廠“提”了多少槍出來，沒有切實的統計數字，如果說反到底派擁有萬把條槍，那是可信的。

1956式半自動步槍實際上就是AK47衝鋒槍的一種改進型。建設廠也生產AK47，被人稱為“全自動”，和“半自動”一樣，都稱為1956式，也就是說是1956年定型開始生產的。“半自動”只能裝十發子彈，但射程遠得多，精度也要高得多，打仗時比“全自動”節省子彈。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越軍都用“全自動”，我軍只有班長用“全自動”，士兵只有“半自動”，而“半自動”的火力不如越軍的“全自動”，吃了大虧，說明“半自動”已經不適用於現代戰爭的衝鋒和對抗射擊，因此後來便被逐漸淘汰。但是，在1960年代，至少在亞洲，相當多的國家，包括越南，

包括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好多國家的軍隊，甚至包括相當大一部分解放軍（特別是工程兵、鐵道兵之類），都還在用那扳一下打一顆子彈的老式步槍，相對來說，“半自動”就是相當先進的武器了。“半自動”可以在槍管前上刺刀，好看，威風，如今的三軍儀仗隊也仍然在使用。

八一五派也占據了幾家兵工廠，但那幾家廠都是造子彈的，還有一家是造坦克的，缺少槍。于是，八一五派只有靠搶武裝部，搶駐軍的。文革中搶槍，往往是裏應外合，假搶真送，人所共知，且不論。武裝部的槍往往型號雜亂，破舊老式。有卡賓槍，有七九步槍，有中正式，有漢陽造，也有瑪克沁重機槍、捷克式輕機槍、湯姆式衝鋒槍之類，甚至還有 1860 年英國人造的那種老掉牙的毛瑟槍。與反到底派清一色的半自動步槍相比，當然要差勁得多。

除了槍，就是炮。反到底派占據了造高射炮的望江廠。那雙管三七高炮射速高、火力猛，不但打飛機很靈，在平射狀態下打汽車、打碉堡也很不錯，成了反到底派的重武器。八一五派占據了生產坦克的空氣壓縮機廠（簡稱空壓廠），擁有那種輕型的水陸兩棲坦克。可是，有坦克，却缺少坦克炮彈。一個鋼鐵烏龜開出來，壓壞了西郊的一條條馬路，只能起到威嚇作用，駭駭人而已，難以真正投入戰鬥。而且，那三七高炮又是那輕型坦克的剋星，輕型坦克裝甲薄，很難擋住那高射炮彈。建設廠的四聯高射機槍也是那輕型坦克的剋星。這種四根槍管的高射機槍，本是用來打飛機的，那子彈口徑為 14.5 毫米，四根槍管同時發射，可以同時或分別打穿甲彈、燃燒彈、曳光彈、爆破彈，威力相當大。當時，這種武器才試製成功不久，只有少數部隊裝備得有，可能尚無參加實戰的，沒想到這樣先進的武器竟然首先用于武鬥。于是，八一五派在炮火上也要遜一籌。

重慶有長江嘉陵江，于是便有“海戰”。長江航運公司（簡稱長航）和港務局都是八一五派占優勢，因而控制的船多。但反到底派在銅鑼峽外攔截了兩條登陸艇（那是國民黨海軍留下來的，解放後改作了貨輪），把三七高炮安在上面，前後各一門，便成

了兩條大兵艦。又把望江廠的一條船改造成軍艦，前後各安一門三七高炮。這樣，艦隊也就頗具規模，在長江上橫衝直撞地就無所畏懼了。

那年代，人們的腦瓜子也真是太靈光了，八一五派沒有槍，便仿照加拿大式手提機關槍，自己設計製造出815式衝鋒槍，可以使用長江電工廠(簡稱長江廠)生產的子彈。瀘州的“紅聯站”(與重慶八一五派觀點相同)還設計製造出一種被稱為“蛤蟆炮”的武器，那其實就是一種迫擊炮，據說因為那炮彈像青蛙像蛤蟆一樣跳出來而得名。九龍坡的反到底派則把碼頭上的履帶式吊車弄來，拆去吊杆，裝上高射機槍，再在四周裝上鋼板，改裝成裝甲車，也同樣厲害。

打槍與拼鋼針不同，不需要面對面幹，也不需要憑個子高、力氣大、鋼針長、刺刀尖。打槍更講究靈活、機巧和智慧。拼鋼針時，是技校、技工校的學生打主力，河運校、石油校、機製校、工業校等名揚一時。打槍了，一些並不出名的普通中學學生一下變得英勇起來，成了新的“武鬥之花”。一些文弱書生甚至當上連長團長什麼的，指揮起打仗來，竟頭頭是道。女生也厲害起來，據說還有能夠兩手使槍的“雙槍將”。文革之前，戰爭小說、戰爭影片特多，誰沒看過幾部呢？又經過搞軍訓，有的還搞過長途野營拉練什麼的，“向解放軍學習”。學生中至少有半數以上的人，其理想都是長大了當解放軍。因此，誰都多少懂一些軍事常識，武鬥便為他們提供了用武之地。真槍實彈打仗，不僅沒有膽怯畏懼之心，反而有一種使命感英雄感，於是便特別亡命。

使用槍炮的戰爭，與拼鋼針擺陣勢的戰法當然大不相同，不是進攻，就是防守，而且攻守都要搶占制高點，戰場主要擺在山頭上。攻也好守也好，都需要大量機動兵力。占據了的據點當然不能丟，不能隨便就把守據點的人抽出來搞野戰，於是便組織那些被另一派趕出來的人建立起機動部隊。這樣的機動部隊往往一個連裏有好幾個學校好幾個單位的人，有的人被打死了，還不知道怎樣通知他的親屬朋友。甚至有個別“烈士”躺在戰場上，武鬥都停了，也沒有人去收尸。八一五派中這種情況多一些，因為

參加機動部隊的很多是 1965 年以前下鄉的老知青，被打死了也不知其姓名。1968 年 2 月，我們曾去建設廠為被打死的同學盧光忠遷墳，在那曾是戰場的清水池山頭上，都還看見一個個穿著勞保服的、戴著藤帽的、只剩下光骨架的尸體無人收。其中還有幾個是女生。有一個辮子好長好長，辮梢還紮著蝴蝶結，使人懷疑她是不是跳“白毛女”的宣傳隊員。那時候，離他們被打死之時已經有整整半年時間了，竟然沒有人為他們收尸！

拼鋼釘也有死人的，但不多。那刺刀在身上戳幾個洞，只要不戳到要害部位，人不一定會死。打槍就不同了，槍子一來就是對穿對過，死人數目成倍增加。建設廠的清水池曾經是戰場，兩派在那小小的山頭上激戰了一整天，動用了輕重機槍，還動用了坦克、四聯高射機槍，反復爭奪，數次易手，不知死了多少人！一個參加過“八一八”潘家坪戰役的人曾告訴我，那天，八一五派的人推倒圍牆衝進來，守衛的一方突然開槍，密集的子彈橫掃過去，他親眼看見一排排人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情景。在重慶人的印象中，就死人的慘狀來說，大約只有抗戰時期日本飛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可以和 1967 年 8 月的文革戰爭相比。

1967 年 8 月，短短一個月中，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激烈戰鬥。現而今，憑記憶能記起的就有“八三”、“八五”、“八八”、“八一三”、“八一八”、“八二二”、“八二五”等大戰役。那戰鬥之激烈，令駐軍也感到震驚。戰火中，不知有多少大樓被炸毀，被燒毀。年齡大一點的重慶人都可以告訴你一長串的名單。戰火停止後，我到楊家坪去過。從大坪到楊家坪的電車電纜綫到處被打斷，東掉一根，西掉一根。馬路上到處是坦克的履帶印。彎彎大樓、建設劇場成了個光骨架，黑糊糊的像惡夢中的惡鬼一樣立在那兒。那慘狀，見過的人肯定都永遠難以忘記。

文革中最吃虧的是老百姓，災禍殃及了數不清的無辜者。擔驚受怕不說，房屋被打爛被燒毀也不說。只說那槍子炮彈亂飛，不知打死、打殘了多少平白無辜的人！我一個同班同學的妹妹，那時才幾歲，在家門口玩，被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顆子彈打穿脚杆，至今也還有些跛。我家鄰居王婆婆，在朝天門江邊的坡坡上

種了一點菜。有一天，她提著尿罐去上肥，不知從哪兒飛來一顆子彈，剛好打在尿罐上，把尿罐打爛，那糞水濺了她一臉一身，把她駭得半死。此且不論，只舉個影響最輕的例子：據一個朋友講，他親戚家住在黃山與朝天門之間的長江邊的玄壇廟，那兒有個不知什麼年代（大概是抗戰時期吧）挖的一個岩洞，一聽到炮響，附近街坊鄰居全往裏面拱。有時就一連幾天睡在裏面，雖然沒遭炮彈打死，因為那洞裏太陰太潮了，有幾位年輕妹崽却因此得了關節炎，至今天氣不對膝蓋就疼。

重慶人愛看熱鬧，街頭死個耗子，也要圍一大堆人。雖然子彈不認人，但武鬥打得那麼精彩，還是有不少人要去看熱鬧。開始打槍打炮的時候，大家也害怕，很多人爬在床腳躲，渾身發抖。但是經歷一旦多了，便膽大起來。江陵機器廠（簡稱江陵廠）與重大隔江相望，一到晚上雙方使用高射炮、高射機槍之類的武器對射。夜空中劃過一道道流星似的紅線，互相交織，竟像一幅美麗的畫圖。於是江南岸中渡口的那些人，江北岸石門的那些人便邊歇涼，邊仰頭看，還指指點點亂評價一通。一個從來膽小怕事的人，1967年8月15日那一天偏偏異想天開，和街上的鄰居一起，跑到嘉陵江大橋頭，去看長安機器廠（簡稱長安廠）打燃了的六中教學大樓。大家都躲在巷道裏，膽大的便一個接一個伸出頭去，往江北那面觀看。別人都沒事，他也學別人的樣兒，伸出頭去。沒想到一顆流彈飛來，正好打中他，當場便被打死，好不冤枉！

重慶文革戰爭中，要說最不划算的，就是這些並未參與武鬥，却不知從哪兒飛來的流彈打死的人。

16. 建設廠爭奪戰

在黃山，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早起跑步操練。那天早上，我突然看到我們南山中學外號叫“蘇修”的高三同學蘇祖斌，穿著一身勞保服，急匆匆的要下山。我問他去哪兒，他說要回建設廠。他還告訴我，南岸反到底派的中學生在建設廠組建了九一縱隊紅二連，學校很多同學都在紅二連裏。我問他到黃山來做什麼，他神秘兮兮的，搖了搖手，不給我說，就跑了。後來，我才知道，他跑的這一趟，引發了轟動全國的“八八”海戰。

建設廠生產槍支，當然就成了兩派爭奪的重點。早在拼鋼針的時候，建設廠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的武鬥隊“紅大刀”和建設技校的“三二八”就出了名。戰爭一開始，駐在該廠以及臨時跑到該廠去的中學生，又組建了九一縱隊紅一連和九一縱隊直屬排，此外還有工人造反軍和二七兵團的，也組建了兩個連隊。加起來，建設廠反到底派就有了好幾百人的武裝隊伍。

但是，建設廠八一五派八一兵團人員雖少，却占據著東面的彎彎大樓以及大樓對面的一個軍庫。彎彎大樓是建設廠的辦公大樓，有七八層樓高，靠近兩（路口）楊（家坪）公路，因將近那地勢，大樓建成一個弧形，因而被稱為彎彎大樓。當年，像那樣的高樓，重慶還少見，那大樓就成了建設廠的標志建築。作為制高點，其屋頂可以俯視整個廠區，對反到底派構成很大威脅。建設廠背靠長江，長江對岸就是生產子彈的長江廠，那是八一五派占據的地盤。建設廠正面是機製校和重慶工業學院（現重慶理工大學），也是八一五派的據點；西面是生產坦克的空壓廠，那更是八一五派的一個大本營；再加上東面又被本廠八一五派所占，建設廠的反到底派實際上處在四面包圍之中。彎彎大樓和軍庫各

據一面，對來往建設廠的兩楊公路構成了封鎖，使反到底派的人要到廠區內來“提”槍，也相當困難和危險。于是，反到底派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堅決要攻下彎彎大樓。

1967年8月3日清晨，反到底派發動進攻。首先用四聯高射機槍向彎彎大樓猛烈掃射，向彎彎大樓傾瀉了一箱箱子彈，彎彎大樓哪能承受得了，立即燃起熊熊大火。八一兵團見勢不對，只好撤退，眼看那彎彎大樓被燒得精光光的。多年以後，又聽到是另一種說法：那彎彎大樓不是反到底派打燃的，是八一五派撤退時傾倒幾桶汽油，故意引燃的。據說，在“清隊”運動中，點火燒樓的人還受到查處。也就是說，後面這種說法已經得到官方確認。

天剛微明，反到底派又向軍庫進攻。不知是主動請戰，還是司令部下派的任務，那紅一連成了突擊隊。紅一連是南泉、土橋、李家沱一帶的中學生組建的，連長王木全（現清華中學）的高中學生，還是九一縱隊的司令。當他們衝進軍庫大門，八一五派守軍突然一陣猛烈射擊，立即打倒好幾個，其中包括王木全。雖然如此，紅一連仗著人多、槍好，順著那坡往上爬，一陣猛衝猛打，八一五派守不住，只好撤退。那軍庫裏沒有槍械，反到底派雖然把它攻下來了，却丟了好幾條性命，實在划不來。戰友們用酒精把被打死的人洗得乾乾淨淨，再給穿上一套嶄新的軍裝（當然有鮮紅的領章和帽徽），就埋在軍庫裏。後來，在建設廠戰場上被打死的反到底派武鬥人員，大多也埋在那裏。我那個在“八一八”戰役中被打死的同班同學盧光忠，也曾埋在那裏。

彎彎大樓和軍庫的失守，對八一五派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誰占據了建設廠，誰就有戰爭的主動權，再不懂行的人也明白這個道理。經過一天的準備，八一五派組織了上千人，動用了坦克，從正面發動了對建設廠的大規模進攻。

1967年8月5日清晨，戰鬥在建設廠正面的制高點清水池打響。號稱八一五派總司令的周家喻乘坐一輛坦克，開到前沿，親自督陣指揮。那坦克裏還坐著我們南山中學一個叫練長友的高三同學，他外號叫“練鼻子”。“練鼻子”也是學校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也是八一五戰鬥團的頭頭，曾被派到八一五的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呆了很長時間，與周家喻是熟人。本來，他的觀點也偏向于反到底，但可能是受了學校八一五戰鬥團一號頭頭鄭望生的影響，也採取了不偏不倚不表態的策略，被學校兩派所拋棄。分成兩派後，他和鄭望生一起在學校看守學校財產。8月4日，看到到處都槍聲緊密、炮聲轟鳴，他只好離開學校。他父親是重慶鋼鐵公司（簡稱重鋼）的工人，家住大渡口。戰爭開始後，交通中斷，他只好從海棠溪過江，走路到了袁家崗，却被守在那三岔路口的機製校八一五派的人抓住。他嘴巴很狡，說：“老子就是你們的頭，不信你去問周家喻。”正好周家喻在機製校策劃第二天的進攻，見到他，對他說：“‘練鼻子’，不要忙著回家了，明天跟我一起去看熱鬧。”于是，他就坐進了周家喻的坦克，來到了進攻建設廠的前沿。

正是重慶最熱的盛夏三伏天，不穿衣服都大汗淋漓，不少武鬥人員乾脆脫個精光。但是，衣服脫光了，就不便於識別，萬一發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況就糟糕了。於是，八一五派的前線指揮部就給上前線的人每人發一件藍色背心。周家喻穿一件白色的無領汗衫，外面再套一件藍色背心，拿著一把蒲扇不停地搖著，讓練長友看了覺得好滑稽。

空壓廠生產坦克，却不生產坦克炮。因此，廠裏沒有供試驗的坦克炮彈。周家喻坐在坦克裏，只能耀武揚威，不能向反到底派陣地開火。由於那坦克是輕型的，裝甲不厚，還不敢開到離反到底派陣地太近的地方，怕反到底派用那種用三七高炮炮彈彈頭改裝的手榴彈炸，只有躲在後面看熱鬧。

清水池是建設廠的水源地，在一個山頭上，水池周圍有圍牆，圍牆裏有一兩間磚房，清水池正面坡下是重慶工業學院的一幢教學大樓，那大樓第三層樓與清水池正好齊平。八一五派把幾挺輕重機槍布置那大樓裏，向山頭猛烈掃射，打得反到底派守軍抬不起頭來。然後八一五派開始派人衝鋒。衝在前面的，拿的都是衝鋒槍，只是太陳舊，有加拿大式，有湯姆式，也有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用的那種“格蚤龍”。反到底派沒有估計到八一五派會大

規模進攻，守清水池的人不多，但却頑強地抵抗。半自動步槍一打就是十發子彈，只見衝鋒的人在眼前一個個倒下去。反到底派的司令部得知清水池吃緊，馬上向清水池派出增援部隊，其中就有九一縱隊紅二連。

九一縱隊紅二連是南岸區的中學生組建的，當時只有兩個排，我們南山中學就有二三十人。原來，九一縱隊總部一個叫劉大強的，是南山中學 1965 年初中畢業後考到電力學校（簡稱電校）的，是電校反到底派的頭頭。戰爭開始後，他受命跑回南岸，通知（也可以說是動員）南岸各中學的反到底派去建設廠。紅二連這些人幾乎都是頭天晚上才分頭趕到建設廠的，晚上 11 點多鐘才領到槍。其實，我接劉新庭上山時，在海棠溪街上就碰上好幾個同學，他們只和我打了個招呼就匆匆去趕船，原來他們都去了建設廠。據說，由於南山中學的頭頭“謙遜”，於是推舉十七中的兩個高二學生肖煥新和黃富源當了連長和指導員。大家都是第一次拿到真傢伙，一個個興奮異常，不停地擺弄，又相互學習。那“半自動”結構簡單、操作方便，於是很快就掌握了射擊要領。搞到很晚，大家才各自找了一個地方躺下，剛打了一個盹就被叫醒，天才濛濛亮就被派到戰場上。但是，竟然沒有一個人畏縮，而且一上戰場就打得不錯，不知能否算作奇迹？

那清水池長約 30 米，寬約 15 米，用條石砌有一兩尺高的圍坎。八一五派人多勢衆，用炸藥將正面的圍牆炸垮，終於衝上頂來。於是，兩派又隔著那水池猛烈射擊。進攻的一方端著衝鋒槍，一個接一個衝上去，伏在那圍坎下，向對面掃射。防守的一方則提著半自動步槍，也是一個接一個衝上那圍坎，向對面射去。也不知相持了多久，有多少傷亡。

據那些參加過這場戰鬥的同學後來告訴我，那場景真比電影裏還要精彩。陣地上，槍聲呼嘯，子彈亂飛。子彈打在牆上、地上、石頭上，濺起的石塊、泥沙和濃濃的硝煙混合在一起，彌漫在陣地上，甚至擋住了人們的視線。我們南山中學高一同學周大齊，從圍牆的一個缺口跳進去，一顆從石頭上跳起的彈頭就擊中了他的頭部，立即鮮血直流。但他好像沒有感覺到，竟然繼續射

擊，直到後面跳進缺口的戰友把他按住，給他包紮好，不顧他反對，硬把他抬下陣地。幸好那彈頭只是擦傷了他的後腦勺，給他留下一條小小的傷疤，沒有造成後遺症。如果那彈頭是對著他的腦殼飛來的，他可能也就“烈士”了。

後來，反到底派堅持不住了，退出了那清水池。聽見圍牆裏有八一五派的歡呼聲，一個反到底派崽兒氣倒了，摸出一個手榴彈來，往那圍牆裏投去。只聽見“轟隆”一聲響，便見一些斷手斷腳從那圍牆裏飛起來。他投的不是一般的手榴彈，是那三七高炮炮彈彈頭改裝的，威力大多了，肯定有好幾個人被炸死炸傷。

當時，生產三七高炮炮彈的江陵廠也是反到底派占優勢，他們用高爆炮彈的彈頭改裝了大批的手榴彈，供全市反到底派使用。那彈頭手榴彈成圓錐體，約 20 公分長，頂部有一個導環反扣著，只要將那導環扳過來，如果不按住，那保險栓就會被彈出來，三秒鐘內就會爆炸（一般手榴彈是七秒鐘或十秒鐘才爆炸）。使用那彈頭手榴彈，都是用大拇指按住那保險栓，猛地摔出去，有時甚至還未落地就炸開了，比一般手榴彈厲害得多。這樣的彈頭手榴彈成了反到底派的寶貝，在戰鬥中大顯神威，很是厲害。

清水池是制高點，又是水源地，如果丟了，建設廠就很難守住，那還了得？于是，反到底派立即組織人員進行反攻。畢竟是本廠地盤，道路地形都熟悉，趁八一五派立足未穩，一陣猛打，八一五派又被壓了下去，陣地又回到反到底派手中。

就這樣，你打過來，我打過去，反復爭奪，數易其手，從清晨一直打到太陽偏西。不斷有傷員被抬下來，到處是死尸，到處是鮮血。那槍聲比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還密集，還熱鬧，整日不停。打仗的人忘了那當頭的烈日，忘了肚皮的饑餓，除了喝水，什麼也不想。從來沒打過仗的人，頭一次參戰便那樣勇敢，那樣熟練，那樣投入，也只有“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紅衛兵造反派”才能辦到。

八一五派的機槍太厲害了，對守軍構成嚴重威脅。于是有人建議，把四聯高射機槍弄上去對付那機槍。那四聯高射機槍是裝在專門的炮車上的，那上清水池的路又陡又窄，且在樹林中。一兩噸重的鐵傢伙，也不知是怎樣弄上去的，居然成功了。弄上去

才發現忘了子彈，于是又派人下去扛子彈。我們南山中學一個叫楊永福的高三同學竟然扛一箱，提一箱，一口氣跑上了山頂。那是14.5毫米的高射機槍子彈，一箱少說也有四五十斤重，後來他扛一箱到山頂都要歇好多次氣，也不知他那時的力氣是從哪兒來的！

四聯高射機槍一開火，那機槍頓時啞了口。四聯高射機槍向坦克一陣猛掃，坦克也受不了，急忙退到山背後去了。後來，八一五派還發動了好幾次衝鋒，却已經是強弩之末，難以奏效了。到下午太陽偏西時，八一五派丟下一大片尸體，撤退了。據“練鼻子”後來告訴我，周家喻坐在坦克裏，只有嘆氣。

可以說，8月5日清水池這一仗，是重慶文革戰爭中最激烈的一場戰役。這一仗打下來，八一五派元氣大傷。八一五派人多，占的地又廣，還有駐軍或明或暗的支持，但短期內却難以再組織大規模進攻了。這一仗也使建設廠的反到底派傷了元氣。據說，軍工井岡山建設兵團的頭頭周應古因此有些膽怯心虛了。當天晚上，建設廠反到底派的司令和高參們（就是那些支持反到底派的“革命幹部”，據說有原團市委副書記于克書等人）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有人提出放棄建設廠，撤退到南岸去，也有主張堅持的人。雙方爭論不下，最後決定派人到南岸黃山去找反到底派武鬥總司令鄧長春，讓他來決定。

那時，市內的電話勉強還能打通，而南岸的電話已經打不通了。況且，這樣重要的軍機秘密，用電話來溝通，肯定不行。於是，就把任務交給了九一縱隊紅二連。紅二連有個通訊班，班長就是我們學校那個外號叫“蘇修”的高三同學蘇祖斌。第二天，蘇祖斌就帶著另外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來到了黃山。

現在想來，這兩個傢伙也真的是吃了豹子膽，他們穿一身勞保服，竟敢穿越一個個戰區，步行趕到黃山。也算他們幸運，一路上沒有遇到盤問的人，否則，那小命早就交割（沒有）了。路上畢竟不好走，他們晚上才趕到黃山，才找到鄧長春，才向鄧長春報告了建設廠的情況。鄧長春當然明白建設廠的重要性，當即表態：建設廠絕不能放棄，必須堅決守住，馬上派人去支援，給

建設廠送三七高炮去，送糧食送豬肉去。據蘇祖斌後來告訴我，鄧長春還說，哪個敢丟了建設廠逃跑，他絕不輕饒，堅決槍斃！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兩個傳信的傢伙帶著鄧長春的口信，又趕回建設廠。我那天早上看到蘇祖斌，就是他們離開黃山時的情景。

鄧長春的話穩住了建設廠的周應古。八一五派吃了虧，在以後的十多天裏也沒有能够舉行再次進攻。事隔三天，鄧長春許諾的支援隊伍以及糧食和高炮也運來了，建設廠也就穩定下來——當然，那支援的過程又是另一次戰役，就是至今還讓不少重慶人津津樂道的“八八”海戰。

力量總是此消彼長的。1968年7月2日，建設廠再次爆發大規模戰鬥，反到底派組織了不少人趕到建設廠，可惜廠裏的成品庫房已經被駐軍嚴嚴控制，總裝車間也已經沒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槍了，搶到手的大多是半成品，不是缺槍栓，就是少板機。那時，建設廠八一五派的力量已經強大起來，而且有鄰近學校和工廠的八一五派來支援，加上駐軍或明或暗的支持，幾打幾不打，就把反到底派趕出了廠區。反到底派只能從廠背後的長江突圍，不少人在那三孔橋橋上橋下被對方打死。此是後話，後面再說。

二十多年後，建設廠已經發展成爲全國五百家最大企業之一，其產值、利稅成了重慶數一數二的大戶。該廠生產的摩托車曾經遍布全中國，遠銷海外幾十個國家。歷史上，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李鵬、朱熔基都到該廠視察過，更不知有多少外國人到過該廠。誰知道，這樣一家聞名全國的大企業，曾經有過那樣戰火紛飛的一頁呢？如今，建設廠已經搬遷，那廠區將建設成大型商業區。那軍庫，那清水池都早已經不在了，被高聳的大樓和雄偉的立交橋所代替。只有那重新修建起來的彎彎大樓還在那兒，但早已今非昔比。

17. “八八”海戰

在黃山上，我經常見到鄧長春。我當了幾天黃山紅二連的副連長，可能也是他點的名。後來，我到望江廠當工人，就在他原來所在的車間。不過，我只是個不起眼的一般武鬥人員，“平頭百姓”，或者用重慶話來說就是個“小毛團”而已，我認識他，他肯定不記得我。當時，人們都傳說鄧長春是個彪形大漢，殺人不眨眼，其實他個子不高，塊頭也不大，說話聲音甚至有些沙啞，臉色也經常有些蒼白。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才20歲出頭，學工期剛滿不久。他是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的二號頭頭，後來反到底派成立“工總司”（即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軍工是老大，于是他又成爲“二號”。雖然不是“一號”，但因爲當“一號”的李木森相對穩重一些，而他敢作敢爲膽子大，重慶人都把他當作了反到底派的“一號”。由於武鬥中李木森拋頭露面少，重慶人更是把他當作反到底派的武鬥總司令，關於他的傳說也就特別多。唉，真不知道他那甚至有點文雅秀氣的外形，何以成爲反到底派的“總司令”的，而且那麼多反到底派的人都服他！

重慶文革戰爭期間，他愛穿一套綠軍裝，背一支半自動步槍，腰上還挂著半自動步槍特用的子彈袋。跟著他身後的警衛員叫鄭世仁，是望江工業校的學生，典型的“門板大漢”。那警衛員的腰上，反而插著一支五四式手槍。不認識的人，很可能把他們二人的身份完全弄反。後來，我進了望江廠，和那鄭世仁也認識了，他在靶場當技術員，于是我知道他家住在羅家壩，是十七中初中畢業後考進望江工業校的。讀初中時，他和九一縱隊紅二連連長肖煥新、指導員黃富源還是同班同學。

與鄧長春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這個人實際上是很隨和的。

我當上副連長後的有一天，站崗的人跑來找我，說他站了一上午了，沒有人去接他的崗。按規定，黃山紅二連和黃山紅一連是輪流值崗的，不知那天紅一連的出了什麼事，一直沒有派人來接崗。正好鄧長春路過，他就向鄧長春報告，發了一通牢騷。鄧長春對他說：“你走吧，我來站。”于是他就跑來報告我。我聽說後，罵了他幾句，急忙提起槍趕到崗位上。鄧長春對我說：“你也走開，我站就是了。”我怎好走開？就和他一起站。後來，他那警衛員鄭世仁來了，說是有什麼事，他才走開。那是在重慶最熱的天氣裏，雖然那崗位在一片樹林旁，畢竟熱氣逼人，把他那身軍裝也濕透了。

鄧長春是在楊家坪長大的，他父母都是新華印刷廠的工人。1963年，鄧長春在楊家坪中學初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就參加了工作，先是在重慶電機廠當學工，後來轉到望江廠，在一個機加車間當車工。那時，他是車間團支部委員，又會說對口詞、快板、相聲什麼的，技術上也肯鑽研，學徒期未滿便能獨立操作，很逗領導和群衆的喜歡。可能正因為如此，鄧長春被捕後，廠裏的人對他並沒有多少惡感。我進廠後，車間不少老師傅提起他，都還忍不住連說帶誇。

1967年8月6日，建設廠派來的通訊聯絡人員趕到黃山，向鄧長春報告了建設廠的情況後，鄧長春當即決定，立即組織人員、武器和物資前往支援，堅決守住建設廠。正是這一決定，引出了“八八”海戰。

“海戰”當然需要軍艦。望江廠有一條船原名叫“建中”，本來就是一條軍艦，是30年代的四川軍閥，後來任過國民黨兵團司令、重慶市市長的楊森從加拿大買來的（也有人說是時任四川省主席、號稱“四川王”的劉湘買來的），馬力大，鐵甲厚。解放後，楊森跑了，船留了下來，被望江廠用來改為運輸船。重慶武鬥升級為戰爭後，“金猴”便將其重新改裝為軍艦，在前後甲板上各裝了一門三七高炮，還安裝了機槍。此外，還有一條改裝的軍艦“嘉陵1號”，那是由嘉陵廠的反到底派從廠裏搶出來，開到望江廠改裝成的，裝有一門三七高炮。1967年8月4日晚上，“建中”

和“嘉陵1號”順江而下，將那因武鬥不能駛到重慶，停靠在深沱的“人民5號”登陸艇和2014號駁船劫持回望江廠。船上裝的呢料、百貨、香烟、白糖、鷄蛋、乾魚等東西，便成了反到底派的戰利品。其實，那“人民5號”本來就由反到底派的長航紅一方面軍控制，據說是他們主動要求“金猴”將他們帶到望江廠的。他們把那船上裝載的物資一一登記，除在望江被“徵用”的部分外，全部通知市第二商業局派車來拉走了。

第二天，“金猴”又攔河搶劫了從武漢開往重慶的長江2021號拖輪，那拖駁上裝的是生豬，正好供武鬥人員大吃特吃。

我們在黃山吃的用的，都是這樣來的。天氣太熱，那搶來的2000多頭生豬殺都殺不贏。于是，只好把那些豬分別送到各個食堂。有一次，在黃山上，看到一頭豬不行了，怕吃上死豬肉，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同班同學羅朝忠就用半自動步槍的槍刺，朝那豬的頸項一下刺去。只見一股烏紅的血一瀉而出，那豬就死了。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是餓著肚子長大的，而且經歷過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有著太多的饑餓經歷和記憶。到了黃山，飯可以隨便吃了，還經常有肉吃，而且不要錢，不交糧票，大家都敞開肚皮吃。我去接劉新庭上山時，在郵電學院食堂吃過的那紅燒肉，極好吃，於是我就慇懃柴油機廠的頭頭們去吃。受不了我繪聲繪色的渲染，我們就開車專程趕到郵電學院，用那大洗臉盆裝了滿滿一臉盆出來。也不吃飯，一人一碗，而且是那種中碗，蹲在地上，悶著頭，像刨蘿蔔一樣，幾下就刨進肚皮裏。那肉也特別好吃，香，糯，微甜而不鹹，燒得又正好，讓人現在想起來也回味不已。那年代，我吃肉又特別厲害，竟然連刨了三大碗！我們用那臉盆去打第三次的時候，食堂的師傅們都睜大眼睛，十分詫異，只好說：“沒得了，晚上再來。”結果我們把那油湯湯都用來泡飯，吃得個乾乾淨淨。

1967年整個8月期間，南岸反到底派武鬥人員所駐的郵電學院、四女中、黃山、汪山等處，天天都可以看到操場上訓練的人，都可以聽見“殺——”“殺——”“殺——”的喊聲。開飯時，食堂裏擠滿了人。天天都可以打牙祭，飯也隨便吃。白糖也多，有

人將白糖灌滿水壺，然後倒開水進去，那糖水好濃，便那樣喝，喝一點再加一點水，又喝。幾個傢伙喝多了，連聲音也搞“丟”了，沙啞得說不出話，那痛苦比挨餓還厲害。那農村來的農民，那吃“長飯”（指正值青少年成長期）的學生，于是便樂不思蜀，巴不得天天這樣吃下去才好。

還有烟，都是好烟，“光榮”、“牡丹”之類，按人頭分發。烟癮大的不够吸，便用子彈與不吸烟的人換。我不會吸烟，就換了不少子彈。也有人“強迫”我吸，我拗不過，只好吸著玩，吸一口吐一口，但一直沒有學會。後來停火回到學校，同班同學韓寶貴硬要把他那“勁松”烟塞給我吸。那“勁松”當時只賣一角錢一包，是僅次于“經濟”烟的孬煙。我吸了兩口，嘴巴臭了幾天，好不舒服，從此便再不吸烟。至今我也不吸烟，都還打心眼裏感謝那韓寶貴呢。

這是閑話了，還是書歸正傳。要支援建設廠，在那時走陸路是絕對不可能的。到處都是武鬥據點，要突破一道又一道封鎖，不僅需要大量兵力，而且可能延誤時間。早在反到底派決定發槍的時候，鄧長春就提出過要打通長江航道的方案。現在正好有了需要，於是決定按預定方案走水路。建設廠和望江廠都在長江邊，大約只有二三十公里水路。不過，那水路也並不通暢，要經過唐家沱、朝天門、銅元局等八一五派占據的地方，沒有武力作後盾，當然不行。於是，鄧長春決定組建一支艦隊，打通去建設廠的水路。

按鄧長春的安排，立即連夜在“人民5號”登陸艇上安裝三七高炮和機槍，全副武裝起來，更名為“反到底1號”。那登陸艇原產于加拿大，排水量2000噸，參加過太平洋海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贈送給國民政府，解放後改為貨輪。當時，三峽裏還有不少急流險灘，在長江上游，那登陸艇就是最大的船了。望江廠生產的三七高炮中，本來就有專門用在軍艦上的，叫作“海三七”。裝上兩門“海三七”，打起炮來，那登陸艇也穩穩當當。“人民5號”登陸艇上也有很多反到底派的人，開船也不成問題。

1967年8月8日，由“艦中”打頭陣，“人民5號”居中，

後面跟著“嘉陵1號”，組成“金猴”艦隊，溯江而上，去支援建設廠。那“人民5號”船艙裏，裝有三七高炮數門，還有生豬、醫藥、百貨、食品、大米等等，足夠建設廠的武鬥隊補給了。幾條船上都有“金猴”的人馬，“人民5號”上的則是支援建設廠的武鬥人員。

艦隊溯流西上，穿過銅鑼峽，正對著就是唐家沱的東風船廠。東風船廠屬於長航公司，既修船，也造船，八一五派人多，但與反到底派相處較為平安，未發生過大規模武鬥。“金猴”艦隊開上來，用高音喇叭一路喊話：“我們是路過的，是去九龍坡卸貨的，請不要向我們開槍！”本來，該廠八一五派並不知道這支艦隊要去做什麼，也未組織攔截。但是，有槍的人總是手上癢癢的，看到對方來了，不打幾槍就不過癮，也不能顯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很可能還會被同伴視為膽小鬼、怕死鬼。於是，那船塢上，那待修的輪船上，那坡上的車間裏，就有機槍步槍的子彈朝艦隊射來。

沱是重慶方言，指回水河灣，重慶話中讀作入聲，又稱為回水沱。唐家沱是長江上游最著名的回水沱，其水面達25萬平方米。清初“湖廣填四川”，一姓唐的人家在此落戶，開荒種地，于是有了唐家沱之名。“金猴”的艦隊都裝了裝甲，唐家沱江面又那樣寬，那子彈打過來基本上起不到什麼作用。本來，艦隊的主要任務是給建設廠運送武器和補給品，是去支援建設廠，並不想在沿途打仗。但是，東風船廠的八一五派這樣一打，就把艦隊上的人惹毛了。那艦隊上的武鬥人員本來也是手腳癢癢的，現在正好有了藉口，於是就開炮還擊，當場打傷船塢和船舶多艘，打死二人，打傷多人。於是，那船塢、船臺、車間就再沒有了回音。於是，艦隊停止炮擊，繼續西上朝天門。

艦隊路過王家沱時，那船廠的八一五派也往艦隊打槍。“金猴”中有不少人原來在王家沱的輪渡修造船廠當過學工，對該廠熟悉。艦隊的廣播裏就喊：“王麻兒，你娃不要打喲，把我們打毛了，我們打過來，你娃就吃不消喲！”

艦隊很快就到了朝天門兩江匯合處。那時，朝天門改名為紅港，因此“八八”海戰又被稱為“紅港海戰”。

如今還留下遺址的重慶城，是明朝初年重慶衛指揮使戴鼎所築，有城門 17 座，九開八閉，朝天門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明初建都南京，朝天門面向東方，正是南京方向，故名朝天，于是就有了“朝天門，大碼頭，迎官接聖”的諺語。公元 1646 年冬，張獻忠在川北抗清前綫戰死，大西農民軍餘部數千人由李定國、劉文秀等統率，沿嘉陵江南下，馳抵重慶。那時，明將曾英擁兵十萬，盤踞重慶。劉文秀親率勇士，手執弓矢，口銜利刃，不怕隆冬寒流，從江北躍入嘉陵江，劈波斬浪直奔朝天門。朝天門一帶，明軍戰船密集，却疏于防備，劉文秀等突然溺入水中，砍斷鐵纜，闖入敵船，殺得明軍措手不及。大西軍乘機衝殺，從朝天門殺入城內，光復了重慶。沒想到，過了 300 多年，那朝天門江面上又再次發生“海戰”，而且比過去打得更加激烈。

很可能是東風船廠的人通知了朝天門八一五派的長航兵團和港口兵團，長航兵團和港口兵團作了準備，見“金猴”艦隊溯江上來，便組織輪船去進行攔截。八一五派的輪船上只有機槍、步槍，怎能與“金猴”艦隊相對抗？那“艦中”見幾艘輪船迎頭而來，便用前主炮予以轟擊。衝在最前面的是長江 207 拖輪。重慶有童謠曰：“長江 207，加馬力；長江 205，掉屁股；長江 203，轉圈圈；長江 208，倒起爬。”我們當娃兒時就唱過，至今也還能唱。從這童謠裏就可以知道，那長江 207 不僅知名度高，而且馬力大。但畢竟只是拖輪，哪承受得了那炮彈。雖然那炮彈只是砂包彈，不會爆炸，但那拖輪的鋼板依然被打得對穿對過。三七高炮是雙管，射速快，一分鐘可以打一兩百發。眨眼功夫，那衝在前面的長江 207 的船肚皮就連中了幾發炮彈，水一下涌進艙中，眨眼功夫便傾斜，不一會兒就沉沒到江底了。

那時的人們也真不可思議，明明是鵝蛋碰石頭，已經碰破了一個，後面的却還要去碰。長江 207 被擊沉後，後面的輪船還是硬著頭皮往前衝。那船上的機槍也更加猛烈地向“建中”掃射。“艦中”舷艙邊，伏著的“金猴”們用半自動步槍還擊，只見子彈打在那鋼板上，火花直冒。一排機槍子彈掃來，好幾人中彈。我們南山中學有一個外號叫“耗兒”初二同學，當時就在那“金猴”

的隊伍中。後來，他告訴我，他左邊右邊的人都挨了子彈，唯獨他沒傷一根毫毛。他說：“那血濺在甲板上，駭人得很！”由此可見當時戰鬥之激烈。

“艦中”被困，“人民5號”和跟在後面的“嘉陵1號”一起衝上來，好幾門三七高炮一起開炮，當場又擊沉八一五派輪船兩艘，擊傷多艘，這才打退了八一五派船隊的進攻，把航路打通。然後，“金猴”艦隊一路往岸上的港口大樓打炮，快速通過了兩江匯合處，繼續向上游駛去。駛到東水門附近，那“人民5號”還將炮轉回頭來，向港口大樓打炮。炮彈從我家附近的一幢樓房牆角擦過，把那磚柱打出一個好大的破洞，差點就把那幢樓房打垮。我後來回家，還專門去看過。

“八八”海戰那天，我父親還在港口大樓上班，幸好他的辦公室靠嘉陵江一面，沒有受到攻擊，總算平安。我家住在朝天門長江邊的一幢吊腳樓裏，靠近東水門，離“八八”海戰的主戰場較遠，沒有受到炮擊。但是，炮聲傳過來的時候，整條陋巷的街坊鄰居都嚇昏了，紛紛躲進城牆下那個防空洞裏。沒能躲進防空洞的，則趴在地上，不敢動彈。當時，我一個遠房親戚也是反到底派，住在沙坪壩，而沙坪壩是八一五派的根據地，不安全。武鬥升級為戰爭後，他們全家人就到我家來躲戰火。那天，他們駭慘了，趴在地上，很久很久都不敢起來。我母親膽子大，還趴在窗子上去看。正是漲水季節，江水離我家吊腳樓那窗口只有幾米高。母親看到那艦隊從陋巷前的江邊駛過，看到那“人民5號”往港口大樓打炮，相距不足50米，那炮聲震得她耳裏好幾天都嗡嗡的。

“金猴”艦隊駛到銅元局。銅元局原名蘇家壩，因清末曾在那兒設廠鑄造銅元而更名。壩又稱為平壩，原來是長江的河床，後來河流改道，從而形成階地。因為離江面近，一旦遇到漲水，階地被淹沒，水退後，大量泥沙淤積，經若干年堆積後便形成了壩。這樣的壩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往往是工廠企業集中的地方。那銅元局後來被軍閥劉湘改造成兵工廠，解放後那兵工廠改名為長江電工廠，專門生產子彈。聽說“金猴”艦隊來了，那長江廠

的八一五派也來阻攔，在岸上用機槍步槍向艦隊開火。艦隊又用三七高炮還擊，把岸上陣地打得稀巴爛。不一會兒，岸上便停止了射擊。

駛過了銅元局，就到了建設廠碼頭。于是，擔任護送任務的“艦中”返航回望江廠。返航途中，“艦中”又一路炮擊，對方知道了厲害，不敢再還擊，或者說再也沒有還擊的能力，所以沒有再發生戰鬥。

這一仗，反到底派打死對方二十多人，打傷一百多人，擊沉輪船三艘，擊傷十餘艘，大獲全勝。在全國武鬥中，“八八”海戰也是絕無僅有。在重慶歷史上，這樣規模的“海戰”也絕對沒有過。那“艦中”歸楊森所有時，其實並沒有真正打過仗。1967年，楊森還沒有死，但他在臺灣可能不知道，他的座艦被反到底派據有後，竟然投入了真正的“海戰”，竟然打沉打傷好幾條船。如果他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望江廠的支援，增強了建設廠反到底派的力量，穩定了反到底派的軍心，“八八”海戰的勝利也鼓舞了反到底派的士氣。于是，反到底派開始反守為攻，演出了更加激烈的戰爭慘劇。

18. 火燒交電大樓

1967年8月13日深夜，八一五派攻占了反到底派在解放碑地區唯一的據點——交電大樓。在攻打的時候使用了燃燒彈，使交電大樓著火，燒了一整天，好端端一座大樓只剩下一個光架架。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黃山的炮臺山上值班，俯瞰山城，沒有亮光，沒有生機，宛若一座死城。突然，解放碑那兒燃起了大火，由於相隔甚遠，也不知究竟是哪幢樓燃了起來。接著，長安廠的反到底派隔著嘉陵江，也往離交電大樓不遠的臨江門外貿大樓打炮，夜空中不時劃過一長串紅色的曳光彈。長安廠也是兵工廠，主要生產高射機槍和艦艇用的小口徑炮。可能因為那炮彈也是檢驗用的砂包彈，沒有打燃那外貿大樓。

在市中區，反到底派的力量相對薄弱，僅占據著兩路口一帶，在山城寬銀幕電影院、體育館、工業展覽館建立有武鬥據點。除此之外，就只有解放碑的交電大樓和望龍門的望江飯店兩處了，但却孤零零地被八一五派所包圍。交電大樓是財貿九二一的窩子，又是“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地處重慶最核心地段，成為八一五派的眼中釘、肉中刺。而此前的8月4日，反到底派又偷襲了離交電大樓不遠的財貿俱樂部，打死六名正在搬家的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成員，凶手被八一五派鎖定為交電大樓的財貿九二一。於是，交電大樓便成了八一五派打擊的第一個目標。

其實，後來才知道，“八四”事件中，襲擊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並不是財貿九二一，而是重慶無綫電廠的反到底派武鬥隊。無綫電廠是軍工企業，隸屬於軍工井岡山，“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也是無綫電廠反到底派主辦的。當時，財貿九二一已更名為財貿井岡山，但人們依然稱其為財貿九二一，交電大樓裏也駐

有財貿井岡山的人。

“完蛋就完蛋”來源于林彪的話：“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當時，不知是誰還為這段話譜了曲，成為反到底派的戰歌，而且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交電大樓裏當然有槍，而且是清一色的半自動步槍。據說，那天晚上，交電大樓裏的反到底派只有九個人（一說是七個人），我們南山中學一個叫張新民的高一同學就是其中之一。幾個人憑藉著那堅固的大樓，進行頑強的抵抗。馬路對面是八一五派占據的和平電影院（當時改名為東方紅電影院），機槍步槍不停地向交電大樓射擊。開始，那廣播站還能一遍又一遍高叫：“強烈抗議……最最強烈抗議……”不久，便被打啞，“完蛋”也就完蛋了。雙方對射了一陣，八一五派便派爆破手去炸樓。第一個亡命徒抱著炸藥包衝上去，結果還未跑過馬路，便被打倒在地。八一五派集中火力掩護，才將他拖了回來。然後又有第二個亡命徒抱著炸藥包衝過馬路，結果還是沒跑到交電大樓門邊，便被打倒。第三個亡命徒繼續上。這人運氣好，終於把炸藥包送到大樓牆邊，拉燃了雷管，急匆匆跑回。那炸藥包“轟隆”一聲爆炸，將那磚牆炸開了一個黑洞洞的大窟窿。

炸了一個洞，交電大樓却沒有垮。那洞裏黑忽忽的，什麼也看不見，八一五派不敢貿然衝鋒。又對峙了一陣，當頭頭的終於下了決心，抬來反坦克槍，裝上燃燒彈，向交電大樓射去。那反坦克槍口徑雖然不大，槍管却很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反坦克的主要武器，在原蘇聯拍的那些二戰影片中可以看到那樣子。那反坦克槍的子彈也很長，有穿甲彈、燃燒彈、爆破彈。那燃燒彈也厲害，只打了幾發，交電大樓便熊熊燃燒起來，那火焰直衝夜空，照亮了半個重慶城！

後來又聽到另一種說法：當時，八一五派先後派了兩個人抱炸藥包去炸交電大樓的鐵鉗子門，都在點導火繩時被守衛交電大樓的反到底派打死了。“八一三”戰役八一五派的現場指揮是機製校機校兵團一個姓楊的頭頭，見炸門受阻，就下令集中幾隻信

號槍，從和平電影院樓頂上向交電大樓 4 樓的窗口射擊。信號彈帶著火焰，引燃了屋裏的易燃物，造成火燒交電大樓的嚴重後果。

那交電大樓是解放後才修的，磚柱磚牆，却是木樓板、木樓梯，又正是盛夏酷暑，容易燃燒。火是從樓上燃起來的。守樓的反到底派急忙退到樓下，商量了一下，決定撤退。他們從大樓後面的窗門跳出去，穿過一條小巷，經過實驗劇場，沿中華路到新華路，從文化街梭下去，最後撤到望江飯店。九個人中有八個竟完好無損，只有一人在撤退時中了一顆流彈，從大腿裏鑽進去，又從另一面鑽出來，穿了一個洞。好在沒傷著骨頭，只留了兩個肉疙瘩在腿上。這受傷的人就是我那個叫張新民的同學。前不久我碰上他，還問他傷口如何，他說除了要下雨前有點疼痛外，基本上沒有影響。

交電大樓失守，望江飯店的反到底派怕八一五派集中兵力來攻打，於是便放棄這個據點，人員全部撤到兩路口一帶去了。

幸好那時還沒有彩電、冰箱、空調之類的高檔商品。但是，交電大樓裏畢竟儲存了那麼多電工交通器材，被付之一炬，好可惜！交電大樓成了黑不溜秋的一個光架架，立在解放碑那繁華地帶上，有礙觀瞻，或者用重慶話說是太脹人眼睛了。我們下鄉後不久，便匆匆忙忙修起來。由於修得太簡陋，後來又拆了重修。改革開放後又重修，現在聳立在那兒的新世紀百貨大樓，算起來已經是第五代了。

解放碑是重慶的中心，當然不能隨便放棄。停火協議一簽訂，反到底派就殺了回來，占據了友誼商店，恢復了“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簡稱“完蛋”廣播站），請來一個特別能說的人當廣播員。此人姓謝，是黃花園豆腐廠的工人，腳有殘疾，是個跛子。重慶人把跛子叫作“拜子”，因此稱其為“謝拜拜”。此人嘴巴極為了得，用重慶話廣播，一挖苦二諷刺的，就像如今的“脫口秀”，經常引起聽眾捧腹大笑，很是吸引人。

為了和“謝拜拜”對抗，八一五派就在友誼商店馬路對面的群林市場新建了一個廣播站，取名為“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廣播站聽起來很彆扭，又不便簡稱，還容易被反到底派稱為“落

水狗”，八一五派在解放碑本來還有一個紅旗廣播站，於是人們都以為那就是紅旗廣播站了。重慶著名的評書演員徐勍曾經在紅旗廣播站當過廣播員，此人也極會說，甚至還略勝“謝拜拜”一籌。文革前幾年，徐勍在市曲藝場說《紅岩》，說《奪印》，說出了名聲，很有一些“粉絲”。因此，不管是紅旗廣播站還是“痛打落水狗”廣播站的廣播員，都極力模仿徐勍的腔調，竟然達到幾可亂真的地步，以至人們都以為和“謝拜拜”對抗的，就是徐勍了。

兩邊的人都會說，說八九個小時都不累，諷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罵、侮辱，什麼都來，總能引起聽的人一陣陣哄笑。於是，每到傍晚，那街心花園便坐滿了人，儘是老頭老太婆，專門聽他二人打嘴仗，似乎那是一種藝術欣賞。那年月，也只有他二人的嘴仗方能稱為“藝術”，不聽白不聽。有時候，嘴仗打不贏了，或者覺得對方的話太讓自己難堪了，便有人從那窗口伸出槍來，開那麼幾槍。於是兩個大樓間，子彈飛過來飛過去，打得個乒乓兵兵的。冬季天黑得早，還可以看到那子彈飛來飛去的紅光，更是耀眼。打上一陣。然後又停火，又用嘴打。

奇怪的是，文革戰爭持續了一年多，重慶人竟然見慣不驚，膽兒也大了。那些坐在街心花園聽他二人打嘴仗的老頭老太婆早已見多識廣，你打你的，他自歸然不動，泰然處之，秩序不亂，還仰著頭看那子彈飛來飛去，指指點點，評價誰的槍好誰又打得好，像看西洋把戲似的。等到槍聲停下，又繼續欣賞兩個廣播員的“說書”“藝術”。那真算得是重慶歷史上一大奇觀一大奇事呢。

文革期間，官辦的報刊雜誌幾乎全部停刊，要得到什麼消息，只有靠看大字報，或者就是聽廣播。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兩派都設了很多廣播站。在一個地方，如果對方設了一個廣播站，另一派也一定要設一個，而且要把聲音弄得更高。於是，往往就形成兩個廣播站對立的局面。上新街是南岸區的中心，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都設了廣播站，也在廣播裏辯論，當然那辯論也要變味，也要諷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罵、侮辱，什麼都來。只是沒有“謝拜拜”和徐勍那樣的“嘴嘴”，辯論也就主要成為對罵。反到底派的廣播站在山坡上的一幢住宅樓裏，幾個高音喇叭一開

起，長江對岸的望龍門也能聽見。那廣播站是城建兵團設的。有一次，南岸城建兵團頭張芝先還把我叫去客串了一回廣播員。八一五派那個廣播員是大慶民中（上新街民辦中學）三二一一戰鬥團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不是我的對手，幾下就被我連諷帶罵激怒了，只有用“小心老子要你的命”之類威脅的話來應付。當天晚上，他們也真的惱羞成怒，半夜時偷偷摸到山坡上來，衝進住宅樓，把廣播站砸了。幸好那天晚上廣播站裏沒有人，只損失了那些廣播器材。

那大腿上中了子彈的張新民同學，後來就一直呆在那“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裏。1967年年底，藉口那廣播站裏藏有武器，駐軍派部隊包圍了“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包圍了，不知為何又不進入大樓，讓軍人站在那兒，只准人出，不准人進。樓上的反到底派却不當回事，還是繼續廣播。包圍了幾天，樓上已經沒了給養，于是又准許給大樓提供糧食蔬菜等物品，于是又睜隻眼閉只眼，讓外面的反到底派趁機混進去。這事惹得全市、全川以至全國各地的反到底派及其戰友送來各種各樣的橫幅布幛，挂滿那大樓。那情景，與今日的廣告大戰相似，只是文字截然不同罷了，色彩可能沒有廣告那樣艷麗罷了。圍了一兩個月，不知為何又撤了。文革中的事，總是這樣前無因後無果的（當然是有因也有果的，只是一般老百姓往往不知道罷了），見多了也就不奇怪。

“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被包圍期間，我也裝著送東西的人，混進去過幾次，從樓上看解放碑街上那人來人往的情景，真不相信那竟是戰爭年代。和張新民吹牛，說起“八一三”那場血戰，他還把腿上的傷露給我看過，前後兩個肉疙瘩，觸目驚心。

19. 去建設廠“提”槍

反到底派雖然占據著南山，但山下却是八一五派的天下。山上畢竟荒涼，山下才是鬧市，鄧長春就想著怎樣打下山去。當時，九一縱隊紅二連已經從建設廠轉移回來，駐在郵電學院。鄧長春又組建了黃山紅一連和黃山警衛排，大約有 300 多人的武裝。靠這點武裝要打山下，鄧長春覺得兵力還不够，于是又決定組建黃山紅二連，由望江“金猴”的李維忠當連長，張亮當指導員。跑上黃山來的反到底派的人多的是，很快就召集到 200 多人。炮兵排有好幾十人，只有兩門炮，人有的，于是就把年輕人編進黃山紅二連中，加上三十八中、三十九中的十多個學生，編成一個排，柴油機廠的楊廣德被任命為排長，我則當了班長。1967 年 8 月 16 日晚上，我們從黃山出發，到建設廠去“提”槍。

李維忠是望江廠的裝配鉗工，那時可能剛剛學徒畢業。我後來到望江廠，就和他在一個車間一個工段，都是裝配鉗工。他也是一個“門板大漢”，在車間扳手腕，沒有人不敗在他手下的。他技術好，別人兩三天裝一件產品，他可以一天裝兩三件。那時，他三天兩頭也挨批。有一次，他一天裝了三件產品，就坐下來，抽抽烟。一個軍代表路過看到了，就黑著臉訓斥他，說他偷懶。車間主任雖然是八一五派，也看不過去，急忙去給軍代表解釋，說他一天完成了十天的工作量。那軍代表才悻悻地走了。他人精靈，人緣也好，武鬥停止後就及時退出了派性爭鬥，在“金猴”的頭頭中，可能是運氣最好的，雖然也挨了不知多少批鬥，但一沒進監獄，二沒被“全托”（隔離審查），算是下場最好的。

從建設廠“提”槍回來，李維忠就回望江廠去了，黃山紅二連就主要由張亮負責。張亮是望江廠的銑工，讀過幾天技校，文

革前就是黨的“積極分子”，“重點培養對象”。後來，南岸區成立革委會，他是反到底派這邊推上去的副主任，于是就成了南岸區反到底派的頭。我到望江廠後，沒有能够忍住，又和他開始交往，結果陷入他們的“幫派”之中。1976年，他們給廠黨委寫了一張大字報，把底稿給我看，我覺得那文字寫得太差勁，就動手幫他們修改了一下。四人幫垮臺後，因為這個事，我就“說不清楚”了，和他們一起挨批鬥。有一次，我們車間把張亮拉來批鬥，把我也弄到臺上去陪鬥，還要我交待我和他的罪行。說到給廠黨委寫大字報的事，我說我是主動提出來幫他們修改的，張亮却不顧別人按著他的頭，硬是昂起來，打斷我的話，大聲說：“是我指使他修改的！”于是，一群人衝上來，對他又是一陣拳打腳踢。當時，我又氣憤又感動，幾乎不能繼續念我的稿子了。

張亮這人對人不錯，人緣好，在車間很有一些威望，車間黨支部竟然不顧上面的反對，批准他入了黨，後來又讓他當了調度員。但是，工廠黨委却把他卡住，他的黨籍被一拖再拖，就是不給予批准，拖到四人幫垮臺，他的黨員資格也就被取消。廠裏還準備弄他進監獄的，却找不到能够判他刑的罪行材料，于是只好作罷。雖然沒有了黨籍，他却一直把自己當作共產黨員，堅持向黨支部交黨費，弄得黨支部收也不是，不收也沒辦法，直到他退休，直到他2005年因心臟病去世。

當時，從南山去建設廠，反到底派建立了一條交通線，就是：南山——交院——過長江到九龍坡——建設廠。從南山到交院，要通過四公里。1935年，蔣介石趕著鴨子上架，逼著劉湘趕修川黔公路，以死亡民工1000餘人、傷數萬人的代價，不到三個月就修通了海棠溪至貴州松坎190公里的公路。那時，重慶還相當落後，川黔公路經過的地方，幾乎都是荒山、田土，很難有正規的地名。沒有地名，汽車開到什麼地方，就說不明白。于是，工程師就用公里來確定地名。從海棠溪算起，每隔兩公里作為一個點，于是就有了四公里這樣的地名。文革開始時，四公里都還有些荒涼，只有長江橡膠廠和第二師範學校（簡稱二師，現教育學院）兩個大一點的單位。長江橡膠廠八一五派人多，但由于該廠從上海內

遷到重慶還不久，廠裏的上海人不像重慶人這樣火爆，兩派之間沒有發生過大的衝突，更沒有動刀動槍。二師可能是因為女生多，在文革戰爭中也“名不見經傳”。

雖說如此，占據南坪的八一五派却可以很快趕過來，封鎖南山下山必經的廣黔公路路口。我們這支隊伍，只有鄧長春、李維忠、張亮等幾個人各有一支半自動步槍。為了安全，在郵電學院吃晚飯時，鄧長春又臨時決定，讓九一縱隊紅二連派一個班來護送我們。那個班好多人都是我們南山中學的同學。班長周大齊，人瘦瘦的，高高的，背一支“三無”衝鋒槍，很是讓人羨慕。那“三無”衝鋒槍是建設廠才研製出來的新武器，打起來無光、無聲、無烟，因而稱為“三無”。

那天晚上偏偏下起大雨來，大多數人都光著頭，不一會兒就渾身淋得透濕。步行到黃沙坎，不能往四公里走，我們就從山上往西南方向走。山路崎嶇，天黑地黑，加上電閃雷鳴，加上大雨傾盆，一路上，不時有人摔跟頭。背著槍的鄧長春、李維忠、張亮等人，拿著電筒，前前後後跑來跑去，在險要的地方照照亮，安排隊伍前進。由於雨太大，天太黑，帶路的人偏偏又帶錯了路，我們在山裏轉了好幾個圈子。後來，雨終於小了一點，才發現我們走到六公里附近那個軍庫邊邊了。軍庫周圍有鐵絲網，前面的人就想辦法把鐵絲網破壞了，我們就鑽進了軍庫。有軍人發現了我們這支隊伍，就來干涉，結果就把我們帶到了公路上，那離交院也就不遠了。

那一路，幾乎所有的人都摔了跟頭，我却沒有。哪知上了公路，或者是因为我太得意，或者是因为我正在提勁說：“只有我一個人沒蹣跚爬（摔跤）。”一不注意，我就摔了一大跤，把屁股蹣得好痛。前後的人都笑了起來，弄得我好尷尬。

到了交院，把我們安排在一幢教學大樓裏，就沒有人管了。渾身濕透，不能洗澡，衣服也沒有換的，只好脫下亂挂起。又太疲倦，倒在桌子上就睡了，直到第二天吃中飯時才醒來。這一睡把我弄感冒了，吃飯時只覺得渾身無力，連飯碗也端不住了。正好碰上在交院的幾個女同學，其中兩個是我同班的，還有兩個是

同年級的。看到我這樣兒，都說我是發痧了。然後，她們就打來一碗涼水，問三不問四，讓那叫王長渝的給我揪痧。那王長渝外號叫“王大漢”，力氣大，幾下就在我的頸項上揪出一長串烏疙瘩。也怪，頭竟然不再那麼暈那麼痛了，身上似乎也來了力氣，把她們重新給我打來的一大碗稀飯喝了個精光。

下午，我們從交院趕到長江邊，“八八”海戰開到建設廠的“嘉陵1號”已經在江邊等我們了。我們排成縱隊，跑步前進。但是，銅元局長江廠那邊却不停地往我們打槍，有機槍，有步槍，子彈在我們頭頂亂飛，我們就只有使勁跑。幸好那一片開闊地較矮，子彈沒有傷著人。江邊水溝多，都是在上面搭一塊木板當橋。我畢竟感冒未愈，過這樣一個橋時，人一晃，就掉進溝裏。還是別人拉我，才把我從那稀泥中拉出來，差點把膠鞋也扯掉了。

跑出了一身大汗，上船後，江風一吹，感覺人清氣爽，感冒也好了。

過河便到了九龍坡。九龍坡這個地名是以訛傳訛得來的。原來，那附近的長江中有大小九個石灘，人稱九龍灘。九龍灘北岸有一階地，平坦廣闊，是重慶難得見到的平壩。那壩上有幾家店鋪，人稱九龍鋪。抗戰時期，在那平壩上修起機場，開始時就叫九龍鋪飛機場。毛澤東從延安來重慶談判，就在九龍鋪機場下的飛機，留下了那張著名的照片。由於“鋪”和“坡”諧音，後來就訛傳為九龍坡了。解放後修成渝鐵路，九龍坡飛機場被拆除，改建為鐵路編組站。後來又在靠江邊的地方修起了九龍坡港，九龍坡就更加熱鬧、繁榮，並帶動了附近的黃桷坪、灘子口、李家沱也跟著繁榮起來。

從九龍坡去建設廠，要從一座人稱“天鵝寶蛋”的小山包通過。在楊家坪、九龍坡那方圓幾公里的地方，這“天鵝寶蛋”是一個制高點，就在現直港大道附近，當時還處於空壓廠的廠區範圍內。武鬥一升級為戰爭，八一五派便在那山包上挖了戰壕，建起據點，有事無事便向建設廠廠區射擊。那“天鵝寶蛋”又居高臨下，正對著九龍坡到建設廠的鐵路。反到底派的交通線偏偏被這“天鵝寶蛋”所截斷，我們這樣大一支隊伍顯然是通不過的。好在九龍

坡是港口，又有鐵路的機務段，于是就弄了一個火車頭，挂上兩三節客車車廂，趁晚上天黑衝過去。

由於連下了兩天雨，那天晚上不熱，月亮也很好，金黃金黃的大半輪挂在深藍深藍的夜空，映在長江江面上，很有些詩情畫意。我坐在最後一節車廂裏，却坐不住，看到張亮趴在車廂後頭，把槍瞄著後方，就走過去看他。月光下，鋼軌閃著淡淡的藍光，急速往後退。正在此刻，只聽“轟隆”一聲，人也跳了起來。原來，由於扳道時出了問題，我們這列火車剛開出機務段的車庫，就撞上了停在鐵道上的另一列火車的屁股上。幸好速度不快，未撞出軌，但畢竟是火車相撞，車廂裏的椅子桌子大多撞壞，不知有好多人頭破血流。張亮趴在地上，沒有受傷。我站在過道上，也躲過了。

一陣驚慌後，列車又退出來，另外找了一條路軌，開出了九龍坡車站，眨眼工夫，就到了建設廠。要路過“天鵝寶蛋”時，張亮叫大家都趴下。透過車窗，只見上面有探照燈在亂晃。建設廠沒有火車站，列車就停在那廠區外的隧道裏。我們從車上下來，沿著山路進了建設廠，列車又開回九龍坡去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睡在建設廠總裝車間的地面上。我從牆上撕了一張廢大字報，竟然睡得很香。第二天就發槍。那槍是成品庫裏拿出來的，打開大木箱，一人一支。那槍塗抹了厚厚的機油，又找來汽油清洗。我們在總裝車間大門外搬弄槍支時，“天鵝寶蛋”那邊突然向我們射擊，機槍子彈打在馬路上，濺起一長溜白色的石花，駭得我們急忙退回車間裏。

我那支半自動步槍的槍號我曾經記在一個本子上的，後來多次搬家，也不知弄到哪兒去了。拿著槍，大家都十分興奮。會打槍的人多，就來教我們。先是教怎麼射擊，然後教怎麼拆卸、怎麼重裝。1956式半自動步槍結構簡單，零部件不多，拆卸和重裝都很簡單，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領。幾天之後，我就能蒙上眼睛，在很短的時間裏，把槍全部拆卸，然後又重新裝好。

有了槍，然後又發了子彈，一人50發，還發了子彈袋。把子彈袋穿在身上，然後扛著槍，就很威風了。

那天正好是 8 月 18 日，八一五派發動了“八一八”戰役。爭奪建設廠的“八五”戰役後，八一五派經過十餘天的休整補充，又恢復了元氣，于 1967 年 8 月 18 日對反到底派展開了全綫進攻。一年前的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這一天便被當作“紅衛兵節”。八一五派選擇這一天進攻，大約有某種紀念意義。

“八一八”戰役有三個戰場，都是從清晨開始打響的。東邊在石油路、潘家坪一帶，西邊在黃桷坪，中間則在五臺山。除此之外，在南岸，八一五派還組織了對黃山的偷襲。由於戰綫長，準備得更加充分，戰鬥也就更加激烈，爭奪也就更加厲害，這場戰役死的人肯定比“八三”、“八五”建設廠爭奪戰還要多。

八一五派發動“八一八”戰役，總目標依然是建設廠。於是，建設廠的人就想把我們留下來。鄧長春當然不同意，要把我們拉回南岸。回南岸還是只有走九龍坡，但不知為何，總聯繫不上那邊的人，於是鄧長春決定攔截火車。8 月 19 日下午，我們 200 多人悄悄來到建設廠外那隧道裏等待，終於等來一列開往成都的火車。開了幾槍，那火車就停住了。我們分別爬上火車的行李車廂和郵政車廂。鄧長春則爬上火車頭，押著火車司機衝過“天鵝寶蛋”的封鎖，很快就到了九龍坡。通過“天鵝寶蛋”時，那據點的人可能有些懷疑，向火車上方打了一梭子彈。好在火車速度快，沒等他們反映過來，火車就通過了。

到九龍坡時已經快天黑了，我們就住在港口的倉庫裏，隨便找個地方就睡下了。我找的地方很隱蔽，人又疲倦，竟然一覺睡到大半上午。我醒來時，發現我這個班的人都不見了。正在著急時，才看到他們疲憊得皮塌嘴歪回來。一問是怎麼回事，他們告訴我，他們上戰場去了。

“八一八”戰役中，黃桷坪是八一五派進攻的一個重點地區。坪是指周邊被河谷切割，邊坡呈陡崖或階梯狀，頂面起伏和緩的高地，地質學上叫做臺地。黃桷坪地處九龍坡後面的坡上，是坪；而九龍坡則是壩。黃桷坪高于九龍坡幾十米，屏障著九龍坡。九龍坡是反到底派聯繫南山和建設廠的唯一通道，丟了九龍坡，這

條交通綫一斷，對反到底派來說就相當危險了。而要拿下九龍坡，就必須先攻下黃桷坪。黃桷坪一旦失守，居高臨下，九龍坡也就守不住。

8月18日清晨，戰鬥在黃桷坪後面的王家大山一帶打響。八一五派打頭陣的是重大八一五的專業武鬥隊“重大三〇一”部隊，反到底派則主要是電校、電技校的部隊。雙方打得十分激烈，互有傷亡。當時聽說，鄧長春在九龍坡接到報告，立即決定向王家大山增派“金猴”部隊。那增派的“金猴”中，有一個叫李魯沂，是嘉陵廠反到底派的頭頭，是“八八”海戰時那“嘉陵1號”軍艦的“艦長”。當時傳說，說他是烈士後代，還是市委書記廖蘇華的侄兒，就住廖蘇華家裏，武鬥中以殺人不眨眼而聞名。其實，李魯沂隨母姓，他父親高蘭戈原是重慶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文革前受到錯誤批判，文革中起來翻案要求平反，得到反到底派的支持。李魯沂15歲即參軍，參加過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後因病退伍。廖蘇華及其丈夫李唐彬（文革前已經去世）均擔任過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與李魯沂家關係密切，所以才有這樣的傳說。

當時還傳說，戰鬥中，這傢伙打瘋狂了，竟端起機槍站起來，向對方猛烈掃射，結果被對方打死。後來我才知道，李魯沂他們是提前到王家大山擔任守衛任務的。8月18日清晨，八一五派組織200多人進攻王家大山，守衛王家大山的反到底派武鬥人員除一人逃走外，其餘十餘人均被打死。李魯沂等人堅持到最後，打光了全部子彈，很可能是被攻上來的八一五派槍殺的。那逃走的人回去報告，反到底派出大部隊，又把王家大山奪了回來。

李魯沂是鄧長春的好朋友，用重慶話來說，號稱“直接兄弟夥”，關係非同一般，以至後來鄧長春下令槍斃兩個俘虜來為他“祭魂”！

在重慶的文革戰爭中，打頭陣的總是中學生，大學生往往梭邊邊。大約是內部人吵了嘴，賭了氣，這一天，重大八一五才一改往日的畏縮，派他們的專業武鬥隊三〇一部隊來打頭陣。沒想到這頭陣不好打，不僅沒有占領對方的陣地，反而傷亡慘重，丟了好幾條命。打到太陽升起來的時候，進攻者已經蔫了氣，只好

撤退。跟著後面來慰問的重大八一五宣傳隊（那時俗稱“鮮花隊”）不知道自己的戰友已經撤退，一車人開到黃桷坪，結果全成了反到底派的俘虜。這一仗，是重大八一五損失最慘重的一仗。那以後，大學生們就學乖了，打頭陣的事再也不願幹了。

我們到九龍坡的時候，王家大山的戰鬥早已結束，也就沒有派我們去參戰。那天晚上，我睡得正香的時候，我這個班的人被叫醒，派到王家大山去運送傷員。由於我睡的地方在貨堆裏面，他們沒有找到我，害得我沒有能够目睹王家大山那戰場，沒有能夠“享受”那戰鬥場面的“精彩”。當時，我還直嘆氣，把他們埋怨一通，暗暗後悔呢。

20. “八一八” 戰役

其實，“八一八”戰役八一五派攻擊的重點不是黃桷坪，而是東面的石油路、潘家坪一帶。從石油路路口到潘家坪，路邊有河運校、郵電器材廠、潘家坪招待所等三個反到底派的武鬥據點，卡斷了沙坪壩到市中區的交通，這恰恰是八一五派的一條重要交通線。搞掉這三個據點，對八一五派來說，具有戰略意義。

本來，從沙坪壩到市中區也可以走紅岩村、化龍橋、李子壩到上清寺。“七二五”一仗，八一五派雖然打下了工業校，但這條交通線上的上清寺卻被反到底派所控制，上清寺轉盤旁的工業展覽館是反到底派的據點，而上清寺背靠的兩路口又是反到底派的大本營，這條路並不通暢。加上江陵廠、長安廠的大炮可以從江北直接打過來，能夠嚴密封鎖這條路，因此走這條路危險多多。打通石油路，不僅可以確保八一五派的交通，而且可以壓縮反到底派在楊家坪、大坪一帶的地盤，對最後攻取建設廠具有戰略意義。河運校反到底派的航鋒兵團拼鋼針時就揚名于全市，被譽為“武鬥之花”，讓八一五派吃了不少虧，八一五派也想像打工業校一樣，狠狠報復一下。

武鬥升級為戰爭後，不管是哪一派，技校、技工校的“武鬥之花”都開始雕謝。河運校“航鋒”也一樣。他們一直據守在學校裏，還沒有參加過重大戰鬥。1967年8月18日那天清晨，天還沒亮，八一五派人馬已經摸進來了，學校裏的人還不知覺。一個亡命徒抱了一大包炸藥，跑到那教學大樓下，將那大樓炸去好大半邊，才將“航鋒”的人炸醒。幸好那大樓是空的，沒有住人，所以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那一聲震天巨響的爆炸聲，却把“航鋒”的人駭倒了，他們沒有組織抵抗，便從河運校撤出，跑過馬路，

逃到重醫去了。這一仗使“航鋒”很沒面子、很髒班子，從此後也就一蹶不振，逐漸退出了重慶人的視野。

郵電器材廠與河運校緊鄰，八一五派幾乎是同時動手的，但却意外遭到失敗。那天早晨，天剛濛濛亮，八一五派的人馬已經埋伏在郵電器材廠辦公大樓對面的小山包上。大樓裏，那站崗放哨的人耐不住瞌睡蟲的進攻，靠在窗口已經呼呼睡著。四一二部隊（即解放軍通信兵工程學院）的反到底派也有人住在那大樓裏，其中一人多少有些戰鬥經歷，又習慣了早起早練，那時候已經起床，鑽出工事，來到外面空闊的地方伸伸腿，彎彎腰，呼吸新鮮空氣。突然，他發現有兩個人從對面山包包的小樹林裏一躍而出，跑幾步又臥下，然後又一躍而起再跑幾步，又臥下。隱隱約約他還發現，那前面的一人還抱了一大包東西。他是行伍出身，當過兵又帶過兵，馬上判斷出那是炸藥。對方要進攻，要來炸大樓了。說時遲，那時快，他從身上抽出五四式手槍，幾乎沒有瞄準，“砰！砰！”就是兩槍。只見那抱炸藥包的立即栽倒在地上。後面一個見了，楞了一下，便轉身往那小樹林裏跑。他又開了幾槍，但因距離遠了，沒有將那人打倒。

立即，小樹林裏的步槍機槍響了起來，子彈急風驟雨似地傾瀉過來。那立了功的軍人却就地一滾，滾到大樓門前，鑽進工事裏。大樓裏的人被槍聲驚醒，一個個撲到掩體裏，猛烈還擊。一時間，槍聲大作。

這時，河運校那邊響起了震天動地的爆炸聲，可以隱隱約約看見那教學大樓被炸去好大一半邊。

大樓裏的人都看見，那炸藥包還在那被打死的爆破手身邊。不把炸藥包搶起來，對方再派人送到樓下來，大樓就喊危險了，于是就要派人去把那炸藥包撿回來。四十一中一個叫朱心全的高一學生自告奮勇，主動請戰前去。

朱心全比我大一歲，家住臨江門，離我原來在臨江門的家不遠，是我們南山中學高三同學朱心躍的兄弟，還是我的小學同學。他長得粗粗壯壯的，顯得精精靈靈的，不知為何當時竟然那樣亡命。他剛躍出工事，就被對方發現，子彈便在他身邊亂飛，他只

好低姿匍匐前進，不時還趴在地上爬上一陣。一串機槍子彈在他前面濺起一串串白烟，那泥沙弄了他一頭一臉。大樓裏的人見狀，便集中火力，壓制那機槍，掩護他前進。不知是打中了機槍手還是機槍要換彈匣，對方的槍聲竟然停頓了那麼一瞬間。他便一躍而起，一下撲到那炸藥包前。

爆破手的頭挨了一槍，倒在炸藥包旁邊，血肉模糊，叫人噁心。他不敢多看，抱起炸藥包就往回跑。這時，小樹林的機槍又響了。他忘了死神正在背後追趕他，竟然沒有臥倒，竟然繼續跑。突然，他覺得有人把他夾在腋下的炸藥包往外猛一推，那力好大，使他站立不穩，一下栽倒，撲到地上。跟著，“轟隆——！”炸藥包爆炸了，把他震得跳起來，掀了好遠好遠。

原來，一發子彈打在炸藥包上，把炸藥包打爆炸了。

他受了傷。那炸藥包爆炸後炸起的沙子、碎布之類，嵌進他右側半身的肉中，竟有上百處之多，後來都成了肉疙瘩，留下了永遠的紀念。好在沒有一處傷到骨頭和要害處，這亡命徒真是命大福大！後來，我們見過面，也看過他那臉上腿上的肉疙瘩，說起當時的情景，也只是相視笑笑而已。

八一五派炸樓的計劃未能實現，打了一陣就沒勁了，于是只有撤退。

後來又聽到另外一種說法：8月18日凌晨，八一五派的武鬥人員就開始向反到底派占據的郵電器材廠辦公大樓進攻，密集的槍聲驚醒了大樓裏的人。大樓裏有四一二部隊的軍人，立即指揮大家撤到底樓進行抵抗。後來發現有三個爆破手推著炸藥包往大樓摸過來，那軍人就叫大家集中火力將爆破手打死，然後又派人去將那些炸藥包拆開。朱心全可能就是去拆炸藥包的人之一，并因此而受傷。守樓的反到底派堅持到當天下午，見沒有人來支援，感到守不住了，才撤離郵電器材廠。反到底派撤離後，八一五派仍將大樓炸壞一個角。這一仗反到底派也死了好幾個人。

1958年3月，毛澤東從成都來重慶，在重慶住了一個晚上。那時，重慶沒有高檔的招待所，更沒有像樣的酒店賓館之類，市委只好把毛澤東安排在市委大院內的一幢別墅裏住。這讓四川省

和重慶市的領導很是難堪，於是不顧“國民經濟暫時困難”，花巨資修建了潘家坪招待所。不過，後來毛澤東再也沒來過重慶，那豪華場所幾乎就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一個人享用了。潘家坪招待所繁鄰重醫，很早就被占據，成為反到底派的一個重要據點。1967年8月18日，潘家坪招待所也成為八一五派進攻的重點。

但是，八一五派沒有估計到潘家坪的反到底派已經作好準備，當他們推倒圍牆一涌而入時，便遭到躲在大樓裏的人猛烈射擊。我後來聽一個當時在潘家坪招待所打過仗的戰友說，只見那人一排排倒下去，不知死了多少。僅一次衝鋒，八一五派便傷亡慘重，不敢再來第二次，只好撤退。

靠近潘家坪招待所的歇臺子市黨校，也是反到底派的據點。八一五派也組織人去進攻，結果也差不多。見反到底派已經有了準備，火力又強，進攻的人也只好撤退了。

在整個東邊戰場，八一五派雖然在河運校打了勝仗，把“航鋒”趕出了學校，却在郵電器材廠、潘家坪招待所吃了敗仗，不僅沒有能够打通交通線，而且死傷慘重，以失利告終。

而在中部戰場，由於反到底派自己失誤，八一五派因此得手，占了一個大便宜。

中部戰場在五臺山，那是石坪橋附近的一座小山包，如今那附近修得有一座很大的立交橋。1967年8月18日那天清晨，那小山包本來是反到底派占據的，好像是二七兵團的人。二七兵團大多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工人，可能缺乏組織紀律性吧，八一五派一進攻，他們就膽顫心怯害怕了，幾乎沒有認真抵抗一下，便“主動”撤退到潘家坪去了，撤退前沒有請求，撤退後也沒有報告。建設廠的反到底派司令部只聽說五臺山吃緊，在消息不清的情況下，便派剛組建的九一縱隊紅二連獨立排前去支援，結果誤入敵陣，死傷慘重。

九一縱隊紅二連轉移回南岸後，又陸續有一些南岸的學生到了建設廠，於是成立了獨立排。我的兩個同班同學也在其中，其中就有盧光忠，還有一個叫許文光。獨立排裏還有江北十九中的人。獨立排排長是紅二連的副連長兼任的，是十一中“紅色暴徒”

的頭頭，帶著隊伍走在最前面。守山的二七兵團一撤退，那五臺山就被來進攻的供電八一五占領。山上的人看見幾十個提著半自動步槍的人來了，知道是反到底派，便居高臨下猛烈射擊。獨立排只聽說去支援，還以為山上的人誤會了，便伏在地上哇哩哇啦喊叫：“不要開槍！自己人！”山上的人却不理會，當場便打死打傷十幾個，其中包括盧光忠和那排長。後面的人見了，才退了回去，叫來三七高炮和四聯裝高射機槍，往那山上轟擊，把對方火力壓了下去，最終攻了上去。那排長身上受了十幾處傷，但都沒有打中要害，還沒有死。送到重醫，本來還可以救活，却因缺醫少藥，竟然活活痛死。盧光忠只挨了一顆子彈，從臉頰上打進去，又穿出來，又從胸口鑽進去，從背心出來，當場便死去，是許文光拼命把他拖下山的。盧光忠比我小，那時才 16 歲半！

盧光忠的父親是市公安局伙食團的團長，解放前當學生時就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兒子死去，給他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是沒法形容的。我們這些同班同學多次到他家去看望他，也難撫平他那悲痛。讀書時，我和盧光忠本來也有些芥蒂，他曾和另外一個恨我的同學（後來知道是因為我成績太好引起他們的嫉妒），背地裏把我的床單用小刀劃破，幾乎讓我不能再用。那個年代什麼都要票，沒有布票不說，我家的經濟情況也不允許我再購置新的。雖然如此，我却沒有記仇。造反後，我們站在一起，後來又都成了反到底派，在“二月鎮反”的日子中，我們住在一起，結下了深深的友誼。但是，在那硝烟彌漫的戰爭環境中，幾乎天天見到有人死亡，死亡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這些當戰士的似乎都搞忘記了，似乎都弄不明白了。幾天以後，許文光把盧光忠被打死的事告訴我的時候，我頭腦裏一片空白，根本沒回過神來，根本不知道這意味著我永遠也看不到盧光忠那憨直的笑容了，也看不到他走路時手和腳幾乎是同步的滑稽動作了。

盧光忠死後，埋在建設廠馬路對面的軍庫裏。第二年，我們把他的遺骨遷回到學校，埋在學校背後的一個石壁上刻有“眠洞”二字的山洞裏。後來，我還填了兩首詞，一首是《滿江紅》：

烈士墓前，
細凝視，
英容遺像。
拳緊握，
眼流淚水，
耳聽炮響。
血灑山城敵寇敗，
長眠大地紅花長。
笑王八，——
恰似蛾撲燈，
烟中葬。

批《必勝》，
揪魔掌；
反翻案，
征黑浪。
屈指一年來，
幾多惡仗？
大恨集為兵卒誓，
深仇斬絕李任黨。
不全贏，
決不把刀槍，
丟庫房！

詞中的“王八”是指“革聯會”，反到底派把“革聯會”罵成是癩格寶（癩蛤蟆），是烏龜，也就是王八。《必勝》指八一五派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周恩來曾傳達毛澤東的話說：“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塗。”李任黨指李井泉、任白戈，前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後者是重慶市委書記。

另一首是《蝶戀花》：

白霧濛濛寒意逼，
仇恨填心，
喘氣登山急。
枯草露珠鞋襪濕，
紅書緊握長江激。

臉貼高巍眠洞壁，
不動鋼槍，
憤怒揮豪筆。
遍響南坡飛泪雨，
悲歌一曲蒼松泣。

寫這首時，我們已經要下鄉了，因此才有“不動鋼槍”的說法。五臺山這一仗損失最慘的是十一中，獨立排死了八個，十一中就占了五個，成爲南岸幾十家中學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學校。當時，因八一五派機槍封鎖得嚴，有好幾個人的尸體沒有拖下山來。後來停火了，戰友們才去把那些已經腐爛成一堆白骨的尸體撿回來，其中五個就埋在體育館那街心花圃裏（就是現在那賀龍塑像下）。這五人中，有三個是十一中的，有兩個是十九中的，好像還立了一塊碑。再後來，當局要强行挖墳，這些尸骨可能被他們的家長遷移走了。

21. 最黑暗的一幕

重慶文革戰爭中，最黑暗的一幕就是槍斃俘虜，兩派都幹過槍斃俘虜這種殘忍的事。鄧長春、方文正也正是因為批准槍斃俘虜，才成為重慶文革戰爭首批受到中央懲處的人。

1967年8月18日，嘉陵廠反到底派頭頭李魯沂在王家大山被進攻的八一五派打死。作為自己的“直接兄弟夥”，鄧長春當然氣憤又悲痛，竟然下令槍斃兩個俘虜來為他“祭魂”。8月20日上午，在九龍坡貨運碼頭上，為李魯沂開追悼會，我們黃山紅二連以及在九龍坡的反到底派全都參加，有好幾百人，坐滿了那碼頭上的一塊大平壩。正是漲水季節，停在江邊的“人民5號”登陸艇的甲板比碼頭還高出許多，追悼會的主席臺就設在登陸艇上。

我們都學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知道“不虐待俘虜”。宣布要槍斃俘虜的時候，引起臺下的人一陣騷動。“首都紅代會”駐渝辦事處姓劉的同學代表“革命群衆”，“控訴”了這兩個俘虜的所謂罪行後，強烈要求對他們執行死刑。我記得，那兩個俘虜，一個是警察（後來知道是消防隊的司機），一個是北碚的農民。據說，那北碚的農民是富農，打死李魯沂是搞階級報復；那警察是八一五的機槍手，雙手沾滿了反到底派戰友的鮮血。

接著，鄧長春站出來，問大家同不同意槍斃。臺下就有人喊：“同意！”那些參加了王家大山戰鬥的人，親眼看到自己的戰友被打死，可能積蓄著仇恨，喊“同意”的就多。我們黃山紅二連的人那時還沒經歷過真正的戰鬥，對戰場上死人還沒有真切的體驗，喊“同意”的就少。鄧長春看喊“同意”的人不太多，又問同不同意，臺下喊“同意”的人就增多了。問到第三聲時，喊“同意”

的人就占了絕大多數。然後，鄧長春就宣布：“我代表山城 400 萬人民宣布，判處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死刑，立即執行！”

我現在盡力回憶，我不敢保證我沒有喊過“同意”。但從我當時的思想來說，我的確是不同意槍斃俘虜的。不過，如果我像同班同學許文光那樣看到盧光忠被打死，看到盧光忠被打死後的那樣兒，我可能也會喊“同意”的。過後幾天，當我看到在“八二二”上新街戰役中被打死的陳世倫後，心中的仇恨之火很可能也會讓我喊“同意”的。

文革期間，甚至在文革之前和之後，這樣的場面都很多。從表面上看，這好像是徵求大家的意見，好像很民主，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暴民統治”。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衆——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以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的事例，對這種現象進行過深刻剖析。在一定條件下，當個人聚集成群體時，其心理就會發生顯著變化，甚至喪失理性，喪失推理能力，思想情感容易受別人，特別是領袖人物的暗示和傳染，從而變得極端、狂熱，不能容忍對立意見。因人多勢衆產生的力量感，往往又讓個體失去自控能力，甚至變得肆無忌憚，形成所謂的“暴民統治”。即使知道自己做的是壞事，是違法犯罪的事，往往也以為“法不責衆”，以為可以逃脫懲罰，只圖一時之樂。特別是在文化落後、思想還不開化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更容易出現。這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踐踏了少數人的權利，甚至威脅到少數人的生命，致使素質不够高的大多數人可以任意把自己的自私、無知、固執發揮到極致，從而陷入野蠻的泥沼，對少數人大開殺戒，造成殺戮的慘劇。這實際上不是什麼民主，而是所謂的“多數暴政”或“暴民政治”。

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相似，重慶文革戰爭期間，幾乎所有的國家機構都已經癱瘓，幾乎沒有人能够完全控制局勢，這樣的“暴民統治”也就特別厲害。那時，街頭上“打死鷄娃”的事也就特別多。所謂“打死鷄娃”，就是看到有人被別人打了，反正可以不負責，其他人也擁上去打“抹合”打便宜，好像是“不打白不打”一樣。而最愛“打死鷄娃”的人，往往是那些沒有參加過武鬥的人，甚

至是所謂的“逍遙派”。

後來，我與那位首都紅代會的劉同學也有了一些交往。我下鄉後，好像還相互通過信，繼續說一些“革命語言”。1971年全國都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那時他好像已經分配到河北的一個農場，農場的軍管會還給我所在的公社來函，要我揭發他的“罪行”，我也只好把我們交往的情況寫了個材料交給公社寄了去。“五一六分子”本指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個極左組織，1967年，他們利用“五一六通知”公開發布之機，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文革開始後，劉同學就長期呆在重慶，極少回北京，不可能參加這個組織。但是，197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大批無辜的幹部、學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遭到長期隔離審查、批鬥、監督勞動，喪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這個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才不了了之。劉同學為何被當作了“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中受了哪些罪，後來怎樣了，也沒有人知道。

執行槍斃的人叫傅明禮，是望江“金猴”的亡命徒，個子不高，一個小把把，學徒期未滿，臉上稚氣未消。他和李魯沂是朋友，是最要好的兄弟夥。聽說李魯沂被打死，他端起一挺輕機槍，衝在最前面，向對方猛掃，一口氣奪回了丟失的王家大山陣地。要槍斃俘虜，據說事前鄧長春還專門問過他：“你敢不敢？”他說：“有什麼不敢？”很英勇的樣子，鄧長春也就放心了。

但是，戰場上英勇是一回事，槍斃俘虜又是一回事。還在開大會控訴那兩個俘虜的“罪行”時，我就發現，傅明禮就有些坐立不安，看來他心裏已經些不踏實了。戰友們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響得他心裏也咚咚亂跳了吧？兩個俘虜被押到登陸艇上，傅明禮提著一支五四式手槍跟在後面。俘虜被按在地上跪著，傅明禮便拉那槍栓，拉了幾下竟然都沒能將子彈頂上槍膛。開會的人黑壓壓一片，我們在下面全都目不轉睛望著他，這讓他越發有些心慌。後來，終於把子彈頂上膛了。他站在俘虜背後一兩米遠的地方，却不敢看那將被他打死的兩個可憐的人，他把臉轉向另一邊，咬

著牙，連開數槍，竟然沒有一顆子彈打中。我看得很真切很清楚，他拿槍的手在抖，而且抖得很厲害。我旁邊有人咕噥，說他孬。我回過頭去，好像是我那叫羅朝忠的同學在說，我就頂了他一句：“那你去嘛！”

槍聲響過，俘虜却沒有倒下，會場裏就嘰嘰喳喳起來，有些混亂。

大約發現自己也太窩囊，傅明禮便再向前走了一步，又連開兩槍，終於打死了一個，另一個俘虜已經嚇得癱軟在地上。那五四式手槍裏的子彈已經打光，槍口冒著青烟。而傅明禮傻傻地站在那兒，不知所措。登陸艇上幾個站崗的人提著半自動步槍，向那被打死的和癱軟在地的俘虜又開了好幾槍，才將其推入江中。據說，那癱軟在地的人並沒有被打死，竟然逃過一劫，後來還活了下來。

我不知那些去補槍的人是怎麼想的。說實話，我真的瞧不起重慶話所說的那種“打死鷄娃”的人。大會結束後解散，補槍的人從登陸艇上走下來。看到一個我認識的傢伙那興致勃勃的樣兒，我忍不住，對他說：“有本事上戰場去打嘛！”讓他頓時好尷尬。

槍斃人的傅明禮最後也沒有好下場。他端起機槍掃射的故事被傳得越來越神，又加上他槍斃了兩個俘虜，八一五派發誓要找他算血帳。戰爭停火後，傅明禮便懷揣兩手槍，一支五四式，一支駁殼，東藏西躲。一會兒殺到專縣，一會兒跑到成都，一陣子躲在朋友家裏，一陣子藏在鄉下親戚家中，好歹躲過了大半年。也不知道是為什麼，那一次他要偷偷溜回廠裏去。有人說，是他要的一個女朋友在廠裏，大半年沒見了，想見見。也有人說，是頭頭的命令，要他回廠探一下虛實。那是 1968 年初春時節，望江廠的八一五派勢力已經強大起來，把“金猴”趕出了工廠，他一個人回廠去，無疑是自投羅網。可能是被別人激將法激昏了頭，也可能對八一五派要找他算賬估計不足，他竟然回去了。他剛在郭家沱街上一露面，便被人發現，八一兵團一夥人便提著長槍短槍向他撲過來。

傅明禮無路可走，只有向江邊退去，退到了輪渡躉船上。那

夥人向他逼來，相互對峙著。傅明禮早已把兩支短槍扯出來，而對方却有五六支槍對著他，相距不過兩三米，但都不敢先開槍。其實，那時候，傅明禮已經練成了神槍手，可以左右開弓，能够百步穿楊，再不會像當初那渾身顫抖。如果他先開槍，至少可以抓兩個“墊背”的。可是，不知為什麼，也可能是求生的渴望，突然，他把槍往江面一摔，一仰身跳進江水裏。對方的五六支槍立即對著那濺起的浪花，狠狠地射擊了一陣。傅明禮沒有冒出來，也沒有血冒出來。他本來是個游泳好手，可是那棉襖被水浸濕後太重，把他拖進了江底，後來連尸首也沒有找到。

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碧如蘭。《國營第四九七廠（也就是望江廠）史》上說：“武鬥中對峙落水死亡1人（工人）。”或者這也叫惡有惡報吧。

黃山上也槍斃過一個俘虜。彈子石地區八一五派的一個頭頭吃了豹子膽，一個人摸到黃山上來偵察，結果被反到底派的人發現後抓住，關在汪山那邊的涂山高中裏。涂山高中反到派的一個頭頭把俘虜交給汪山小學的幾個小學生看管，可能是那幾個小學生手發癢吧，竟然背著其他人，把那俘虜弄出去打死了。後來，那幾個小學生沒事，而那涂山高中的頭頭却被弄進去關了好幾年。

關於槍斃這個俘虜，還有另一種說法：說是鷄冠石的一個農民到汪山來理髮（因他家離汪山較近），可能是好奇，在理髮時與顧客閑聊中，向人打聽有關反到底武鬥隊的事，結果被懷疑是間諜而被抓到涂山高中關起來。涂山高中反到底派頭頭想搞個假槍斃來逼他招供，哪知執行槍斃任務的小青年却想“打活靶”過癮，把那人打死了。

其實，即使在那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對大多數參加武鬥的人來說，都不認可隨意槍斃俘虜。槍斃俘虜的事，大多發生在由工人或農民控制的武鬥隊裏。學生組成的武鬥隊，八一五派中有沒有槍斃俘虜的事我不大知道，但反到底派中我却從來沒有聽說過。九一縱隊幾個連隊雖然也被打死了不少人，甚至連自己的司令王木全也被打死了，却沒有發生過槍斃俘虜的事。據說，為槍斃俘虜的事，九一縱隊紅二連的頭頭與鄧長春還發生過爭執。

《紅岩》雜誌 1980 年 1 期刊發的中篇小說《失落的夢》，也寫了一個槍斃俘虜的故事：那外號叫“豬頭”的農村來的合同工，稀裏糊塗參加了武鬥隊，上了戰場，先是運彈藥，抬傷員；後來便拿起槍，投入戰鬥。在攻打礦業學校的戰鬥中，這“豬頭”被人連罵帶推，強迫去槍斃了一個俘虜。後來，成立了革委會，他却被本派的頭頭送進了監獄。作者殷正渝是重慶人，親身經歷過那荒唐的年月，故事寫得催人淚下。他告訴我，小說主人公的原形就是他所在的供電局的人，故事絕對真實。這個故事其實也告訴我們，在槍斃俘虜時，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都會躲避，其實也說明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人的本性還是有一個底線的。

但是，槍斃俘虜的事却在不斷發生著，兩派都有。權威的數字是省革委“人保組”的一個工作組 1971 年進行的統計：武鬥期間，共發生 22 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共殺死（主要是槍斃）的俘虜、探子和“叛徒”達 1737 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蛋、右派分子“五類分子” 14 人）！這個數字是否準確，是否誇大，現在很難判斷。不過，據這個工作組的《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彙報》說，這些殺人案件的作案凶手 878 人，當時（1971 年 5 月）就已經拘捕凶手 239 人。既然凶手都確定了，準確性應當是相對可靠的。冤有頭，債有主。隨意殺人肯定不會有好下場，不管你用什麼名義，哪怕是“以革命的名義”或者是“以毛主席的名義”！

重慶畢竟是大都市，文明程度相對較高，槍斃俘虜的事雖然有，但與專縣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在宜賓、內江、涪陵、萬縣、達縣等地區，武鬥隊往往由縣革委組建，縣革委的領導往往就是縣武裝部的部長、政委之類，武鬥隊也就由武裝部派軍人來當隊長，來指揮。縣武裝部雖然號稱是團級，但那當部長的、當政委的，文化往往很低，大多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農民，甚至是起義或投誠的國民黨士兵。由於思想單純，又長期搞“階級鬥爭”，他們往往把對方當作土匪，當作壞人，於是槍斃俘虜的事就相當普遍。那時，絕大多數專縣都還沒有現代工業企業，大多數武鬥人員都只是運輸合作社的搬運工人之類，打

仗不行，槍斃俘虜却“樂此不疲”，甚至搶著幹。

以涪陵為例：那時，涪陵專區下轄十個縣，包括後來劃出去成立黔江地區的酉、秀、黔、彭等五個縣。涪陵軍分區政委叫李畔，傳說這李畔就曾親自帶領武鬥隊東征西剿，不知打死打傷多少人。據說，有一次他批准槍斃的俘虜就有好幾十個，超過了我所知道的重慶反到底派槍斃俘虜的總人數！當然這只是當時的傳說。後來才知道，李畔在涪陵發槍給擁護“紅十條”的“忠實派”（即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造反司令部），是經成都軍區政委、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批准的，而張國華請示過中央，據說是經周恩來同意了的。李畔帶隊攻打“忠實派”的對立面“紅聯司”（又稱“紅貿派”，即紅色貿易軍革命造反總部）的過程中，並沒有大規模槍斃俘虜。相反，“紅聯司”在退出涪陵城後的幾十天裏，却大開殺戒，殺害的俘虜以及不同觀點的群衆，數量驚人。

不管怎麼說，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槍斃俘虜都是人性最醜惡的表現。如今，每當我想起九龍坡江邊那槍斃俘虜的一幕，心中就忐忑不安。的確，雖然當時我對槍斃俘虜“不感冒”（反感），雖然我當時也不可能公開站出來去反對，但想到那被打死的人，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也是凶手。我只能默默禱告，願死者安息，願上天寬恕！

22. 南岸的戰鬥（上）

1967年8月21日晚上，我們回到南山，住在四女中教學大樓。

就在前幾天，也就是1967年8月17日深夜，為配合在大坪到九龍坡一線的進攻，南岸區的八一五派也組織兵力，對黃山進行了夜襲。黃山是南山山脈的一段，東、西、北三面都朝著長江，山巒重疊，溝壑縱橫，因此上山的路也多。那天晚上，八一五派分成幾路，偷偷摸上山來。其中主力一路是從五馬槽水庫方向摸上來的。那五馬槽水庫是大躍進時修的，四周有五座山峰，水庫就形成像章魚那樣的五個觸角。我們曾去那水庫洗澡游泳，那山林靜悄悄的，藍天白雲，碧水清波，很是愜意。從五馬槽水庫到黃山療養院，是一片相當茂密的樹林，即使白天去走，弄不好也會迷路，更不要說晚上看不到路了。八一五派的武鬥人員在那密林中鑽來鑽去，竟然鑽迷了路。如果他們能夠順著那一條小路摸進療養院來，一個突然襲擊，即使也可能要被打退，至少也要讓反到底派吃很大的虧。但是，這樣一迷路，不僅耽擱了時間，而且遇到了反到底派放的暗哨。幾聲問話不對頭，便引來槍聲。那時，黃山上的反到底派只有百來人幾十來條槍，居高臨下，“乒乓乒乓”，就往那樹林中一陣亂打。

怪只怪八一五派運氣不好。那天晚上，住在黃山的鷄冠石的反到底派農民造反軍，也是順著五馬槽水庫的路，準備下山去偷襲八一五派，兩派的武裝隊伍正好在路上錯過了。那下山去偷襲的反到底派武鬥人員走到半路上，突然聽見背後槍聲大作，知道山上出事了，又立即趕回來，對偷襲黃山的八一五派形成前後夾擊之態勢。八一五派只好丟下幾具死尸，狼狽逃下山去。天亮後反到底派打掃戰場，還發現不少八一五派丟棄的武器。其中竟然

還有一支英國造的毛瑟槍，與當年打太平天國的華爾洋槍隊使用的那種洋槍一模一樣。仔細看，那槍上面還刻有“1860”的字樣！1860年，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我估計那槍是清政府從英國買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這樣的槍肯定打不響，八一五派從武裝部搶來，也拿到戰場上來，可能是“有”聊勝於無吧？後來，我還到五馬槽那山溝裏去搜尋過，以為還可以再找到什麼，結果除了幾顆子彈殼，只有空手而回。

槍聲一響，其他幾路上山來偷襲的八一五派以為被發現了，於是就心慌。可能是為了給自己壯膽，還沒發現對手就亂開了一陣槍。反到底派居高臨下，武器又好，天還沒亮，八一五派就只好全線撤退。

那天晚上，打得最激烈的是炮臺山。炮臺山反到底派炮兵陣地對面的山頂上有三塊聳立的石笋，稱為三塊石。八一五派從三塊石山下的亂墳堆裏摸了上來，就聽見五馬槽山溝裏槍聲大作，再不敢向前摸，就把機槍安放在那三塊石下，向炮臺山猛烈射擊。炮臺山只有炮兵。前兩天，炮兵排的年輕人又被編入黃山紅二連，到建設廠“提”槍去了，剩下的人不是頭頭就是年齡較大的師傅，而且只有兩支蘇式步槍。那蘇式步槍要扳一顆才能打一顆，哪能與對方的機槍抗衡？雖然是夜晚，但在山頂，天又晴好，相距不過100多米，雙方人影晃動都能看見。那機槍子彈打在那高射炮上，“當當當”亂響，誰敢爬到炮上去？

這時，外號叫“黃金棍”的那個炮兵教練，那個從望江廠總裝車間來的老師傅，却沉著冷靜。只見他趴在地上，用手去轉動那炮盤，讓那炮管轉過去，對準了三塊石。八一五派的捷克式輕機槍的彈匣只能裝20發子彈，手指按著那扳機不放的話，一下子就會全部飛出去。“黃金棍”師傅人瘦小，却相當英勇。趁那機槍換彈匣的時候，猛地站起來，抓住那搖把，把那炮管從高仰狀態搖到水平狀態。此時，機槍又響了，他又趕緊趴了下來。要爬到炮上去擊發，至少需要十幾秒時間，肯定不行。於是，他便用他天天捏在手上那根膠木棍，去捅那擊發板。那擊發板像汽車的剎車踏板，有彈簧頂著，力小了就捅不動。光是手上的力不行，

他就用身子去頂那膠木棍。人趴在地上，角度不對，還是捅不動。機槍繼續在響，子彈繼續打在炮上“當當當”亂響。他一咬牙，竟然弓起身子來，一用勁，居然將炮打響了。咚咚咚——！那炮彈飛向三塊石，機槍立即啞吧了。後來，炮兵們跑到那三塊石去看，地上還有大灘大灘的血迹。經觀察分析才知道，那炮彈並沒打著那機槍，却打中了那石筍。那岩石被打碎，石塊落下來，打傷了機槍手，才逼迫他們撤退了。

1968年8月，我學會填詞，為這場黃山戰役專門填了一闋《念奴嬌》：

上黃山去，
正鉛雲五彩，
洋洋春節。
路側清溪琴瑟響，
松翠傲迎飛雪。
忽見梅花，
一枝獨立，
風凍成紅色。
尋山歌調，
是雲坡檢柴者。

指點烟暗山城，
雙江淡霧，
爭相說八月。
大雨巨風杉樹斷，
激戰多為深夜。
三塊石邊，
機槍休叫，
炮彈霹靂裂。
下山時候，
殘陽輝照巴國。

詞中的“山歌調”，原來寫的是“黃山調”，暗指“我愛黃山是戰場”那首歌。但與第一句重複了，就改爲“山歌調”了。

應當說，除了望江廠（那時望江廠的地盤還屬於南岸區管轄），南岸兩派之間的武鬥並不像城裏頭以及江北、沙坪壩、大坪、楊家坪那樣激烈。拼鋼釘的時候，好像只有八一五派偷襲柴油機廠那次打死了一個人。戰爭開始後，八一五派在新市場伏擊城建兵團，一下打死打傷二十多人。反到底派的仇還沒有報，八一五派又對黃山進行偷襲，讓反到底派更是氣憤。可能是聽到留守黃山的人報告，鄧長春在回到黃山之前，就與留在山上的人策劃了“八二二”攻打上新街的戰役，目的是要教訓教訓八一五派。

南岸的地形是一個啞鈴，東面是南山山脉，山下的市區是兩頭大中間窄。東北面是彈子石，有重棉三廠、紡織配件廠、西南製藥廠等企業；西南面是南坪、銅元局，有長江電工廠、第二機床廠、水泥廠等企業；中間則是一個狹長地帶。區委區政府就位於這狹長地帶最中間的上新街。而八一五派的主要力量則在西南面的水泥廠、長江廠一帶。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組織了幾百人的武裝，從中間突破，對上新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

清晨，首先開始炮擊。反到底派把黃山大門外那門三七高炮拖到龍黃公路一棵樹（現觀景臺）附近，又從望江廠拖來一門五七高炮，向山下的區武裝部、區委大樓及幾個制高點轟擊。然後，又派九一縱隊紅二連、黃山紅一連和其他幾個武鬥連隊下山。當時，八一五派在上新街的武鬥隊只有大慶民中三二一一，不管是從兵力還是從武器來看，反到底派都占絕對優勢。反到底派衝進上新街，八一五派幾乎沒有能够組織起像樣子的抵抗。沒用多少時間，反到底派就大獲全勝。這一仗，反到底派打死對方二十餘人，打傷數十人。

地處上新街西南側的八一五派主力得到消息，立即組織力量前來支援。長江廠八一兵團也擁有一門三七高炮，不知是從哪兒搶來的，不過是單管的，同時還有幾挺口徑爲12.7毫米的高射機槍。他們不知深淺，只好把那炮和機槍布置在海棠溪附近的山坡上，向反到底派的山上陣地轟擊。八一五派的炮兵都是轉業軍

人，據說還有駐軍空軍的人參與（當時南山的不少山頭上都駐有高炮部隊），那三七高炮僅試射了兩炮，第三炮便打中了反到底派設在真武山上的指揮所。那是一個臨時搭起來的草棚棚，馬上燃燒起來，一會兒便燒得個精光。反到底派的兩門炮被一棵樹前面的小山擋住，不能向海棠溪方向還擊，只好悶在那山凹裏看著八一五派的炮兵顯威風。鄧長春見進攻上新街已經達到目的，便下令撤退。山下的人員便陸續撤上山來，順便搶回了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物資。

我們黃山紅二連是8月21日晚上才回到南山的。打上新街的兵力已經足夠了，鄧長春就沒有安排我們。這樣也好，黃山紅二連有柴油機廠的，還有三十九中的，都是上新街的人，認得上新街那些八一五派的人。如果把黃山紅二連放下山去，肯定還要打死打傷更多的八一五派的人，鄧長春的罪行就更大了。我們也不知道要打上新街，睡了一覺起來，戰鬥已經基本結束。我們跑到龍黃公路路口那兒去看熱鬧時，八一五派的三七高炮正在向山上轟擊，只見那真武山上火光一閃，就冒起大火來。

天快黑的時候，有命令下來，要我們黃山紅二連派一個班去黃桷古道上設立哨卡，防止八一五派夜裏摸上來偷襲。我是班長，便主動請戰。柴油機廠的楊廣德是排長，由他帶領我們去了老君洞。

我這個班，除了我和我的同學羅朝忠外，都是柴油機廠的學徒工。我們出發時，兩個女生也硬要跟到我們一起去。這兩個女生就是曾經在重醫照顧過劉新庭的那兩個衛校和護校的學生，因為她們家都住在大興場，不知什麼時候也從重醫那邊回到南岸來了。可能是因為認識望江廠的人，她們就和另外幾個女生組成了黃山紅二連的衛生班。兩個女生堅決要去，楊廣德也沒辦法，只好讓步，讓她們換上勞保服，和我們一起出發。

天還沒有全黑的時候，我們就來到老君洞，在一個靠近黃桷古道的斷牆處設立了哨卡。那黃桷古道原是重慶通往綦江及貴州等地的驛道，青一色的石板路，沿途多黃桷樹，那時路兩側尚存不少明清建築風格的木結構穿鬥民居。當年，這黃桷古道不僅商

賈雲集，更是人們春游南山的主要通道。從正月初一開始，到清明節前後，重慶城的人或三朋四友，或全家老少，從城裏走出來，過江上山，以求一樂。清人陳瀚《涂山賦》曰：“至若元旦朔日，正月良辰，渝城士女，郡縣商民，逾山跨嶺，喚渡問津，燃香裂楮，佞佛禮神。亦有緇流耽咏，羽客沉吟，雲岩泉洞，竹徑松陰。或誦經而舞鶴，或寫意而鳴琴。”朝山敬香的，觀景玩耍的，徒步而行的，轎來轎往的，再加上沿途擺攤叫賣的，攔路討口的，經常把那逶迤延綿的黃桷古道擠得個水泄不通。不過，我們去守夜的那天晚上，那路上連個鬼影影也沒有。坐在那草籠籠裏吹了一陣龍門陣，大家都有了睡意。于是就安排人值崗，其他人便橫七豎八倒在樹下的凹凸處裏睡了。

兩個女生睡在男生們的中間，雖然穿著勞保服，但那睡相却也相當刺激人的。柴油機廠那些學徒工，大多在社會上混過，說話時甚至都帶著下三流的腔調，有空時都要說點騷話、擺點暈龍門陣什麼的。現在想來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那天晚上，就是這樣一些人，竟然沒有人想入非非，更沒有人做任何非禮動作。天亮了，樹上的鳥兒嘰喳喳，叫醒了沉睡的年輕人。大家爬起來，竟然沒有人想到那一回事，兩個女生也沒有一點尷尬一絲臉紅。有沒有人做那種荒唐的夢，我不敢保證，但我絕對沒做。如果真的有人做了，我想他可能會臉紅，可能會表現出不自然的狀態來，但十幾個人裏面却沒有誰不自然。後來——那是一年多以後了——一個曾睡在那女生身邊的柴油機廠的學徒工下流無耻地對我說：“當時好哈（傻）呀，都不曉得趁機摸一把！那女生的咪咪好大吧，摸起來好舒服喲！”我對他說：“如果當時你亂摸了，說不定就被槍斃了！”他說：“那也是。”

我們醒來的時候，發現兩個值最後一班崗的人竟然也睡著了，大家很是氣憤，有人甚至要出手打他們，被楊廣德勸住。都是年輕人，又沒經過特別訓練，站崗不打瞌睡其實是很不容易辦到的。其實，八一五派剛剛被打得那樣慘，沒有意志也沒有能力再組織偷襲，我們總算平安度過了一夜。

23. 南岸的戰鬥（下）

1967年8月23日一大早，鳥聲把我們從草籠籠裏叫醒。時間還早，楊廣德讓我們再巡邏巡邏。于是，我們就順著老君洞的圍牆，往山下走。走出樹林，有一處裸露的岩坎。向山下望去，海棠溪那邊的山坡上有一挺高射機槍，不時往山上盲目地射擊，打得樹葉子颯颯直落。要通過那岩坎，必須快。只要山下的人一發現，機槍就會掃射過來。楊廣德安排我先下，我說你先下，我斷後。那個年代，我的確是相當“英雄”的，總用小說和電影中的英雄來要求自己。從建設廠回黃山的途中，從九龍坡過江到南岸時，長江廠八一五派的機槍比我們去九龍坡時還要打得厲害。看到別人拿著槍跑不動，我就幫忙拿，身上左右橫挎兩支了，還硬從別人手上又搶過兩支來。也是我力氣大，背了四支槍，竟然還跑到別人前面，竟然還招呼大家身子俯低一點。在一個水溝旁，我還站住，伸手去拉那些力弱的人。我明明知道過這個岩坎斷後的人最危險，我却偏偏要斷後，也是想顯示自己的“英雄本色”。

我們十幾個人一個跟著一個衝出樹林，往那岩坎下跳。那岩坎有四五米高，有點斜，可以梭下去。兩個女生先是有點膽怯，但在大家鼓舞下，也跟著梭了下去，但這樣就耽擱了一些時間。看到山上有人出沒，如果用望遠鏡看，還能看到我們拿著的半自動步槍，山下的高射機槍就開始掃了過來。子彈在樹林裏“嗖嗖”呼嘯，樹葉落在我頭上。已經只剩我一個人了，我忘了危險，猛地衝出樹林，一縱身便跳下岩坎。跳下去後又是一個斜坡，站不穩，身子便滾了好幾圈。這時，機槍子彈已經打在那岩坎上，濺起的石塊石粉和泥巴落了我一頭一身。如果我晚那麼一兩秒鐘，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被打中。高射機槍子彈直徑大，只要打中，

肯定沒命。大夥兒急忙將我扶著，全都說：“好險！”

這是我在武鬥中經歷的第二次危險。

後來，我們轉到黃桷古道上來。有居民告訴我們，新建小學後面的山坡上有個被打死的人，是昨天被打死的，是山上下來的。我又自告奮勇，帶了兩個人去查看是怎麼回事。那地方已經臨近山下了，在一處草籠籠中，我們發現了那死人。那是個年輕人，身上的勞保服還是嶄新的，手臂戴著九一縱隊紅二連的袖章，胸口有一個很大的洞，顯然是刺刀捅的。既然是戰友，又是九一縱隊紅二連的，我立即決定把他抬回去。我叫一同去的羅朝忠負責警戒，我在附近一個居民住房裏找到兩根晾衣竿，又找到一些草繩什麼的，綁了一個臨時擔架。一天一夜暴曬暴露，尸體已經發臭。我們捂著鼻子，把死者抬上擔架，然後抬起擔架往山坡上爬。我自恃力氣大，一個人抬前面，讓他們兩個抬後面。坡太陡，很難走。海棠溪那邊的八一五派可能從望遠鏡裏也發現了我們，高射機槍也開始往這小山坡打了過來。那擔架是臨時綁的，由於心急，肯定綁得不好，加上那草繩又有些腐爛，只走了幾步，那草繩就斷了。死者頭向後的，重心一變，就一下子翻了過去，差點兒翻到後面兩個人的身上。把他們駭慘了，立即摔開擔架，匆匆跑到房子後面。我看也沒有辦法了，害怕八一五派殺過來，於是只好向山上後撤。

和楊廣德他們匯合後，看太陽已經快升到頭頂了。經過商量，決定派人去郵電學院通知九一縱隊紅二連，其他人回四女中，我又自告奮勇留下來等九一縱隊紅二連的人。也不知是怎麼搞的，我等了幾個鐘頭，太陽都偏西了，九一縱隊紅二連指導員黃富源才帶著人趕來，讓我又累又餓。我給他們指了位置，不一陣他們就把那尸體抬了回來。

死者名叫陳世良。“八二二”這一仗，反到底派就只死了他一個。陳世良是十七中高二學生，是班長。打上新街時，他帶一個班在丁家嘴負責西面的警戒。不知為什麼，撤退的命令沒有傳到他這個班，下山的人都撤上了山，他還帶著人伏在丁家嘴，監視著海棠溪。八一五派的支援部隊從海棠溪開過來，他又命令一班人猛烈射擊，這無疑是惹火燒身。八一五派人多，逐漸攻了上

來，他只好帶領大家往後退。不知是他後來中了子彈還是崴了腳，其他人都退到山上去了，他却沒有跟上來。

陳世良怎麼死的，已經無法弄清了。尸體抬回郵電學院後，天已經黑了下來，又下起濛濛細雨。幾個女生圍著尸體，用酒精清洗著，一片抽泣。我站在旁邊，沒有哭，只是狠狠地咬著牙。從尸體上看，陳世良死得很慘。胸口那一個大洞，肯定是被刺刀捅的，刺刀捅進去後，肯定還在裏面絞了幾下，不然那洞不會有那麼大。兩隻手腕都被割了一刀，那可能是他臨死前還緊緊握住他的槍，對方扳不開手指，便將他的手腕肌腱割斷，才把槍搶走。如果不是兩派武鬥，如果是和日本人什麼的打仗，陳世良肯定成爲家喻戶曉的“革命英烈”，肯定成爲中小學生嚮往的“戰鬥英雄”！

也是在那天晚上，同班同學許文光告訴我，盧光忠在五臺山被打死了。明明面對著陳世良的尸體，明明知道死去就不能復活，但不知爲什麼，我頭腦的思維却一再短路，對什麼是死、死意味著什麼等等有關死的含義失去了最基本的認知，更不用說理解。我很晚才回四女中駐地。走在路上，天下著雨，我却在想我也要像陳世良這樣，要死得英勇，要死得值得。現在回憶起來，也覺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議！

1967年8月25日凌晨，八一五派組織人馬，對七公里的交院進行夜襲。交院是溝通建設廠和望江廠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打起來後，交院不知對方底細，向黃山緊急求援。那時，鄧長春在黃山成立了“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將郵電學院的通訊器材搶出來，在交院、黃山、望江廠之間建立起無線電臺。聽見呼救，鄧長春立即帶領九一縱隊紅二連下山支援。那時。反到底派依然還沒有控制住四公里，怕八一五派在那裏設下埋伏，鄧長春只好帶著九一縱隊紅二連走我們去“提”槍時走的那條山路，從六公里上面的山上繞下去，結果又闖進了軍庫禁地。那軍庫屬於總後勤部管，那軍人的觀點偏向于反到底派，竟然沒有阻攔這些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反而將他們引出禁地。九一縱隊紅二連趕到交院的時候，戰鬥早已停止。交院反到底派九一五戰鬥團在武鬥中

比其他大學生能打，駐交院的其他反到底派人又多，加上槍好，雖然也死了兩三個人，但八一五派不僅沒占到便宜，反而丟下了十幾具尸體。但是，九一縱隊紅二連姍姍來遲，却使交院反到底派很不高興，害怕下次八一五派來進攻時吃虧。于是，鄧長春立即決定攻打并占領四公里，以保證交通線暢通。

當天下午，“黃山警備區司令部”的隊伍幾乎是傾巢出動，集中于黃沙坎。不知與交院的聯繫為何中斷了，幾百人一直呆在山溝裏不能出動。四公里的八一五派受到攻擊，立即召來長江廠八一兵團支援。兩邊都有三七高炮，于是便對射。八一兵團的炮手厲害得多，只打了幾炮，便通過修正瞄準目標，將炮彈打到反到底派炮兵陣地後面的懸崖上來了。那石頭飛濺下來，正好打在黃山炮兵排那門三七高炮的二炮手頭上。三七高炮二炮手是負責擊發的，名叫張德裕。由於頭上沒有鋼盔，也沒戴藤帽，那樣大一塊石頭打在頭上，當場就把張德裕打死。

張德裕的妻子很漂亮，那時才生孩子不久，後來開追悼會的時候，那妻子哭得死去活來，讓我也感到傷心了。張德裕死後，那妻子又嫁給柴油機廠反到底派一個叫周從軍的頭頭。周從軍把那孩子當作自己親生的來撫養，至今在柴油機廠那些老工人中還傳為佳話。

當時，我們黃山紅二連的人正呆在炮兵陣地附近不遠處，聽說炮兵死了人，又是張德裕，我和柴油機廠的那些人都要趕過去看，却被鄧長春攔住。那炮兵陣地暴露在八一五派的炮口下，四公里附近的山頭上，八一五派還設有兩個機槍陣地，不時地往山上噠噠噠亂射。我們一下涌出去，八一五派亂打一通，我們也要死好多人。

這時，跑來一個穿著勞保服的矮個子女生，找到鄧長春，三句話沒說完，就罵鄧長春是“怕死鬼”。我認識她，她叫鄧紅闖，是五十中初三學生，也是九一縱隊紅二連裏唯一一個不是南岸學校的學生（參加“八一八”五臺山戰鬥的十九中反到底派學生沒有到南岸來）。原來，九一縱隊紅二連半夜就被派去支援交院，十多個鐘頭過去了，却沒有音信，生死不明，讓留守在郵電學院

的戰友們好擔心。鄧紅闢是負責後勤的，不是“官”，却搭上郵電學院食堂送稀飯來的車，一個人偷偷跑到黃沙坎來。她見這麼多人窩在黃沙坎，就來找鄧長春，要鄧長春派人下山去救她的戰友們。鄧長春正為四公里下面那兩挺機槍犯愁，沒聽她的，她就開始大罵。鄧長春不理她，她就跳下公路，要一個人下山去，被鄧長春派人硬拉了回來。她一路掙扎一路罵，弄得鄧長春下不了臺。我見了，急忙叫住她，我說：“急啥子嘛？交院那邊連槍聲都沒有了，肯定沒事的。”前兩天晚上，在郵電學院清洗陳世良尸體的時候，我們見過面，已經算是認識了。聽我這樣說，她才安靜了一點。後來，有消息傳來，說九一縱隊紅二連已經平安無事到了交院，她立即破涕為笑。直到現在，我都還能記得起她那破涕而笑的樣兒。

鄧長春終於下了決心，派我們黃山紅二連的人先下山去探個究竟。張亮把任務交給楊廣德，我和楊廣德却為走哪條路發生了爭執。他要我帶我這個班從最近的山溝往下走，我不同意，我說八一五派萬一在那山坡上安了一挺機槍，我們全都完。楊廣德爭不過，就說：“我是排長，我命令你，你就得執行！”我不服，就和他爭起來，鄧長春見了，過來問我們是怎麼回事。我把我的意見說了，還把地形指給他看，鄧長春立即同意了我的意見。可能正是這樣一次遭遇，鄧長春就把我記住了，過了幾天，在擴編“黃山警備區司令部”部隊時，點名讓我當了副連長。

哪知我的擔心却是多餘的。八一五派攻打交院吃了大虧，又得知黃山上的人都來了，自知守不住，已經悄悄撤退。我們搜索下山，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搜索到控制四公里的二師裏面，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于是，反到底派就占領了四公里。為了免除交院反到底派的擔心，鄧長春派了一支部隊駐到交院，又在四公里的二師派駐了一支部隊。這樣，南岸反到底派就連成了一片，交通線也暢通了。

24. 反到底派大舉進攻

“八一八”戰役可說是兩派的一場決戰，結果八一五派沒撿到便宜，反而一蹶不振，再也組織不起大規模進攻了。相反，反到底派贏了這一戰，便開始轉守為攻。經過幾天準備，反到底派在各戰區向八一五派發動大舉進攻。在反到底派進攻面前，八一五派幾乎難以阻擋，只好一步步退縮。

不過，北碚可能是例外。“六五”事件後，北碚兩派之間的仇恨迅速加深，武鬥不僅迅速升級，而且比市區還要殘酷，戰爭中兩派槍斃的人也比市區的多。早在 1967 年 6 月 15 日，北碚地區因武鬥而逃離原單位的一些反到底派人員就在西南農學院（簡稱西農，現并入西南大學）成立了專業武鬥隊猛虎團。7 月 8 日，猛虎團前往歇馬場八一五派控制的紅岩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小口徑步槍、獵槍等，打死九人，變電所也被炸毀，造成全廠停產。此事被《重慶市志·大事記》定為“武鬥中，首次使用槍彈”（其實，頭一天即 7 月 7 日，反到底派二輕兵團在守衛嘉陵江橋頭的二輕大樓時，就已經使用了小口徑步槍）。武鬥發展為戰爭後，北碚的反到底派因離市區較遠，很難到建設廠來“提”槍，而八一五派却通過“搶”武裝部，“搶”駐軍，很快就武裝起來，因而一直占有優勢。八一五派通過一次又一次攻勢，終於把猛虎團趕出了北碚。8 月 28 日，八一五派組織攻打四二四軍校的反到底派據點，打死數十人，取得了所謂的“八二八”大捷，幾乎控制了整個北碚區。北碚猛虎團被趕出北碚後，先後到江津專區的璧山、永川等地，再後來又到宜賓專區的隆昌、瀘州等地，幫助當地觀點相同的一派打仗，打出了名聲。在一些專縣，猛虎團甚至成了重慶反到底派武鬥組織的代名詞。

此是後話，後面再說。

反到底派的進攻是從南岸開始的，但“八二二”雖然打下了上新街，却沒有堅守，雖然也可以稱為是一個大的勝利，但說明南岸還不是反到底進攻的首要目標。從文革戰爭全局來看，反到底派進攻的首要目標是楊家坪的空壓廠。空壓廠和建設廠相鄰，廠區幾乎連成了一片。該廠八一五派人多，反到底派很早就被趕了出來。因為生產坦克，該廠八一五派八一兵團頭頭方文正就被稱為“裝甲司令”，後來與鄧長春這個“艦隊司令”一起，成了重慶文革中最早被逮捕法辦的兩個人。空壓廠廠區的那個“天鵝寶蛋”，是反到底派的眼中釘、肉中刺，反到底派一提起便含血噴天，因此必須首先拿下。

1967年8月25日，建設廠反到底派首先用四聯高射機槍和三七高炮向楊家坪一帶轟擊。攻打的重點是楊家坪轉盤處的建設電影院，那是八一五派的一個據點，封鎖著楊家坪轉盤。高射機槍傾倒出去的燃燒彈很快就把建設電影院燃燒起來，跟著楊家坪便到處都燃燒起來，成了一片火海。空壓廠八一兵團自知難以抵抗，8月23日便主動往大渡口方向撤退。撤退前，對被俘和關押的反到底派人員進行了“處理”，據說槍斃了十幾個，其中一個還是懷孕婦女，肚皮都已經凸現出來了。這也是後來逮捕方文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反到底派沒有花多大力氣，便順利進入楊家坪，佔領了空壓廠。于是，以建設廠為中心，北面到大坪，南面到九龍坡，東面到長江，西面到石坪橋，包括石油路、袁家崗、楊家坪、黃桷坪的反到底派“解放區”就連成了一片。停火後，人們來到楊家坪，只見那昔日繁華的街道到處斷壁殘牆，電線杆東倒西歪，馬路上到處是坦克履帶的印痕和各種彈殼，叫人慘不忍睹，真是一場浩劫！

此前，8月15日，江北區的反到底派向嘉陵江大橋發動了進攻。

江北區也有兩家大型兵工廠，一家是長安廠，一家是江陵廠，都是反到底派占優勢，於是便左右了江北的戰爭態勢，八一五派在江北基本不敢有大的動作，因而江北也就沒有發生過重大戰鬥。江陵廠生產三七高炮炮彈，他們將那炮彈彈頭改裝成彈頭手榴彈，

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全市反到底派。該廠又有檢驗炮彈用的三七高炮，有事無事就往嘉陵江對岸的重大轟擊，長安廠是生產小口徑火炮和高射機槍的，一到晚上，便向市中區的八一五派武鬥據點開槍開炮。臨江門的外貿大樓、枇杷山下的兒科醫院門診大樓、嘉陵江橋頭的二輕大樓都挨過炮，那大樓上的炮眼密密麻麻的，像蜂窩。

進攻嘉陵江大橋的頭幾天，江陵廠的反到底派首先攻打十八中。十八中是江北八一五派唯一的武鬥據點，據說主要是三鋼廠的人。反到底派人多槍好，又有火炮支援，八一五派自知難以抵抗，只好主動撤退。這樣，除了江北城，反到底派就完全控制了江北區。為了使江北與體育館的反到底派“解放區”連成一片，于是便決定攻下嘉陵江大橋。

嘉陵江大橋是一座鉚合鋼桁架雙懸臂橋，位於上清寺和華新街之間，是重慶第一座橫跨嘉陵江的城市大橋，由蘇聯設計援建，1958年12月開工。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後停工，直至1966年1月才竣工通車。大橋南橋頭山坡上的二輕大樓本來是反到底派占據的，我曾經去過多次。1967年7月7日，二輕大樓遭到六中八一五派三二一一的進攻，形勢危急時，反到底派就拖出小口徑步槍來，打死八一五派兩人。由於這是重慶武鬥中第一次開槍打死人的事件，“省革籌”聞訊後當即指示，要求交出凶手和槍支彈藥。駐軍派人前往二輕大樓交涉，八一五派也組織武鬥人員將二輕大樓包圍，但反到底派拒絕交出“開槍凶手”。當晚，駐軍又派出宣傳車，在武裝巡邏隊保護下，前往宣傳“省革籌”指示。反到底派則出動人員，將宣傳車包圍。對峙至次日下午，二輕大樓內的反到底派武鬥人員才主動撤離，於是六中三二一一就占領了二輕大樓。

二輕大樓緊緊扼守著嘉陵江橋頭的咽喉要道，像一把刀子插在反到底派的交通線上。長安廠反到底派雖然經常向該大樓打炮，却未能趕走該處的八一五派。1967年8月15日晚，反到底派把炮拉到北橋頭附近，讓炮口正面對著二輕大樓。一串串燃燒彈飛過大橋，打燃了那大樓。然後反到底派又用汽車、吊車改裝的土

裝甲車掩護人員衝上大橋，在炮火支援下，向二輕大樓進攻。駐在體育館的反到底派也積極配合，提前進入橋頭附近潛伏。江北的炮擊一停止下來，他們就從二輕大樓後面開始進攻。八一五派腹背受敵，終於堅持不住，只好往曾家岩方向撤退。二輕大樓被燒成一個光架架，大橋上到處是槍眼炮眼，好幾根電杆也被打斷。據說，守橋的一方還曾有人提出要炸垮嘉陵江大橋，終因當頭頭的還有些理智。才未實施，否則又將給重慶帶來更大的慘重損失。

我有一家遠房親戚是長安廠的車間主任，他兒子輩分比我小一輩，年齡比我大一歲，在長安子弟校也是讀初三年級。8月15日那天，他們學校的人也參加了攻打嘉陵江大橋的行動，不過他只是呆在後面，并沒有衝上大橋。長安廠反到底軍工井岡山的武鬥隊叫“六月天兵”，與望江“金猴”、建設“紅大刀”相比，經歷的戰鬥少得多，名聲也不那麼“響亮”。

在南岸，“八二五”戰役後，鄧長春決定擴編黃山的武鬥隊，要組建至少十個連隊。他把黃山紅一連、紅二連都分成兩個連，從望江廠派來一批中學生，分到各個連隊。我所在的黃山紅二連也來了十來個女生，編成衛生班。鄧長春還派人到長生橋、姜家、接龍、南川一帶去查看地形，聯絡當地的反到底派，以便萬一駐軍介入後打不贏了，好向南面撤退，拉上山去打游擊。另一方面，鄧長春又積極籌備，準備攻打海棠溪、南坪和銅元局，占領整個南岸區。在四女中操場上，在來自軍校的教官的指導下，我們頂著烈日，練刺殺，練射擊，練匍匐前進。那操場跑道是用煤炭渣鋪的，在上面爬，好多人的手倒拐都擦破了血，却沒有人叫苦。可惜，鄧長春的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中央就下達了“九五命令”，兩派只好執行已經簽署過多次的停戰協議，然後把槍交給駐軍。

但是，經過1967年8月底那幾天的進攻，反到底派的“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武鬥隊伍更加擴大，從當司令的到當兵的，全都開始提勁，要打出一個新天下來。1967年9月3日一大早，雖然那時就要簽訂停火協議了，以長安廠“六月天兵”為主力，反到底派還是組織人員武裝攻打江北縣（當時還屬於江津專區管轄）兩路鎮，把戰火燒到了專縣。

25. 對家人深深愧疚

在武鬥中，最對不起的是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母親。

我父母是 1947 年從合川農村來重慶的破產農民，和現在的“棒棒”一樣，只是那農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房子，身上也沒有了錢。開始他們住在千廝門洪崖洞旁一親戚家裏，那親戚一家以洗衣為業。天還沒亮，就一字擺開幾個大腳盆，肥皂水熱氣騰騰，碱味彌漫在那陰暗潮濕的小巷中，那揉搓聲與鷄鳴聲應和在一起。母親那時才十幾歲，也加入到其中。一雙手終日泡在肥皂水中，十個指頭磨得尖尖的，露出嫩肉來，碰一下便鑽心的痛，但還得不停地搓呀揉呀，那滋味可想而知。如今母親已經八十多歲了，說起來都還唏噓。

父親找親戚借了點錢，挑著擔子在街頭巷尾賣菜。他人老實，不會要秤之類，沒幾天就虧了。沒有辦法，只好向水桶棧房老闆交了一筆保證金，租來一桃水桶，加入了挑水夫的行列。重慶是山城，城內幾乎沒有水井，雖然早在 1930 年代就有了自來水，但不够用，依然要靠人力從長江嘉陵江挑水來用。抗戰時期，著名畫家徐悲鴻住在重慶，耳聞目睹挑水夫的辛勞，作國畫“挑水圖”，并在畫上題寫：“忍看巴人慣挑擔，涉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將血汗熬。”短短四句，形象地反映了當年重慶人吃水的困難和挑水夫的辛苦。從臨江門河邊到城裏，梯坎都有上千步，一挑水至少也有兩百來斤，一步一步爬，那水不得有一點外溢。水桶不裝滿，或者倒灑了一些，別人就不要。這樣挑一挑水到新生市場（現解放碑附近），得的錢僅可買三個燒餅。就這點力錢，棧房老闆還要抽頭。從天不亮到天黑，一天不跑十來趟，就不够一家人的開支。不是年輕力壯者，是難以吃下這碗飯的。

後來，父親好不容易擠進了搬運夫行列，從挑水改為挑磚瓦石灰之類，才算把職業安定下來。雖然封建把頭抽頭更厲害，但力錢相對要高一些，於是父母就租了房子，在臨江門石灰碼頭住了下來。

第二年夏天，父親“打擺子”（瘧疾），不能出工。那時，搬運夫下力要“挨輪子”（排隊）。如果輪子到了，你沒去，便失去一次找錢的機會；若有三次不去，便要被開除出行幫，打破飯碗，而且入行幫時交的押金也要被沒收。於是，只得讓母親去頂替。那時，母親在大川銀行一職員家裏“幫人”（當保姆），晚上基本上睡不到覺（要照看別人的孩子），白天又要匆匆忙忙趕回來下力，還要給父親看病熬藥。有一次挑著一挑石灰，竟從梯坎上摔下去，跌得頭破血流，至今她額頭上都還有明顯的疤痕。

這樣的貧困，這樣的經歷，一旦解放，可以想像，他們對共產黨會是怎樣一種感激心情！

我1950年6月8日出生在臨江門石灰碼頭。我應當算是老二，老大是解放前出生的，出生後才幾天就害病死了。我出生後不久，我家就搬到了臨江門九道拐1號。那是一幢“洋房子”，磚牆磚柱，原來是封建把頭的。封建把頭被“鎮壓”（槍斃）後，收歸國有，就分給搬運工住。雖然只有十來個平方米的小小一間，當時卻被當作了宮殿。父親因為讀過一年半的書，因為不斷跳級，好歹算個初小畢業，可以打算盤（只會加減乘法），於是就讓他專門開票，成了幹部。母親沒有正式工作，長期做臨時工，不是在搬運站的“家屬隊”，就是在街道搬運隊，或者就是“下野力”（指那個年代沒有單位的人從事非正式的搬運工作），反正都是找點下力錢。她力氣好，吃得苦，可以挑兩三百斤，又喜歡幫別人，在哪兒都受歡迎，都能當先進。1958年修大坪到石橋鋪的公路，她還是那工地上有名的“鐵姑娘隊”隊長呢。

在這樣的家庭，我很早就學會了下力，也就是幫母親“打薄”。第一次“打薄”我可能才五六歲吧，一個人呆在家裏，母親不放心，就讓我跟著她。她扛米袋，就把那米放了一些在一條小口袋裏，讓我扛著跟著她。後來，我就開始用背兜背磚，從背兩匹開始，跟著母親爬臨江門城門洞坡坡。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就

開始挑了，那時可以挑十多匹，六年級時就可以挑 16 匹了。到小學畢業時，我可以挑二十來匹。按規定換算，16 匹磚就是 100 斤。後來，左鄰右舍的大人都說，我沒有我父親高，就是這樣被壓矮了的。

那幾年正是“困難時期”，肚皮餓得厲害。每天晚上，母親用剩飯煮一鍋燙飯，看到的幾乎全是菜葉子。煮好了，先把大中小三個碗裝滿，我端大的，兄弟端中間的，妹妹端小的，剩在鍋裏的只是些湯湯了，才是母親的。趁母親不注意，我們都把自己碗裏的往鍋裏“趕”一些，好讓母親也多少吃點乾的。母親發現了，就大聲呵斥我們，然後再把那鍋裏的給我們加到碗裏。那時，父親在朝天門上班，天天很晚才回來，肚皮餓，有時還要給父親留一小碗。至今想來，那日子雖然苦到極點，却充滿溫馨。

父親雖然有點文化，但人極老實，被稱為“乾人”，只曉得老老實實做事，單位領導都欺負他，兩個人做的事讓他一個人做。在我記憶中，他幾乎從來沒有休息過星期天和假節日，晚上經常加班，有時還把我叫去，幫他開票據，一本 50 份，一天晚上要開好幾本，把握筆的三根手指都握得青痛。母親是文盲，掃盲時多少認得了幾個字，但不管在哪兒做臨時工，都是“積極分子”，都要當個班組長什麼的，性格又特別要強。我讀初二的時候，同班同學徐平原到我家來，看到我家窮，就去向老師反映，學校就讓我申請助學金。我把申請表拿回家，要父母簽字，哪知却挨了一頓罵。母親說：“國家的錢那麼好拿嗎？要靠自己的勞動！”結果，我只好把申請表退給老師。

文革開始的時候，父母都在上班，我在外面跑，他們以為我在學校住，一般都不管我，也管不了我。和在單位上班一樣，父親在家裏也沒有多少話說，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保”是“砸”，他可能被單位上的人“弄”進了八一五派，也可能沒有“弄”進去，反正他從來沒有去參加過諸如游行之類的活動，也沒有戴過任何一派的袖章之類。運動初期，他連“工糾”（工人糾察隊）也沒參加，他只知道上班做事。不管武鬥多麼激烈，他都在辦公室裏堅持著。雖然武鬥升級為戰爭後，朝天門碼頭上的運輸業務基本停止了，

但依然還有一些日用品，包括糧食之類還要保證，還要從朝天門的庫房運到市內的各個糧店、各個商店，因此也還需要他去安排搬運工人，需要他開出票據。母親是文盲，肯定弄不清楚什麼“砸”和“保”的。家裏窮，她只知道怎樣多找點錢。武鬥再厲害，她也要去上班。武鬥升級為戰爭後，母親正在江北茅溪的紅機廠做臨時工，依然天天坐船過河到江北嘴，然後走十來里路到茅溪上班。“八八”海戰後，長江嘉陵江都封航了，過江輪渡也不開了，她才只好在家裏呆起。

在柴油機廠我經歷了第一次危險，手指被電燒傷，腫得像幾根甘蔗。回到家裏，我謊稱是不小心碰到電線遭了的，父母也信了，沒有追問我。後來，我上了南山，好幾天沒有回家，到處都在打槍打炮，父母才著了慌。我去接劉新庭時，順便回了一趟家，父母都不在，只給兄弟妹妹交待了幾句又跑了，這就讓父母更著急了。後來，戰爭打得厲害了，我却了無音信。想想我都十多二十天沒個消息，在家呆著的母親就到南岸來找我。

母親到儲奇門江邊去了三次，都沒有船過江。第四天，可能是八一五派的人員和物資要往來，儲奇門車渡開了一趟，她和其他要過江的人好不容易才擠上那車駁。由於人太多太擠，控制車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還用皮帶槍托來維持秩序，母親差點兒就挨了一皮帶。那時，武鬥人員紮的都是軍人用的那種武裝帶，有一個很大的金屬扣，打在腦殼上，一打一個眼，立即鮮血直冒。好在那時母親才三十多歲，在外面做臨時工見多識廣，有力氣，也靈活，總算躲過了那槍托皮帶，擠上了車駁，過江到了南岸海棠溪。

母親到南山中學來找我。學校裏靜悄悄的，鄭望生也不知躲到哪兒去了，只有幾個家住學校的老師還在。在南山中學，我因為成績好，也算是“知名人士”吧，東問西問，有老師告訴母親，說我是砸派，可能在南山上。於是，母親又到南山來找我。母親只能說出學校和我的名字，南山公園那裏的人怎麼知道我是誰，怎麼知道我在哪兒？沒有找到，時間又晚了，母親只好下山。

盛夏時節，烈日如火，在那熱氣騰騰的路上奔波了一整天，

我不知道母親是否已經中暑。她又捨不得花錢，中午可能連飯都沒有吃，肯定又累又餓又渴。偏偏又來了一場暴風雨，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那時，她正從清水溪那山溝裏走出來，走在蓮花山的山路上，前不巴村後不靠店的，沒有個躲雨的地方，只有靠在那崖壁下，任暴雨澆淋，立即就渾身濕透。電閃雷鳴，山脚下不時滾過那雷電的火球，只聽得樹木被雷擊打“啪啪啪”的聲響，然後就是一股難聞的焦臭隨著狂風吹來。在那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一個樣子，心中是否害怕，身上是否發抖。但一想起那情景，我眼前就模糊起來，就會感到一陣陣揪心地痛，幾十年都是這樣。

母親好不容易才趕到海棠溪江邊，天都快黑了，哪還有船過江！想來想去沒辦法，她只好到羅家壩去找原來在臨江門住的一個鄰居。幾經周折，總算找到了。

頂著烈日跑了一整天，又淋了一身雨，母親感冒了，發著高燒，躺在陌生的床上，做著熱昏的夢。

那好像是8月中旬的一天，九一縱隊紅二連從建設廠轉移到南岸才兩三天。九一縱隊紅二連的連長、指導員都是十七中的高中生，主要成員也是十七中的，還有就是我們南山中學的。而十七中和南山中學都離羅家壩不遠，都屬於羅家壩“社區”。羅家壩有一個帆布廠，帆布廠的一個八一五派頭頭是個二不挂五的傢伙，經常在羅家壩街上佔吃霸賒、欺小騙老，用重慶話來說就是“操民憤”，讓群衆氣憤和仇恨。前兩天，這傢伙還把十七中一個反到底派頭頭的父親打傷。據說是爲了報復，也可能是想亮一下相，那天晚上，九一縱隊紅二連派了一個排的人，從文峰塔旁邊那條山路摸下山去，對羅家壩的八一五派廣播站進行了攻擊。那廣播站在一個山坡上，又是一幢高樓，難以攻下來。打了一夜槍，廣播吼了一夜“抗議”，到天快亮時進攻一方才撤走。

羅家壩是一個山間小平壩，沿著海棠溪兩岸分布著好幾家工廠企業，散布著成片的低矮住房。川黔公路從街中穿過，街上只有稀稀拉拉幾家小商店。半夜時分，密集的槍聲突然像炒乾胡豆一樣，“劈劈啪啪”的，把人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男女老少紛

紛爬起來，往樓下跑，往洞子裏鑽。那鄰居一家沒有地方跑，全都趴在地上，趴在床腳，駭得打抖抖。他們叫母親也趴到地上來，母親有氣無力，喃喃地說：“算了，打死了算了……”她就一直躺在床上。幸好那天九一縱隊紅二連只是想嚇唬一下八一五派，打了一陣槍後就撤退了，羅家壩的人，包括我母親，總算逃過一劫。

第二天，母親的燒奇迹般地退了，她不願麻煩鄰居，不聽勸告，獨自一人趕到海棠溪，又等了大半天，還是搭乘過江車渡進城，回到朝天門家中。

又過了十來天，母親還是放心不下，又從城裏過江來找我。這一次，她從海棠溪爬上黃桷壠，就聽說搞武鬥的人住在四女中，于是就匆匆趕來。那天，正好是黃山紅二連的人在四女中大門站崗，她找到那站崗的人打聽，終於把我找到了。聽說母親來了，我從操場上飛也似地跑到大門處，只見母親疲憊地坐在地上，頭髮亂蓬蓬的。她給我送來一套衣服，還給了我幾元錢和幾斤糧票，然後便默默地走了。我望著她的身影消失在龍黃公路那壠口後，又跑到操場，繼續喊著“殺——”“殺——”“殺——”，操練武鬥技術去了。

在那年代裏，我竟然沒有認真去體會母親的心，更沒有去珍惜這比天還要寬廣、比海還要深厚的母愛，現在想來，真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啊！！

這愧疚之情我只有帶到高烟囱（火葬場）去了。

26. 槍不是好玩的

重慶武鬥升級為戰爭，引起中央極大關注。在周恩來的干預下，中央派出了一個姓陳的（據說曾是少將軍銜）為首的調查組來到重慶。調查組經過艱苦工作，將兩派頭頭弄到“警司”（駐軍軍部）進行談判。1967年9月1日，兩派終於達到停火協議，規定從9月2日18時起，無條件地全面停火。接著，9月5日，中央又下達了“九五命令”（即《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賦予軍隊強行收繳造反派武器的權力，措詞相當嚴厲。這對正在策劃大幹一場的鄧長春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

按照停火協議的規定，9月5日，雙方代表將在“警司”協商交槍的具體辦法。為此，還出現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差點導致停火協議失敗。

9月5日那天，號稱反到底派武鬥總司令的鄧長春，帶領南岸的一幫子談判代表，分乘兩輛汽車，從黃山上下來，前往“警司”。在海棠溪河邊過車渡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與控制車渡的紅岩三中（凱旋路中學）和水泥廠的八一五派發生了糾紛。八一五派動用匕首之類，將鄧長春等人殺傷，其中一人後經搶救無效身亡。隨後，八一五派又仗著人多勢衆，將車渡強行開到水泥廠碼頭，把鄧長春及其手下人員連人帶車俘虜到水泥廠關押。九一縱隊紅二連的一個排長，我們南山中學那個叫楊永福的高三同學，也是跟著鄧長春去參加談判的代表。據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在江邊洗手洗腳要水去了，躲過了八一五派第一輪毆打和刺殺，但因穿著一身勞保服，依然被八一五派認出，也一同被押到了水泥廠，也挨了一頓飽打。中央調查組得知消息後，與駐軍代表一起趕到

水泥廠，強制八一五派放人，才算未釀成更大的後果。鄧長春事後解嘲地說：“那一頓打得好，把我腦殼打清醒了，所以我才在交槍的協議上簽了字。”

海棠溪是長江上重要的渡口，20世紀30年代修通的川黔、川湘公路，其起點都在海棠溪。文革戰爭沒有打起來的時候，那碼頭上待渡的汽車總是排起長龍，趕船的行人更是摩肩接踵。抗戰時，蔣介石經常從黃山下來，經過海棠溪進城去。有一次，他正在碼頭上等待車駁過渡，忽然，江邊的小木船上“轟隆”一聲，一團黑煙直衝藍天，把蔣介石的心臟病都駭出來了。幾個侍衛連抱帶推，把他弄上汽車，飛也似地開走。一群警衛衝到那小木船上，要抓“刺客”。那“刺客”却已被炸翻在船上，渾身烏黑，血流滿面。原來，那是個船老二，將打濕了的火藥擺在艙面上曬，不知誰朝艙面上丟了個烟屁股，火藥便炸了。鄧長春等人被打被殺，又給海棠溪增添了一段新的傳說。

鄧長春被抓的消息傳到黃山，形勢陡然緊張。我們全都極其氣憤，紛紛要求下山攻打水泥廠。于是頭頭們又將攻打水泥廠的計劃拿出來，作了布置。如果不是當天晚上鄧長春就被中央調查組和駐軍解救出來，并且立即從“警司”的醫院裏給黃山打來電話，要大家不要亂動，肯定又將爆發一場惡仗，不僅水泥廠可能被夷為平地，而且還要讓已經達成的停火協議泡湯，重慶的這場文革戰爭也就可能繼續升級。

從1967年7月25日到9月5日，整整40天。對重慶人來說，那是黑色的40天！戰爭中，交通斷絕，城市居民面臨著斷糧的危險，停水、停電更是經常的事。沒有菜吃，沒有煤燒，不少家庭將鹹菜都吃得個精光，甚至將桌子椅子都砍來當柴燒了。後來我聽父親說，朝天門糧食倉庫的大米糧食幾乎都拉空了，如果再打上幾天，市中區的人就可能要餓飯了。因此一停火，駐軍便組織好幾個車隊，向城裏送糧食、煤炭、蔬菜，以保證供應。老百姓說：“還是解放軍好！”

聽說要交槍，可以說沒有哪個參加武鬥的人捨得。比如我，天天都把那支半自動步槍擦得亮銳銳的，吃飯、睡覺都不離身，

時不時還把那槍刺弄出來，左右比劃一下刺殺動作，或者就練瞄準。有槍在手，似乎身板也要硬許多。江青說過“小青年愛玩槍”，我那時 17 歲，當然也算“小青年”了，但我覺得我不是因為愛玩才玩槍。我讀過《毛澤東選集》，我知道“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我嚮往那“烽火連天”的歲月，我嚮往那“火紅的戰鬥”，我嚮往做那建功立業的英雄。看到有了這樣的機會，却要交槍，真是想不通。

如今回憶起來，才知道那槍真不是好玩藝。玩槍走火之類且不再說了，只說這槍讓人感到身板也硬了起來，就相當危險。有一次，我和同班同學羅朝忠去汪山看望班主任陳老師。陳老師家住汪山白蘭園，她老公在南山公社供銷社工作，他們都是八一五派觀點。我們背著槍走進陳老師家，把她駭慘了，以為我是來找她算賬的。畢竟她在擔任班主任期間，對我那樣“卡拿”，撤了我的班主席不說，還明裏暗裏打擊我，給我小鞋穿，讓我在那兩年裏痛苦不堪，按一般人的想法和做法，我至少也可以威脅她幾句。羅朝忠也不是她喜歡的學生，被她劃進了第三類。但是，我和羅朝忠走進她家後，却彬彬有禮，擺了一會兒龍門陣，安慰她幾句，就走了出來。然後，我們就跑到南山公社反到底派的團部，告訴他們，她是我們老師，不許他們傷害。說著，就把那半自動步槍往地上一“篤”：“如果她有個三長兩短，不要怪我們不客氣啊！”幸好我們的威脅不但沒有引起他們的反感，反而讓他們感動。後來，他們把我們的話轉告給陳老師，讓陳老師也感動。

參加武鬥的人，大多是年輕人，半數以上都沒有超過 20 歲，一旦槍在手，往往就會擺出一副吃不完要不完的樣子來。有了槍，說話就嘴硬，動不動就把槍亮出來，把槍口對準別人，逼迫別人服從。我當副連長後，連裏有兩個三十八中的同學不知吃了什麼東西，肚皮痛，到醫務室去拿藥。那發藥的人雖然穿個白大褂，却是歪的（外行或不正宗），他給兩個肚皮痛的人各倒了一小杯顛茄合劑。那是顛茄合劑的原漿，應當稀釋 100 倍後才能服用，他又按服用量增加了一倍，結果兩個肚皮痛的人就服用了 200 倍的用量。顛茄合劑含有羥苯乙酯，一會兒，兩個肚皮痛的

人就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渾身發燙，皮膚潮紅，口乾舌燥，瞳孔放大，心跳加速。有人向我報告，我立即帶上兩個人，提著槍去找那穿白大褂的。沒等他解釋清楚，我就把槍一“篤”，另外兩人就把槍口對準他，把他駭得直打抖。然後，我們找了一輛卡車，把兩個肚皮痛的人送到黃山。我們把他也押上車，一路上威脅他：“如果這兩個戰友死了，堅決槍斃你！”他臉色恰白，渾身囉嗦，連求情的話也說不出來。到了黃山，把已經半昏迷的兩個倒霉蛋抬進醫務室，我們又是一窩蜂，又吼又叫的，就像電視劇《亮劍》中的鏡頭。不過，黃山畢竟是療養院，有醫生，看了那穿白大褂帶去的藥，對我們說：“小事情，這藥又沒毒，就像酒喝多了，沒危險的，洗個胃就好了。”經過醫生處理，過了一晚上，那兩人就回到了連隊。

因為槍的事，我們還差點鬧出大事來。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按規定，吃飯時不能帶槍到食堂，黃山獨立排一個崽兒偏偏背著一支半自動步槍來吃飯。在打飯的時候，他的槍把我的頭撞了一下，撞得有點痛，我就埋怨了他幾句。哪知有槍在手，說話就硬氣，他不僅不道歉，反而傲起，和我爭吵起來。本來是一件小事，最多吵幾句就算了，我根本就沒想到他會出手打人。可能是那槍壯了他的膽，他趁我不注意，一拳頭打來，一下打在我下巴，我立即被打倒在地。後來在訓練中，一個軍事院校的教官告訴我們，要想把對方一拳擊倒，一是打下巴，一是打耳門子，如果對方是女的，還可以打乳房。那崽兒可能是比我們先聽過這樣的課，可能是想在我身上試一試，結果真的如此。我作爲副連長，被這樣打倒在地，連隊的人當然不依教（四川話，不同意或不答應的意思），不知是誰喊了一聲，一群人立即把槍拖了出來。對方一群人也把槍拖出來，雙方就在食堂槍口對槍口對峙起來。我雖然被打倒，却並沒受傷，立即站起來，把自己的人按住，要大家不要亂動。事情鬧到這個份上，鄧長春也跑來了，把雙方臭罵一頓，局面才緩和下來。

有了槍，自己感覺身板硬了，動不動就會威脅他人。所謂威脅，就是用武力來脅迫、逼迫或強迫別人服從自己。如果威脅沒有起

到作用，別人不服從，威脅就變成直接使用武力了。如果別人也有相應的武力，威脅就可能更起不到作用，雙方也就可能打起來。所謂武鬥，所謂戰爭，其實都是因威脅沒有達到目的而發生的。因此，即使是在本派內部，即使是同一陣營，即使是要得很好的朋友之間，這樣的威脅，有時候就難免不惹出事端來。1967年8月25日那天，我帶著我那個班的人衝進四公里二師校園後，我安排同班同學羅朝忠在那圍牆後面的山坡上監視公路上的動靜。不知是為什麼，他不服從命令，和我對抗起來。沒說上幾句，就把半自動步槍一橫，把槍口對準了我。其他人急忙來勸，才把我們勸開。這樣的事後來我還遇到過一次。那是一年後，另外一個叫譚元生的同年級同學，也是要得極好的，也是因為一言不和，也是這樣把槍口對準我。不過，那時我不是班長，也不是副連長，什麼都不是，雖然手上沒有槍，却不怕惹事了，把他的槍往旁邊一撥，把臉杵到他臉前，瞪大眼睛盯著他：“你才摸幾天槍，還敢和老子兩個抗？”

如今看新聞，看到美國發生校園槍案，我就在想，如果中國人也像美國人那樣，可以隨便擁有槍支彈藥，不知要鬧出多少人間悲劇啊！

“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理論，讓當年的年輕人對槍迷戀到崇拜的地步。武鬥了，手上有了槍了，吃飯解手不離身，擦得鋥亮鋥亮的，把那拆槍裝槍動作記得爛熟，晚上還要抱著槍睡，槍成了自己的“第二生命”，拿過槍的人幾乎都和槍結下了難捨難分的感情，都捨不得把手中的槍交出去。交槍前，不少人偷偷帶著槍去照相館照相留念。我覺得槍在我手上只有二十來天，還沒有正南齊北打過仗，不想去照。一次路過黃桷壩街上，我那連隊裏的一個上浩中學的同學帶著槍到街上来，見了我，不知是怕我說他還是要討好我，硬把我拉到照相館，和他一起照了一張相。可是，後來我却沒有得到那相片，我也懶得問他了。

南岸反到底派的交槍地點設在郵電學院。交槍那天，我們黃山紅一連、紅二連、紅三連和獨立排的隊伍，打著紅旗，列著隊，一路喊著口號，從四女中出發，經過黃桷壩街上，武裝游行到郵

電學院。黃桷壩原名崇文鄉，是舊時從重慶去貴州的必經之路，很早就形成了場鎮。因那上黃桷壩的山路上有很多黃桷樹，特別是那壩口處的幾株黃桷樹高大古老，樹蔭遮天蔽日，人們就稱其為黃桷壩。抗戰時期，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不少人，特別是一些達官貴人搬到黃桷壩來住，使黃桷壩繁榮起來。解放後，在黃桷壩建立起郵電學院、中藥研究所、四女中，加上原有的五中（廣益中學），黃桷壩就相當熱鬧了。除老街外，沿著廣黔公路兩側修建了一公里長的街市，即使是武鬥期間也是人流如織，熙熙攘攘。我們近千人的隊伍，全副武裝，逶迤一兩公里，那陣仗也的確威風。公路兩側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有人鼓掌，有人呼喊，但大多數人都驚异地望著我們，讓我心裏不是個滋味。

在郵電學院，我們把槍交到駐軍派來接收的軍人手上。我記得那些軍人就是駐在黃桷壩附近山頭上的空軍高炮部隊的，穿的綠軍裝、藍軍褲。當我把槍遞給那軍人時，又搶了回來，拉開槍栓，再看上幾眼，把那軍人逗笑了。我憤憤地說：“笑個屁？我在檢查槍膛裏有沒有子彈，怕你拿去走火打死人！”

交槍後，很多人都悄悄離開了。那天中午吃飯時，食堂裏少了好多人，感覺好沉悶。

27. 停火之後

“九五命令”措詞嚴厲，對兩派都還有一定威懾力。應當說，1967年9月初那一次交槍還是比較自覺，比較徹底的。不過，經過四十來天的你死我活的拼殺，誰也不會傻到相信這樣就會結束兩派的爭端。只要有可能，都會留下若干武器。短槍好隱藏，大多數留了下來；長槍基本上都交了，重武器更不可能留下。至于留幾個手榴彈下來的人，也在所難免。一般的武鬥人員則都留有幾顆子彈作為紀念。

交了槍不等於說戰爭就停止了，只是說重慶這場文革戰爭的高潮暫時結束。其實，從1967年9月到1968年10月，大大小小的武鬥從來沒有停止過。為了爭奪地盤，動不動就打起來。拳頭、棍棒、鋼鉗作武器的武鬥且不說，動槍的也不少，只是不能與1967年8月戰爭激烈期間那樣動用槍炮、坦克、軍艦的大廝殺相比了。

本來，重慶兩派中八一五派實力要強一些，人數也占優勢，地盤更是占絕對優勢，又有駐軍支持，本以為靠武力就可以把反到底派打下去。哪曉得經過四十來天的戰爭，反而失去了不少地盤，到後來就只能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反到底派之所以能在這場戰爭中占優勢，主要是因為佔據了建設、望江、長安、江陵等幾大兵工廠，既有槍又有炮，而且都是當時最先進的武器。一旦停火，武器上交，廠裏進駐了軍隊，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可以隨便把廠裏的槍炮“提”出來了，反到底派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八一五派看到這種形勢，便依仗自己的優勢，在駐軍的扶持下，採取擠、趕、打的策略，將反到底派從本單位本地區往外趕。從1967年年底到1968年年初，八一五派採用這種手段取得很大的

成功，一個接著一個學校，一個接著一個單位的反到底派被趕出來，不少地區便成了八一五派的絕對天下。

在擠、趕、打的過程中，如果某一個單位某一個學校八一五派的力量不够，占不了絕對優勢，八一五派便到本地區八一五派力量強的單位去約人來；如果拳頭解決不了問題，便用棍棒鋼釘；如果棍棒鋼釘也解決不了，便拖出槍來打幾槍，嚇唬一下；如果嚇唬不了，就乾脆打一仗，打死打傷他幾個。反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八一五派把槍拖出來，駐軍往往當瞎子，當聾子。如果反到底派把槍亮出來，那就對不起，駐軍就會立即來收繳。1967年年底，就是藉口“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裏藏有武器，駐軍就派部隊包圍了地處解放碑的友誼商店，一圍就是一兩個月。

戰爭期間，南山中學只剩下家住學校的老師和鄭望生等幾個騎牆的人。1967年8月中旬的一個晚上，九一縱隊紅二連下山夜襲羅家壩，從南山中學經過，把鄭望生幾個人也駭到了，怕學校成為戰區，也離開學校，學校就空蕩蕩了。交槍後，我們便先回到學校。在進入學校圖書室時，有人發現那門背後竟然挂著手榴彈。那可能是鄭望生挂的，怕有人趁機到學校來偷盜圖書。幸好我們是經過戰爭的人，警惕性高，沒有貿然撞門，否則那手榴彈一炸響，不說死人，至少也要傷人。那時候，已經有一些學生“醒了”，也就是說，已經懂得社會上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了，已經學壞了，于是就偷偷到學校偷盜東西，圖書室就是主要目標。有鄭望生在學校，那些人就不好下手了。騎牆的鄭望生下鄉後病死，雖然學校兩派的人對他都“不感冒”，但大家私下裏還是說他為學校做了一件好事。

我們回學校早，就占據了辦公大樓。開始，我們還想好好“文鬥”一下，辦了批判專欄，拿到海棠溪去張貼。我記得那專欄的開篇詞還是我寫的，有什麼“我們放下鋼槍，又拿起筆來；打仗我們是好手，搞大批判我們更是好手”之類的話。沒過幾天，八一五派也組織人馬回來了，占據了教學大樓。本來，我們學校的兩派從來沒有發生過正面的糾紛和爭執，甚至連激烈的辯論也沒有過，戰爭中也沒有過直接交鋒。但是，戰爭的血腥已經敗壞

了同學之間那一點點情感，立即就感覺到雙方對立的情緒，辯論、爭吵、相互威脅、推推搡搡、打冷錘、踢腳尖之類幾乎天天都要發生。後來我們也知道了，八一五派是下了決心，要把我們擠出學校。于是，也就不可能繼續“文鬥”下去了。

1967年國慶節期間，我們家住城裏的人都回家了，學校只剩下幾個同學。八一五派看到反到底派沒有幾個人了，就開始下手，趁反到底派不注意，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一下打傷殺傷七個反到底派的同學。受傷的人中，最想不通的是一個叫楊濟濟的高三同學，他是回族人，打傷他的是一個初二年級的姓李的崽兒。他們本來很要好。1966年9月初，重慶學生北上告狀，從重慶走到永川，他們兩個都參加了。那姓李的崽兒走不動的時候，楊濟濟還背過他。後來只因對“革聯會”有不同認識，一個要“砸”，一個要“保”，分成了兩派。雖然他們都參加了武鬥，都打過仗，但並沒有直接交過手。回到學校後，楊濟濟住一個獨立的平房裏。那天，那姓李的崽兒來找他。楊濟濟請他坐，還拿出煙來請他吃。楊濟濟沒有想到，當他轉身去為他倒開水的時候，那姓李的崽兒竟抄起一根扁擔，給他當頭一扁擔，打得他東倒西歪，一下子躺倒在地上，好半天也沒有醒來。那姓李的崽兒却把扁擔一丟，拍拍手，揚長而去。

受傷的同學後來都被送到重醫，我看他們，雖然都無大礙，但大家都很氣憤。戰鬥團的頭頭却很理智，要把此事向反到底派“工總司”（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報告。那年國慶節，毛澤東發出了“鬥私批修”的指示，駐軍按中央的要求，分別組織兩派的頭頭學習，不過是走走過場。我們去報告的時候，“工總司”正要組織人去駐軍司令部，于是我就成了反到底派的代表，走進了位於佛圖關下的重慶警備區司令部（簡稱“警司”），也就是五十四軍軍部。

五十四軍是第四野戰軍的部隊，由原四野六縱、八縱（後改為四十四軍、四十五軍）改編而來，是林彪麾下最得力的部隊之一，曾創造過數不清的輝煌戰功。據八一五派寫的那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的文章中說，五十四軍有“通天電話”，可以直接

與林彪聯繫。正是因為有五十四軍的支持，八一五派才有恃無恐，才敢在停火後採取進攻態勢，把反到底派擠走打垮。

重慶市區兩江挾持，形似半島。半島平面最窄處僅有幾百米，那最窄處就是高高的鵝嶺。佛圖關地處鵝嶺山嶺的脊梁上，懸崖絕壁，易守難攻，歷來是重慶西邊最重要的屏障。作為軍事要地，“警司”始終給人一種神秘感。1932年，熊克武與劉湘、楊森之間就曾在“警司”這個發生過大戰，雙方反復廝殺，相持月餘，僅熊部第八混成旅就傷亡幾百人。死尸填滿黃沙溪谷，鮮血流成小河，染紅長江半江水！我們走進“警司”大門，忍不住東張西望，但却看不到一點軍事設施，反而像一個幽雅靜謐的公園。不過，我們知道，在那佛圖關上，在那懸崖坎下，在那大樹背後，肯定有很多很多炮口和槍口。已經經歷過戰火的人，我們對此好像也并不存在驚奇和恐懼。

學習會在軍部小禮堂舉行，由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主持。那白斌人不高，却壯實，整個上午一直坐在那兒動也不動，眼睛始終盯著天花板。偶爾也向臺下掃上一眼，你會感到那眼光裏有一股殺氣。不過，在場的都是“久經沙場”的人，也沒有哪個怕他。那時，五十四軍原政委謝家祥已經調任成都軍區副政委兼四川省軍區政委，軍長韋統泰則隱居在幕後，前臺由政委藍亦農、副軍長白斌來跳。後來，八一五派專門製作了一大批紀念章，藍白二色作底，再加一個由“815”三個數字組成的火炬，號稱“藍白紀念章”。藍天白雲，表示重慶是他們的天下。反到底派却說這是“藍天白地”，是把“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變成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

中午，我們在軍部食堂吃飯，每人交三兩糧票，實在沒帶的也可以免交。雖沒有肉食，飯菜却隨便吃。我飯量大，吃得肚皮脹脹的。

下午討論，參加的人就七嘴八舌，搶著發言，紛紛控訴八一五派的罪行。我也搶到發言機會，簡短說清了八一五派怎麼打傷殺傷七人的事，要求“警司”嚴肅處理。白斌始終一言不發，眼睛也不再向下看，任我們這些反到底派的人在那兒義憤填

膺，他自“歸然不動”。“工總司”一個頭頭悄悄對我說：“沒得法，沒得用，回去自己想辦法。”我知道，他是讓我們回去組織力量反擊。

回到學校，我把“工總司”頭頭的話報告給戰鬥團頭頭，於是我們就準備反擊。因為八一五派首先動手，學校兩派之間已經充滿敵意，對立也尖銳起來。八一五派的人拿出一支步槍來顯揚，晚上甚至向我們所在有辦公大樓開槍，對我們進行威脅。我們也不示弱，策劃狠狠地教訓他們一下。記得是1967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頭頭們是怎樣策劃的，準備派高中的同學出去搞一次夜襲。我是初中的，却又自告奮勇，要求一起去。在整個武鬥期間，我這樣“自告奮勇”太多了，現在想來，這可能與我那時好出風頭的性格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所謂的“英雄情結”，讓我不願意失去“戰鬥”的機會。

我也不知道我們戰鬥團是從哪兒搞來的鋼針，一人拿一根，悄悄溜出辦公大樓。哪知那天晚上八一五派也正好準備要來進攻我們，甚至已經從外面請來了幾十個人的支援力量。我們在食堂附近與他們相遇，趁他們不注意，偷襲了他們，可能打傷了他們幾個人。他們早有準備，一招呼，就來了很多人，我們只好退入那尖尖房子。

那尖尖房子一樓一底，磚柱木樓板“篾壁牆”（重慶舊時民居建築往往因陋就簡，牆壁用竹篾編織好或用木片釘好後塗以稀泥、石灰等，稱“篾壁牆”或“夾壁牆”），房子後面又是一個山坡，對方很快就控制了局面。那過道上不知什麼時候準備的一瓶硫酸，被窗外投擲進來的石頭打破，我們戰鬥團的一號頭頭剛好站在那兒，硫酸濺了他一身，把他的腳燒傷了，這就更亂了我們的陣腳。看到抵擋不住了，站在窗邊抵抗對方進攻的另一個叫張正華的頭頭，摸出一個三七高炮彈頭改裝的手榴彈，摔了出去。他只是想嚇唬一下對方，沒有往對方人堆堆裏投，手榴彈在空地上爆炸，“轟——”的一聲，把兩邊的人都駭了一跳。我們都以為是八一五派投的，心中便有點驚慌。而對方看見是樓上窗戶裏丟下來的，于是磚頭石塊使勁往張正華所在的房間猛投。那房間

只有幾個平方米，張正華沒處躲閃，終於支持不住，只好退出來。進攻的人見那房間裏沒人了，就把木板從山坡搭到窗臺上，然後衝進樓來，占據了那個房間。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鋼針刺中了衝到最前面的那個進攻者的頸項。

可能全靠我這一鋼針，進攻者不敢繼續往其他房間衝。我和高一同學周大齊在一個房間裏，與其他人隔開了。幸好那牆很單薄，我們用鋼針幾下就捅開了一個洞。周大齊瘦一些，先爬了過去。我身子爬過去了，屁股却被夾住。那時，進攻的人如果衝進來，我的屁股上肯定是一堆蜂窩眼了。周大齊已經跑到另一個房間，我只好使勁扳動，才穿過那牆壁，與另一個房間的大隊人馬匯合。

我們被逼到一個房間裏，這時才發現，對方人太多，武器太好，我們是“偷鵝不成倒蝕米”。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跳樓突圍。南山中學地處向家坡，當時坡下有一個煤礦，煤礦附近駐有一個軍分區的連隊。為了便于突圍，大家說我嗓門大，要我喊叫。我想也沒想，就拉開喉嚨喊：“解放軍，救命喲！”我的聲音的確大，整個向家坡，甚至山下的羅家壩都能聽見，但解放軍却“聽”不見。他們是支持八一五派的，八一五派可能已經向他們報告過，今晚要好好教訓教訓一下反到底派，因此，他們是不會出面的。我的叫聲讓那些呆在辦公大樓的戰友們好是擔心，但由于不瞭解情況，加上大樓外也有八一五派的人拿著鋼針游來蕩去，他們不敢貿然出來支援我們。我這樣叫喊，真的很丟面子，很髒班子，後來那些女生都來笑我，讓我好尷尬，下不了臺。

喊了一陣沒有動靜，我們只好跳樓。只有一層樓，也不高，別人都跳下去了，然後都跑脫了。我跳在後面，運氣不好，腳後跟偏偏觸到那地基的石頭上，身子便一歪，順著一面坡就滾下去。在我跳下樓的時候，進攻的八一五派已經發現我們在突圍，紛紛圍了過來。只是那窗口下是斜坡，站不住人，但還是有幾個順著牆根趕了過來。我跳下時，一根鋼針從背後猛地向我刺來，只因我的腳被石頭硬痛了，身子一歪，那鋼針才沒有刺中。月光下，

只見那鋼針從我腋下刺過來，那三楞刺刀寒光閃閃。我手一夾，想把那鋼針夾住，却被他收了回去。我滾下斜坡才爬了起來，忍住腳痛跑掉了。如果那三楞刺刀刺中了我的背心，來個對穿對過，我也完了。

這是我在武鬥中經歷的第三次危險。

我下鄉後，有一個同年級的八一五派同學到鄉下來找他熱戀的女生，那女生偏偏是反到底派的，和我在一個公社。我們在鄉場上相遇，說到當年的往事，他告訴我，他就是用鋼針刺我的人。他說，他看到是我，就把鋼針三棱刺刀的那一頭換了過來，而且是故意刺偏的。我知道他想討好我，讓我在那女生面前多說他的好話，也不便戳穿他，只是說：“那我還應該感謝你喲？”

我們十來個人跑到那煤礦附近，但那些軍人却不出面，也不准我們進入他們的駐地。不過，八一五派也沒有追來。于是，我們就回到辦公大樓。一查，還有一個人沒有回來，那是高三的一個同學，跳下樓後沒跑脫，被八一五派的人抓住，挨了一頓飽打，第二天才放了回來。眼看是呆不住了，第二天我們就撤出學校。八一五派看目的達到了，也沒有對我們進行追殺。

28. 體育館的苦難日子

我們被趕出學校後，先是在上新街城建兵團的駐地呆了幾天。那地方地處交通要道，八一五派就挑起事端，組織力量前來攻打。雖然沒有打下來，那房子的瓦片却被城建兵團的人揭來當武器，結果弄得只剩下一半，再也擋不住風雨。于是，我們就轉移到城裏的體育館，在那游泳池邊找到一間房子，作為南山中學井岡山戰鬥團的駐地，一直呆到第二年9月份才回學校“復課鬧革命”。

體育館是解放後第二年開始修建的。當時，賀龍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他是個愛好體育的角色，不顧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財政緊張的困難，強行修建了大田壩體育場和體育館。那體育館和體委辦公樓均采用琉璃瓦，顯得十分堂皇。雖然如今已經過去了六七十年，那體育場、體育館依然還是重慶的標志性建築之一。

停火之後，八一五派采用擠、趕、打等多種手段，把反到底派趕出本單位。而被趕出來的反到底派，大都跑到體育館一帶來呆起。那時，體育館附近的所有機關，例如市計委、教育局、一輕局、機械局、工人醫院住院部等處，都住滿了從本單位逃出來的反到底派人員。一個單位占一間辦公室，幾床草墊往地上一鋪就是床，十幾個人擠在一起，蓋幾床破棉絮，也就不冷了，但那腳的臭味却熏得人要背氣。有時，廁所被堵住，污水橫流，更使那據點的衛生條件惡化到極點。一時增加那麼多人，吃的也就成了問題。兩路口、上清寺一帶的飯館、商店便生意興隆，吃飯的時候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稍微晚半個時辰，就莫想買到吃的。于是，便有人出來賣稀飯涼麵涼粉之類，價錢也陡升。受不了那份罪的人，便回家“逍遙”去，更多的却趁機往成都往專縣跑，名曰“逃難”。能堅守的，大多是頭頭，還有就是所謂的鋼杆。回家“逍遙”的，

隔三差五的也要來體育館走一遭，算是報到。一有事，往往也能召集到很多人。

我們住的游泳池在跳傘塔旁邊，只有作為更衣室的一幢兩層的樓房，却住著好幾個單位的人，包括人交公司的反到底派紅一方面軍團部。我們只占了一間屋作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和幾根凳子，開個會都只能站著開。要睡覺只能在更衣室裏打地鋪，幾床爛草墊，幾床破棉絮，經常冷得人睡不著。有一次，人太多，我們打地鋪後人挨人，前胸貼後背，兩邊的人就貼在牆壁上，不僅連翻身都困難，甚至連呼吸也被阻礙，結果半夜三更就有人爬起來不再睡了。又冷，只好去跑步。由於地方太小，我們這些家住城裏的人大多晚上回家去住，白天再到體育館來。

後來，我填了一首《憶秦娥》的詞：

天欲黑，
絮爛不暖難眠夜。
難眠夜，
迎來紅日，
送歸殘月。

烏龜霸道放人血，
英雄何懼志不滅。
志不滅，
衝鋒陷陣，
斬殺李賊。

詞中的“烏龜”是指八一五派，“李賊”是指李井泉。“革聯會”有個“革”字，八一五因為保“革聯會”又有個“保”字，於是反到底派就稱八一五派為“癩格寶”（癩蛤蟆），後不知為何又將“癩格寶”轉化為“烏龜”了，可能是“烏龜”更帶罵人的意味吧。

體育館及其附近不足一平方公里，一下子住了那麼多人，又來自四面八方，良莠不齊，紀律也就開始渙散，最普遍的是吃飯

吃麵“污”別人的碗。趁人多，邊吃邊走，便將那碗拿回來。積壓多了，又將那碗和那賣稀飯涼麵的小販換東西吃。更有個別惡劣的，晚上出去吃宵夜，吃了不給錢，別人要，便遞上幾顆子彈，甚至還有把手榴彈和槍拿出來駭人的。有一次，我們遇上這樣兩個傢伙，就出面干涉，差點兒還和他們打了起來。

後來，幾家大單位，例如人交公司的反到底派便自己辦了伙食團，總算解決了一些人的吃飯問題。好笑的是，不管那伙食團煮了多少人的飯，沒有那頓是賣不完的。特別是中午，還不到12點鐘，伙食團就早早關了門，你莫想再找到飯吃。人交公司反到底派有一個叫石納威的，藏族人，身高兩米多，是當年重慶有名的籃球運動員，是很多中學生的偶像，也經常和我們一起在那兒吃飯。看他一個人吃那麼多，我們就和他開玩笑，對他說：“你一個人吃了我們好幾個人的飯，害得我們經常餓肚皮。”

那時，我們還經常到三路電車（兩路口到楊家坪）的伙食團去吃飯，那兒的沖辣菜特別沖鼻子。又是吃的罐罐飯，那沖辣菜藉助飯的熱氣，沖得人頭昏腦脹的。我們戰鬥團的一號頭頭就教我們吃沖辣菜的技巧，感覺那沖味要上來時，就趕緊吸氣，把那沖味壓下去。直到如今，味道再沖的沖辣菜對我來說也算不了什麼了。

那麼多人住在那兒，除了寫幾張大字報，便無所事事。我們戰鬥團一號頭頭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沒事的時候就畫些漫畫。有一次，他把我們戰鬥團挨過打的人都畫了，每人畫一張，張張形神皆備。比如畫外號叫“蘇修”的高三同學蘇祖斌，1967年國慶節期間，蘇祖斌被學校的八一五派戳了一刀。本來是戳屁股的，不知是戳的人沒掌握好尺寸，還是被戳的人看到刀戳來了下意識墊起了腳，那一刀戳低了一點，結果戳到大腿上，傷了筋骨，跛了好久。跛起走路難受，他經常說：“給老子戳高一點也好嘛。”一號頭頭就把這句話寫上，讓人忍俊不禁。他也給我畫了一張，畫的是我站在尖尖房子的窗口前大喊“解放軍救命”。他還畫了他自己，畫的是他在尖尖房子被硫酸傷了腳的狼狽相。畫好一張就貼在牆上，一口氣竟然畫了幾十張，把一面牆都貼滿了。當時

我就想，這些畫如果保留下來，今後該是多好的歷史資料。只可惜有幾個被畫得太狼狽的人不依，趁人不注意，就把畫自己的那張撕掉，於是其他人也效仿，結果一張也沒保留下來。

還有就是“千方”（調皮搗蛋）了。有一次，我們學校的幾個崽兒不知從哪兒搶來一輛當年上海生產的那種三輪汽車，大家都搶著要去學開車。一個叫周維揚的高三同學，也是我們戰鬥團的頭頭，他本來開不來車，偏要去開，又開得野，結果方向盤沒扳過來，將那車撞在體育場大門的鐵欄杆上，將車頭撞個稀爛。幸好沒有傷著他，幸好也沒有傷著路上的人，他從駕駛室跳下來，還笑，還連說：“過癮，過癮。”

還有些人便邀約在一起，到火車站，到解放碑去襲擊八一五派的大字報和大批判專欄。那種襲擊不是撕毀，而是用大排筆，蘸上濃墨，在大字報上寫標語，一張紙寫一個字，籬筐般大小，赫赫然。如果剛好碰上對方的武鬥人員，雙方便將漿糊桶、墨汁瓶、大掃把往天上一摔，立即大戰一場。有時甚至還開上幾槍，丟上一兩個手榴彈。然後便四下散開，逃之夭夭。那場面，比好多電影和小說都還要精彩。有一次，我們戰鬥團的一號頭頭甚至組織我們偷偷跑回南岸去，從羅家壩“襲擊”到海棠溪，打了八一五派一個措手不及，把八一五派的大字報和大批判專欄全部寫上我們的標語，我們還安全轉移了。

這樣的事情多了，八一五派就會採取報復措施，組織人到大街上“撒網”，來“網”反到底派的人。被“網”進去的，命運就慘了，不死也要脫層皮。在那將近一年多的時間裏，不知多少人被“網”進去坐了“土飛機”！以至我們走在大街上，都要隨時左右觀察，害怕被八一五派的人“網”住。有一次，我在解放碑逛街，有人從後面拍我的肩頭。我猛一驚，下意識地轉過身去，把手伸進懷中，這才發現是我的同班同學藍洪俊。幸好那天我沒有帶槍，否則就很可能掏出來開上一槍呢。他是逍遙派，當然不知道這種情況。我告訴他，今後不要這樣問三不問四從後面去拍別人的肩頭，萬一誤會了就麻煩。

有一次，我們戰鬥團的那個女頭頭在解放碑街上被學校的

八一五派“網”住了，被抓到二十九中裏，挨了一頓狠狠的打，還被硬灌她喝了兩碗用來寫標語的紅色廣告墨水。我們聽說後，連夜連晚開會，通過各種關係，想了各種辦法，第二天八一五派才把她放出來。事後，頭頭張正華不給任何人講，獨自帶了兩個亡命徒，各提一支手槍，連續三天晚上溜回學校，潛伏在校門外的小路邊，要報銷對方兩三條命來報復。只因對方戒備森嚴，加上晚上也無人敢走出那據點半步，才未造成血案。一直到下了農村，我才從其中一人嘴裏知道此事，我為此還很氣憤：“為何不喊我一起去？”

雖然在武鬥，雖然打槍打炮，雖然兩派見面分外眼紅，但如果一個單位兩派力量相當，或者有某種利益鉤連，依然還要保留相應的聯繫渠道。例如我們學校以住讀為主，不少同學家庭困難要“吃”助學金。雖然早就停課，但財政局依然把助學金按時撥付到學校的賬上。要取出這筆錢來，就要蓋相應的章。章不齊全，銀行就不會支付。我們學校的賬務章兩派各掌握著兩個，任何一派也莫想獨吞助學金。于是就通過私下協商，達成協議，每個月各派一人，拿著支票去取錢，然後平分。這筆錢基本上沒有支付給那些“吃”助學金的人，往往都拿來作為戰鬥團的必不可少的活動經費用了。我不是頭，我也不知道那個錢是怎麼用的。只是有一次我們“逃難”到自貢後，每個人發了20元，都是簽了字的。八一五派來“網”我們戰鬥團那個女頭頭，可能就是想逼她交出那兩個能够在銀行取錢的章，哪知道她雖然是女生，却那樣堅強，堅決否認自己掌握著那兩個章，八一五派也就沒達到目的。

對體育館這個反到底派最大的窩子，八一五派當然也想一下子端掉，無奈這兒離“警司”不遠，要大規模進攻，就必須撕掉駐軍自稱中立的面紗，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於是只有看著它存在。不過，八一五派也暗中想了不少辦法，要搞點破壞動作什麼的。有一次，八一五派要開批鬥李井泉、任白戈大會，偏偏要選擇在體育場裏開。明明是一個陰謀，反到底派却不能反對，“打不出噴嚏”來，只好事先做好準備，把槍支、武器之類轉移出去，通知所有人員那天都要提前離開。開會那天，八一五派組織人員

衝進各個反到底派的據點，翻箱倒櫃搜查，却什麼也沒有搜出來。人交公司有個保險櫃存放在體育館的辦公樓裏，太重，不好搬走，就留下了。一群八一五派見了，以為裏面有好東西，想撬開，却撬不動。又用雷管炸那保險櫃的門，也炸不開，只好沮喪地丟下。後來，我們又回到體育館，看見那保險櫃被丟棄在體育館外面的臺階上，圍了一大堆人。我也擠進去看過，那門上的炸痕猶在。由於那一炸，鎖變了形，有鑰匙也打不開門了，只有報廢。人交公司的人說，那保險櫃的東西早就轉移了，裏面是空的，“如果裏面有錢有東西，我們還不曉得轉移走喲？真是一群‘保哈兒’！”引起在場的人一陣笑。

停火後的一年裏，曾經發生過多次可能重新把重慶拉入戰爭深淵的事件，除了1968年7月發生在建設廠、江陵廠的戰役外，最危險的一次要算是“一七”事件。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組織二十多萬人在大田壩體育場集會，慶祝上海“一月風暴”一週年。會後，二十多萬人沿兩路口、七星崗游行到解放碑。途經二十九中後門處（臨江路）時，該校八一五派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居高臨下，先是與游行隊伍對罵，然後便石頭磚頭亂擲，當場打傷多人。反到底派仗著人多，便往上攻打，八一五派便退回學校。反到底派繼續往學校裏衝，要踏平二十九中。八一五派便拖出暗藏起來十來支步槍，當場打死打傷好幾人。反到底派中也有帶槍的，也拿出來打，但都是手槍，難以與八一五派的步槍相抗衡。雖然反到底派隊伍將二十九中圍得水泄不通，却又奈何不得，從中午一直對抗到傍晚。反到底派中有一些聾啞人，他們聽不見槍響，偏偏又勇敢，又很“天”（重慶俗語，指魯莽、勇敢、調皮、無所畏懼、不知天高地厚，這樣的人又被稱為“天棒”），硬要往前衝，據說結果死傷了好幾個。

那天的大會和游行我都參加了。中學生的隊伍走在前面，走到小什字就散了，後面發生的衝突我開始也不知道。我回家洗了澡，換了衣服，再回體育館去。走到臨江路，才知道打起來了。我親眼看到有聾啞人被抬下來，我也想衝上去看看，但那只是一條很狹窄的石梯，連拐兩三個之字，已經站滿了人。此前不久，

只因一個“據說”，駐軍就以藏有槍支為名，派人把解放碑友誼商店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包圍起來，只准人出，不准人進，那時包圍也還沒有解除。友誼商店與二十九中相距只有幾百米，八一五派這樣明目張膽開槍打死人，駐軍却看不見也聽不見，這激起了反到底派的極大憤怒。天又下起濛濛細雨來，十多二十萬人幾乎都不散，將兩路口到解放碑一帶的交通全堵斷。

我趕到現場的時候，剛好鄧長春也趕來了。那天，他穿著一件咖啡色的皮夾克，像個“毛操哥”（操哥、毛操哥都是當時重慶俗語，指穿著打扮時髦的男子，帶貶義），讓我看了很不順眼。他剛從成都回來，一下火車就聽說出了事，急匆匆趕到現場。他那天偏偏很理智，站在那石梯上發表了一通演說，要大家冷靜，把游行隊伍都拉回到體育館去，然後再商量下一步怎麼辦。我記得，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同志們，我是鄧長春。”下面的人立即鼓掌。第二句話是：“我剛從成都回來，我在成都受到了‘省革籌’領導的親切接見。”大家又鼓掌。第三句話是：“‘省革籌’領導向我表態了，堅決支持我們反到底！”鼓掌就更加熱烈。鄧長春的聲音雖然有些嘶啞，但他的演講還是很有鼓動性的。游行的人便後隊變前隊，回到體育館。

鄧長春演講後，走到馬路上，上了一輛大卡車。上車時，他看見我，可能他還多少記得我吧，便順手從別人手上拖來一根鋼釘，遞給我。我就握著鋼釘，坐到那卡車前面的大燈泡上。那時，天又下起細雨來。車行一段路後，鄧長春又演講一次，連續演講了四五次，都是勸告反到底派回體育館。不過，回到體育館的人并不多，大多數人就散夥回去了。只有那些死了人的單位，把游行的人帶回到體育館，呆在那雨壩壩裏，要頭頭們拿話來說。後來，好勸歹勸，又走了一些人，其他的人就進了體育館裏。那時，天已經黑盡了。

當天晚上，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包括“工總司”即重慶工人革命到底總司令部、“農總司”即重慶農民革命到底總司令部、“紅大司”即重慶大專院校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紅中司”即重慶中學生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重慶文藝界延安兵團、重慶機關

反到底司令部)的頭頭們在體育館看臺上開會，“紅中司”只有二中那個“假姑娘”在家，就把我們也叫上，于是我也參加了那個會。會上，大多數人激憤異常，特別是死了人的單位代表更吼得凶，要全市停電停水大罷工，給中央施加壓力，徹底解決重慶問題。還有人提議，要幹就要大幹，重新占領建設廠望江廠，把槍拖出來，把炮安起，和八一五派血戰到底。我們學校的一號頭頭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是個很理智的人，便極力反對，還給大家分析了這樣做的後果。“假姑娘”可能也被來他說服了，也代表“紅中司”堅決反對。我覺得全市停水停電也不可行，也發言表示反對。由於“紅中司”的人堅決反對，最後決定，立即派人到成都、到北京，向“省革籌”，向中央報告。

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樣的報告不可能有任何結果，反到底派只能吃下這個啞巴虧。

29. 小報和宣傳隊

雖說發生了“一七”事件，但那以後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重慶還算平靜，兩派之間沒有發生大的武裝衝突，鬥爭的焦點轉入了文鬥。大約是從 1967 年 11 月開始，八一五派在他們辦的小報上連續發表《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的長篇文章，以至有一論二論三論。那些文章的邏輯無非是，八一五派有五十四軍支持，而五十四軍是能“通天”的，因此八一五派必勝。而反到底派抓著八一五派的文章，群起攻之。反到底派裏有寫文章的高手，各種各樣的文章都有，或正面駁斥，或暗地挖苦，或大肆攻擊，或辛辣諷刺，一時形成熱潮，直到 1968 年春也未終止。其中又以西師八三一模仿《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筆法和格式，一連寫的“九評”為最有份量，用重慶話來說就是最“壓秤”。北京城裏的毛澤東日理萬機，却又那樣喜歡看小報，竟然翻閱過重慶兩派的這些文章。1968 年 3 月 15 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接見四川及重慶軍政領導幹部時，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塗。”讓人驚嘆。由此也可以想見，那時候重慶的文鬥也還真有點像那個樣子呢。

其實，即使是武鬥最激烈的時候，文鬥也沒有完全停止。畢竟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兩派都不可能放棄文鬥。不過，文鬥的主要內容已經從揭批走資派轉移到揭批對手的“罪惡”上來了，還時不時推出像《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之類時評或專論。我記得，戰爭爆發前那段時間，也就是還在使用鋼針之類進行武鬥的時候，兩派都寫了好幾篇呼籲“人民戰爭”的文章，刊登在各自的小報上。其中一篇是反到底派寫的，好像發表在軍工井岡

山的《井岡山》報上，題目叫作《人民戰爭救山城》。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篇文章是四川外語學院（簡稱川外，現四川外語大學）一個姓林的老師寫的，這個老師後來成了重慶著名的教授，專講外國文學，好像得過很多獎，我都多次聽過他講的課。

在我記憶中，還有一篇叫作《滿城大霧兆天晴》的文章，那是川大八二六駐渝聯絡站寫的，刊登在他們出的一張名叫《驚雷》的小報上。重慶號稱“霧都”，那天正是漫天大霧，到中午也沒散去。雖然駐軍已經把解放碑友誼商店的“完蛋”廣播站包圍了好長一段時間了，但解放碑依然那樣熱鬧，那《驚雷》一拿到街上，人們就圍上去搶。那篇文章說反到底派要贏，八一五派要輸，文字雖好，却沒有《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那樣的自信和實力。

文革中，辦報成爲時髦，不需要刊號，不需要審批，誰想辦就辦，只要你能找到印刷廠，找到紙張。最早的小報好像是北京來的大學生辦的，後來諸如哈軍工（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川大（四川大學）等駐渝聯絡站都辦得有自己的小報。文革中，重慶出過多少小報，沒有統計過，也統計不完全，我估計至少有好幾百種。有的單位一個戰鬥團就辦得有好幾種小報，例如重大八一五就辦過《八一五戰報》、《重大八一五》、《橫眉》、《冷對》等好幾種。西師八三一好像也辦有兩三種，我記得的就有《紅岩》和《八三一戰報》。有的辦的時間長，例如重大八一五辦的《八一五戰報》，從1966年12月創刊，一直辦到1968年10月，有時每週一期，有時又接連著出版，沒有定期，好像沒有斷過。有的辦的時間短，短得可能只出過一期就“壽終正寢”。有的印刷精美，甚至有用道林紙來印刷的；有的印得粗糙，甚至有用毛邊紙來印的。那毛邊紙太柔軟，也太薄，只能印一面。還有的用傳統的石印，也就是先用特殊的油墨把字反寫在平整的石板上，然後把紙鋪在石板上印刷。石印出來的報紙，往往是很漂亮的手寫的楷體字，行與行之間的間距也就比較大，與鉛印報紙也就大異其趣。八一五派掌著權，占據著不少印刷廠，不會用毛邊紙印刷，更不會用石印。如果誰把那毛邊紙報紙和石印報紙存留下來，真還是文物了呢。

那時正規的報紙只有《重慶日報》(曾改名為《新聞報道》、《新重慶報》，也有人提議改為《紅岩日報》，但沒有改成)，為了不引來兩派的反對，只刊登新華社的消息，經常都只有兩個版，幾乎沒有人看。郵局門口也貼報紙出來讓人看，除了《重慶日報》，就是《人民日報》，有時還有《文匯報》，大多都是新華社的通稿，只有《文匯報》有時透露一點上海的地方新聞。因此，兩派出的小報都很受歡迎。小報又不要錢，都是拿到大街上去散發，不管是哪一派的，一拿出來就被人搶光，再多也不够。我曾經搜集了不少反到底派的小報，還帶到了農村。招工回城的頭一天晚上，幾個要得好的同學到我家來送我，堅決不准我把與文革、與武鬥有關的東西帶到工廠，硬將那些小報塞進柴灶裏，為煮熟農村那最後一頓飯做了貢獻。

好像是 1968 年春節前，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被派到重慶來，在大禮堂進行擁政愛民慰問演出。為了表示“一碗水端平”，給八一五派演三場，也給反到底派演三場。大禮堂雖然可以坐好幾千人，但重慶人那麼多，在那文娛活動極其貧乏的年代，誰都想擠進去看看，於是入場票也就相當緊張。我們戰鬥團好像只拿到幾張票，當然不够。戰鬥團的一號頭頭怕大家因此鬧矛盾，竟然用油印來仿冒。也全靠他多才多藝，用蠟紙刻，用不同顏色的油墨套印，印出來的票竟然可以以假亂真，不注意根本就發現不了。於是，我們全都混進了大禮堂。那天演出的是些什麼節目，如今我已經記不清楚了，無非是唱啊跳啊，與兩派的宣傳隊演出相比，那水平好像也並沒有高出多少。

可能正是這次演出，引出了重慶兩派文娛演出的熱潮。那時，兩派中的一些大單位，都組織有自己的宣傳隊，也就是演出隊。趁著春節前後這股演出熱潮，也申請到大禮堂去進行擁軍慰問演出。駐軍雖然對反到底派不“感冒”，依然也給予同意，依然也派軍人來觀看，只是要求不能演出派性節目。但派性已經根深蒂固，總是透過那些表面看來很正面的節目頑強地表現出來，從而引起那些派來觀看節目的軍人不滿。記得有一次我們也去陪看，演出才開始不久，那場子中間的軍人就以有派性傾向為名，起身

退場，以示抗議。但是，八一五派演他們的《八一五風暴》和《紅衛兵戰歌》，充滿了派性，同樣的軍人去看，却沒有人抗議，反而博得陣陣掌聲。

大型歌舞史詩《八一五風暴》和《紅衛兵戰歌》都是重大八一五自編自演的，展示了八一五派的造反歷程。這兩個歌舞節目不僅重大八一五自己演，其他單位的八一五宣傳隊也跟著演。于是，重大八一五就把其他單位演得好的演員都弄到自己的宣傳隊來，最後就成了整個八一五派的宣傳隊了。有一次在大禮堂演出《紅衛兵戰歌》，我不知從哪兒弄到一張票，也混進去看。看了不到一半，突然發現那場子裏有我們學校八一五派的人，駭慘了，急忙偷偷逃出來。八一五派人多勢衆，又有相應的經濟支撐，不管是舞臺設計還是演出服裝，不管是樂隊音樂還是演員水平，都比反到底派的強多了。後來，我出席萬縣地區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遇到一個三中的女生，和我一樣，也是知青代表，她就演過《紅衛兵戰歌》，演的還是女主角，不過好像是B角或者是C角。我們都要她再跳一下，她却死個人不願意，也就罷了。她落戶在巫山縣的大山裏，後來就再沒見過了。再後來，我進了望江廠，車間有兩個重大學生，都是重大八一五宣傳隊的，不知為什麼，他們反而沒有那麼厲害的派性，對所有的人都隨和，其中一個後來還當了好幾年副廠長。

其實，文革一開始，這樣的宣傳隊就大量涌現，解放碑的臺子上經常有演出。雖然演出的節目大多是“殺殺殺”之類，現在看來好像有點好笑，但那個年代只有八個樣板戲，這樣的演出依然能够讓人多少有點娛樂。一些大單位的宣傳隊，就乾脆排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除了樂器差一點之外，那演出可能並不比中央芭蕾舞劇團的差多少。那時的人都亡命，排練時跌倒了又爬起來再練，不練好不罷休，演出技能也就上去了。比如吳清華跳的那個名叫“倒踢紫金冠”動作，難度之大，好像現在中央芭蕾舞劇團演出時都取消了，可那時有好多人都能跳。除了正式演出，甚至有人隨便都能跳。我“逃難”到宜賓的時候，在人民公園裏就看到過。那天，一群重慶崽兒圍著一個重慶女生，要她跳

給大家看。推辭了一會兒，那女生就真的跳了幾個動作，其中就有這個“倒踢紫金冠”，引起大家一陣鼓掌。柴油機廠反到底派那個叫周從軍頭頭後來到機械井岡山總部去了，他曾帶著機械井岡山的宣傳隊到甘孜、阿壩去進行過一兩個月的巡迴演出，就專門演《紅色娘子軍》。

一般小的宣傳隊，除了派性節目之外，最拿手的就是《沙家浜》的“智鬥”。三個人清唱，隨時隨地都可以。我們戰鬥團張吉祿、孫利明、劉開理三人，就經常這樣清唱。在那“逃難”的日子裏，給我們多少增添一點樂趣。

後來，五十四軍調防雲南，專門招收了一批“文藝兵”，八一五派宣傳隊的人只要真的有點文娛才能，當然也要有點關係，都擠進去了，從而逃脫了上山下鄉的命運。

文革激發了不少人的才華，除了演出，還有創作。重慶的幾個詩人，寫了一篇長詩《翠屏松》，是歌頌劉結挺、張西挺的，印得很精緻，主要執筆者就是後來成爲渝中區作協主席的冉莊，據說參與者中後來都成了著名詩人。至于寫歌曲的就更多了，前面說的李天鑫就是代表。下鄉之前，不少人把這些歌曲找到一起，刻印出來，作爲紀念。我一個小學同學，刻印技術超凡，送了一本這樣的歌曲集給我，還是彩色套印，還設計了精美的封面，還有插圖。想想那是油印的彩色套印，你就知道要下多大的功夫了！只可惜，那樣有文物意義的東西，也是離開農村時被同學們硬塞進灶孔裏燒掉了。

30. 反到底 “逃難”

交槍後，反到底派失去了優勢，挨打的機會也就增多。一有風吹草動，反到底派就成群結隊往成都跑，往專縣跑，被稱為“逃難”。1967年9月以後的一年內，反到底派掀起了三次“逃難”高潮：第一次是1967年底，首先是北碚反到底派武鬥隊猛虎團打不過八一五派，撤到永川，引起大批反到底派的人往外跑。第二次是1968年3月中旬，中央出了個“三一五指示”，是支持反到底派的，引起八一五派激烈反彈，反到底派的人恐懼八一五派進行“垂死掙扎”，又一窩蜂往外跑。第三次是1968年7月上旬開始的，因反到底的三個武鬥根據地望江廠、建設廠、江陵廠相繼失守，反到底派人心惶惶，又紛紛出逃。據當時的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在一次講話中說，重慶反到底派“逃難”到成都和專縣的，至少有十萬人！如果按“逃難”的人次計算，那就更多了。

這三次“逃難”我都參加了。

那時，四川兩大派，各有一個堡壘，一個是重慶，一個是成都。成都與重慶反到底派觀點相同的是八二六派。八二六派有省革委（前期是“省革籌”）以及駐軍支持，把對立的一派“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的簡稱）壓住，但却不能完全把“紅成”打垮，與重慶正好相反。其他專縣與成渝兩地不同，一旦某一派占了多數，掌了權，便將另一派打成反革命，或者全部趕走，或者不許亂說亂動，因而往往形成一派占統治地位的清一色的狀況。

成都和專縣並不像重慶有個“革聯會”，並不要因為要“砸”要“保”而分成的兩派。但重慶兩派都把與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相同的看作是戰友，于是就把重慶兩派的名稱佔倒加到成都和專縣的兩派頭上，也稱他們為砸派或保派。更有甚者，是把他們叫

作“土砸”、“土保”。實際上，不少地方與重慶反到底派觀點相同的，原來是在“保”本地的類似于“革聯會”的機構，或者相反，專縣那些要“砸”本地類似于“革聯會”的機構的，反而與重慶八一五派站在了一起。這就顯得有些混亂，後來就有人出來統一稱呼，把擁護省革委（先是“省革籌”）的稱為“紅十條派”（因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文件是十條而得名），把對方稱為“反紅十條派”，這當然是“紅十條派”的人想當然了。實際上，當時省革委主要領導是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梁興初曾經是五十四軍的老首長，公開表態支持重慶八一五派，而劉結挺、張西挺兩口子（簡稱劉、張）則是支持重慶反到底派的，張國華只好在中間協調，“和稀泥”。因此，所謂“紅十條派”擁護省革委是假，擁護劉、張是真。而所謂“反紅十條派”從來沒有接受過這樣的帽子，也沒有在全省統一過自己的派別稱號，重慶人一般都稱他們為專縣八一五派。因此，成都和專縣的兩派，實際上也就與是否擁護或反對劉、張為分水的。

劉結挺、張西挺都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曾分別擔任宜賓地委書記和宜賓市委書記。文革之前，因為反對李井泉（現在說是嚴重違法亂紀、合謀打擊陷害幹部群衆），二人被撤職，被開除黨籍，還被關押起來。文革開始後，他們跑到北京，獲得中央文革的信任，開始飛黃騰達，讓他們的野心更加膨脹，想當四川王，於是就暗地裏支一派打一派。但是，劉、張畢竟是因為反李井泉而受難的，在“紅十條派”看來，反對劉、張，就是為李井泉開脫，就是保李井泉。因此，“紅十條派”就更把反對劉、張的“紅成”、八一五派看作是保皇派了。

不管怎麼說，當時四川兩大派却相互對峙，大約以內江瀘州一線為界，西邊是“紅十條派”的地盤，東邊是八一五派的天下，再東邊的涪陵、萬縣又是“紅十條派”的地盤了。重慶反到底派“逃難”，絕大多數都是往成都方向跑，也有的往涪陵、萬縣跑。望江“金猴”就曾跑到涪陵去躲過。不過，那時去涪陵、去萬縣，只能坐船，交通不便，去的人少。望江“金猴”去涪陵，是搶了廠裏的船，自己開船去的。那時，內江到成都，成都到綿陽，內江到宜賓，

幾乎每個縣城都有重慶反到底派的“逃難”隊伍，其中尤以成都和宜賓最多。特別是宜賓，一個小城市，突然擠進那麼多重慶人。大街上一走，幾乎都是二不挂五的“逃難”者，反而難以見到當地人，也是一大怪事。

那時從重慶往西跑，路只有一條，那就是乘火車走。一到“逃難”高潮時，那火車站的擁擠程度，并不亞于現而今的春運民工潮，只是那時秩序更亂，也就更顯擁擠。1967年年底，鐵道兵已經進駐重慶，準備修建襄渝鐵路，火車站便由鐵道兵守衛，并負責維護秩序。沒有車票，要進站上車，很難。于是便買一張到江津的票(1.20元)，甚至只買到九龍坡的票(0.20元)，混進站去，反正上了車就再也沒有人管，管也管不了。

重慶站原來很小很破舊，售票廳更不像個樣兒，面積可能還不到100平方米。買票的人多，全靠力氣大才能擠進去。一個學校的人往往選幾個大漢，齊心合力往裏衝。更有絕的，把人抬起來，爬在人頭上往裏擠。有一次，我就是這樣被同學們抬起來，從人頭上爬到售票窗口才買到票的。于是，罵天罵地的，打架鬥毆的，當然也就免不了。不過，打也打不起來，都是一大群，一說又都是一派，說不定還曾在一個戰壕裏呆過，往往相互撒幾支煙就和好，就完事，叫作“拿言語”。後來，有當兵的來維持秩序，維持不了，只好用槍筒左右亂打，好歹才將那混亂局面控制住。那槍筒打在背上，一打一個青疙瘩。不過，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挨打的也理解，最多罵兩句也就算了。

有了票，進了站，要擠上火車，還要花更大的勁才行。車廂早已擠滿，連門口也堵死了的，哪能上得去，只好爬窗門。窗門裏的人又不讓爬，于是便爭吵打架。爬不上去的，便將廁所窗門用磚頭打爛，從廁所進去。車廂裏再放一隻腳都難，于是只好呆在廁所裏。那小小的廁所，不足一個平方米，又髒又臭，也成了爭奪的對象。有一次，我們學校的人占據了一個廁所，竟鑽進去七個人，而且還要那樣站到內江！那便槽裏還有糞便，一個叫趙時國的初三同學實在看不下去，就找了一根棍棍去掏，結果就得了一個外號叫“掏屎棍”。

那天我的運氣好，看他們鑽進廁所，我不願意去聞那屎臭，正準備不走了，忽然聽見有人在車上喊我的名字。一看，原來是黃山紅一連的一個排長，叫何蜀光，是二中的高中學生。他正坐在窗前，伸出手來，硬把我拉了上去。太擠了，那桌板上已經坐了一個人，我只好和那人背對背坐著，我的兩隻腳也拿不進去，只好懸在窗外。那是“三一五指示”下來後的那次“逃難”。何蜀光對我說：“這是最後一次‘逃難’了！”看他那樣充滿信心，我却說：“不一定喲。”

何蜀光懂音樂，笛子吹得特別好。那天，他就帶有一根笛子，在那混亂齷齪的火車車廂裏吹著，給我們多少帶來一絲安慰，一點“美的享受”。武鬥停止後，他竟然假冒八一五派，趁五十四軍調防雲南招“文藝兵”之機，混了進去，當了幾年兵。改革開放後，市工商局辦了一張《個體經濟報》，我和他又在一起同事了將近一年。後來，他憑自己的本事進了重慶電視臺，當了音樂編導，還是很有造化的。

好在那時與解放前災民的“逃難”不同，我們都不帶行李，最多只背一個軍用挎包。車廂裏的行李架上也坐滿人，常常將行李架坐塌，一個個又掉下來，落在車廂裏的人頭上，引起一陣騷動。最苦的是女生，人那麼多，廁所又被人霸佔著，尿脹了，往往只好屙在褲襠裏。於是，那車廂裏的臭味，叫人睜不開眼。

實在上不了車的，便吊車門，便爬車廂頂篷。那真是拿生命作賭注了。我親眼三次看見有人被火車摔下，真叫人觸目驚心。一次是在小南海，一個背大鋪蓋捲的，硬要上車來。車門口已經擠滿了人，連最下面一步的鐵梯也坐著人。他只能吊著那欄杆扶手，背向著車外。火車出站，速度逐步加快。他那背上的鋪蓋捲鼓起好大一砣，被路旁的電杆一絆，將他絆歪。他還未回過神來，下一根電杆又來了，再給他一絆，便將他絆下去了。車窗邊的人幾乎都看著他這樣摔下去，只有嘆氣而已。那時，火車速度還不算快，估計他只是摔傷了，不至于捲進車輪下送命——如果他幸運的話。

還有一次是在大足郵亭鋪。那是晚上，一個農民挑了兩籮筐

煤炭，硬要搭車。也是擠不上來，他一隻手抓住車門的欄杆扶手，一隻手穩著扁擔，穩住那煤炭籮筐。也是火車出站時，被那電線杆絆下去了。天黑地黑，也不知其生死如何。

還有一次是在簡陽到成都之間的一個小站，記不得是紅花塘還是石板灘了。火車停了一陣，車廂頂篷上的人可能坐累了，便站起來伸伸腰活動活動手脚。後來火車又開動，站著的人便又坐下。其中一個“天棒”崽兒却不坐，站在那上面大呼大叫的，好得意。那時都是蒸汽機車，煙囪裏冒出的濃烟裏，常有芝麻大小的煤粒，風又大，不管是坐是站，只能臉朝後，不能臉朝前。火車出站不遠，就有隧道。如果坐著，剛好能躲過。那崽兒只顧得意忘形，那知死神已經逼近。正好又是彎道，車窗前的人見了，大聲喊，他又聽不見。說時遲，那時快，火車一進隧道，他就被絆了下去。火車好高，速度又快，摔下去能活出來的機會幾乎為零。可憐他“逃難”，把命也送脫了！

其實，最惱火的，還不是擠火車，而是一路上被攔截，隨時都有被八一五派抓走的危險。從重慶到內江椑木鎮，也就是內江前一個站，還沒過沱江大橋，都是八一五派控制的。八一五派知道，那火車上的人都是“逃難”的反到底派，膽大的便帶一隊人馬到車站，趁機打劫，耀武揚威的，打“耙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兒挨過打。有一次，在江津德感，我在車上看到幾個八一五派圍著一個反到底派的人亂打，車上的反到底派同夥便衝下去幫忙，雙方在站臺上拳頭棍棒打起來。畢竟是八一五派的地盤，不一會兒便從站外衝來一隊提著槍的人，將那幾個反到底派圍著，槍托皮帶亂打，打得那幾個傢伙皮青臉腫。火車開動了，還有兩個被扣下，抓進那樓房去了，也不知生死如何。由於類似的事太多，各單位當頭頭的每到一個車站，便要派人將那些火氣大的、愛惹事的“天棒”崽兒管住，儘量不讓他們下車去，免得發生衝突吃虧。

可是，你不找他，他要來找你。只要見到重慶來的火車，沿路的八一五派都要組織人馬，荷槍實彈，來尋釁滋事。看到不順眼的，就盤查，動不動就打人。為了撈點好處，一些地方的八一五派甚至用武力攔截火車，然後搜查武器，洗劫財物。1968

年7月，我們“逃難”去成都，就在隆昌附近的石燕橋被這樣攔截過。他們把車上的人全部趕下車，然後把留在車上的東西全部洗劫。折騰了半天，好像沒有多大的收穫，又讓我們一個跟著一個上車。每個車門都派上兩個傢伙，一左一右，挨個搜身，除了武器，值錢的東西也一律被搶去。

“逃難”到成都，到專縣，有“支左飯”吃，不用擔心餓肚皮。但是，那吃的住的却極差。成都人小氣，又排外，似乎給這些“逃難”的人飯吃，就算恩重如山了。而重慶人粗野，閑不住，便到處惹事生非。于是相互不滿意，甚至發生衝突。我們學校“逃難”的幾十個人曾住在四川省農科院，當時成都煤炭供應緊張，頓頓吃夾生飯，讓我們心頭很是不滿。晚上，幾個傢伙便去試驗田裏偷香瓜來解饑，于是又與守夜人打起來。又不知是誰的提議，要成都人捐獻東西給我們這些“逃難”者。重慶人想都沒想到，送來的儘是已經破爛了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連一件像樣的舊衣服也沒有，只好丟得遠遠的。南岸有幾個學校的反到底戰鬥團住在資陽，我看他們。不知那一年資陽為何沒有熟米，連街上飯館都只賣糙米飯。糙米飯有一股潲水味，又硬，牙巴嚼得青痛了，也難以下咽。吃了幾頓，便難消化。打起屁來，震天動地響，男女生都一樣，先還笑話一陣，後來也就不再笑了。

最好的地方是宜賓。劉結挺、張西挺曾經是宜賓地委書記和宜賓市委書記，宜賓當然就是他們的根據地了，也是“紅十條派”的大本營。宜賓在全川最早成立革委會，其主任又是劉、張的同夥王茂聚。重慶反到底派的人到宜賓，憑介紹信便可在接待站領飯票，憑那飯票便可在飯館或所住單位的食堂吃飯。於是，便亂開介紹信，冒領很多飯票，集中起來到飯館換好吃的。即使住在學校工廠，隔幾天也有牙祭打，也有油暈吃，以至大家都“樂不思渝”，不願再走。我們在成都呆不住了，就趕到宜賓去，住在金沙江南岸的宜賓茶廠裏，很過了幾天好日子。吃了飯無事幹，便坐茶館打撲克。那翠屏山公園裏，那人民公園裏，儘是重慶人。宜賓又是金沙江和岷江匯合處，一到下午，江邊游泳的，也儘是重慶崽兒。實在厭了，便你邀我約，三五成群，深入更偏僻的地

區去搶槍，或者就參加“武裝支滬”，到瀘州等武鬥前線去打仗。

“逃難”的人太多，給省革委增加了好大的財政負擔。李大章便出來說話，其中一句叫“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一則是給重慶方面施加壓力，一則勸反到底派“殺”回重慶鬧革命。一直捱到 1967 年 9 月初，反到底派才大規模從成都、從專縣“殺”回重慶，結束了那“逃難”生涯。

31. 專縣的戰爭

重慶的戰爭停火（其實並沒有真正停過），不少專縣的戰爭才拉開帷幕。重慶直轄後，稱主城以外的為區縣，專縣一詞很少用了。當年，重慶雖不是省城，却是四川省最大的城市，重慶人就更有一種優越感，把其他地方稱為專縣，也就是專區（後改稱為地區）和縣的簡稱。把專縣的兩派稱為“土砸”、“土保”，就更帶貶義了。

專縣經濟落後，消息閉塞，政治鬥爭却更加黑暗。因此，與重慶相比，專縣的戰爭就打得更殘酷，雙方也更野蠻。專縣的文革戰爭主要在涪陵專區、江津專區（後改稱為永川專區）以及瀘州至內江一線進行，後來達縣專區也打了起來。綿陽專區的中江縣也打得凶，那是黃繼光的故鄉，黃媽媽所在的那一派被打出來，到處流浪，後來還流浪到重慶，受到八一五派的熱情接待。到1968年，兩派基本上沿沱江一線對峙，江東為八一五派，江西為“紅十條派”，其中瀘州是兩派對峙的最前沿，經常發生或大或小的各種戰鬥。

重慶武鬥中，駐軍雖然或明或暗支持八一五派，但表面上還是要裝出一副中立的面孔，也不敢直接出面組織武鬥。現役軍人（軍隊院校除外）直接參與武鬥的事雖然也有過，但却極少。由於兩派爭鬥，重慶基本上處在無政府狀態中，革籌組以及後來的革委會大多名存實亡，沒有作用。即使像望江廠“八一三”事件那樣，武鬥人員公開進攻駐軍，駐軍參謀長等數人被打死打傷，駐軍被迫還擊後，也是立即主動撤出武鬥區域。正因為如此，反到底派雖然敵不過八一五派，雖然受壓，甚至受到駐軍一些不公正的對待，但依然還能存活下去。雖然跑了十多萬人，也還有

那麼多不跑的，堅守在重慶城。像體育館一帶的反到底派據點，八一五派從來沒有策劃過去攻打，因此也就從來沒有失守過。

專縣就不同了，一般沒有駐軍，只有軍分區和武裝部。軍分區和武裝部與革籌組（革委會）都是一派的，態度鮮明，公開將另一派宣布為反動組織或反革命組織，動用各種專政工具，予以取締。哪一派占了一塊地盤，哪一派都這樣幹，并非某一派如此。專縣的武鬥隊往往是由革籌組（革委會）出面組織起來的，武裝部公開發槍，甚至派人到武鬥隊充當顧問或指揮，直接參與武鬥。王茂聚是劉結挺、張西挺一夥的，當時任宜賓專區革委會主任、軍分區政委，他就經常到瀘州前線視察，指揮武鬥。瀘州“紅聯站”與重慶八一五派觀點相同，力量强大（主要是幾家大廠如瀘州化工廠等單位的“紅聯站”派的人多，加上那兒駐有五十四軍一個師，能够得到支持），“紅十條派”的瀘州紅旗壓不住陣。王茂聚竟組織宜賓專區（當時瀘州屬於宜賓專區管轄）各縣武鬥隊“武鬥支瀘”，前後打了三次大戰。後來，那些武鬥隊就被分到前線的各個據點裏，承擔守衛任務。宜賓專區當時所轄縣市達19個，“紅十條派”占據了大多數，一個縣派上一兩百人，就是好幾千。每個縣都分了戰區，誰丢失了自己的防線誰負責，輕則處分，重則關押。從富順到瀘州一線，沱江兩岸的山頭上，哪怕是極偏僻的地方，都有武鬥隊守衛。

我曾參加望江“金猴”頭頭徐開華組織的“紅旗三〇三”部隊，去過瀘州，在瀘縣和豐場附近江邊的一個山頭上呆了幾天，也去過瀘州城裏。瀘州城與沱江對岸的小市有一座大橋相連，兩邊橋頭都修得有碉堡工事。武鬥人員荷槍實彈，監視著過往的行人，動輒喊住，檢查搜身，稍有不對便拳打腳踢，甚至抓捕到武鬥據點中關起來，弄得人心惶惶。而且，從那橋頭沿著江邊，戰壕一直修到瀘州醫學院所在的“革命山”上，逶迤數裏。那戰壕兩側，還修得有機槍陣地、迫擊炮臺、碉堡、指揮所、避彈洞、衛生所等等，其規模之大，其設施之全，令人嘆為觀止。我們從那大橋旁進入那戰壕，轉來轉去，把頭都轉暈了。

所有的武鬥隊吃飯都不要錢，還有各種補貼，各種優待，其

供給由專區統一負責。幾乎每天都要從宜賓開一個車隊到瀘州，給前線運送糧食給養。參加武鬥的人員與重慶也不同，學生極少，主要是各縣城的職工，也有不少農民。小縣城的職工與重慶城的工人不同，大多是店員、搬運工之類，素質低，稀裏糊塗的。不少人可能還是被強迫拉來的，更有不少人是衝著有飯吃、有補貼、有優待而來。那時人窮，一天補貼幾角錢，也會吸引好多人。

武鬥隊都由武裝部派人當隊長或指揮。領導（縣革委頭頭或武裝部部長、政委之類）一動員，那些武鬥人員便只知道對方是土匪，是壞人，於是槍斃俘虜的事就相當普遍。據說涪陵軍分區政委李畔就親自帶領武鬥隊東征西剿，不知打死打傷多少人。有的地方，一旦抓住俘虜，往往就槍斃，據說有一下子就槍斃好幾十個人的事。因為這些原因，專縣的文革戰爭與重慶就大不相同。

在專縣，不僅前方人員有槍，後方人員也發槍，每個單位每個公社都有武鬥隊。一些半輩子老頭扛一枝老杆杆步槍，動輒便用槍托打人，那樣子就像解放前的鄉丁兵痞。在宜賓岷江游泳時，我的同年級同學安剛被洪水沖走，我們解開停在江邊的一條小木船去搶救，結果被木船社的武鬥隊抓住，全都挨了槍托，幾個人好幾天都直不起腰來。對“逃難”的戰友尚且如此，可以想像，這些武鬥人員對本單位的對立派和“牛鬼蛇神”們該是怎樣厲害了。這讓“逃難”到專縣的重慶崽兒很是看不慣，經常當面諷刺洗滌他們。看到重慶崽兒天不怕地不怕，那些人往往也沒有辦法。

與重慶武鬥隊比，專縣武鬥隊的戰鬥力就差遠了，像建設廠爭奪戰那樣殘酷的戰鬥幾乎沒有發生過。放幾槍，打不贏，便扯伸腳杆逃跑。重慶的學生和工人大多是憑熱情，憑“保衛毛主席”的一顆“紅心”去打仗，“完蛋就完蛋”，因此打起來便頑強。專縣武鬥人員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為混飯吃，為幾文補貼而打仗，誰會那樣賣命呢？因此，重慶崽兒說起專縣“土砸”、“土保”都要搖腦殼，沒把他們放在眼中。

當然也有厲害的，江津專區兩派就打得特別凶。江津縣兩派在一次武鬥中，就打死（包括槍斃的俘虜）十多人，與重慶反到底派觀點相同的紅旗派沒打贏，只好逃到永川。接著，永川工農

派（與重慶八一五派觀點相同）又組織武鬥隊攻打縣城，一下就打死紅旗派十多人。這樣，江津專區的紅旗派就被趕出永川。他們把運輸公司的汽車全搶了，幾百輛汽車載著武鬥人員，在川中川南大地上浩浩蕩蕩地奔來奔去。每輛車的車頭上都架著一挺機槍，車上是行李、彈藥和武鬥人員，有的甚至還拖兒帶女。公路上煙塵滾滾，遮天蔽日，車隊要半天才能過完，那陣勢似乎只在戰爭影片中才見過。他們的人太多，幾乎所有的縣都承擔不起給他們提供“支左飯”的負擔，于是他們只好一個縣住上幾天，看當地不管他們了，又走。有一次他們來榮縣，我正好也在那兒，看到他們下車來，那一個個疲憊的樣兒和那一張張沮喪的滿布灰塵的臉，也為他們感到難過。1980年底，我曾遇到永川地區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長，他當過紅旗派，當年也曾參加過武鬥，也被打出永川。他告訴我，有一次在西山打阻擊，他們在山上，工農派的人從山下蜂擁地攻上來。他們的機槍一掃射，只見那衝上來的人一排排倒下。那場阻擊打了一整夜，不知死了多少人。他說：“打仗，那像電影中說的那樣簡單喲！”他唏噓，我也唏噓。

重慶武鬥打死了多少人，沒有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專縣武鬥死的人比重慶的多得多，至少要高數倍，甚至高數十倍。把武鬥當作剿匪，又有掌權的當局撐腰指揮，抓到俘虜又槍斃，怎能不死人？在瀘州，“紅聯站”經常派特工隊渡過沱江，深入到紅旗派的後方，出奇不意搞襲擊，打得紅旗派受不了。我在瀘州時就聽說，有一次，一夥紅旗派武鬥人員正在堰塘裏游泳洗澡，“紅聯站”特工隊突然出現，一槍一個，把十幾個紅旗派武鬥人員全都打死在水中。好大一個堰塘，那水也被染得通紅，好慘！

還值得一提的是，瀘州在文革戰爭中，還動用了一五〇加榴炮。那是1968年初夏，紅旗派為了攻下瀘州長江南岸的藍田壩，搶了兩門駐軍的一五〇加榴炮，從北岸向南岸轟擊。一五〇加榴炮，那炮彈直徑達150毫米，一發炮彈可以炸垮一幢樓，可以炸一兩丈深的大坑，即使是野戰軍，也只有師一級的炮兵才能配備，到現在也屬於重武器。全國武鬥中，瀘州又占了一個“吉尼斯”第一。

重慶兩派都有跑到專縣去參與當地戰爭的，尤以反到底派的人為多。不少反到底派被趕出重慶，無所事事，就去參加專縣的戰爭。最出名的是北碚的猛虎團，他們被趕出北碚後，退到永川，後來又退到富順一帶，直接參與了專縣戰爭。當然，零星參與的更多，三五人，十幾人或幾十人結成一夥，扯一個旗號，便開到瀘州去混飯吃。重慶崽兒打仗勇敢，又有計謀，很受專縣武鬥隊歡迎。1968年春天那一兩個月，我就參加了徐開華組織的“紅旗三〇三”，去過瀘州。不過，大多數重慶崽兒之所以到專縣去打仗，主要還是想弄到一支短槍。短槍一到手，便溜之乎也。為了弄到短槍，偷、搶、騙、詐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又與專縣武鬥隊發生矛盾和衝突，有的甚至鬧得很厲害。到後來，專縣武鬥隊聽說是重慶崽兒，便一律謝絕，不再引狼入室了。

32. 搶槍

要武鬥，就要有武器；要打仗，就要有槍彈。槍彈從何而來？只有一個字：搶。文革中最大的怪現象就是搶槍了。

1967年7月重慶文革戰爭開始時，反到底派是“提”槍。兵工廠的槍，哪能隨便就能“提”？所謂“提”，實質上也是“搶”，只不過是從自己控制的兵工廠的總裝車間或成品庫裏把槍“搶”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衝突和周折罷了。只要頭頭不怕秋後算賬，下個決心，做個決定就行了。真正的搶槍是從控制著武器的駐軍（包括軍分區、武裝部）手上弄過來，就沒有這樣簡單了，更沒有這樣容易了。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豈能隨便就讓你“搶”去？即使駐軍很願意把槍交給來搶槍的人，也要做一些阻攔的動作，只能搞明搶暗送那一套。軍隊都有制度，對武器都要進行嚴格保管，放在什麼地方往往還是保密的。去搶槍的人如果沒有軍人指點，很可能找上半天也找不到。于是就有軍人用動作、用眼神，甚至用語言加以暗示，甚至直接帶路指引。搶槍的人來了，也要讓軍人來阻攔。搶槍的仗著人多，很容易衝破軍人的封鎖線，但要完全不發生衝突是不可能的。只有極少數情況，搶槍的與駐軍事先商量好，駐軍首長找藉口把下面的軍人調開，搶槍的人衝進來了，把留守的軍人控制住，就對直打開武器庫，把槍正南齊北運走。私下裏，那些駐軍首長還會給搶槍的人出點主意什麼的。

重慶文革戰爭停火後，反到底派交槍交得比較徹底，以至後來吃了虧，又好後悔。為了弄到槍，趁著“逃難”浪潮，反到底派就涌到成都和專縣，到處搶槍。八一五派已經將重慶市內武裝部的槍都搶“完”了，又不敢去搶野戰軍的（畢竟五十四軍是支持八一五派的），也到八一五派觀點占優勢的專縣去搶。于是，

1968 年全川到處都出現了搶槍的浪潮，連一些偏僻縣城也難幸免。八一五派的情況我不大瞭解，只說反到底派搶槍。

本來，反到底派所到之處都是“紅十條派”的“根據地”，當地的武裝部也是支持反到底派的，按說應當明搶暗送。但是，那些武裝部的槍，大多已經發給本地的武鬥隊了，早已所剩無幾，而且剩下來的又多是沒法用的東西，不是沒有配套的子彈，就是槍械出了故障不能修復，還有就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諸如 19 世紀使用的那種火藥槍。徐開華組建“紅旗三〇三”後，從井研縣武裝部搶到幾支美國槍，口徑倒是和 1956 年式半自動步槍一樣，也是 7.62 毫米，但那子彈不同，因而那槍膛的尺寸與同樣口徑的半自動步槍、蘇式步騎槍也就不同。找不到適用的子彈，這樣的槍還不如鋼針管用。徐開華就把這樣的槍拿到南溪縣的長慶機器廠（也是兵工廠，簡稱長慶廠），自己改造一番，于是就能打 1956 式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那種子彈了，也才使那次搶槍不至于是做無用功。

搶槍時，先要派人將武裝部的地形、武器庫房之類偵察好，然後趁其不備，幾十百把人一涌而入，砸庫房，撬櫃子，旮旯角角都要搜遍。有時候，運氣好的話，也可以找到武裝部留下的軍人自己要使用的槍支，甚至可以找到部長或政委使用的手槍。但是，大多數人能找到的，只有刺刀、大刀、破槍之類。而什麼也找不到，像個紅頭蒼蠅亂竄一氣，結果空手而歸的人更多。搶到槍的興高采烈，急忙往外溜。有時也發生爭執，為一支槍，兩人或兩方的人拳腳相加，大打一場，甚至將槍扯出來，逼對方就範。

到了 1968 年，武鬥人員的紀律已經開始渙散，一些人已經變壞，槍未搶到，倒把皮帶、軍帽、軍衣甚至錢糧之類搶走。有人甚至把挂在牆上的軍用地圖也搶走。在榮縣武裝部搶槍的時候，我什麼也沒搶到，却被挂在牆上的軍用地圖迷住了，那是五萬分之一的地圖，由若干張拼成的，連農村的小路也標得清清楚楚。我從小愛好地理，喜愛地圖，好想取下來拿走，最終却不敢下手。後來，我在一個戰友處看到一張相同的地圖，不過只是其中的一小張。我對他說：“你娃膽子大喲，軍事秘密被你劫走，小心今

後找你算賬！”他笑笑：“又不是我搶的，我在河邊渣滓堆撿來的。”我又嫉妒又羨慕，只得悻悻地說：“那你哪個不多撿幾張？”他和我一樣，也是個地理愛好者，捨不得把那地圖給我，我也只好乾瞪眼了。地圖、軍衣、軍帽之類與武鬥多多少少還有點關係，最壞的是搶軍人自己的東西了，像小偷，像強盜。我下鄉後，一個八一五派的同年級同學拿了一個小收音機給我看，說是搶槍時弄來的。當時，我真恨不得搶過那小收音機，狠狠地摔在地上給他砸爛。

被搶過的武裝部總是一片狼藉。剛剛收拾妥當，沒過幾天，另一夥人可能又竄到這小縣城來了，往往又會來光顧一次，把那武裝部再抄得個天翻地轉。因此，在搶武裝部時，那軍人便會提醒你，你是第三輪或第五輪來搶的，槍早就被搶完了，肯定沒有收穫。不過，哪怕是第十輪去的，去搶槍的人也不會相信軍人的話，也要再去翻他個亂七八糟，即使空手而歸也不會罷休。

一般情況下，碰到來搶槍的人，武裝部的軍人也要阻擋一下，也要與搶槍的人爭吵，甚至推搡扭打幾下。被搶的次數多了，軍人也厭惡，畢竟弄得亂七八糟的要他們自己來收拾，有時也會發生衝突，甚至打鬥。但是，搶槍的人多，擋得了這個擋不了那個，打鬥就更沒有用，于是便退到一邊，袖手旁觀。看著一夥人搶出幾支破槍，那軍人便笑，甚至揶揄道：“那爛‘燒火棍’都能拿去打仗呀？”也有人回過神來，將那無用的東西丟掉。

搶槍中也經常發生事故。有一次在內江，一夥人衝進軍分區，翻箱倒櫃，什麼也沒找到。我認識的重慶五中的一個“天棒”崽兒，為了嚇唬人（主要是為了嚇唬其他搶槍的傢伙），手中舉著一顆手榴彈，將導火索扣在小指姆上，衝進一間辦公室。那辦公室不過二十來平方米，早擠滿了人，有搶槍的，也有軍人。一個當兵了見了那手榴彈，也不明底細，竟衝上來搶。手榴彈倒被搶過去了，導火索却被拉斷。那手榴彈“嗚嗚——”尖叫著，直冒白煙。那軍人又是新兵，不知該怎麼辦，嚇得急忙把手榴彈往地上一撂。其他人見了，急忙往門外跑。門又小，人擠在一堆，又跑不動。有人大喊：“給我趴下！”於是，搶槍的人和軍人都急忙

趴在地上，抱著頭，等著那一聲響，不知能否躲過那死神。那是令人揪心的七秒鐘！那是像七天七夜一樣難捱難熬的七秒鐘！終於，“轟——！”一聲巨響，大樓震動，彈片橫飛，硝烟彌漫。還好，只有幾個人受了輕傷。

原來，那辦公室是水泥地板，較硬，使彈片反彈高，其幅射夾角大，人都已趴下來，所以受傷的人不多。那握手榴彈的傢伙站起來，手上還吊著那導火索，望著那被炸傷的人血流滿面，一時竟嚇得不知怎麼好，還是他的一個同學推了他一把：“還不快跑！”他才將那導火索一摔，趁著人亂，擠出辦公室，扯伸腳杆溜之大吉。當兵的明白過來，撲上去要抓他，又被其他搶槍的人攔住，眼看著他逃脫。那搶手榴彈的軍人也受了傷，惶惶然站起來，好半天都沒回過神，弄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當時，五中一個外號叫“麻兒”的崽兒也在那辦公室。他後來對我說：“好險喲！老子離那手榴彈只有一米多遠，竟然沒有把我炸到。下午，我們到沱江去游泳，我總覺腳後跟處有些發癢，就用手去摳。好痛，仔細一看，一塊彈片嵌在肉裏，嚇得我哇哇大叫。還是別人狠心，咬著牙，猛地將那彈片給我扯了出來。流了好大一灘血喲，痛得我眼泪直流。”說著，他把那腳給我看，那兒有一個小小的肉疙瘩。于是，我為他嘆息，然後我們又一起哈哈大笑，為他死裏逃生而慶幸。

可惜，他後來却沒有躲過死神的追捕。1969年我們還沒下鄉前，他就被診斷得了白血病，住在第五人民醫院。那時，白血病是絕症。我去醫院看他，他還相當樂觀地對我說：“你們先去，我馬上就趕過來。”沒想到，我們下鄉兩三個月後他就死了。他和我一個年級，死的時候剛好滿19歲。

搶武裝部沒有搞頭，便想辦法搶軍庫。1968年7月下旬，在成都的重慶反到底派互相邀約（背後肯定有人組織，只是情況不詳），上千人分頭趕到廣元某地去搶軍庫。哪知那軍庫在大山中，又隱蔽，難以尋覓，加上部隊戒備森嚴，結果大多無功而返，僅在該地武裝部搶到一些子彈、刺刀之類。呆了一兩天，又爬火車返回成都。一夥人在油罐車頂上呆了一夜，下車後，除了兩個眼

睛的眼白，渾身都是黑的。出成都站時，明明大包小包的。一個崽兒甚至扛了一箱子彈，僅用一件爛衣服包著，那出站口處守衛的軍人竟睜眼不見，更不收繳。那時，成都駐軍是才調來四川不久的五十軍，與重慶的五十四軍態度相反，是支持重慶反到底派的。因此，“逃難”到成都的重慶反到底派往往也就肆無忌憚。

武裝部、軍庫及駐軍的槍搶不到，便搶自己人的。重慶反到底派在成都、在專縣下“土砸”槍的事經常發生，以至一說起重慶崽兒，“土砸”們都有些怕。成都崽兒有了一支槍，好顯揚，往往吊在屁股上，一甩一甩的，像個爛丘八，生怕人家不知道，以此嚇唬人。重慶崽兒見了，分外眼紅，便千方百計打主意。于是，趁其不備，幾個人猛地撲上去，將其攔腰抱住，不待其回過神來，那槍早沒了。如果弄得不好，屁股上還要挨上幾刀。搶槍的人一聲呼哨，頃刻間便不見了踪影。也有的手脚快，將那槍扯了出來，却被撲上來的重慶崽兒一脚踢飛。即使沒被踢飛，敢開槍的畢竟很少。成都街頭不知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搶槍故事，重慶崽兒失手的似乎還沒有聽說過。以至到後來，成都崽兒再不敢把槍拿出來現相了，一說起重慶崽兒就害怕。1967年12月，我和外號叫“暴徒”的初二年級同學曾強忠，帶著一群初一女生“逃難”到成都，住在省輕工廳。同樓住得有成都一個中學的武鬥隊，有幾支槍。那武鬥隊竟派人給我們送來一些吃的，來說和我們“拿言語”，說好話，也就是疏通關係，叫我們不要約人來搶他們的槍。我們趁機提出一些條件來，他們竟然一一答應下來。

說起下成都崽兒的槍，當年還有一件曾在成都和專縣流傳到很廣的事：那是1968年春天，一夥成都崽兒去爬峨眉山，帶有好幾支手槍，又洋歪歪的，到處現相，生怕別人不知道，時不時還扯出槍來，佔吃霸賒。這惹得幾個重慶崽兒心癢癢的，于是便暗地策劃好。上了金頂（也有人說是接引殿），天氣冷，外面又下起了大雪。成都崽兒住在一間大殿裏，蓋著鋪蓋大衣正在閑扯。突然，大門被一脚踢開，衝進一群重慶崽兒，其中好幾個都拿著槍，那為首的還端著雙槍。一陣大喊：“不許動！”把那些成都崽兒都駭倒了，一個個躺在地上，不敢動彈。其中一個膽大亡命的，

剛想從枕頭下去抽槍，那端著雙槍的重慶崽兒手一揚，就是一槍，把他打傷。其他人更不敢動了。于是，重慶崽兒按上去，將成都崽兒的槍一一收繳，然後緩緩退出，連更連夜下山，跑得個無踪無影。據一個知情人後來告訴我說，那群重慶崽兒，除了爲首那傢伙手中那兩支是真槍外（其中一支還打不響），其他全是玩具，全是假傢伙！成都崽兒人也多，槍也多，却吃了個啞巴虧，連對方是哪個單位的也沒弄清楚，只好灰溜溜下山返回成都去。

成都崽兒也想槍，也想下重慶崽兒的槍，不過他們的那些動作就差遠了。1967年12月，我們第一次“逃難”到成都，下車後已經是半夜，走到人民南路皇城根時被一群成都崽兒攔住，他們有好幾支槍，頂著我和曾強忠的胸口，要我們把槍交出來。我說：“如果我們有槍，還跑到成都來做啥子？”他們搜了一下，沒搜到任何東西，只好放了我們。他們走開後，我說：“成都崽兒真笨。如果我們有槍，要藏也會藏在女生身上嘛，要打也會首先開槍嘛。”後來，重慶崽兒來多了，這樣明目張膽的攔路打劫也沒有了。

槍搶到了，要拿回重慶，很難。特別是長槍，一般都拿不回重慶。那時車站出口也有全副武裝的軍人守著，看到你扛著槍，肯定要收繳。所以，要儘量將長槍換成短槍。不少重慶崽兒弄到幾支長槍，便組織一個武鬥隊，拉到瀘州前綫去混幾天，打幾仗，想方設法與“土砸”換槍換子彈，哪怕三支五支長槍換一支短槍，也幹。實在換不了，便將那長槍的槍托鋸掉，甚至把槍管也鋸掉一截，包在鋪蓋捲裏，子彈也上膛。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端起來就可以射擊。

重慶反到底派從成都、從專縣弄了多少槍回來，沒有統計，但其數量肯定不少，各單位各學校的反到底派多多少少都有幾支槍，半數以上都是這樣弄來的。長槍以1956式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爲主，也有其他，我見過的就有加拿大式手提機關槍（最早的衝鋒槍）、俗稱“格蚤龍”的1950式衝鋒槍（就是抗美援朝志願軍使用的那種）之類。那種打一顆子彈就要扳一下槍機的老式步槍，例如中正式七九步槍、日本造三八式大蓋步槍之類則不要。短槍更是五花八門的，駁殼（又分爲一號、二號、三號）、五四式、

公安牌、科爾特、日本王八盒子、白朗寧，什麼都有。只是很多槍都沒有子彈，或者只有那麼一兩顆子彈，往往只能起個駭人的作用。

有了槍，便膽大。那一兩年，街頭上常常發生槍戰。但是，如果是一個人上街，身上又帶有槍的話，心裏反而不踏實。有一次，在解放碑，一個崽兒碰到一位老同學，便趕上去，從他後面拍了拍他肩膀，想打個招呼。哪知那傢伙身上帶得有槍，心中有鬼，以為是對方一派的人來抓他。他也不回頭，手倒拐猛地往後一拐，將那崽兒打翻在地。然後扯出槍來，往天上“砰砰——”就是兩槍。街頭立即大亂，他也趁機跑脫。那崽兒被老同學打翻在地，又聽見槍響，好半天都沒回過神來。後來，兩人再次見面，說起那件事，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類似的故事，在那一兩年裏，重慶一些鬧市幾乎到處都上演過。

33. 我的“逃難”生涯（上）

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及重慶軍政領導幹部，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塗。”這對八一五派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八一五派却不甘心，在駐軍默許下，開始新一輪“搶”槍運動，從駐軍手中接過大量槍支彈藥，武鬥驟然升級，戰爭一觸即發。那時，反到底派的武器早已上交，兵工廠的武器成品庫已經被駐軍控制，反到底派要搶槍相當困難，于是就弄得人心惶惶，只好紛紛“逃難”。我們戰鬥團的人幾乎是傾巢出動，從重慶趕到內江，然後又到自貢。

此前，我已經有過一次“逃難”經歷。1967年12月，我就曾帶著幾個初一年級的女生跑過成都，在成都呆了幾天。但那次與其說是“逃難”，不如說是去游玩。那幾個初一女生有的沒去過成都，有的在成都的親戚，一直吼著要去。當頭的怕她們人小出事，就要我和外號叫“暴徒”的初二同學曾強忠帶她們去。那時，重慶“逃難”的人還不多，一路上也沒有遇到什麼周折，基本上是順利而去，順利而歸。

這第二次“逃難”就艱難了，我是坐在窗臺上，雙腳懸在車窗外趕到內江的。我們本來準備去成都，就因為車太擠，大家才商量好到了內江再說。幾個擠在廁所裏的傢伙，下車就哇哇乾嘔，那樣子比我狼狽多了。

在自貢，我們住在貢井房管所。那地方偏僻，一天又無所事事。高一年級一個姓孫的傢伙花言巧語，想把住地附近的一個小女孩騙到山上去。那小女孩不去，回家告訴了母親。那母親就跑來找我們，於是孫的陰謀就暴露。這傢伙本來極少參加戰鬥團的

活動，頭一次出來就想犯罪（他自辯是想給那小女孩畫一張裸體像），把同學們氣慘了，狠狠揍了他一頓。頭頭們又開會，決定把他開除出戰鬥團。剛好有人不想再吃“支左飯”了，就讓他們兩個把孫某押回重慶。那時，孫某已經快20歲了，正處在青春危險期，性的衝動可能太大，把握不住自己。好在沒有造成後果，又被我們這樣一收拾，可能是吸取了教訓，孫某後來再也不敢胡思亂想。否則，像他那樣衝動，很難不再次栽岩。

我一個同班同學，雖然也是反到底派，但從來沒有參加過戰鬥團的活動，在家“逍遙”，到處“繞女”（討好女人或追求女性），“繞”了這個丟那個，或者同時“繞”上幾個，完全是花花公子那一套，不知做了多少壞事。我們住在體育館的時候，他來找過我幾次，把我帶到他“繞”的女生家中，得意洋洋地顯擺。每次我這樣見的女生都不是同一個，也不知他究竟“繞”過多少女生。後來，他頂替他父親進了建設廠，在“繞”來廠培訓的一個新疆維吾爾族女子時，把別人肚皮弄大了（懷孕），又把別人拋棄了。那維吾爾族女子回到新疆，就告發了，結果他被抓進監獄，判了十幾年，至今我們都不知他後來如何了。和他比起來，孫某還是算好的，更是“幸運”的，他還應當感謝我們呢。

貢井很偏僻，只相當於一個大的鄉場，不好耍。高中的同學比我們聰明，他們就策劃去爬峨眉山，表面上說是去樂山。聽說我們要走，負責接待“逃難”戰友的自貢人巴望（迫切盼望）不得，趕緊給我們安排了車輛。於是，我們坐著大卡車，又到了樂山。那時的樂山還只是一個小縣城，整個城裏幾乎都是一樓一底木結構的老房子，唯一“現代化”建築就是地區醫專的教學樓，是磚混結構，也只有四層。我們去拜訪一個已經回到樂山老家的老師，那還是清代建成的民居木樓，那木樓裏的小天井，陰暗、冷清、幽雅而又有些神秘，讓人覺得時光倒轉，似乎回到了中世紀。

樂山住了幾天，其他同學就去爬峨眉山。沒有車，他們就半路爬車。可能是心情不好吧，也可能是太累了吧，他們爬上峨眉山，全都失望。戰鬥團一號頭頭是我們南山中學的第一號才子，就用粉筆在金頂那廟宇的牆上寫了幾句打油詩：“郭老頭，吹個

牛，天下名山好個述。我發誓，我賭咒，再也不到此山游。”哪知，這打油詩竟然一傳十，十傳百，傳得很廣，至今都還有人寫入文章什麼的。當年重慶至少有十多萬人跑到成都去過，想去峨眉山的以 10% 計算，也有一萬多人。這打油詩肯定抑制了好些人爬峨眉山的願望，從某個角度來說，對保護峨眉山的資源多多少少也起到了一點作用吧？

只有我一個人沒去峨眉山，我和其他學校的幾個同學乘船去宜賓。那是春天，岷江清可見底，又天高雲淡，景色特佳。多年後，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回憶那次岷江之行：

戊申年春，吾自嘉州之叙府，行于岷江上。江水碧藍，清澈見底。青山逶迤，江天開闊。陽光暖暖，春風拂拂。立于船首，歌清新之賦，誦豪放之章。樂于心，喜于色。掃昨日之憂，忘明日之慮。自作辭曰：離文峰兮別山城，行千里兮苦征程，岷江水兮入胸懷，浪花捲兮滿激情。

同舟三女子，皆眉清眼秀，乃鄰校同學也。異鄉偶逢，相拜而坐，一時投機，話古今，論中外，海闊天空，樂不止也。

唐王勃詩云：“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吾所行處，正係風烟五津之地也。沿路鄉鎮皆柳掩楊蔽，房屋錯疊，幽雅異然。

夕陽西下，白塔在望，即到叙府矣。

宜賓是重慶反到底派的“根據地”，吃得好，耍得好，讓人“樂不思渝”。一天，我到一個餐館去吃飯，忽然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頭一看，是一個女生，面對著我，笑得很甜：“認不到了啊？認不到了啊？”我在腦海裏竭力搜索，也沒想起她是誰。她也不管，把我拉到她那一桌坐下，把我介紹給她那一桌的人：“這是我們黃山紅二連的副連長。”我這時才想起，她可能是黃山紅二連衛生班的。不過，衛生班是擴編後才有的，而擴編後沒多久就停火交槍解散了，加上衛生班的女生都來自望江廠，我的確對她們不瞭解，也記不住她們的名字什麼的。這次見面，我才知道她叫駱勛。

吃飯的時候，駱勛也不管別人怎麼看，不停地給我拈菜，向我問這問那。吃了飯，她又邀請我去她們住的地方看看。正好順路，我就去了。路上，她給我講，她差點就沒命了。原來，重慶文革戰爭停火後，她跟著望江廠的一撥人在專縣“打天下”。一次，在永川附近一個地方，他們乘坐的汽車中了八一五派的埋伏。八一五派在山坡上，一挺機槍噠噠噠亂叫，首先將伏在駕駛樓頂的那機槍手打了下來。她本來靠在車廂邊站著，只覺得腦殼像被人敲了一棒似的，立即倒在車上，鮮血頓時蒙住了雙眼。幸好那司機亡命，加大油門猛衝，竟衝出埋伏圈。除機槍手和她受傷外，全體平安。送到醫院，那醫生給她包紉傷口，竟也楞住：那子彈從她腦頂上擦過，僅僅只傷了一點頭皮。

重慶文革戰爭中，甚至整個武鬥期間，死了那麼多人，有的人死得很冤枉，也有很多幸運的人。我們南山中學一個同學，1967年8月25日攻打四公里時，一顆子彈從山下飛來，打中他的大腿，把他打得坐在地上。由於那子彈飛得太遠，已經失去了追力，竟然未能鑽進他的大腿裏去，只把那大腿打了一個大青包。你說他幸不幸運？還有一個崽兒，背了一百多發半自動步槍的子彈，都上在彈夾上的，彈頭全部朝下。不知從哪兒飛來的子彈，剛好打在他的子彈袋上，那飛來的子彈被綁在腰上的子彈反彈了回去，沒有鑽進他的肚皮。可是，那腰上的子彈却被打炸了，一顆接一顆炸響，砰砰啪啪——像一串鞭炮，響個不停。只一瞬間，一百多顆子彈頭全部射進地裏。他被嚇得一動不動的，竟然毫毛無損。那時如果他稍微動了一下，即使能夠活命，怕也要在他身上留下好幾個彈孔。

但要說離死神最近的，只有駱勛了。那子彈稍微下來一點點，哪怕半個毫米，她就是不死，也會成為植物人。她真是重慶武鬥中最幸運的人！

回到她住的地方，她把頭髮打散。原來，她有一頭濃密而又烏黑的頭髮，長長的，拖到臀部以下。她將頭頂的頭髮撥開，低著頭，把那傷口亮給我看。只見那腦頂上有一條兩三寸長的疤，令人赫然無語。那年，我18歲，正是青春躁動的時候。她比我

小兩歲，這樣熱情，這樣純真，不能不讓我的心砰然亂跳。我真想伸出手去，撫摸撫摸那傷口，撫摸撫摸那頭髮，但我却忍住了。我覺得我的手在發抖，那可能是我此生第一次有那種意義的衝動。

後來那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都和她在一起。她家住在大興場，和望江廠的幾個同學住在一起。沒事的時候，她們就在公園裏打牌。那時流行“鬥走資派”，與如今的“鬥地方”差不多。我從小就不喜歡打牌下棋之類，她却硬要我參加。她坐在旁邊為我當參謀，那呼吸就在我耳邊，讓我注意力集中不起來。或者她坐我上手，總把好牌讓給我。那真是我人生很美好的一段時光。

後來，我加入徐開華組織的“紅旗三〇三”。她和徐開華是鄰居，也參加了。可能我們的交往讓大家都看出來了，于是有人見了我就亂喊“馬各”。在井研縣搶槍的時候，有人甚至叫喊：“馬各部隊，出發了！”弄得我好尷尬，却又不好去捅穿。後來，參加“紅旗三〇三”的學生都散了，我和另外幾個同學留下，我留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她了。在瀘州通灘，我們被當地“土砸”夜襲，武器被收繳後，我們呆在一起。那是一個很黑很黑的夜晚，我和她站在窗前，說著話，她的頭髮在我鬚角擦來擦去，讓我心裏癢癢的。但那個年代，不知是禁慾主義的壓抑還是我沒有“醒”，還不懂男女戀情方面的事，雖然我好想把手伸過去，但我却一動不動，只是激動著。後來，沒有話可以說了，我們就這樣站著，一直到鶲鳴聲起。

那時，我還沒有過任何戀愛方面的經歷，只是經常遠遠看著她，只知道激動，却不知道怎樣向她表白。當然，這樣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回到重慶後，和她在一起的另外一個年齡較大的女生告訴我，她已經娶得有朋友了，“你和她絕對沒有可能”。她們在我家住了一晚上，就回望江廠去了，我把她們送到朝天門輪渡躉船上，從此再也沒有見面。這讓我好長一段時間都黯然傷神。于是，我寫了一首《葛算子》：

窗外月寒江，
無伴淚人立。

滾滾東流可托心？
難却回音寄。

時常憶黃山，
更感通灘誼。
頭上槍傷痛不知，
笑臉猶能記。

1972年春天，那時我已經在望江廠當了半年多的工人。有一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隊打飯，突然一個女子從前面打飯出來，喊了我一聲。和當年一樣，聲音很脆，笑得很甜，很純真的樣子：“你啷個也到我們望江廠來了喲？”我立即認出她來，就回答說：“怎麼是你們的望江廠呢？”她告訴我，她才從農村調回來，分配到熱處理車間，是派到總裝車間來支援的。食堂的人太多，又有同事喊她，我又激動得說不出多的話來，她只好走了。熱處理車間離我們車間好遠，我也曾偷偷去找過，但沒有找到過她，或者說是我不敢找到她。我還到大興場他家附近去找過她，但我不知道她家究竟住哪兒，也不敢向別人打聽。我所在車間有師傅也住在大興場，擺龍門陣時，我有意無意提到她，別人告訴我，他早就和某某人“好”（要朋友）了，更讓我絕望。後來，我只好把這段感情埋葬在一首《漁家傲》裏：

男兒不流相思淚，
只將熱烈存胸內。
自到望江情更倍。
相見未，
四年話語盈心肺。

昨夜獨依江月醉。
低頭却憶當年會。
往事幾多影已碎。

問流水，
痴情未必成空費？

真沒想到，我這“逃難”還“逃”出了一段浪漫。其實，在那個年月，像我這樣浪漫的——不——比我這段浪漫還要浪漫的，肯定還多了。

34. “紅旗三〇三”

當年，在望江“金猴”中，徐開華可能還排不上號。但徐開華這人聰明、能幹。文革前，他年齡雖然還不大，也就三十左右吧，但卻是五級車工了。和他年齡差不多的，大多還是二級呢。組建“紅旗三〇三”後，從井研縣武裝部搶到幾支舊槍破槍，徐開華拿到南溪縣的長慶廠，自己改造一番，竟然也能使用。後來，我進了望江廠，在裝配車間當工人。裝配車間月底往往加班，就把其他車間的人派來支援，徐開華就多次來到我所在的班組。好幾道工序的裝配過程，他只花十來分鐘時間就能完全掌握，動作之快，質量之好，完成任務之多，我們班組裏好幾個老工人都趕不上。徐開華又多才多藝，會打金錢板，會唱歌，還會譜曲，是望江廠的文藝骨幹。廠工會開文藝方面的會，都要喊他參加。長慶廠有兩個女工，硬要加入我們“紅旗三〇三”。徐開華為其中一個姓曹的女工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我現在還記得那頭兩句是：“古有曹氏是奸雄，當今小曹絕非同。”雖然只能算是順口溜，但能够隨口而出，在那個年代的工人中還是極為少見的。四人幫倒臺後，搞“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他被弄進監獄去關了好幾年。從監獄出來後，聽說他自己開了一家工廠，發了財，也不知後來如何了。

重慶文革戰爭停火後不久，徐開華就帶領七八個望江“金猴”的人到了專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了鄧長春的派遣，是專門到專縣去“搞”槍的。1968年4月底，他把住在宜賓、自貢、內江的南岸學生召集起來，組建了“紅旗三〇三”。又不知從何處找來幾部卡車，把我們兩三百人拉到榮縣。在榮縣，我們首先洗劫了武裝部，却什麼也沒搞到。然後，我們又去井研，也沒有搞到

多少著。徐開華又把隊伍拉回宜賓，準備帶大家到高縣珙縣一帶去搶槍，哪知“紅旗三〇三”人太多，七爺子八條心，各個學校的人各懷自己的鬼胎，搞到槍的想走，沒搞到槍的覺得不划算，沒有幾個人願意繼續跟他一起去，徐開華只好讓大家解散。加上重慶局勢有所緩和，革委會就要成立，不少人就回重慶去了。

我們南山中學的人幾乎都沒有搞到槍，很讓人沮喪。頭頭張正華不甘心，就聯絡我們幾個人，繼續跟徐開華走。于是，徐開華把我們帶到長慶廠，把那幾支大家丟棄的舊槍破槍修復，又從長慶廠弄到幾支 815 式衝鋒槍，我們這支二十來人的隊伍就趕往瀘州前線。按徐開華的安排，我們要趁機再弄一些槍，然後把長槍換成短槍，好帶回重慶。

所謂 815 式衝鋒槍，是仿照加拿大式手提機關槍的樣子製造的，只是把口徑改為 7.62 毫米，加大加長了槍膛，可以打 1956 式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那種子彈。由於最早是由重大八一五派開始試製的，於是被統稱為 815 式衝鋒槍（在專縣，也有人稱為紅旗牌衝鋒槍）。這種衝鋒槍結構簡單，只要有相應的機械加工能力，畫幾張草圖就可以製造出來。但是，正是因為結構簡單，性能也就相當差勁，打起來後坐力太大，精度太差，一不小心，一個彈夾裏的 30 發子彈就全部飛出去了。長慶廠是生產高射機槍的，有的是技術力量，據說可以批量生產這種衝鋒槍。只是子彈來源少，有槍沒子彈也是白搭。

徐開華是瀘州人，與很多專縣“紅十條派”的人都很熟。我們二十多個人，大多是望江廠的工人。那天，我們從長慶廠趕到瀘州通灘，已經是晚上了。通灘是沱江邊一個小鎮，從沱江邊沿著一條雲梯式的石板路，直到山上。路兩側都是一樓一底的瓦房，很有特色。下車時，來接我們的人說，江對岸的山頭上就是八一五派的據點，經常向這邊打黑槍，有時還向這邊發射“蛤蟆炮”。因此，小鎮上實行燈火管制，不能打電筒，怕對岸見了亮光就開槍。那天晚上又特別黑，天上沒有一點星光，眼裏只有對岸黑蔚蔚的山頭，讓人感到緊張，甚至讓人覺得恐怖。

所謂“蛤蟆炮”，是瀘州八一五派製造的一種迫擊炮。我沒

有見過，據說威力很大，可以打過沱江，炮彈落在地上後，會跳起來爆炸，就像蛤蟆那樣跳。四川人稱蛤蟆為癩格寶、癩克貓，因此又把這種“蛤蟆炮”叫作“克貓炮”。那時，甚至有傳說，說是這“蛤蟆炮”引起了軍隊的關注，要正式生產，裝備部隊。其實，那東西並沒多大用處。後來，我看到過沱江對岸的人向我們打過這種炮，至少有一半的炮彈都沒有打過河來，全落到江中了。

那天晚上，駐在通灘的那些“土砸”可能事先就已經預謀好了。他們把我們二十多個人分成兩堆，安排兩處住下，一處在鄉場上，另一處在鄉場外面的學校裏。我和徐開華等人擠在學校的一個房間裏，睡在樓板上。可能因為坐了大半天的車，而且是沒有座位的卡車，大家都很疲倦，一下全睡著了。突然，一陣喧嘩把我吵醒，睜開眼睛，只見一群“土砸”按了進來，把我們一個個全都按住，吼著：“把槍交出來！”原來，他們想下我們的槍。

我手上沒有槍，也就無所謂。睡在我身旁的是望江廠的一個青工，使勁一扳，就掙脫了那按住他的“土砸”，順手就從枕頭下扯出一枚三七高炮彈頭做的手榴彈來。那“土砸”見了，立即又按上來，抓住他的雙手。可是，那手榴彈的保險環已經被他打開，只要他把手指頭一鬆，那彈簧就會彈出來，手榴彈就會立即炸響。

我知道，那彈頭手榴彈的起爆時間只有一兩秒鐘，而且威力大，殺傷力強。駭得我急忙往旁邊滾，可是我旁邊就是牆壁了，滾也滾不動。那天天氣熱，又沒有被蓋，當枕頭用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的枕頭好像就只有一個書包。我想，我是必死無疑了。

徐開華睡在另一邊，可能他太瞭解瀘州這邊的情況了，也可能他有預感，他已經坐了起來，很平靜地對那崽兒說：“算了，給他們！”那崽兒才停止了掙扎，手榴彈才重新被套上保險環。後來我才知道，那崽兒是望江廠有名的亡命徒，如果不是徐開華那句話，他還真的要拉響那手榴彈。雖然如此，那些“土砸”反而比我們還駭得慘，再也不敢對我們一凶二惡，反而撒烟來討好我們。

這是我在武鬥中經歷的第四次危險，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次危險。當時雖然緊張，却沒有顫抖，更沒有失態。後來每每想起，才有些後怕。畢竟離那手榴彈太近，畢竟不比得是正規手榴彈，畢竟沒有任何防護，即使不被炸死，至少也要殘疾終生。

我前後經歷的六次危險，其實都只有“險”而沒有“危”，只在手上留下幾條小小的幾乎不能覺察的傷痕。其實，像我這樣的遭遇，搞過武鬥的人，誰又不能說上幾件呢？畢竟真刀真槍，畢竟你死我活，遇到一些危險，也不足為奇。只是現在想來，那是為哪一樁呢？與死了的人相比，與受了傷的人相比，我只有時時暗下慶幸罷了。

雖然遇到危險，那天晚上却讓我永遠難以忘懷。直到現在，一回憶起來，多少也還有一點幸福感。我們隊伍中還有駱勛和另外一個女生，住在我們房間隔壁的另一個房間。我們被“土砸”襲擊，把她們也弄醒了。徐開華帶著兩個人，去找“土砸”的頭頭交涉，我們就等著。我却沒有了睡意，和駱勛站在窗前，吹起龍門陣來。黑黑的夜空，靜靜的鄉場，山下沱江輕輕地流淌，遠處傳來陣陣成熟的麥子清香。雖然經歷了一場危險，才來時那恐怖的印象却沒有了，反而有了一些詩情畫意。後來，我們都不說話了，就那樣靜靜地依在窗前，彷彿能聽見對方的心跳。夜風吹來，她那頭髮就拂到了我的臉上，感覺癢癢的，心就跳得更加厲害。我好像想過，我應當伸出手去挽她的腰或抱她的肩，但那念頭只像電光閃過一樣，瞬間就被我的“革命思想”打得落花流水，再也沒有出現。雖然我們都很疲倦，却沒有打呵欠，也沒有睡意，一直那樣默默地站著，直到天濛濛亮。

第二天早上，我們才知道，住在場上的戰友也被“土砸”襲擊了，槍也被收繳。那個年代，農村的電話都是手搖的。徐開華不停地打電話，可能打了大半天，甚至找了宜賓地區革委會主任王茂聚，才逼迫襲擊我們的“土砸”把搶去的槍支彈藥還給我們。“土砸”把槍支彈藥送還時，為了表示道歉，還增加了一支短槍和一些子彈。但是，受了這個氣，徐開華不願意再在通灘呆了，當天天黑的時候，我們就撤到離前綫有二三十里路的況場。

況場是瀘州宜賓之間的一個重要交通路口，另有一條支路到通灘，場上有一個酒廠，我們就在酒廠的食堂吃飯。那天中午，我們看到許多人去接那新烤出來的酒喝，我們也用碗去接。那新烤出的酒幾乎沒有酒味，甜咪咪的，我們都喝了兩大碗，可能有一斤多吧。吃完飯，我們回到駐地睡覺，那是一家居民的閣樓，陽光透過那亮瓦灑下一片溫馨，真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們沒想到，這一睡就睡得很香很沉，什麼也不知道了。第二天，有人喊我們起來吃中飯了，我們才醒來。我在想，才吃了中飯，怎麼又要吃中飯喲。一問，才知道已經是第二天了。于是，我們再也不敢暢飲那酒了。

每天吃了晚飯，我們就去附近的堰塘洗澡，然後就“壓馬路”，沿著瀘宜公路散步。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一個車隊開往瀘州，車上裝的都是大米之類，那是給瀘州的武鬥人員提供給養的。後來，我們聽說況場附近發生了一起八一五派特工隊襲擊事件，于是就再也不敢走出場鎮了。

況場生活得雖然平靜，却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徐開華去瀘州聯繫了多次，有一次我也跟著去了，才聯繫好一個地方。我們在況場呆了幾天後，就移到離況場十多里路的和豐鄉的一個江邊的武鬥據點。那是沱江江邊一個小島，小島是一個小山，山上有一個農家院子，農家院子背後挖得有戰壕，從戰壕往江對岸看，可以看到八一五派的陣地，甚至可以看到提著槍來往的武鬥人員。小島與西岸之間的內河不寬，但水深，適合魚兒產籽生長，當地人稱“鰱魚洞”。小島上的武鬥人員就拿迫擊炮彈、手榴彈或者炸藥，去炸魚。那水裏魚多，被炸昏了，便浮到水面，只需人去撿起來就是了。在島上的時候，我們幾乎頓頓都吃魚。但沒有油，那幾斤十多斤的魚就砍成幾大塊，在農家那種煮豬食的大鍋裏加點鹽煮熟，每個班滿滿一大土陶缸鉢，還是蠻好吃的。

在那小島上只呆了兩三天，就和“土砸”達成了協議。我們把長槍全部留給他們，他們給了幾支短槍和幾個手榴彈給我們。我們幾個當學生的，分得兩支二號駁殼槍和兩個手榴彈，也算是大有收穫。可能是捨不得，徐開華還是留下了一支 1956 式衝鋒槍，

用鋪蓋捲裹著。于是，我們就匆匆離開瀘州前線，趕回長慶廠歇了兩天，然後取道內江，坐火車回到重慶。雖然我們設想了路上可能遇到的種種情況，做好了打一仗的準備，但却意外地一路風順，什麼也沒有發生，連出重慶車站時也沒遇到軍人檢查什麼的，讓我們感到奇怪又覺得幸運。

哪知回到重慶，就有人找上門來。“紅旗三〇三”剛到榮縣時，就遇到一夥重慶來的爛污崽兒組成的團夥，佔吃霸賒，欺壓百姓，亂攬女人，搶劫農民。當地人來告狀，徐開華就組織我們把這些人全部抓了起來，痛打了一頓。哪知人多手亂，那個叫陳世倫的就被打死了。陳世倫有個兄弟叫陳世喜，外號叫“喜兒”，是工業校的“武鬥之花”。聽說徐開華回來了，這“喜兒”就帶著一幫兄弟夥，找到駐在市計委的軍工井岡山總部來，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要徐開華說清楚。徐開華手下那些望江“金猴”，個個都是亡命徒，也不把那幾個工業校的崽兒放在眼中。有的雙手抱懷，手却握著槍。還有一個人抱著那鋪蓋捲，手指按著那衝鋒槍的板機上。那天我剛好也去那兒，看到兩邊的人劍拔弩張，心裏真還有點惶惶然。後來，有人把鄧長春找來，才把兩邊的人壓住，避免了一場內部大血拼。

却說這外號叫“喜兒”的陳世喜，可能是重慶文革戰爭中最不幸的人了。此事只過了一個多月，1968年8月的一天中午，他却把自己打死了。那是重慶反到底派第三次“逃難”，工業校的一群崽兒跑到成都，也不知他們在成都參與了什麼事情，和成都的或重慶的另一撥崽兒發生糾紛，還打了架。“喜兒”他們住在省機械廳內，那天中午，他跑了一個上午，回來吃飯，端著飯碗走出食堂。大家都蹲在臺階上吃飯，他平時也愛那樣蹲著吃飯，于是他也想蹲下來。不知是挨了另一夥崽兒的打，腦殼被打昏了，還是因為天氣太熱人太累，把他搞得昏昏濁濁了，他身子剛剛往下彎，那反插在懷中皮帶上的五四式手槍就突然落下來，掉在那石梯坎上。老天爺可能也沒想到，那下落的重力，竟然把槍打響。“砰——！”未待他完全蹲下，一顆子彈就從他胯下射進去，從他後背射出來，血沒有流一滴，當場便被倒在地上，眼一瞪，死了。

“喜兒”經歷過“七二五”那場血戰，更經歷過不知多少槍林彈雨，逃脫了死神不知多少次的追捕，沒想到最後却是自己打死自己，而且又絕對不是自殺。重慶文革戰爭中死了那麼多人，他應當是死得最不幸、最冤枉、最讓人感嘆的一個了！

那時，重慶崽兒帶槍在身上，子彈大多上了膛，一扯出來就可以射擊，以防止遭對方暗算，或者遭同夥下槍。

在軍工井岡山總部那天，看到鄧長春臉面上，或者是怕打起來吃虧，陳世喜沒有和徐開華“拉爆”。臨走時，他指著徐開華，咬牙切齒地說：“此事還沒完，你給我小心點，老子還要來找你！”他一死，那威脅的話也就徹底失去效力，陳世倫被打死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四人幫垮臺後，徐開華被判了幾年，也不知這是不是他的罪狀之一。

35. 戰火硝烟又起

我們回到重慶時，四川省的和重慶市的革委會都已經成立，各區縣的革委會也在積極籌備，兩派頭頭都撈到了好處，都有了官帽，理應停止武鬥。但是，看到兩派平起平坐，八一五派却不甘心，繼續採取擠、趕、打的策略，要把反到底派趕盡殺絕。與過去不同的時，這一次，八一五派開始採取“清鄉”的手段，一個單位一個單位、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清查反到底派成員，即使是那些具有反到底派觀點却“逍遙”在家的也不能逃過，抓住重則飽打一頓，輕則警告立即滾出去。

1968年6月至7月，八一五派連續組織了多次進攻，幾乎把過去反到底派占優勢的單位全部爭奪到手。一旦把反到底派的組織趕了出去，八一五派立即實行戒嚴，組織“清鄉”，製造“紅色恐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反到底派幾乎失去了全部據點，只剩下體育館及其周圍那一塊地盤。如果不是毛澤東親自出面召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在講話中嚴厲要求制止武鬥，八一五派肯定還要進攻體育館，把反到底派全部趕出重慶，以實現他們“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的夢想。

長安廠本來也是反到底派占優勢，不知怎麼搞的，也被八一五派打垮。我的一個遠房親戚是長安廠的車間主任，也只好把全家弄到我家來躲藏。我家鄰居我喊大姐的，只是東風造船廠的一般工人，雖然是反到底派觀點，却從來沒有參與過武鬥什麼的，也在廠裏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城裏來。後來，還跟著我一起去成都“逃難”。

八一五派的進攻，當然要引起反到底派的抵抗，於是戰火硝烟又起。其中有兩次雙方打得相當厲害：一次是1968年6月30

日至 7 月 3 日建設廠兩派的那一次爭奪戰，以反到底派死傷慘重並被趕出廠區而告終；一次是 1968 年 7 月初至 7 月 12 日江陵廠兩派用槍大幹了一場，結果也是以反到底派死傷慘重，被趕出工廠而告終。這兩場爭奪戰其實是八一五派策劃的一場大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8 年 7 月 3 日上午，我從朝天門家中趕到體育館。一到團部，就聽說住在體育館的人頭天晚上都到建設廠“提”槍去了，又要大打一場了。然後又聽說建設廠“紅大刀”沒有打贏，被八一五派趕出廠區，去“提”槍的人也被包圍在廠裏，有的人可能還沒能突圍出來。我們學校也去了不少人，據說都回來了，也有人說還有一兩個沒有回來。于是，頭頭就叫我和另外兩個人沿著鐵路去看看。我正為沒能參加到這場戰鬥而沮喪，馬上就去了。

走到王家坡路口，就看見至少有一個連隊的軍人守在那兒。那些軍人全部穿著新軍裝，衣服上的折痕都還很明顯，而且全都荷槍實彈，那大樹下還架著兩挺 1956 式班用機槍。大樹後面還有幾個女兵，挎著醫藥箱。王家坡那個路口，是反到底派武鬥人員從建設廠撤到體育館必經的路口，駐軍派一個連隊來守住這個路口，名義上是收繳武器，實際上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過，那時重慶人已經看慣了這樣的場面，路邊圍了不少人，指指點點，還有不少人笑話那些當兵的。我們路過時，也嘲笑他們：“穿上新衣服，像打仗的嗎？”聽到嘲笑，那些當兵的也不惱，他們可能也習慣了反到底派的嘲笑。

我們剛轉過一個彎，就碰上從建設廠撤出來的“紅大刀”，可能有百來人的隊伍，全都顯得十分疲憊。前面的端著清一色的 1956 式衝鋒槍，其他人則拿著半自動步槍，有的人還受了傷，被人攬扶著。原來，“紅大刀”和建設廠技校的“三二八”堅持到最後，還是被趕出總裝車間。建設廠被圍得死死的，他們只有退到長江邊，搶了一條柏木船，順江而下，通過了八一五派設在三孔橋的封鎖線，然後在黃沙溪上岸。我們急忙讓開路，向他們喊道：“前面有五十四軍的，不要怕，衝過去！”於是，前面那幾個便舉起衝鋒槍，向天上鳴槍。那是一片竹林，直打得竹葉紛紛揚揚如

雪花飛舞。可能是上級早有命令，不能開槍，不准開槍，那些軍人見了，也沒有衝上來攔截，更沒有開槍，眼睜睜看著“紅大刀”這夥人衝過去，然後灰溜溜撤了。

重慶文革戰爭中，雖然駐軍偏袒八一五派，并因此與反到底派發生過多次衝突，甚至出現過交火，甚至相互打死過人，但駐軍至少還要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不能（或者說也不敢）直接介入到武鬥中，更不敢首先開槍。這和其他地方駐軍直接參戰不同，也和省內那些專縣的情況有所不同。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敢向“紅大刀”那夥人喊“衝過去”，而“紅大刀”那夥人也才敢開著槍往前衝。如果那些軍人要開槍，要真正打起來，“紅大刀”那一夥人不知要死多少，說不定我們幾個也跑不脫呢。

路上，我們遇到一個同學。他說，我們學校的人早就撤出來了，不必去了。或者是頭頭的命令，或者是想看熱鬧，我們把他也拉在一路，趕到三孔橋。三孔橋是成渝鐵路上的一座鐵路橋，橋下是一條大水溝。長江剛漲過水，水退去後，水溝兩邊有很深很深的淤泥。我們去的時候，戰鬥早已結束，槍聲也沒有了。那同學昨晚參加了戰鬥，早上才從建設廠突圍出來，他告訴我們當時的情況，讓我們噓唏不已。

從建設廠撤出來，必須通過三孔橋，或者就是越過那水溝。八一五派在三孔橋上面的山坡上設有機槍陣地，那機槍不停地掃射，嚴密封鎖那橋上橋下。當晚去建設廠的，大多是臨時召集的，沒有人指揮，沒有人負責，又被打敗了，成了烏合之衆。很多人見機槍打得厲害，就試圖從水溝裏通過。哪知天黑，看不清那淤泥，一下去就陷住了，結果也就很慘。我們看到，那淤泥中東一處西一處有好幾具尸體，也不知是哪個單位的，好是悲傷。于是，只要會一點水性的人，都跳下長江，順水漂流到黃沙溪上岸。我們學校的人來到三孔橋時，正好有一列火車從菜園壩方向開過來，領頭的人一聲喊，大家就迎著火車跑。哪知，那火車只拖了兩三節車廂，剛跑到橋當中，火車就駛過去了。一夥人都駭慘了，急忙趴下。那路基僅有一尺來高，擋不住山上八一五派打來的機槍子彈。只見那子彈打在那鋼軌上，火星直冒，當當亂響，飛蝗一

般亂飛。誰也不敢抬頭，誰也不敢妄動，只能慢慢往前爬，一寸一寸地移動。看看要到橋頭了，趁機槍換彈匣的一瞬間，大家一爬起來就衝過橋頭，逃了出來。

幸好那三孔橋不長，否則我們戰鬥團又要增加幾名“烈士”了。

第二年，也就是 1969 年的 7 月 3 日，我在忠縣望水公社同興七隊當知青。那天晚上，月亮特別好，回想這場戰鬥，我還寫了一首七絕：

一束月光上牆來，
塘邊信步望雲堆。
低頭却憶昔年事，
三孔橋邊正突圍。

說起江陵廠那場戰鬥，還有一件老重慶人可能都能記得的故事：

一個反到底派女生（後來知道她是南岸十七中初三年級的，我忘了她的姓名）背了一個傷員，隨著大隊人馬突圍出來，結果又走散了。那傷員傷勢很重，流血不止，一再要求不管他，把他放下，請她自己先走。這女生却不答應，還說：“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那傷員是個工人，他們過去並不認識，更沒有人們現在想像的那種曖昧關係。她背著他，艱難地往前走，穿過一片水田，躲進一間農民的草屋。她將那傷員放下，那傷員流血過多，終於死去。臨死前，他將自己的那支駁殼槍交給她。她本來有一支白朗寧手槍，于是便有了兩支槍了。看著人死，是很悲傷的事，可能因此耽擱了時間。當她要衝出門去的時候，八一五派的追兵已經追了上來，把茅屋包圍了。她整整那勞保服，一手提一支手槍，衝出門去，倒把那些端著步槍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駭了一跳。如果她先開槍，肯定能撂到幾個，說不定還能跑出來。可能畢竟是女生（據她一個同年級同學後來告訴我，她讀書時還是個好學生，連油蚱蜢也怕），畢竟面對面，畢竟心怯，她沒有開槍。圍在四周的八一五派終於明白過來，不知誰先開槍，把她當場打死。她

倒在那菜地邊，仰望著藍天白雲，似乎很不甘心，死不瞑目。

如果是戰爭年代，她很可能成為英雄，至少比如今宣傳的那些英雄更英勇、更光彩。可惜，那是武鬥，那是一場荒唐的內戰，沒有人能够記住她的名字，她的故事只能在那歷史的硝烟中消失殆盡！

她死了，反到底派反而沒有放過她。滿城大字報，滿城傳單，廣播也吼，說她被八一五派武鬥隊員十幾人輪奸後才槍斃的，槍斃前又將她乳房割了，槍斃後又把黃瓜插進她的陰道裏，一絲不挂擺在山坡上曝尸云云。八一五派也抓住這女生大做文章，說她是隨軍妓女，被好多好多反到底派搞過，下身都被搞爛了；還說她是殺人的魔王，雙手打槍百發百中，不知打死過好多人等等。可憐僅僅只有 18 歲的一個清白女子，死得那樣慘，死後還要被這樣糟蹋，真讓人說起來也唏噓不已！

1968 年中央把重慶軍工企業的兩派頭頭弄到北京開“八一五會議”（因是 8 月 15 日開始召開的而得名）。會議期間，對此事進行了清查，查來查去，據說那女生依然還活著。但是，十七中一個女生在那場戰鬥中被打死却是事實。十七中那個女生與這個故事中的女生是不是一個人，現在已經無法弄清楚了。

戰火硝煙彌漫，反到底派只好再次“逃難”。我們學校的頭頭們決定，只要願意走的，全部都走。考慮到八一五派很可能要來進攻體育館，于是決定將不能帶走的武器全部“堅壁清野”，埋在游泳池後面的山林裏。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兩支半自動步槍（是 7 月 3 日剛從建設廠拿回來的），還有幾支手槍和兩個手榴彈。頭頭又決定，把半自動步槍的槍機、彈倉、彈簧等拆下來，另外收藏。我記不清是我自告奮勇還是頭頭的安排，我就把兩個手榴彈和那些步槍部件拿回家。

那時，城裏已經到處都在交火，汽車電車都停駛了，只有走路回朝天門。又沒有挎包，我把步槍部件之類放在衣袋裏，一看就是很重的東西。我又把兩個手榴彈放在褲兜裏，一邊一個，因為重，把褲子都要拉垮下去了似的。我把手榴彈的保險蓋打開，把拉環扣在手指上，雙手把那手榴彈提著，隨時準備投出去。爲

了給自己壯膽，我又在腰帶上插了一支駁殼槍，把子彈頂上膛。正是午後，太陽又大，商店幾乎全部關門，路上行人極少。我那樣兒，任何人看了，肯定都會產生懷疑。我那插在腰帶上的二號駁殼槍，雖然有一件外衣遮住，但仔細一看，也能看出那家什來。可能是大家都害怕，不敢多看，更不敢亂問，我才能够混在那很少的行人中，躲躲閃閃走路。

從兩路口到朝天門，第一關就是兒科醫院。那是八一五派的一個武鬥據點，那門診大樓上設有機槍陣地，時不時向體育館方向射擊。可能是午後太陽太烈，可能是八一五派沒有想到，竟然有我這樣的亡命徒，敢于提著兩個手榴彈，插著一支駁殼槍，在他們控制的地區裏趕路，竟然沒有在路邊設卡，竟然沒有人盤查。我從兒科醫院對面的岩坎下匆匆通過，不時偷偷朝兒科醫院看上一眼。那時，我已經下了決心，如果八一五派的人追來，我首先把手榴彈投出去，然後就扯出駁殼槍來抵抗。

這是我在武鬥中經歷的第五次危險。

現在想來，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是否冒了冷汗，我的衣服是否全部汗濕，但我敢保證，雖然我的心可能也亂跳了一陣，雙腳却沒有一點點發軟。

幸好沒事。但我知道，我這樣子肯定難以通過臨江門，更不敢去解放碑。走到七星崗，我急忙拐進一條小巷，去找同班同學羅朝忠，他住在上安樂洞一個吊腳樓下。我把那些步槍部件和一個手榴彈留在他家，讓他藏好。這樣，我身上輕鬆了，就大搖大擺地走回朝天門，把另一個手榴彈和駁殼槍藏在家裏的柴堆堆中。

第二天，我們就坐上火車，開始了第三次“逃難”。

36. 我的“逃難”生涯（中）

1968年7月，我們“逃難”到成都。這一次“逃難”，我不僅帶上鄰居大姐一家人，還帶上我一個遠房親戚，他和我一樣，讀初中三年級，只是比我大一歲。我兄弟那時才14歲，想到成都去耍，我向父母保證了又保證，也把他帶上了。在那個年月，人們對危險的概念已經模糊。父母覺得，有大姐一家，又有遠房親戚一起，人多就沒有什麼危險了。殊不知，火車開到隆昌附近的石燕橋，就遭遇八一五派的攔截。就在前幾天，八一五派就在這個小站攔截了五個車皮的援越軍列，將車上的武器全部搶光。周恩來為此還作出指示，把搶劫援越軍列定性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要求把搶去的武器全部追回。可是，在當年那種混亂情況下，這樣的指示也只是放個屁而已。

我們到達石燕橋那天晚上，天黑地暗，八一五派在山頭上架著好幾挺機槍，“噠噠噠——”“噠噠噠——”不停地往天上亂打。火車本來是不停那個小站的，只好被迫停下。車上的人看見，燈光下，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已經把火車團團包圍。廣播裏不停吼著：“車上的人全部下車，要進行檢查。不聽指揮者，敢于反抗者，後果自負！”八一五派用槍逼著，首先把車門邊的人拉下去，強行搜身，誰敢反抗，便用槍托打。不知是哪個單位的一個崽兒太亡命，挨了槍托還要撲上去，卻被背後一個端著日本那種三八式步槍的傢伙一刺刀捅到屁股上，當場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車上的人全部被趕下來，經過車門時，都要被搜身。“逃難”的人中，總有一些人帶有手槍、匕首之類武器。乖乖繳械，可以免打。誰肝火旺，要頂幾句嘴，便要挨槍托，甚至被抓走。帶武器的人便儘量往後面溜，在車上找地方藏那手槍、匕首之類。也

有人趁車窗外八一五派人員不注意，將那武器丟給已經下車的人。那些八一五派的武鬥人員可能都是縣城裏的人，除了搜武器，凡值錢的東西也要搶。

那天上車時，同年級同學安剛把一個挎包交給我，那包裏有他的一套中山服，要我幫他保管。我把挎包挂在車窗旁邊的鉤上，下車時竟然忘記了，結果被八一五派洗劫。當時，一個人一年只有八尺布票，做一套中山服要兩個人的布票才够。後來，安剛在宜賓岷江游泳時不幸被衝走，再也沒有回來，讓我一想到我給他弄丟了那衣服就難受，就恨。

車站上擠了一兩千反到底派的人，人多勢衆，便與那拿槍的八一五派爭吵起來，暗地裏還有人動手動腳。一個拿著槍的老頭擋在車門口，那槍口放得太低，竟然有人把那槍一抬，說聲：“好生點，走火打死了人啷個辦？”話音未落，“砰——”的一聲槍響，還真走了火，一發子彈射上夜空。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害怕！不僅沒有人後退散開，後面的人反而還往前面擠。有裝“天棒”的竟在後面喊：“把他的槍下了，拉下來錘！”還有人“踏屑”（貶低或嘲笑人）那老頭：“你打不打得來槍嘛？要不要老子教你？”那拿槍的畢竟是個老頭，可能心怯了，便悄悄退了回去，從另一個車門溜了。

鄰居大姐是 1958 年參加工作的老工人，在東風造船廠開行車，哪裏見過這樣的場面？火車被逼停下來後，只聽見車窗外槍聲大作，荷槍實彈的八一五派凶神惡煞，她駭得直打抖。我承擔著保護她的責任，只好讓她跟著我，不停地安慰她。事後，她告訴我，她當時害怕得要死，可一看周圍的人都那樣說說笑笑，不當一回事，也就不再那麼害怕了。

從軍事的角度看，八一五派除了洗劫到幾支短槍之外，沒有什麼大的收穫。我推測，他們來攔截我們這列火車，可能不是為了槍，而是為了搶點東西，或者就是想給車上的反到底派一點顏色看看。不過，這樣“勞神費力”，也沒有多大意義。我帶著大姐和兄弟，雖然丟了安剛的衣服，但沒有出事，也是萬幸。

我們趕到成都，住在省農科院。那時，成都燃煤供應相當緊

張，伙食團的飯煮不熟，讓我們頓頓吃夾生飯，大家心頭很是不滿。晚上，幾個傢伙去試驗田裏偷香瓜，與守夜人打起來。于是，我們就和農科院的“土砸”發生了糾紛。一氣之下，頭頭們決定離開成都去宜賓。于是，我們又“逃難”到宜賓，住在我們第二次“逃難”時曾經住過的宜賓茶廠。

離開成都之前，我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廣元搶軍庫，結果空手而歸。那時，成都至少住了好幾萬重慶“逃難”來的人，大家都不甘心，于是就有人策劃去搶廣元的軍庫。于是相互傳言，上千人分頭趕到廣元，又沒有人組織，把個廣元城搞得亂糟糟的。其實，那軍庫修在大山中，設在岩洞裏，隱蔽得很，可能沒有人知道究竟在哪兒，除了個別人在縣武裝部搶到一些子彈、刺刀之類外，大多數人只好無功而返。

當時，廣元只是一個縣城，沒有幾幢房子，滿城都是黑不溜秋的重慶崽兒，把那飯館、面攤的東西都吃得精光光的。又正是盛夏酷暑，城裏連個躲太陽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只好下河裏去泡澡。嘉陵江從秦嶺的大山中流出來，水渾濁得比黃河還厲害。江邊有一隻木船，船老闆告訴我們，沒有搞武鬥之前，他們經常跑重慶。望著那渾濁的江水向南流去，讓人平添濃濃的思鄉之情。

我們只好趕到火車站，偏偏沒有南行的火車經過。我們等到快天黑時，聽說一列油罐車要南行，便紛紛爬上去。那油罐車頂上有一個小小的平臺，可以坐幾個人。我覺得那太高了，就跑到車尾去擠守車。守車早已擠滿了人，連車門也坐滿了人，我只好在車門最下面的一步樓梯上坐下，手緊緊挽住那欄杆扶手。

那是深夜，火車開出後，閑得無聊，又不敢打瞌睡，怕一鬆手就掉下車去。于是，坐在一起的人便擺龍門陣。先互通單位。我沒有想到，我剛把南山中學幾個字說出來，坐在我後面的一個崽兒便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憤憤地道：“你們學校的崽兒好可惡，差點把老子打死了！”我急忙問：“你是那個學校的？”那崽兒道；“五十一中。”當時，我頓時覺得身子都輕了，七魂飛走了六魂。

原來，我們學校戰鬥團在解放碑附近的煤管局大樓裏也住有一撥人，而五十一中的反到底派也住在裏面。我們離開重慶前不

久，不知爲一件什麼小事，兩個學校的人發生了糾紛。那時，已經有一些武鬥人員開始結爲兄弟夥，模糊了兩派之間的界限，兄弟夥之間相互幫忙。五十一中的人多，我們學校的便打電話喊來幾個兄弟夥，其中有我們學校的，也有官井巷民辦中學八一五派的。那天，我剛好也去煤管局。那幾個人衝上樓來，迎面便撞上這崽兒。相距二三十米，衝在前面那傢伙提一支二號駁殼槍，也不問，揚手就是一槍。這崽兒雖然沒被打中，却駭得急忙趴到地上。

沒想到冤家路窄！只要那崽兒使一點力，把我一推，我就只有慘叫一聲，“犧牲”在這荒山野林中了。而他却可以說是我自己不小心，自己摔下去的。黑天黑地的，後面的人也看不清楚。我只好雙手緊緊抓住那鐵欄杆，做了最壞的準備。

這是我在武鬥中經歷的第六次危險。

那崽兒說：“後來一見面，才知道大家都是兄弟夥，那開槍的還是我的直接兄弟夥。他告訴我，是個姓李的把他攔了一下，才沒把我打死。”

我急忙說：“就是我。”

其實，可能我是急中生智，要用此化解他的仇恨。至于我是不是攔了一下，或者是不是把那開槍的人手臂抬了一下，我當時也說不準。後來，我極力回憶發生衝突那天的情景，也不敢肯定我就攔過那開槍的人，現在我就更弄不清楚了。按弗洛伊德的說法，人有一種遮蔽性記憶。所謂遮蔽性記憶，就是通過回憶所展示的記憶印象，往往可能是對自己更有利的，或者是由於記憶的內容與另一種受壓抑的思想間存在有著某種連帶關係。這不僅可能是此事的原因，也可能是我這本回憶錄中其他記憶可能出差錯的原因。遮蔽性記憶並不是自己能够意識到的，也就是說並不是有意的，並不是故意說謊，並不是故意美化自己，而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的。有鑑于此，還望讀者諸君從中加以識別，并給予指正和原諒。

那崽兒激動了：“真的是你呀？老子大難不死，還靠你呢！”

在那黑夜，在那荒山中，在那列車上，我突然感到，做善事好，會有善報的。

我們爬上的這列油罐車，有五十多個車廂，前面一個車頭拉，後面一個車頭推。從廣元出來是上坡，然後又是下坡。兩個蒸汽機車頭，馬力好大，下坡速度好快，真是風馳電掣。我剛從驚慌中回過神來，又發現前面燃起了火光。我沒有搞清楚那火光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油罐車怕火。我急忙對後面的人說：“糟了，前面可能失火了！如果引起油罐爆炸，都跑不脫。”後面的人正在打瞌睡，被我的話駭醒，看著那火光也驚慌起來。我站起來，抓住鐵欄杆朝前面看，也沒看出個名堂。我說：“聽到第一聲爆炸，我們就跳車！”後面的人都說好。火光就這樣一直亮著，却沒有爆炸聲。後來，我突然明白，那是車輪和鋼軌摩擦引起的火花，火花太多，太亮，就成了火光，照亮了路旁的山林，好像失火一樣。于是我又給大家解釋，後面的人才“哦”了一聲，繼續打瞌睡。

我不敢打瞌睡，我怕一失手摔下車去。火車飛馳，風聲鶴唳。雖是盛夏，那山野的風好大，好涼。我穿著一件中山服，也冷得顫抖不已。幸好一路上隧道多，火車過隧道的時候，那車頭飄過來的熱氣才把我從冷凍中緩過來。

不知過了好久，火車才開到馬角壩，終於停了下來。我們急忙下車。那爬到油罐車頂的人被風吹得更慘，也冷得更慘，也紛紛下車來。馬角壩是一個大車站，那油罐車就停在那兒，好像不會再開走了。幸好沒有等多長時間，就有一列客車經過，好像是北京到成都的，不知為何在馬角壩臨時停車。我們不顧一切，強行爬上車。車上的乘客大多是從北京來的，看到我們一個個像剛從煤窯子裏爬出來的一樣，除了兩個眼睛的眼白，渾身都是黑的，不知是嫌我們髒還是嫌我們擠占了車廂，在那兒吵吵嚷嚷。幾個“天棒”崽兒就摸出匕首、子彈、手榴彈之類東西來顯揚。那吵嚷的人可能還不知道四川的武鬥是什麼樣兒，見了這些傢伙，只得閉嘴。

第二天下午，火車開到成都。沒有車票，而且有人還帶著匕首、子彈、手榴彈之類東西，我們便邀約到一起，要硬闖出站口。哪知，那守衛出站口的軍人却昂著頭，似乎沒有看見我們這一兩百人似的，讓我們大搖大擺地走出車站。其中一個崽兒扛了一箱

子彈，又找不到東西包，只用一件衣服包著，也混了出來。

原來，那守車站的軍人是五十軍的。與五十四軍不同，五十軍是一支由起義部隊組建起來的野戰軍。抗戰勝利後，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原隸屬於雲南軍閥龍雲）被派到東北戰場參加內戰。1948年底，六十軍在長春附近起義後，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隸屬於四野，與五十四軍也算兄弟部隊。但是，由於五十軍支持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所謂的“紅十條派”，被八一五派看不起，說他們是俘虜兵部隊。在“三一五”、“四二七”兩次講話中，周恩來、江青等“中央首長”對此進行了批駁，可能還給張國華、梁興初和五十軍施加了壓力，這樣的流言才逐漸消失。上個世紀80年代大裁軍，五十軍被裁撤。

37. 我的“逃難”生涯（下）

南山中學的同學已經去了宜賓，我把兄弟從成都的一個親戚家中接出來，也匆匆趕去。“紅旗三〇三”早已解散，駱勛也回望江廠去了，宜賓再也沒有春天的那種浪漫。無所事事，我們就經常從茶廠渡過金沙江，去城裏閑逛。覺得肚皮沒油水了，南岸城建兵團的人住在屠宰場，我們就經常應約去打牙祭。

當時，宜賓茶廠是四川為數不多的大型茶廠之一，主要生產茉莉花茶、沱茶和茶磚。茶磚是專供藏族的，用的是老茶葉和茶樹梗之類。茉莉花茶是最好的。那茉莉花來自周圍的農村，每天下午都有農民送到廠裏來，讓整個茶廠都籠罩在濃郁的花香中。我去過一次車間，出來後，全身都香了，那香味竟然保留了一兩天。據說，那茉莉花茶全是供出口的。

吃得好耍得好就有了閑情逸致。晚飯後我們三五成群，到金沙江邊閑逛。一天，我們幾個人弄到一條小船，劃到金沙江裏。後來，我寫了一篇《金江夜游》的短文，記敘此事：

戊申年夏一日，與同學數人漫步于金沙江畔。夕陽似火映江中，浪流抖動，宛若金龍。晚風徐來，遂忘憂。覓得小舟一葉，游于金沙江上，皆樂也。

金沙江水自天而降，小舟起伏，出沒浪濤中。上游常有桶粗之木沖來，全賴舵手避之。然一鐵橋飛架南北，天險不險也。

須臾，月出東山，皎潔如銀。滿天蒼茫，浪聲消沉。何處悠笛，如訴如泣？誰人低吟，游子淒零？因之憶故鄉之夜，念文峰之月，感昔日之會，嘆今宵之游。興盡悲來，心疏意懶。

小舟順江急下，頃刻遠去。

忽一人大呼：“糟也！”吾等方回神。遠望叙府，燈火點點，已十餘里也。弃船登岸，沿江右拉纖而返，至叙府已夜闌人靜矣。

是夜，吾夢返南山，雙臂摟文峰之塔，幾欲摘下明月也。

但是沒幾天，因為同年級同學安剛淹死，這樣的閑情逸致就被打破了。

那天，我和安剛等幾個人在街上的飯館吃了飯，就跑到宜賓東門外的岷江去洗澡。高三同學楊永福的水性好，他說四川就是四條江，他已經游過了三條，只有岷江還沒游過。在他鼓動下，我們就從江西岸游過江去。哪知，江對岸有一個大回水沱，我的水性又差勁，幾次快游到岸邊了，又被沖到江心，弄得我精疲力竭。還是一個同學推了一根圓木給我，我才抱著那圓木游上了岸。

然後，我們去爬白塔。白塔在江東的一個山頂上，可以俯瞰整個宜賓城。不知是哪根弦出了問題，我在那白塔塔頂的牆上用石灰寫了兩行字：“今日游白塔，何時返文峰？”後來，我還將這兩句嵌入到一首《水調歌頭》中：

百次抗殘害，
萬丈怒心中。
登山因是遠客，
只顧急匆匆。
風捲戎城旗浪，
雨洗翠屏松樹，
火車叫聲隆。
今日游白塔，
何時返文峰？

金沙水，
滾滾去，

朝夕涌。
迎風昂首東瞭，
心事正重重。
月出涂山如雪，
燈入江中似蛇，
鐵水映天宮。
誓回山城去，
躍馬戰妖風。

宜賓古稱戎城，城後是翠屏山，山下有鐵路經過。而我們南山中學在重慶南山（又稱涂山）的文峰塔下。每到重鋼出鐵時，站在學校操場上，就能看到西邊天空一片絳紅。

寫下這兩句後最多一個多小時，同行的安剛就被激流沖走。我不知道，我當時寫下“今日游白塔，何時返文峰”這兩句，是不是有什麼預兆？

從白塔下山，又是楊永福突發奇想。他說：“只游過來，不游回去，還不算游過。我游長江都是游過去了又游回來的。”我和其他幾個人都不聽他的，只有安剛響應。于是，他們兩個又躍進岷江。哪知道，已經游了一趟，又爬山下山，安剛人又瘦小，體力已經不支，被一股激流沖向了金沙江和岷江的匯合處，再也沒有爬起來。

我們是渡過江後才發現出了問題的。只見兩江匯合處有兩個人腦殼在一冒一冒的，情知不好，立即解開停在岸邊的一隻小木船，喊上另外一撥正在江邊洗澡的同學，駕船去追。太匆忙了，那洗澡的同學甚至還打著光條條。木船順水而下，外號叫“麻兒”的譚元生站在船頭大聲喊著，又大聲問那在江邊洗衣的人。洗衣的都是年輕女子，抬頭一看，是幾個赤裸裸的男生，全都羞紅了臉，不理我們。

聽說木船被人搶了，木船社的“土砸”立即開著機動船，荷槍實彈追來，把我們全部抓起來。那些半蔫子老頭問三不問四，掄起槍就給我們每人幾槍托。我正在找他們的頭頭交涉，只感到

背後不對頭，急忙往前一撲，抱住那頭頭。一槍托打來，打在我背上。由於我撲了一下，讓開了，那槍托落在背上的力就小了許多。結果，其他人都被打得好幾天都直不起腰來，只有我躲過了。

金沙江與岷江匯合後就是長江。為了尋找安剛，第二天，我們趕到宜賓下游幾十里的南廣鎮。那是一個很大的回水沱，回水沱裏漂滿了木材。聽說我們要找“水大棒”（淹死的人），那照看木材的工人用篙杆推開木材，那水裏一下就蹦起來好幾具已經被水泡得發脹了的尸體，駭得一起去的女生驚叫喚。我們一一察看，沒有安剛，只好無功而返。

南廣鎮因南廣河而得名。南廣河發源于川滇交界處的大山，原來是川滇之間重要的交通要道。不知哪年地震，從山上震落下來的巨石塞滿了南廣鎮附近的南廣河，形成數百米長的險灘，阻斷了航道，於是就要搬灘。所謂搬灘，就是將貨物從下游的船上卸下來，從陸上搬運到上游，再裝上船；或者相反。因為搬灘，南廣鎮就繁榮起來。我在南廣鎮呆了兩天，後來還寫了一篇《南廣紀游》的短文：

叙府順江東去卅里，有鎮名南廣。依山傍水，房屋錯疊，雄偉巉岩，終日濤聲，乃一幽雅之地。

戊申年夏一日，雷雨初收，一路泥濘。同學數人，沿正修建之宜珙鐵路，跨鐵路橋，穿隧洞，行約二時許，便到南廣。

雲霧山腰，勁松蒼健。街上冷清，唯酒肆一家有猜拳行令之聲。吾等臨窗而坐。涼風徐徐，江天開闊，浪濤間一葉扁舟時隱時現。却問酒保，知此地壯觀者乃鎮後南廣河也，飯畢即欣然前往。

出鎮便見一小河，由南而來，穿山過峽，喧囂不息。一石拱橋飛架河面，雲飄其上，霧繞其下，宛若天橋。橋長約十丈餘，乃傳統之雙曲拱橋也。因其架于兩山峽谷，更顯雄壯矣。放眼望去，洪波涌起，濁浪排空，水珠噴天，霧氣蒸騰，猶如天鍋沸沸，火山欲噴，如此壯觀，何人不樂？

既樂之，攜手下橋至河畔細察。此段河谷本係亂石堆，

平日水細，潺湲而流。今山洪陡至，層層亂石阻擋之，即成壯觀矣。俯身低望，水自天降，浪花滾蕩，久視之，竟與原子彈爆炸時之烟雲同。投石其中，石即被掀入空中，頃刻無踪影也。

聲過巨，心顫不便久留，遂復橋頭。一同學曰：“郭老題峨嵋曰：‘峨嵋天下幽。’吾等不畏艱難攀登，感之平平，豈比此處也。若有筆墨，當題此處曰：‘南廣天下壯’也。”衆皆曰：“然。”

在南廣沒有找到安剛，頭頭又派人沿著長江兩岸，一路步行去找。走到瀘州藍田壩，前面已經是八一五派控制的地方了，也沒找到安剛，只好返回。

安剛就這樣失蹤了，永遠也不可能再見到他了。他第二次下水的時候，我坐在渡船船頭，我還對他說：“游啥子喲？上船來吧！”他只向我招了招手就繼續游走，那最後一眼我至今也難以忘懷。

沒想到只過了幾天，又差點發生死人的事。那時，流行戴灰軍帽，就是八路軍、新四軍戴的那種，前面有兩顆扣子，實際上是國民革命軍（也就是國民黨軍隊）戴的那種帽子。為了在安剛的追悼會上顯示一下，學校一群崽兒不知從那兒弄到兩張床單，拿到城裏去染成灰色，找了個縫紉店，每人做了一頂。由於耽擱了時間，他們回來時，金沙江已經收渡，船工早已沒有踪影。

當時，宜（賓）珙（縣）鐵路還沒有通車，不過金沙江大橋已經修好，但却不許任何人通行。見沒有渡船，一群崽兒就要去過橋，守衛大橋的軍人不讓過。高一年級外號叫“豆腐佬”的曾光正一揮手，這群“天棒”崽兒又跑到江邊，要從北岸游到江南岸來。

金沙江比岷江寬，也更浪高水急。我們第二次“逃難”到宜賓的時候，也到金沙江裏游過泳，一大群人還從北岸橫渡到南岸。但那還是春天，還沒漲水，而此時正是洪水月份。那渾濁的江水拍打著江中的礪石，發出震耳的吼聲。要想游過江去，死的可能

性至少在 80% 以上！那個年代，站在金沙江邊，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看到江水中時不時漂浮著死尸，有的死尸甚至是被鐵絲牢牢捆綁著的。沿宜賓往上，是彝族聚居的大涼山，是雲南昭通。我不知道那些地方是否在武鬥，但那金沙江裏的死尸肯定是從那些地方漂流下來的，可以想見那些地方殺人更厲害，死人也更多！

那時，天已經開始黑下來。有人看到那滾滾急流，心中虛了，提出反對意見，又被那“豆腐佬”嘲笑，一氣之下，就有人找到電話，給茶廠打了個電話回來。聽說一大群人要橫渡金沙江，把當頭頭的駭慘了，急忙把留在茶廠的人全部召集到江邊，大聲喊叫，讓他們不要下水。我的嗓門大，我的喊叫那些人肯定聽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們中間已經有十來個人下了水，而且已經游到江中一塊礦石上。金沙江水特別冰冷，水又特別急，只游了不足江面的五分之一，大多數人就已經感到精疲力竭，只好爬到那礦石上等待。那礦石本來是在北岸江邊的，因漲水才成了孤島。我們發現他們後，又叫他們站在那兒不要動。當頭頭的急忙去聯繫守橋的部隊，可能是事關十幾條人命，軍人只好讓他從橋上過去。當頭頭的到了北岸，聯繫上了木船社的人，劃了一隻木船，把他們從那礦石上接下來，讓他們回到北岸，然後從大橋上走回南岸來。

在等待的那一段時間裏，那“豆腐佬”和另外兩三個傢伙幾次要獨自下水，要繼續游過江來，都被其他人攔住。當木船靠到那礦石的時候，大家都上船了，只有那“豆腐佬”還要堅持下水，還要一個人獨自游過南岸來，說是這樣走回去好“髒班子”好沒面子。當頭頭的也在那船上，就叫其他人估倒把他拉到船上，才避免了出現第二個安剛。

他們一夥人回到南岸的茶廠，已經是晚上 9 點多鐘了。雖然這“豆腐佬”高我一個年級，我和他關係不錯，但我一看到他，就氣得狠狠地給了他幾拳頭，把他臭罵了一頓。他却晃晃腦殼，不理我，那樣子，好像不讓他游過金沙江，他還很委屈一樣。碰上這樣一個不顧後果的傢伙，真讓人哭笑不得。

在重慶崽兒中，像“豆腐佬”這樣倔強，這樣不顧後果的，那年代真的太多，幾天後我就又碰上一個。

“逃難”到成都的柴油機廠的戰友帶了一個信來，他們要開個會，紀念造反兩週年，讓我去參加。我在柴油機廠住得最久，和他們交往最多，又是“八月戰爭”中的戰友，當然要去。我先趕到資陽，去約三十八中的同學一起去。在黃山時，連隊裏有幾個三十八中的同學，也是生死之交。那三十八中叫張興仁的頭頭當即決定，和我一起去成都。我們沒有車票，混進車站後被乘務員攔住。我勸他算了，再等下午另一列火車，他却硬要去吊車。吊第一次時，火車剛剛啓動，他被車站上的人拉了下來。吊第二次時，火車已經開出站臺，他跳上去抓住車門的扶手，卻被車上的人一脚踢了下來。他爬起來就吊第三次。那時火車已經加速，車頭已經駛入正軌。他跳上去却沒有抓住車門扶手，摔了下來，摔倒在路基上，差點兒被火車捲進車肚皮裏去。我一直追著他，大聲喊叫，叫他不要再吊。他却不聽我的，強得讓人氣憤。車上車下的人見了，都膽戰心驚。信號工只好發信號，讓火車停下。我衝過去，把他扶起來，幸好他沒受傷，只是手上擦破了一點皮。面對這樣的強人，你真是哭笑不得啊！

從成都回到宜賓，同班一個叫鄭裕民的同學又突然犯病，什麼病我忘記了，好像也很惱火，被我們送到醫院。到我們回重慶時，他的病都還沒好。我們提前通知了他的家人，他家裏人來照顧他，不幾天後也回了重慶。

重慶十多萬人“逃難”，引起中央的重視，一再下令，重慶駐軍只好派人到成都來游說反到底派回重慶。1968年9月初，我們也離開宜賓。由於是凌晨的火車，我們頭天下午就趕到火車站。前兩天下了大雨，天氣已經涼快了，半夜還有些冷。一起等車的城建兵團的一個工人，花了五元多錢，買來一瓶五糧液，讓我們每人喝一口暖身。頓時，那候車室裏便充溢著濃濃的酒香，到第二天早上我們上車時都還沒有散，讓不喝酒的人也感到舒服。如今的五糧液，哪還有那樣的香味喲！

悶罐車裏鋪上幾張擋席，我們或坐或臥，心情沉沉的，不知回到重慶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火車飛馳，車門外的青山綠水竟然引起我的詩興，於是寫下一首五絕：

火車越青山，
青山留白烟。
雨輕敲蜀國，
竹簇掩清泉。

當時，我並不知道此詩竟然預示著武鬥的結束，預示著我們這些在重慶文革戰爭中出生入死的中學生將面臨另一場更加艱難困苦的考驗。

38. 都是瘋子嗎？

如今，說起文革，說起武鬥，人們都認為那簡直就是神話，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簡直就是瘋子。就是這些瘋子，打來打去，死的死，傷的傷，沒有哪一個落得了好下場。但是，歷史就是歷史。要說是瘋子也可以，首先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個人瘋了，然後把全國六七億人都搞瘋了。從文革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幾乎所有反對過文革的人，包括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類所謂的走資派，也包括像張志新、遇羅克這樣的死難者，你只要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思想和言論，就可以看到，他們實際上也是“瘋”的。真正清醒的，可以說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

在黃山紅二連的時候，我和幾個柴油機的戰友沒事打“牙巴仗”（嘴仗），爭論一道難題：如果你父親是八一五派，如果他拿著槍來進攻，你打不打？我說要打，我還舉了許多歷史上一些“大義滅親”為例子，舉了諸如彭湃之類先烈為例子。也有人說不能打，畢竟是自己的父親。我們爭得個面紅耳赤的，主張打的竟占了上風。事實上，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之間，因觀點不同而在一派的多得很。那年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朋友決裂，同學廝殺的太多太多。電影《楓》那樣的悲劇，並非絕無僅有，有的比其還要典型，還要可悲。不少參加過武鬥的人看了《楓》都說，那女主角已經瞄準了那男主角，却還要猶豫；要是我的話，早就一槍將男主角打死了，有什麼猶豫不決的！

人們把這歸結為派性。派性是文革中最莫名其妙的產物之一，只有經歷過派性爭鬥的人，才會明白這個名詞中所包含的豐富而又複雜的內容。什麼叫派性？查《辭海》、《辭源》，竟然都沒有。派本是水的分流，引伸為流派，一般陷於學派之類，後又引

伸爲政治派別或派系，但似乎都沒有產生出派性這個詞來。文革一開始，群衆便分爲兩派，這本不足爲奇。毛澤東說過，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總會有左中右不同派別的。奇怪的是，那時也沒有產生出派性這個詞。到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又分成了兩派，爭過來鬥過去，打得不亦樂乎後，才出現了派性這個新名詞。1968年1月中下旬，《人民日報》連續轉載《文匯報》、《新安徽報》的社論，其題目就是《論派性的反動性》、《敵人利用派性，派性掩護敵人》。但對什麼是派性，却沒有明確的定義。

其實，直到現在，要給派性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怕也還有些困難。1997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爲：“指維護派系私利的表現：閹派性 | 消除派性。”在網上搜索，人民網“黨史百科”的解釋有800字左右，且只抄其中的核心詞義：“派性就是派別性，指革命隊伍內某些人站在個人和小團體的立場上，以一派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一派的得失爲轉移，結派營私。派性與無產階級的黨性相對立，是宗派主義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極端表現，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惡性膨脹，是封建階級和小生產者的行幫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按此解釋，派性只是在文革中產生的，也只存在於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而且還只是在黨內才有的。也就是說，文革中的兩派都統一於共產黨，都是共產黨內的成員或擁護者。既如此，爲何又鬥得個你死我活呢？

讀中國歷史，你會發現，爭鬥的兩方，原來往往就是同志或戰友。項羽與劉邦如此，曹操與劉備如此，國民黨與共產黨也是如此，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以及共產黨內的路線鬥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中國人的窩裏鬥，在文革中登峰造極。以重慶爲例，當年的重慶人，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都有自己的派性，只是那派性或重或輕不同而已，只是因派性輕重不同採取了不同的投入方式而已。即使是那些“逍遙”的，也有自己的派性。即使是邊遠農村的農民，是“砸”是“保”，往往也有自己的看法！

派性是因爲觀點不同造成的。說到觀點，這可能也是如今年

輕人難以完全弄明白其中全部含義的一個詞。《現代漢語詞典》對觀點的解釋為：①觀察事物時所處的位置或採取的態度。②專指政治觀點。也就是說，觀點只是一種看法、一種意見、一種態度。但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觀點却左右著人們的行為，左右著一個人的命運。不少人僅僅只是因為有了某種觀點，甚至並沒有表露，更沒有任何行動，往往也逃不脫挨批挨鬥的命運，甚至被持有另一種觀點的人用“武”“鬥”導致傷致殘致死！

雖然沒有誰對我們進行過派系知識的教育，但我們讀書時，老師就把我們分成了不同的類別，就動用那一丁點兒實際上是很可憐的權力，親一些人，疏一些人，甚至整一些人，用行動來教育我們：人是分為派系的。那個撤了我班主席職務的班主任陳老師，就把全班同學分了類。有一次，我無意中發現她的筆記本上把班上同學分成了四類，第一類是她喜歡的，但大多出身“不好”；第四類是她最討厭的，大多出身工農家庭；而我却被她劃進了第三類。那時正好開始“四清”運動，學校也開始講階級路線。而且剛剛傳達了“四清”運動的《二十三條》，即中共中央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還組織全校師生去聽了李井泉在南充火花公社講話的錄音，明確不能在群衆中劃分類別。我氣憤不已，把信息通給劃成第四類的工農出身的同學，讓他們去找她鬧。她被那幾個調皮學生弄得下不了臺，就來找我，我就一條一條和她說：你這樣做，一是違反黨中央規定，在群衆中劃分了類別；二是把工農子弟劃成三類四類，不講階級路線；三是把出身資本家的同學劃成一類，是“反攻倒算”。我“義正詞嚴”，說得她啞口無言，最後竟然守著我哭了起來。可能正是此事，讓她對我更是恨極。現在想來，我那時的思想不僅極左，而且也已經有了派性，只不過分派系的標準與她不同而已。

附記：

李井泉說的是江西話，他的講話我們幾乎一句也沒有聽懂。在那個講話中，他故意拖聲拖氣，官腔十足，講了兩三個鐘頭。聽完錄音，又讓人念他那個講話稿，只念了不到

半個小時。這讓我對他沒有了好印象。那時，我知道他當過十八兵團政委，我對同學說，他當年打仗，也用這樣的語氣下命令，只怕敵人都打到面前了，話都還沒說完喲，不遭敵人打死才怪。因此，文革一開始，我就贊成“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

在學生中分“坨坨”、分派系的狀況，就是現在也還存在，甚至存在于幼兒園，存在于小學裏，只是分類別的標準不同了而已，過去是以政治為標準，現在是以是否富有為標準。當老師的，當家長的，總是用或明或暗的行為在教育孩子，你是哪一類或哪一派，你就不能和另一類另一派的孩子在一起。正是這樣的派系知識“教育”，使我們從小就有了派性。長大以後，不管是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中，我們都可以碰上各種各樣的“派”，或者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只是因為“合得來”，大多數人往往就很自然地就陷了進去。可以說，文革中派性泛濫成灾，與中國人這種“天性”直接相關。

派性就是分“坨坨”，的確是一種“封建階級和小生產者的行幫思想”。重慶地處內地，雖然很早就有了現代工業，但“封建階級和小生產者的行幫思想”，可能比上海等沿海城市更嚴重。事實上，解放前，重慶的袍哥幾乎滲透到各行各業，形成大大小小的“碼頭”。解放後，袍哥被取締了，但碼頭文化、江湖義氣之類都依然存在。正是這些文化殘留，被毛澤東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給予鼓動，加以煽動，甚至暗裏挑動，使文革中的派性發展到頂峰。到後來，連毛澤東自己對此也無可奈何了。也正是因為這些文化殘留，到後來，不少派頭頭、派鋼杆都放棄了派性，與對方的頭頭、鋼杆結成了兄弟夥，開始另一種意義的派系鬥爭。即使到現在，重慶人分“坨坨”的惡習依然，重慶的黑社會往往也比其他地方容易形成，也難以完全打掉。

的解，現在想來，當年那些參加武鬥的人，那些出生入死、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人，都是瘋子。但是，那麼多人都是瘋子

嗎？重慶城多多少少參加過武鬥的人，少說也有十幾萬吧，十幾萬人都瘋了不成？其實，那時的人說不定比現在的人都還要有理智，都還要崇拜理性。武鬥中，死人的事幾乎天天都有，却沒有見到過誰去燒香拜佛求神卜卦。要打仗了，遇到危險了，可能要死人了，最多說一句：“該死鷄兒朝天，不該死鷄兒朝地。”用來自嘲，也用來安慰自己。

“該死鷄兒朝天，不該死鷄兒朝地”是一句四川俗話。當年傳說，五十四軍的戰鬥英雄陳代富在給紅衛兵作報告時，就說過這句話。在 1962 年的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陳代富去炸印軍地堡，將爆破筒塞進去，却被印軍推了出來。危急時刻，他爬上地堡，扒開堡頂積土，將爆破筒從頂蓋圓木的間隙插進去，并用胸口頂住爆破筒，不讓印軍推出來。他喊著“一二三四五——”當爆破筒即將爆炸的那一瞬間，他迅速滾下地堡，地堡被炸毀了，為部隊打開了前進道路，他因此被稱為是活著的黃繼光。陳代富是四川安岳縣人，當年他頂爆破筒時是否想到這句四川俗話且不論，但在重慶文革戰爭中，這句表示生死莫測的話的確很流行。

回憶自己的武鬥經歷，我感到，不能過分相信人的理性。邏輯推理的規則太多，只要在某一處出現偏差，就會出現錯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釀成天大的悲劇。而偏差在理性思維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時時處處都可能冒出來，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把握、完全控制。古今中外那麼多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其理性思維能力比起我們一般人來，不知有多強多厲害，可又有哪一個沒出現過偏差呢？黑格爾不是偏到維護和吹捧反動的普魯士國家、為普魯士的黑暗現實進行辯護的泥沼去了嗎？從某一方面說，文革浩劫之所以發生，不是也與毛澤東的認識和理性思維出現偏差相關嗎？

且看文革中兩個最常見的邏輯推論：

推論 I：我是保衛毛主席的（這一點對任何人都毫無疑問，似乎成了公理），你反對我（哪怕只反對一點點），就是反對毛主席（那還得了呀），我就要和你血戰到底（因為我是保衛毛主席的）。

推論 II：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

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誰也不願當國民黨，都把自己一派當共產黨。于是，我是共產黨，你就是國民黨，對國民黨只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平談判不成，就武裝自衛，于是就武鬥就打仗，最好來一個“三大戰役”，將對方全部消滅乾淨。

這樣的邏輯推理現在看來的確荒謬絕倫（其實現在也還有不少人繼續按照這樣的邏輯來推理，動不動就把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罵為“漢奸”，罵為“五毛”，甚至也叫囂著要斬盡殺絕），可當年參加武鬥的人中，包括那些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幹部，包括或直接或間接介入武鬥的軍人，誰又不是這樣在推理呢？

也不能過分相信人的本性。不管是性善說還是性惡說，都難以解釋武鬥中的怪現象。一個當初連螞蟻也怕踩的同學，參加武鬥後，打起人來又凶又惡，被稱為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你說他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望江廠我那個邀約同派的人把自己丈夫捶得長期癱瘓在床的鄰居老太婆，其實是個笑眉慈眼很善良的人。她在宿舍後面的坡坡上種了一點菜，都要一家一戶送，我家就吃過她種的菜。你說她性本惡還是性本善？當年參加過武鬥的人，後來有不少人成了專家、教授、學者、作家，甚至還有的當上了領導幹部，有的還成了慈善家，你能判定他們中有幾個是性惡的？

派性不僅使人們互相爭鬥，互相廝殺，而且也使人變壞。文革的確是一個大熔爐，它煉出來的，是一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野心家、陰謀家。一些普通學生、普通工人，甚至只是十幾歲的中學生，當了派頭頭後，被派性所腐蝕，自我無限擴大，野心極度膨脹，不擇手段要當官，要掌權。那時候，不知有多少狂妄的人公開明言：“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林彪的接班人就是我！”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些人拿幫派作籌碼，爭權奪位。即使武鬥停止了，秩序恢復了正常，也要藉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鬧“地震”，把一個個好好的單位搞得不安寧，甚至停產停工。1976年，重慶原兩派頭目周家喻、黃廉等人藉“批鄧反右”，聯合起來興

風作浪，搞得全市到處動蕩，停工停產。這說明，派性發展到了後來，已經改變了性質，成了幫派，成了社會不安定的最大一個因素。直到四人幫垮臺，經過全面清查幫派的運動，才將這股勢力最後打了下去。否則，也真難安寧啊！

中國古代有不少善長辯證思維的思想家哲學家，可是，偏偏中國人的形而上學又最厲害。或者正因為如此，才從反面產生了老子那樣的辯證大師吧？派性從其誕生開始，就是一種最典型的形而上學。正因為國人擅長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所以便很容易接收。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可那派性的陰影却依然還殘留在某些人心底，有時候甚至還會暴露出來。如果到當年那些兩派爭鬥最厲害的單位去作一個深入調查，說不定都還可以發現派性作怪的陰影。前不久，天涯重慶論壇上不知是誰發了一個帖子，說到 1967 年那場“八八”海戰。一個跟帖的甚至還在那兒大肆吹噓當年八一五派的戰功，說是把反到底派打得個落花流水，那派性竟然還那樣溢于言表。

如今網絡上也有這樣的“派”，諸如毛派、左派、右派、民主派、五毛、美分之類。一些人，特別是那些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人，只要不符合自己觀點的，也不管事實如何，就反對，只要是不贊成自己的，也不想想是否有道理，就大罵，甚至暴跳如雷，給對方加上諸如漢奸、腦殘、賣國賊之類的帽子，個別的竟然叫喊著要殺殺殺，要把對方殺個乾乾淨淨才罷休，與文革中的兩派何其相似乃爾！如果不是現在多少已經有了法治，他們肯定比文革中的兩派武鬥還要殘酷，還要厲害！

派性這東西何以這樣頑固？何以這樣厲害？它是否反映中國人“窩裏鬥”的劣根性呢？若是，不妨讀一讀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說不定可以從中找到若干派性根源的答案。

39. 英雄的悲劇

鋼鐵誓言

我們剛從戰場上下來，
就來到毛主席像前，
用傷口流出的鮮血，
寫下這鋼鐵誓言——

要毛澤東思想，
寧可不要腦袋！
爲保衛毛主席，
完蛋就完蛋！

一個字就像一朵鮮花，
一個字就是一隻大雁，
把它捎到北京吧，
獻給毛主席，表咱心願。

一個字就像一把鋼刀，
一個字就是一顆子彈，
把它貼在心窩裏吧，
衝上陣地去，決一死戰。

這是我在 1968 年 1 月寫的一首小詩，雖然寫得差勁，却真實地反映了武鬥人員的那種英雄主義氣概。

英者，杰出也；雄者，强有力也。英雄是不怕困難，不顧自己，願意犧牲自己也要保全同伴，令人欽佩的人。雖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不再崇拜英雄，但不管怎麼說，英雄主義始終是人類的驕傲。那種犧牲自己也要保全同伴的精神，哪怕是悲劇，哪怕是歷史決定不可為的，甚至有違于歷史發展正道的，也是值得贊賞和欽佩的，當然也可以感慨和同情。重慶文革戰爭中，那麼多武鬥人員表現出來的英雄行為，雖然他們的行為導致了更多的人的不幸，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損失，但却不能因此就去嘲笑他們。的確，他們也應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應當為自己行為造成的後果而懺悔。但是，文革的主要責任、武鬥的主要責任却不應該由他們來負，而應該由那些“政治家”們來負，特別是應當由毛澤東來負。就武鬥人員行為的本身來說，敢于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總是一種高尚行為。今天，我們可以從各個方面去責難當年的武鬥人員，却不能亵瀆他們的英雄主義。與當今社會那些面對歹徒殺人却袖手旁觀的人相比，我要說，他們更值得我們尊敬。如果當年有人能够把他們引入正道，那種精神煥發出來的力量，將是巨大無比的。

作為“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我們從小所接受的就是革命教育，家長、老師、組織、社會都要我們學英雄，做英雄，不怕苦，不怕死。我們一懂事，接觸的就是英雄，先是董承瑞、黃繼光、邱少雲，後是江姐、成崗、許雲峰，還有卓婭、舒拉、保爾、牛虻……我們當中，誰沒讀過《紅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誰不知道《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不管男生女生，長大當解放軍，幾乎是所有人的第一理想。不管問誰，都可以一口氣給你背出一長串戰鬥英雄的名字來。文革一開始，我們那樣投入，與那十幾年的“革命教育”是分不開的。那時，我們當中好多人都為沒有趕上戰爭年代而遺憾，又為能趕上文革而慶幸。英雄教育讓我們嚮往英雄，讓我們鄙視膽小鬼、怕死鬼，讓我們胸中積澱了濃濃的“英雄情結”。武鬥，特別是已經發展為戰爭形態的武鬥，讓我們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學英雄，做英雄，成為我們的心聲。

的確，面對死亡，任何人都可能膽怯，都可能害怕。但是，在那一兩年時間裏，我却沒有聽說哪個參加武鬥的人，哪個走進戰爭的人，因為害怕當了逃兵。被對方抓住，認罪，求饒，寫“反戈一擊”聲明，肯定是有，而且還不少。一旦被放了出來，依然如故，繼續“戰鬥”，甚至比過去更亡命，却是普遍的事實。拼鋼針的時候，看到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有的人也可能害怕。但打槍後，離得遠了，反而不害怕了。第一次上戰場，也可能因為害怕而渾身發抖（有的人也可能是因為激動而渾身發抖），還沒瞄準就開槍，甚至連槍也舉不起來。但只要打響第一槍，也就鎮靜下來。後來我對此進行過分析，可能是膽小的人、害怕的人已經悄悄地“逍遙”了，脫離出去了，回家跳“鍋邊舞”去了，留下的人都是不怕死的貨。這些留下來的人，最怕的就是別人罵他“怕死鬼”。在戰友面前，特別是在異性面前，至少也要裝出一副英雄的樣子來。裝多了，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如果誰心裏有了那種“英雄情結”，當然也就更要表現出一副英雄的樣子來。

本書中已經講過不少英雄的故事，不妨再講兩個吧：

1967年8月18日，五臺山。九一縱隊紅二連副連長為了救戰友，被一串機槍子彈打傷，腳上手上竟然有十來處傷口。他被戰友救下來，被送進醫院。據醫生說，那十來處的傷口均不致命。但是，由於藥品奇缺，無法鎮痛，這位中學生竟然被活活痛死。他是十一中“紅色暴徒”的頭頭，來照看他的幾個女生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兒，全都哭成一個泪人，他却不哭，反而強打精神，安慰她們，直到最後落氣死去。

1967年11月，南山中學。我們十幾個人被八一五派包圍在尖尖房子那小樓裏。進攻者仗著人多鋼針長，已經從窗門口攻了進來。雖然那為首的被我一鋼針戳在頸項上，暫時停止了進攻，但我們却被壓縮在一個小房間裏，不知所措。眼看八一五派調整部署，就要發動再次進攻，衝進我們所在的房間。面對電筒光下那一排上著長長刺刀閃著寒光的鋼針，突然，矮胖矮胖的高三同學朱心躍提著鋼針，衝出小房間，大聲喊著：“為保衛毛主席，完蛋就完蛋！”那氣勢竟然使進攻者一楞，接連後退幾步，不敢

再向前衝，這才為我們贏得了時間，紛紛從樓上往下跳，逃過了一場劫難。

不但男生如此，女生也相當英勇。事實上，武鬥並不是男生的專利，幾乎所有的武鬥隊中都有女生。雖然女生往往不會被直接派往戰場，但她們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同樣令人欽佩。九一縱隊紅二連有個通訊班，班裏有兩個女生，外號叫大娃、二娃，都是十一中初一年級的，不過十三四歲。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要攻打上新街，頭一天派人下山去偵察，就派了這兩個女生。兩個女生換了衣服，竟看不出是中學生。特別是那二娃，長得小巧玲瓏，穿一件花襯衫，套一條裙子（那年月穿裙子的人極少），頭上還紮上一個大蝴蝶結，像個托兒所的大娃娃。兩個女生分頭下山，從彈子石到上新街，從上新街到海棠溪，把八一五派的據點一個個偵察得明明白白才回到山上。第二天，這兩個女生還是那身裝束，跟著戰友們又打下山去。有人認出他們來，竟嘖嘖感嘆，她們還笑。那大娃姓黃，後來也進了望江廠，曾和我老婆在一個單位上班。我問她：“當時你們害不害怕？”她說：“好像沒有想到害怕一樣。”我問：“萬一被人識破，被八一五派抓住，你怎麼辦？”她說：“好像也沒想過。”

再看我1967年寫的一首小詩：

血染的袖章

戰壕裏，伏著親愛的戰友，
頭頂上，飛著呼嘯的子彈，
面對著敵人的瘋狂進攻，
她英勇沉著地作戰！

忽然，一顆手榴彈飛來，
她轉眼一看，啊，嗤嗤冒烟，
眼看就要爆炸呀，
怎麼辦？怎麼辦？

黃繼光在眼前出現，
王杰的話響在耳邊，
喊著“毛主席萬歲！”
她撲向那就要爆炸的手榴彈！

……她叫什麼名字？
身旁的戰友都不知道，
從她身上找到一個鮮血浸透的袖章，
才知道她是九一縱隊的一員！

報仇！報仇！！報仇！！！
槍膛裏射出憤怒的子彈，
堅決打退敵人的進攻，
向李任死黨討還血債！

詩中的故事，是我 1967 年 8 月底在一份叫《九一縱隊戰報》的小報上看到的。雖然這個故事本身可能並不真實，但故事中體現出來的那種英雄氣概却是真實的。如果真的發生了故事中的那種情況，在那樣一種氛圍中，說不定也真有人會撲到那手榴彈上去的。事實上，那時候也流傳著不少類似的故事。

就在那一期《九一縱隊戰報》上，還刊登得有著名的《九一縱隊遺書》，據說出自於後來成爲作家的余新慶之手。

其實，類似的故事，本書中已經講了很多。從這些故事中，不是很可以看出當年電影、小說、革命回憶錄留下的影子嗎？如果能將這樣一股力量引到正道上去，該會產生多大的效果呢？這樣的人，這樣的行爲，如果不是在這場莫名其妙的文革戰爭中，你能否認他就不是英雄？你能否認那行爲就不是英雄行爲？

遺憾的是，武鬥不是正道，那個時代也難以有什麼正道。他們即使可以冠以“英雄”的頭銜，也只是歷史的悲劇。後來，武鬥終於停止下來，竟然使很多人都感到惶惑和失落。不少人都說，應當組織武鬥人員到越南去打仗，而且還要去越南南方，直接和

美國鬼子打。還有更提勁的說，應當組織一個世界兵團，到非洲去，幫助那裏的人民打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解放黑非洲。好像是 1968 年武鬥還沒完全停止的時候，非洲的剛果（布）發生過一次軍事政變。政變者帶著 100 多人的武裝人員從剛果（利）的首都利奧波德維爾（現金沙薩）偷偷渡過剛果河，攻入剛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的國家電臺和總統府，宣告政變成功。後來，這支政變武裝雖然被政府軍打敗，但却堅持了好幾天。我們看了這樣的新聞，都覺得好耍。我們學校那叫張正華的頭頭說：“乾脆我們組織一兩百人去，保證打下一個國家來！”那幾年，也還真的有人跑到雲南，想方設法越過邊界，跑到越南、老撾、緬甸等國家去“幹革命”呢。據說，緬甸共產黨的部隊裏就有好多的中國紅衛兵。如果當時中國也出一個格瓦拉那樣的人物，要在全國招募幾百萬的“世界兵團”，可能真不會成問題。但是，那將造成怎樣的後果呢？

單純、熱情、愚昧，使我們這一代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他不說，只說所謂“要讀書時搞文革，要工作時下農村，要戀愛時講晚婚，要結婚時沒房子，要發展時又下崗，要退休時錢沒得”，就已經讓我們這一代人難受了，更不用說那些被批鬥、被“全托”（隔離審查）的事了。社會的發展總是彎彎扭扭的，一個否定接著一個否定。單純的熱情被否定，于是就有了複雜的冷漠；當年以艱苦樸素為榮，而今則奢風糜氣蓋地。歷史當然進步了。但是，當我們面對歹徒殺人時，都袖手旁觀，包括一些黨員、幹部、軍人、警察都睜眼不看，我們是不是應當呼喚一下那種英雄氣概呢？我時常想，如果當年被打死（或其他某種死法）的紅衛兵突然活轉過來，回到我們現在這樣的社會中來，該會演出多少喜劇、悲劇、滑稽劇呀！這是一個小說題材，如果有人能够寫出來，肯定會受歡迎的。

40. 武鬥中的男女

當然，現在的人們不屑于聽英雄故事，最關心的可能是武鬥人員性方面的事。很多人以為，搞武鬥了，手上有了槍，沒有“110”可以報警，也沒有警察來管，肯定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以為，參加武鬥的男生就是一群性饑渴者，都是色狼，見到女人就會“亂來”（在重慶話中特指男女之間的事）；參加過武鬥的女生就是“慰安婦”，就像隨軍妓女一樣，似乎誰都可以與她們睡覺。在他們的想像裏，武鬥就是睡覺，就是“亂來”。遇到這樣的人，你解釋得再多，他們也不信。後來，我就不解釋了。

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的想像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參加武鬥的，絕大多數是學生和青年工人，身體剛剛發育成熟，有的甚至還未發育成熟，正處在性危險期。如果是現在，那局面肯定難以收拾。但是，文革前那種革命的禁慾主義的教育，使絕大多數人又有很強的自製能力，加上革命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很少有人想到過要借用武鬥來解決性的問題。特別是在一般的中學生中，如果誰在耍朋友談戀愛，都會遭到大家的嘲笑，更不要說隨便“亂來”、隨便“睡覺”了。我沒有正式耍過朋友，只是和駱勛有過那麼一點曖昧的關係（她可能還沒有），就被別人看出來了，就被嘲笑過。

不僅現在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武鬥中的兩派也都經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通過大字報、小報、廣播什麼的，把對方說成是強奸犯，是妓女。這種風潮大約是從1967年5月全面武鬥開始後興起的。那時，雖然諸如反革命之類依然是最大的罪惡，但由于已經用得太多，用得太爛，給對方扣上諸如

反革命之類的政治帽子已經引起不起人們的注意，也就失去了作用，而攻擊對方是强奸犯，是妓女之類，更容易讓對方難堪。如果對方在性方面真的有什麼越軌行爲，也更容易將對方打倒。1968年9月，我們回到學校。有一天，我正在張貼批判專欄，一個八一五派同學來搗亂，指著我鼻子罵：“老子要揭發你，你在黃山上強奸了三個女生！”把我氣慘了，立即撲上去，要和他打架。還是旁邊的人拉住，我們才沒打起來。

“食色性也。”性畢竟是人的一種基本需要。雖然有禁慾主義的壓抑，但性的需要依然要通過各種方式頑強地表現出來。攻擊對方，僅僅罵幾聲强奸犯、妓女之類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就開始編造故事，那故事從簡單到複雜，甚至聳人聽聞。前面曾說過了那個1968年7月在江陵廠武鬥中被打死的女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還有更荒唐的傳說，說某武鬥隊把打死的對方女生尸體洗乾淨，然後讓武鬥人員排著隊去玩樂。有的文章甚至寫得很細很淫穢，無異于黃色小說（當然還不能與現今的黃色小說相比）。其實，讀過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容易就知道，這都是那些寫此類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性幻想變成了攻擊對方的謠言，反映的正是他們自己的性需要。讀此類文章的人當然也可以通過閱讀和性幻想，以滿足自己的性需要。

雖然如此，但也不能說就沒有怪現象。參加過武鬥的人那麼多，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那麼一些爛污崽兒也正常。但是，誰一旦敢拆爛污，一旦被揭露，幾乎都沒有好下場。1967年8月底，住在建設廠的某中學的幾個爛污崽兒，不知哪根神經發了岔，看到一個女人路過，就將其抓來輪奸了。那女人是建設廠一個工人的老婆，已經懷孕，是到廠裏來找丈夫的。此事很快就被揭露，建設廠的反到底派指揮部立即將那幾個爛污崽兒抓了起來，給予一頓飽打。9月初一停火，又將這幾個爛污崽兒押送到“警司”，請求當局嚴肅處理。後來，這幾個爛污崽兒都被處以死刑，公開宣判後槍斃了。

1967年8月18日，電技校一個武鬥人員從王家大山打仗回來，路過一處田地，看到一個農村姑娘在摘豇豆。可能是打了大半天，

見過太多的死人，經歷過太多的危險，控制行為的神經出了毛病，這傢伙忍不住，就把那姑娘强奸了。走到前面的戰友見他半天不來，以為出了什麼事，便倒回去找他，正看到他在强奸別人。當頭頭的頓時火起，一槍托向他砸去，其他的人則用半自動步槍的刺刀在他屁股上捅了好幾個窟窿。後來，這個強奸案釀成一個浪漫故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的附錄 E 中找到。

到了 1968 年，一些單位的武鬥隊紀律鬆懈了，沒有事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也擺些驕龍門陣。特別是在專縣跑的時候，見到長得乖的女生，或者見到穿得特別的女生，大喊大叫說怪話的也不少。在“紅旗三〇三”的時候，開車的是一個望江廠的工人，外號叫“水生”。每當遇到這樣的女生，他都得意忘形似的，丟下方向盤，拍手大叫：“好麥子（好妹子的諧音）！好麥子！”讓我們坐在車上的人提心吊膽。

當然，也有一些爛污崽兒，攬上一兩個爛污女生，跑到成都或專縣“亂來”。據說，有兩個永川的女生，在成都跟著重慶某技工校的崽兒鬼混，吃了別人的，用了別人的。後來要返家了，在火車上，那技工校的崽兒們強占了一個列車員室，將那兩個女生叫來，硬是將兩個女生輪奸了。那兩個女生跪下來求饒，那些爛污崽兒便威脅道，如果不答應，就將她們丟出車窗外去，其手段令人髮指！

還有一些爛污崽兒夥在一起，打著某一派的旗號，佔吃霸賒，欺壓百姓，亂攬女人，搶劫農民，被稱為“操民憤”。但是，這種現象畢竟不多，而且一旦被發現，就要被懲處。即使本單位的人不來懲處，外單位的人也可能要來懲處。在榮縣，我們“紅旗三〇三”就懲處了這樣一個爛污團夥。

多年後我聽人說，當年北碚猛虎團的一些人跑到隆昌、富順一帶，竟然有人開始嫖妓。據說，歷史上那一帶就以娼妓業出名，有某種傳統。重慶這些傢伙去了，不少是工人，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領到工資，於是就成了一些貧窮女性的找錢對象。畢竟是人，又年輕，長年在外，當然有性的需要，於是就有人藉此消解自己的性饑渴。

但是，一般來說，學生不比工人，拆爛污的要少得多。那些投入武鬥的男生女生，特別是跟著自己學校戰鬥團行動的，大多還是要表現出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別說行動，連言語也不敢猖狂。特別是女生，把性當作是一種極端低級極端下流的東西，不少人根本就不懂。如果哪個男生敢于在女生面前做個小動作，很可能就挨上一耳光，還可能引來“打流氓”的喊叫，讓你下不了臺。那時，牛虻和保爾是年輕人的偶像，即使有了性的衝動，或者有了愛情衝動，也要像牛虻和保爾一樣，把那衝動壓制下去，表面上還要做出一副冷漠樣子來。

南岸竅角沱中學的反到底派頭頭，人長得又小又黑，但極聰明，外號叫“小腦殼”。1968年4月，我們一起“逃難”到了樂山，住在地區醫專。吃飯的時候，一個女生可能是真的喜歡他，分菜時給他多分了一點，他竟然大發其火，把那女生罵了一頓。幾個男生趁機在一旁說笑，他一時怒起，竟然又拿起那土陶罐罐的飯鉢鉢，向那女生擲去。不是躲得快，那女生頭上肯定開花。後來我聽說，他和那女生還真的有點“那個”呢。

1967年9月初，我們交槍後回到學校，不知是誰在八一五戰鬥團的團部找到幾封情書，寫信的人是高一年級的，還是八一五戰鬥團的一個頭頭，是寫給他同班一個女生的，雖然滿紙都是革命言詞，但却寫得情真意切。我們井岡山戰鬥團那個一號頭頭看了，可能也受了感動，又拿給我看，還說：“此人不錯，肯定是一個好人。”話語中好像還充滿著羨慕。可是，我那時還真的不太懂事，除了從小說上讀到過之外，還真沒有讀過這樣的情書，也就不能從那革命言詞中去把握寫信人的感情。我讀後不以為然，心底裏還多少有點嘲笑，便揉成一團丟出了窗外。現在想來，如果保留下來，那還真是一件“文物”了。後來，那寫信人與那女生究竟如何了，也不知道。

我們井岡山戰鬥團的那個女頭頭，人長得並不漂亮，但不知為什麼，另外幾個頭頭都私下愛上她，却都不敢表露，我們也不知道。有一次，她在街上被八一五派抓走，弄得那幾個當頭頭的像熱鍋上的螞蟻，連夜連晚開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通過各種

關係，想了各種辦法，才讓八一五派第二天把她放出來。那天晚上，我們都不知道，那個一號頭頭一個人獨自躲在廁所裏，哭了一個鐘頭。另一個頭頭張正華則不給任何人講，獨自帶了兩個亡命徒，各提一支手槍，連續三天晚上溜回學校，發誓要報銷對方兩三條命來報復。只因對方戒備森嚴，晚上又無人敢出據點一步，才未造成血案。可是，他們都緘口不說，表面上好像都是正兒八經的，實際上心中都有“鬼”。這些事，連那個女頭頭自己也不知道。下鄉到農村後，還是她主動，最後才和那個一號頭頭結為秦晉之好。

當然也有不壓制自己感情的人，趁著武鬥，相互追求，或者在生死搏鬥中產生了戀情，最終結為秦晉之好的，幾乎每個單位（包括每個學校）都有，但不多。像我們學校井岡山戰鬥團，好幾百人的隊伍，最終也只那麼兩對而已。除了一號頭頭和那個女頭頭之外，另一對就是周大齊和林明。我們“逃難”往專縣跑，他們兩個都留下了，一個留在“紅中司”，一個留在鐵路局，相距不遠，正好加強來往，增加感情，後來也真的成了很幸福的一對。畢竟是在榆林彈雨中戀愛上的，一旦結合，感情也就深，生活也就幸福。

也有像電影《楓》所描寫的那樣，男女各是一派，但觀點和派性往往擋不住愛情，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演繹出一個個相當精彩的故事。本書附錄 D 《被押下車的情人》，就是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到後來，當初那些還不懂愛情的人，那些還沒“醒”過來的人，那些有機會而又沒抓住的人，對那些在文革戰爭中戀愛成功的人，既羨慕又嫉妒。如今大家都年過花甲，但有時聚會，依然還有人在感嘆：“當年啷個那麼蠢喲！”既有男生這樣感嘆，也有女生這樣感嘆，好像那一場文革戰爭真的是戀愛的最佳季節！

1968 年 9 月，各個學校的兩派都回校“復課鬧革命”，一些人拋棄前嫌，衝破兩派隔閡，要起朋友來，也演繹了不少浪漫故事。我一個同年級同學，本來是八一五派的鋼杆，被手榴彈炸得滿臉都是肉疙瘩，他竟然喜歡上了他同班一個反到底派的女生，硬要

和她要朋友。不知他使用了什麼“道法”，兩人也的確戀愛起來。後來下鄉，不知他為何又沒有和學校大部隊一起走，結果造成兩人各在一方。可能是太思念了，下鄉不久，他還專門跑到忠縣我們公社來看望過那女生。後來又不知是什麼原因，這場戀愛終究沒有成功。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在家跳“鍋邊舞”的逍遙派。他們中不少人吃了飯沒事幹，便陷入愛河中。1968年8月，我們在宜賓時，就來了一個同年級的同學，還帶著一個小學的女生（已經16歲）。他從來沒參加過我們的活動，到宜賓來是來“躲禍”的。原來，他把那女生的肚皮弄大了，想到醫院去墮胎。我們很看不起他，也不理他。可能是醫院也不理他，住了一兩天，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後來，那女生就為他生下一個孩子。我們下鄉後，他還把他那孩子帶到鄉下來耍過，那孩子都可以走路了。像他這樣早在1968年便生了孩子的，我們學校就有好幾個，全是呆在家裏的逍遙派。

還有就是那些比較安定的地區，那些某一派占了絕對優勢的學校，沒有武鬥可打，一些崽兒閑著無事，便“亂來”，強奸的，亂搞的，都有，個別的甚至相當嚴重。望江廠有個民辦中學，其中有一群爛污崽兒，抓來一個“五類分子”，也不管別人是孕婦，竟然把那女子輪奸了，其獸行令人髮指！這些傢伙，後來大多數都沒有能够逃脫法律的制裁。

武鬥那個年代，性是最嚴厲的禁忌。“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雖然到了一定年齡，正常的人都會有性的衝動，都會有戀愛的需求，但是我們那一代人中的相當大一部分人却不善于表達，越是所謂的“好學生”，越是所謂的“高才生”，越不懂怎麼去戀愛。這樣的人真正戀愛成功的，也極少。怎樣去戀愛（更不要說怎樣做愛了），老師不會教，家長也不會教，而這樣的事要無師自通往往很困難。可能正因為如此，到後來出現了許多讓人匪夷所思的事。1968年3月，我們住在四川省農科院，一個高中同學可能是遺精，醒來不知所措，竟然指責睡在一起的人“耍流氓”，為此差點打架。不過，到後來也的確有些人“耍”

這樣的“流氓”：不知是從誰開始的，趁別人睡著了，把一張草紙弄濕，貼到別人的腳板心上，然後用報紙之類往那草紙上扇風，據說就能讓那人遺精。此風在“逃難”人群中甚至很流行了一時。我就被這樣貼過濕草紙，但一貼我就醒了，讓我憤怒得要和對方打架。不過，與其說這是“耍流氓”，不如說是開玩笑。

那些“逍遙”的人在家一天無事可幹，更要生出一些奇怪事來。據我一個同班同學說，下鄉前，他們幾個男生竟然同時和一個女生做那種事（淫亂），而且那女生還是自覺自願的，只是要他們一個一個來！

武鬥全面停息後，也就是1968年年底後，重慶出現了一些北方來賣假藥的人，在街頭上拉起圈子，為兜售所謂的“紫河車”，轉彎抹角講些性知識。那時武鬥不能搞了，復課也沒有真的“復”起來，像我這樣的學生有事無事就到街上去閑逛。只要沒有遇到認識的人，就圍上去聽。我們這一代人最早的性啓蒙老師，竟然是這些傢伙，現在想來好可悲啊！

41. 重慶崽兒

北京男子被稱爲漢子，上海男子被稱爲小生，而重慶男子則被稱爲崽兒。據考證，崽是孩的音變字。楊雄《方言》：“崽，子也。”李實《蜀語》：“謂子曰崽。”高士奇《天錄識餘》：“今北人罵頑童曰崽子。”重慶男子潑野放縱，總給人一種幼稚而不成熟的感覺，因而被稱爲崽兒。不僅十幾二十歲的自稱崽兒，就是三四十歲的也常被人稱爲崽兒。不僅男子稱爲崽兒，女子也可稱爲妹崽。不僅那些社會底層愛說下流話的人，也就是所謂水流沙壩的人被稱爲崽兒，連一些文人學士也以當崽兒爲榮。有一年，《重慶晚報》編了一本書，就叫《重慶崽兒重慶妹》。

重慶古屬巴國。巴人尚武好鬥，稱著于史。但是，歷史進化了兩千多年，現代重慶人留有巴人血統的，幾乎絕無僅有。不知爲什麼，巴人那好鬥的脾氣却在現代重慶人身上發揚光大。有人說，重慶氣候炎熱潮濕，重慶人又喜歡麻辣燙的飲食，這影響著重慶人的性格。乾燥、粗魯、好鬥，再加鬼心眼多，使重慶崽兒在武鬥中大顯身手。在成都，在專縣，重慶崽兒的名聲都相當了得，幾乎無人不感嘆。

首先，重慶崽兒不怕死，愛惹事，喜張狂，越是危險似乎越有刺激。1968年4月，三十八中的一夥學生搶了一輛卡車，準備開到綿陽去搶槍。那時的司機，絕大多數都是無師自通，都是“黃司機”（指技術不好的司機），往往把車子開得東搖西擺的。路上要過一條河，先是順著河的流向的一個長下坡，然後是一個90度的急彎，然後上一座大橋。“黃司機”也不管那麼多，下坡不減速，見到急彎就是一盤子。車上的人看到那河邊洗衣服的姑娘，拍手高喊：“好麥子（好妹子的諧音）！好麥子！”都沒注意。卡

車一個急轉，把車上的好幾個人都甩了下去，甩到那河灘上，長躺躺的。卡車開到大橋中間，司機才發現出了事，急忙停下去看。哪知那些甩下去的人却爬了起來，哎喲哎喲亂叫，然後又哈哈大笑。原來那是沙灘，又不太高，沒有傷著他們。後來，他們給我講起，都還笑呢。

其次，重慶崽兒又敢于先下手，問三不問四，打了來再說。在成都，只要發生武鬥（幸好那兒武鬥並不厲害），打頭陣的都是重慶崽兒。1967年12月，成都“八二六”在人民南路廣場開了一個什麼會，然後游行。隊伍走到工人文化宮門前，占據文化宮的“紅成”開動喇叭大喊大叫。成都人無所謂，自己游行自己的，不予理睬。游行隊伍中的重慶崽兒卻被激怒了，便有十來個邀約在一起，往廣播站大樓裏衝。于是便打起來，于是便有更多的重慶崽兒到附近的雜貨鋪去搶來扁擔鐵鏟什麼的，衝上去支援。片刻功夫，便將那廣播站圍得水泄不通。大約因為廣播站大樓裏築有工事，衝不上去。于是又有亡命徒爬欄杆，爬窗門，翻牆越壁，往樓頂上爬。廣播站裏畢竟是成都人，不像重慶崽兒那樣敢往死裏打，竟讓那些亡命徒爬上樓頂。爬上樓頂的重慶崽兒將那一排排大喇叭砸了個稀爛，從樓上摔下來。于是，樓上的“英雄”和馬路上的人一起歡呼，令成都人瞠目結舌。據說，被重慶崽兒這樣一打，“紅成”後來就只好撤退，工人文化宮也就被“八二六”派占領了。

重慶崽兒有槍，從不顯山露水，帶槍出門，大多子彈上膛，扯出來就可以射擊。這與成都崽兒完全不同。成都崽兒生怕人家不知道，把槍吊在屁股上，一甩一甩的，像個爛丘八，于是往往成了重慶崽兒下槍的對象。以至到後來，成都崽兒幾乎不敢帶槍上街，見了重慶崽兒便心虛三分，退避三舍。

武鬥中最“天”的是初中學生，十四五歲的，到懂事不懂事的，又最不怕死。如果平時就愛搞點小動作，搞點惡作劇，武鬥中更是什麼怪花樣也想得出來。坐土飛機、吊鴨兒鳧水、鑽工事、“下零件”（割鼻子耳朵什麼的）、剃女生的光頭，不曉得創造了多少刑法！有的比渣滓洞、白公館那些軍統特務都還要絕。二十九中

反到底派的一個女生被學校的八一五派抓住，八一五派將她那一對美麗的長辮子綾去，還在頭頂上給她剃了一個十字。那女生只好將頭髮全部剃去，跑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假髮戴上。有一次反到底派游行，在凱旋路抓到一個人，據說是八一五派的。一個傢伙衝上去，問三不問四的，便扯出小刀來，將那人的耳朵割掉。鮮血順著那人的脖子往下流，慘不忍睹。這是我親眼所見。我們學校那個女頭頭在解放碑大街上被八一五派抓到二十九中，挨打不用說了，竟被灌了兩大碗紅廣告色水！

據說，武鬥中被灌陰溝水的，甚至被灌尸水的，都有。南岸巒角沱中學反到底派中有一個外號叫“大眼鏡”的，就被灌過尸水，後來一提起就打乾嘔。他是九一縱隊紅二連通訊班的號手，一張稚嫩的臉上戴一個很大的眼鏡，斯斯文文的樣兒。別人告訴我，這個事不能直接去問他，一提起，他就要噁心，就要嘔吐。我只好問他們那個叫“小腦殼”的頭頭。“小腦殼”告訴我，他在沙坪壩被人“點水”，被抓到重大去，挨了一頓飽打。天氣又熱，好口渴，他要求對方給點水喝。求了又求，對方才遞給他半碗水。由於雙眼被黑布蒙住，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水，咕嚕咕嚕就喝了下去。喝下去了，對方才告訴他，那是尸水。他立即“哇”的一聲就吐出來，然後就不停地吐，把膽汁都吐了出來。“小腦殼”說：“那是不是尸水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は陰溝裏的水，髒得不能再髒的，八一五真的黑心！”後來，我看到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某人寫的回憶錄，也承認有過拿尸水給俘虜喝的事。

武鬥使好多重慶崽兒失去了人性，而且是失去了最起碼的人性。如果在戰場上，雙方真刀真槍的，你亡命一點，似乎還可以原諒，甚至還可以稱為英雄。而槍斃俘虜、毆打俘虜之類爛擺雜，哪還有一點英雄氣可言？越到後來，這種惡劣行為越泛濫，兩派的法西斯味道也越來越濃。小龍坎中學是1965年才新開辦的，只有初中一年級學生。那兒是八一五派的根據地，沒有武鬥可打。於是那些十三四歲的“天棒”崽兒便把本地區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集中到學校，施以各種苦刑，前後竟逼死十多人！活著出來的現在談起，都還心有餘悸。

不僅男生如此，女生也一樣，個別女生用皮帶打人比男生還凶。

重慶崽兒火氣大，手中有了槍，腰便硬起來，哪怕一個小把把小癟三樣兒的傢伙，也敢跳起來，扇牛高馬大樣兒的人的耳光。有時，哪怕是戰友，動輒也將槍扯出來，要武力解決，戰友也就可能演化成敵人。不過，往往又不打不相識，有時敵人又演化成朋友。在煤管局，我們與五十一中的崽兒發生矛盾，我們學校的幾個亡命徒趕來，一上樓便是一槍。那人雖然沒有被打中，却嚇得急忙趴下。後來，坐下來“拿言語”，那打槍的和那挨打的竟拋棄前嫌，成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重慶是個工商業城市，有繁榮的水陸碼頭。近代以來，各地商賈紛紛涌入重慶，例如陝西街便是當年來重慶做生意的陝西人聚居之地，還有贛江街，還有湖廣會館，以致當時的巴縣縣政都要問訊于“八省會館”。抗戰時期，大量的下江人又涌入。解放後，特別是“三線建設”期間，又有大量的北方人、上海人等遷移進來。這種背景使重慶人的江湖味特別濃。重慶崽兒講義氣，這種義氣發展到後來，就走向了反面，形成了黑社會。

早在文革之前，重慶的武術活動就很活躍。每天晚上，人民公園裏都有練打和練挨打的人，人稱操“扁卦”。那練挨打的其實就是學氣功，先讓人用巴掌打，然後再用拳頭打，再後就用扁擔鐵棒之類打。打一下，那挨打的人便“嗨——”地一聲，竟平安無事。武鬥後期，一些武鬥人員，還有一些在家閑悶了的逍遙派，便找上老武術師，紛紛操起“扁卦”來。同是一個師傅，也就不講反到底八一五了，於是便結為兄弟夥。有了這樣的兄弟夥，要“拿言語”也就方便多了。某人被對方抓走，便派人去找對方一派的兄弟夥，看到兄弟夥面上，私下活動，或勸或威脅，逼迫抓人的人放人。有這種功效，於是迅速普及開來。最典型的是市中區官井巷中學八一五戰鬥團（簡稱官中八一五），他們與好多學校的反到底派都夥到了一堆。我們南山中學的學生大多家住解放碑周圍，不少人與官井巷中學的學生是鄰居，是小學同學，因此，我們也和官中八一五夥到了一堆。有一天，我們一夥人坐在官中門

口要，被我們學校的八一五派發現，他們組織一夥人撲上去要抓我們。哪知，官中八一五的人一下衝出來，把他們打得個落花流水。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也就宣告兩派爭鬥已經變色，武鬥初衷已經改向。

發展下去，後來便形成黑社會那樣的幫派，一些“武鬥之花”便成了爲非作歹的地痞惡霸。據說，到 1969 年，市中區便有八大金剛、十二路英雄之類，其中就有我們南山中學的好幾個學生。那些“金剛”和“英雄”還很有些傳奇色彩。我們南山中學那個叫“耗兒”的同學，住在下半城的文華街。據說有一次，“群專”（群衆專政大軍的簡稱）來抓他，他竟從樓上跳下去，搶了一輛自行車，蹬起就跑。“群專”急忙跑下樓，要去追，他却把手槍向後一甩，“砰——”的一槍，駭得那些“群專”立即趴到地上，眼睜睜看著他跑掉。

還有我那同班同學羅朝忠，下鄉第二年春節他回重慶，就和街上鄰居崽兒們混在一起，參加了好幾次打架鬥毆。據說，他揮舞一根扁擔，敢于往人的腦殼上打，打倒過好幾個人，因此也曾揚名一時。幸好他收手早，後來被推薦爲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下場比我好多了。

最有名的還是電鍍廠一個姓周的傢伙。因爲罪大惡極，已經被抓進監獄，判了死刑，還沒有執行。經過謀劃，他假裝要去廁所解手。那守衛是個新兵，又怕臭，未跟著他進去，只是在廁所外面等候，哪知那傢伙趁機翻牆逃出監獄。他跑到成都和專縣躲了一段時間，又回重慶來。那天剛好碰到上清寺一帶戒嚴，兩個“群專”對他產生懷疑，便上前查問。他帶有一支手槍，一順手，便將那槍夾在腋下。兩個“群專”搜他的身，竟然未能搜著。他說他住在人民小學。兩個“群專”還是有些懷疑，便跟著他往人民小學走。走進那巷道僻靜處，那傢伙猛地回過身來，把槍對準“群專”，罵道：“硬要跟著老子走，想討死呀！”其中一個“群專”英勇，撲上去要奪那槍。他一揚手，就是一槍，將那“群專”當場打死。另一個“群專”轉身就跑，他又是一槍，打中了那人的屁股。那“群專”受了傷，心一橫，忍著痛，又返過身來要抓他。那時，他槍

中已無子彈，只好逃跑。聽見槍聲，四周的“群專”都趕了過來。他却從那陡坡連爬帶滾，跑到河邊，撲進嘉陵江裏，逃跑了。後來，他又潛回一號橋附近的工廠，還想再打死幾個人。他在那下水道裏躲了幾天幾夜，餓得受不了，才鑽出來，向一個倒尿罐的居民老婆婆討吃的。那居民老婆婆嚇壞了，急忙向派出所報告，民警趕來，才把他抓獲。幾天後，他就被槍斃了。

當時，我已經下鄉到了農村，這個故事是一個同學回重慶聽來後給我講的。那時，已經開始流傳諸如“一雙綉花鞋”、“三下南京”之類的故事，這個故事流傳很廣。那個同學在講這個故事之前，還講過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黃廉的，但因為太離奇了，我不相信，對這個故事我也不太相信。不過，這個姓周的從監獄中逃脫以及後來在下水道裏被發現，《重慶公安志》上有記載，肯定是真實的。但周某與“群專”的遭遇，我估計是有人編造的。

黑社會的形成，是武鬥的副產品，對社會造成危害，可能比武鬥還大。1968到1971那幾年，搶劫的，殺人的，打群架的，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成群成夥。以至不少街道、不少院子都自發組織起護院隊，也不管是哪一派的了，碰上來搶劫的，便一起打。黑社會團夥之間經常火并爭鬥，或是為錢，或是為地盤，或是為一個爛女人，幾十人成百人打群架，扁擔鐵棒亂砍亂舞，甚至火藥槍亂射。一場群架打下來，不知有多少人受傷，躺在馬路中間呻吟叫喚。“群專”費了好大的勁，都未有效遏制住這種群架。在下鄉的知青中，這種情況也普通存在，幾乎每個縣城都發生過知青團夥之間的毆鬥。我有好幾個同學，就因為參與過這種毆鬥，招工時大受影響，以至在農村多呆了好幾年。

耿直，講義氣，善變，是重慶崽兒的三大特點，但却透露出重慶崽兒幼稚。所謂耿直，不外乎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有錢就花，沒有城府，不加考慮，不留後路而已，這不正是不成熟的表現嗎？年輕人操社會，一個人勢單力薄，便要與人結成兄弟夥之類，於是就要講義氣。到了一定年齡，還把講義氣作為為人處世的第一要義，實際上表明並沒有獲得獨立于世的本領和力量，還要像年輕時一樣，依賴於他人。善變可以適應環境，可以有利于改革，

但沒有根基沒有原則沒有計劃的變，只能是小娃娃水平。事實上，在武鬥中，重慶崽兒的這些特點都暴露無遺。重慶武鬥成為全國之冠，打得最激烈，打得最殘酷，和重慶崽兒的這些特點不能說沒有關係。

如今，重慶人的火爆脾氣似乎有增無減，張口老子，閉嘴×媽，欺軟怕硬、凌強欺弱，動輒出手傷人的事，隨處可見。我們這一代人如今雖然多年過花甲，但也有不少人依然火氣衝天，“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一身戾氣，經常在公共場所撒野。記得文革前重慶人不是這樣，那時人們要講理得多，吵罵事倒有，動輒打人却極少見。現在這種壞風氣，說不定也是武鬥所造成的一種後果，也是文革的一筆可悲的遺產！

42. 人是怎樣變壞的?

1968年4月的一天，我從樂山到了宜賓，憑著一張證明，在體育場外面的接待站前排長隊領飯票。忽然，馬路對面鬧鬧嚷嚷的，涌來一大群人，說是抓了一個偵探。站在我前面的一個崽兒給我打了一聲招呼，便衝過去。只見他邊跑邊從屁股後面扯出一把匕首來，衝過馬路，一把抓住那“偵探”的膀子，不開腔，不放屁，二話不說，往那“偵探”腦殼上就是一刀。那“偵探”只見那匕首的寒光一閃，身子發軟，那腦殼下意識一偏，便癱軟在地上。匕首刺進了那“偵探”的肩胛，鮮血一涌就出來了。看熱鬧的，押“偵探”的，以及馬路這邊排隊的，全都驚呆了，盯著那崽兒，似乎他是外星人。那崽兒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將那匕首在鞋跟上揩了兩下，插回刀鞘，神態自若，不慌不忙地走回來，向我一笑，又站進隊列中，讓我好一陣都回不過神來。

後來，我問他：“你心好狠，啷個下得了手喲？”他不回答，只是把頭低下來，分開亂蓬蓬的頭髮給我看。那腦頂處，有一條明顯的傷疤。他告訴我，他是解放碑民辦中學的，住在朝天門節約街。讀書時，他是絕對的好兒童，各科成績都不錯，數學成績特別好，從來不低於95分。不打架，不葛孽（鬧矛盾）。剛滿15歲就入了團。他雖然是反到底派，但武鬥一開始，他就“逍遙”了，回家跳起“鍋邊舞”。有一天，他上街去買菜，路過小什字人民銀行大廈，住在樓上的同校的八一五派看見了，竟從樓上丟磚頭下來，剛好打在他頭上，把他當場打翻在地，血流滿面，昏迷不醒，還是路過的鄰居老大伯把他背到醫院去的。

“他們好歹毒，打在老子腦眉心上，幸好沒打死喲！”他惡狠狠地對我說，“躲在醫院裏，我好氣。出了院，我就不再‘逍遙’

了，發誓要報仇，賺回來。這是老子殺的第三刀，老子發誓要殺他十二刀！”

武鬥中，你殺過來，我殺過去，人性就在這樣的你來我往中泯滅。那年月，街上最多的標語就是：“血債要用血來償！”你向我討還血債，我向你討還血債，仇恨也就越來越大，武鬥也就逐漸升級，人也就開始逐漸瘋狂，失去理性，失去人性，越變越壞。

應當說，開始的時候，武鬥的參與者們大多數都還是好人。長期的“革命教育”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思想單純熱情。就以反到底派的武鬥總司令鄧長春為例，文革前，他就是車間團支部委員。有一次，和他住在同一個寢室的師兄弟生病，鄧長春二話不說，就背著他到醫院，後來還為他熬稀飯，還悄悄買來水果糕點，放在他床頭。不過，他病好後，鄧長春見他沒有反應，竟悄悄要他寫一篇表揚稿，表揚他鄧長春做了好事。後來，我進了望江廠，認識了他這個生病的師兄弟，他給我講起這個故事時，既稱贊又好笑。

不可否認的是，文革前那幾年，正是學雷鋒的年代，像鄧長春這樣的故事到處都是。我那時雖然年齡還小，也做過不少好事。讀小學五年級時，學校作文比賽，我就寫了這樣一個做好事的故事，竟然得了第一名。不過，我沒有像鄧長春那樣，要別人給我寫過什麼表揚稿。可是，不過一兩年，我們這一代單純熱情的青年學生青年工人，却成了武鬥幹將，成了武鬥司令。像鄧長春這樣曾經以助人為樂的人，竟然親自組織攻打駐軍，攻打朝天門，攻打上新街，還親自批准槍斃俘虜。他是怎樣變壞的呢？如果參加武鬥的人都被認為是壞人，那麼我們又是怎樣變壞的呢？

從組織的角度來說，開始的時候，各種戰鬥團、武鬥隊的紀律也是相當嚴格的，經常組織大家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違反紀律的人動輒給予處分，甚至送交駐軍懲處。如果沒有約束，形勢那樣亂，手中又拿著槍，不知要幹出多少壞事來。武鬥中也發生過搶劫，例如搶槍、搶車、搶船等等，那畢竟是為了武鬥，搶來的東西只供集體使用，不得私自裝進腰包。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攻打上新街後，曾搶劫了位於上新街的雨衣廠，我們黃

山紅二連的人也被派去當搬運，我當然參加了，但并不是誰搶到手就歸誰。搶回來後，全部集中，然後才給我們每人發了一件雨衣。交槍的時候，要我們交還雨衣，也有人交還了，但也有人沒有交還。我也沒有交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這甚至成了我的心病，覺得自己貪了國家的便宜，損害了國家財產。後來，那件雨衣被一個同學借去，再沒有還給我，說是搞丟了，我的心才慢慢平靜下來。

1967年7月底，我跟著柴油機廠的人一起上了黃山。柴油機廠是反到底派掌權，離開廠裏時，他們帶走了廠裏的4萬多元現金。由於走得匆忙，大家身上都沒有錢，幾個頭頭開了好幾次會，準備給大家每人發20元。但是有人反對，說這錢是國家的，不能亂動。為此爭執起來，一直決定不下來。後來，看到大家身上沒錢的確不方便，還是黃景華的妻子張麗珍（她是一號頭頭）拍板，才決定發錢，但是要每個人都簽字畫押。據說，那20元錢後來都從各人的工資中扣除出來，還給了廠裏。我和同班同學羅朝忠的40元，不知還沒還，或者是誰幫忙還了。

還有學校的助學金，不管是哪一派在掌握或者是兩派各掌握一部分，都是嚴格控制著的。即使發給武鬥人員每人10元或20元，也都要簽字劃押的。武鬥停止後，各個學校都要查助學金的來龍去脈，兩派都能拿出完整的單據之類來，沒有聽說哪個單位哪個學校有人敢貪污的。1968年4月，我們在自貢時每人發了20元，頭頭們也是研究來研究去，讓大家簽字畫押，承諾今後如果追查起來要還轉來，最後才決定發的。雖然後來沒有叫我們還這筆錢，這筆賬却算到了頭頭身上，作為他們的一條罪狀。我們下鄉後，1971年8月，學校工宣隊還派人來調查，企圖懲處我們的一號頭頭。只是後來那“批清”運動因林彪自我爆炸戛然而止，此事才不了了之。

可是，越到後來，武鬥人員中搶劫的、强奸的、亂打亂殺的壞事就越多，“污”（偷）東西，“飛”軍帽甚至成了一股風。更有甚者，個別學校的武鬥隊專事搶劫，墮落為黑社會組織。那麼，為什麼人會變壞？又是怎樣變壞的呢？

我們說的“壞”，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野心膨脹，一

心想當官，想掌權，那多半是些當頭頭的人，像鄧長春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們變壞，首先是派性的腐蝕，其次是林彪、江青那樣的人物引誘。我就聽到過好幾個人說：“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林彪的接班人就是我！”這在前面章節中已經分析探討過，且不贅。“壞”的另一個含義是指爛污。“污”在重慶話中是一個詞義很廣的字，既可作名詞，又可作動詞，還可以作形容詞。例如作名詞，有“污教”的說法，也就是混亂、壞、違法犯罪之類意思。例如作動詞，“污東西”就是趁人不注意，把別人的東西偷走。例如作形容詞，那些做壞事的人就被稱為爛污崽兒。但是，“污”的全部含義，大約只有當年的重慶人才會真正明白，如今很難將其講解清楚。只是有一點是明白的，就是指人們常識中的壞和壞事。

文革期間，全國都是無政府狀態，尤以重慶武鬥的那兩年為最。一些最早“醒”（這又是一個含義很廣的字，再一次表明重慶人語言的形象和豐富）了的人，既不參加反到底派，又不參加八一五派，但又儘量與兩派拉通關係，趁機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1967年9月，我們回到空蕩蕩的學校時，只見兩個傢伙挑著大麻袋往小路上走。抓住一查，那是兩個高一的學生，都是所謂的逍遙派，那麻袋裏竟是學校圖書館的書，不是小說、畫報之類，而是《辭海》、《辭源》、《資治通鑑》等大部頭。兩個傢伙承認，偷這些書是為了今後賣錢的。當然，這兩個傢伙免不了要挨我們一頓飽打，可誰知他們已偷走學校多少東西呢？圖書館已經空空如野，試驗室的顯微鏡等設備也不翼而飛。這樣的傢伙各個學校都有。

更有一些傢伙邀約在一起，避開本單位本學校的兩派，打一個旗號，專幹偷拿騙吃搶劫奸淫之類的勾當，實際上已經成為黑社會團夥。到1968年下半年，重慶城出了很多這樣的團夥，甚至公開搶劫居民大院。一些居民大院便組織自衛，那時也不管是哪一派的，有槍的拿槍，有鋼針的拿鋼針，一致對外。據傳，大梁子（新華路）某大院的人就曾打死過搶劫的強盜崽兒。更有一些“爛污”團夥跑到專縣，佔吃霸賒，欺壓百姓，亂攬女人，搶劫農民。1968年5月，我們在榮縣打掉這樣一個團夥後，當地“土砸”還

敲鑼打鼓來慰問我們，感謝我們為榮縣除了一害。類似的事，據說在其他地方也有過。

無政府主義泛濫只是人變壞的外部條件，最根本的還在人自身。其實，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在不同的環境中，這種好的或壞的也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發展。在社會秩序混亂的背景下，爛污崽兒來引誘，一些好人也可能變壞。到1968年上半年，大街上佔吃霸賒、哄搶強買的現象已經隨處可見。一些武鬥人員買了東西不付錢，別人要便遞上幾顆子彈，甚至亮出手槍手榴彈來威嚇，與明火執仗搶劫已無多少差別。到1968年底，重慶城忽然刮起一股“飛”軍帽的風。大街上，誰戴有軍帽，不管是當兵的，有沒有帽徽，稍不注意，便被“飛”走。“飛”者，搶也。我曾有一頂軍帽，就是在解放碑街上，被電車上一夥崽兒“飛”去的。看著電車開去，車上的崽兒哈哈大笑，我却無可奈何。

首先開始變壞的是民辦校、技工校的。當年考學校，一般都是普通中學（包括初中高中）招滿後，民辦校、技工校才從落榜生中招生，因而其素質也就差得多。武鬥中，民辦校、技工校的一開始就大出風頭，這也是一個原因。到後來，這些學校的崽兒首先開始“污”，開始亂搞，最後陷入黑社會的也多。

不幸中的萬幸是，文革及武鬥都是在當年那種革命的禁慾主義時代進行的。如果現在有人發動，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再來一次那樣的武鬥，在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進行，不知會發生比當年多多少、壞多少的壞事，不知會給中國和中國的老百姓造成多多少、壞多少的災難！這樣說，並不是否定現在的環境，而是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的確已經惡化，個別地方那惡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當年武鬥時的狀況。

當然，如今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的惡化，文革（當然也包括文革中那場戰爭）應當承擔相當大一部分責任。正是當年對道德觀念的大破壞，造成了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大敗壞。無序的社會治安和不良的社會風氣在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又得到惡性發展，才有了如今的結果。

43. 滿懷深深的懺悔

武鬥人員開始變壞，說明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破產。

毛澤東曾經說過，正義戰爭是社會的消毒劑。文革這場戰爭當然說不上是什麼正義戰爭，但至少是在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戰爭。這場戰爭不但沒有給社會“消毒”，反而給社會增添了更多的毒素。文革是從破“四舊”開始的。1966年六七月間，只要帶點“舊”字的，只要包含有“舊”的內容的，或者僅僅只是有一丁點兒“舊”的感覺的，甚至與“舊”不搭邊但不符合“革命原則”或者“革命性”不那麼強烈的，都要破，都更改。那時，我們都在努力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都決心要做社會主義一代新人。結果不到兩年，這些被大“破”特“破”的所謂“舊”東西，却打敗了大“立”特“立”的“新”東西，竟然在號稱最革命的武鬥人員中開始重新蔓延。當年懷著一顆“紅心”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投入到這場戰爭中的人，卻被各種各樣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污染，不僅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沒有“立”起來，那顆“紅心”反而開始變“暗”變“黑”。一旦變“黑”，就再也難以洗乾淨，再也難以變回去。如今年過花甲了，那被污染的靈魂，依然還在頑強表現著，讓我們這一代人成為戾氣的一代，經常引起年輕人的不滿。以至有年輕人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從做新人開始，到成為“壞人”結束，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相信，我們當年也是有信仰、有理想的。我們正是懷著這樣的信仰和理想投入到文革戰爭中，把“腦殼挂在褲腰帶上”，出生入死，“完蛋就完蛋”。但是，那樣的信仰，

那樣的理想却是建立在虛誑的基礎上的。兩年多的武鬥，血與火的殘酷現實，讓人不得不開始反思。特別是在文革戰爭這兩年多的時間裏，“城頭”不斷地“變幻”著“大王旗”，今天捧這一派，明天捧那一派，今天“三一五”，明天“四二六”，讓人弄不清“最高統帥”那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信仰逐漸破滅，理想灰飛烟滅。

這種心理首先從大家開始“操”兄弟夥這個現象中反映出來。

到文革戰爭後期，也就是1968年春夏之際，“操”兄弟夥已經成了武鬥人員的普遍現象。不僅在本派人中“操”，而且也在對立派人中“操”。那時，重慶城裏已經形成兩個有名的兄弟夥團夥，一個以官中八一五為核心，占據了上半城的地盤；另一個以群林中學敢闖戰鬥團（簡稱群林敢闖，屬反到底派）為核心，占據了下半城。兩個兄弟夥團夥，都大量吸納對立派的人當“兄弟”，勢力也就越來越大。開始，兩派那些正牌組織對此都看不慣，或者壓制，或者抵制，但哪知願意去當兄弟夥的人却越來越多，加上有時也需要這樣的團夥從中協調，于是就看著這樣的團夥一天天坐大。

我們南山中學的學生，絕大部分的家都住在城裏，以解放碑為中心，散布在上半城和下半城。或者因為是鄰居，或者因為是小學同學，或者因為父母之間有某種聯繫，於是不少人就陷到這樣的團夥中去了。後來，連我們戰鬥團的頭頭，也開始與官中八一五的人稱兄道弟。那位女頭頭被我們學校的八一五派抓捕後，我們戰鬥團的頭頭還親自出面，請官中八一五的兄弟夥幫忙，迫使對方放人。

不知為什麼，我家住的那條陋巷的人都知道我在黃山參加了武鬥，甚至把我當成了頭頭。我回家，就有人來找我，要拉我當他們的兄弟夥。一個二十九中八一五派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小頭頭，就來找過我幾次。他比我大，瘦瘦的，操了幾天“扁卦”，不知為何高看了我。那時我還沒開始變“壞”，也就虛以應付，沒有和他“操”成兄弟夥。

兄弟夥之間，要互相維護利益。為了兄弟夥，“革命原則”也只有讓步了。既然不再講“革命原則”，所謂信仰，所謂理想

也就失去了意義。到後來，那些當上了革委會委員之類“官”的頭頭們，也就只剩下爭權奪利。當他們受到官復原職的老幹部壓制時，也就和當年的對手“相抿一笑解恩仇”，放棄前嫌，結成幫派。黃廉、周家喻就是這樣的代表。到文革後期，他們兩人幾乎是人影相隨，意氣相投。至少在我們這樣的人看來，他們已經成了最要好的兄弟夥。

不能說“操”兄弟夥就是變壞，但的確有好多兄弟夥團夥後來成了黑社會，不少人甚至違法犯罪，甚至無惡不作。事實上，重慶人都是另眼看待那些“操”兄弟夥的人的，總覺得他們不正道，甚至把他們當作壞人。

雖然我沒有去“操”過兄弟夥，沒有去偷拿拐騙，沒有去打架鬥毆，也沒有想到要當官掌權什麼的，但我在那兩年裏也同樣開始變“壞”。這樣的“壞”至今也附在我身上，想改也改不了了，也真是“壞人”變老了。在我身上，最突出的有三“壞”：一是擠車，二是逃票，三是和人爭吵的大嗓門。

文革中，特別是在那兩年中的戰爭狀態裏，公交車雖然並沒有完全癱瘓，但却很不正常，擁擠程度不是現在的人們能够想像的。我家住在朝天門，要經常去體育館，不能不坐車。于是就學會了擠車。不管車好擁擠，我幾乎都能擠上去，至今我的擠車“技術”也堪稱一流。前幾年上班，我要在南坪坐車。那路車上下班時的擁擠程度，在重慶都有點名氣。但我幾乎從來沒有被拉下過，再擠也要擠上去，也總能擠上去，以至有幾個售票員都認識了我，說我年齡這樣大，比年輕人還會擠。

與擠車相似的是插隊，重慶話叫插輪子。不管隊站得是長還是短，我都要想方設法插進去，盡可能少站一陣。我插隊的“技術”也堪稱一流。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經常去北京出差，每次在北京買車票，我都天亮了才去，從那人山人海的買票人中插到最前面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票買到手，讓那些等了一個晚上的同事驚詫。不過，如今排隊現象越來越少，我的“技術”也失去了作用。

如果說會擠車會插隊還不能說是“壞”，那麼逃票就真的是壞了。那時家裏窮，又要經常坐車，哪有那麼多錢買車票？于是

就學會了逃票。上車前撿一張廢票，拿在手上或貼在口唇上，很容易就混過去了。住在體育館那一年多裏，有人就開始偽造月票，偽造得像模像樣的，在售票員面前一揚就混了過去。那時，售票員也不認真，甚至不用偽造的，隨便用個什麼本本，也可以混過去。由於混得太多了，習慣成了自然，後來工作了，有了收入，也經常逃票。只要能逃就逃，甚至被抓住了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有一次，我去歌樂山上看朋友，來去換了七八次車，竟然沒買一張票，現在想來也匪夷所思。

還有就是大嗓門了。我這人喉結大，嗓門也大。文革中與人辯論，難免不提高聲調。我又好和人辯論，不管是和對立派辯論還是和戰友辯論，都自以爲是，說話像吵架一樣，潛意識中無非就是想用音調壓住對方。這樣的習慣直到現在也沒有多大改變，打個電話都像與人爭吵，經常引起同事的詫異和誤解。有一次，我們在車上，一個人橫穿公路，差點被撞上。我伸出頭去訓斥那人。不知是我的樣子還是聲音特別，同車的年輕人竟然說：“搞過武鬥的人的確不同，好凶！”當時就讓我一震，不知如何回答。後來我想了又想，只好用我還沒有養成動手打人的惡習，更沒有動刀動棒的衝動，自我解嘲而已。

當然，兩年多的文革戰爭，也給我留下了一份精神財寶，讓我學會了堅強。

戰爭是殘酷的。在兩年多的文革戰爭中，我看到過太多的血，抬過被打死的人，拾過同學的遺骨，對生死好像也相當超然了。那時，我也真的不怕死，才敢做那麼多危險的事。後來有段時間我對死這個主題很感興趣，爲此專門看了不少書，進行了一點研究，還準備寫小說來反映我的思考結果，結果也真的寫過幾個短篇，有的還發表過。直到現在，雖然離死亡越來越近，我對死也沒有感到過恐懼。雖然已經沒有當年那種“該死鷄兒朝天，不該死鷄兒朝地”的豪氣，但即使死神直到面前我可能也不會惶惶不可終日。

經歷過戰爭的人，往往能够泰然面對失敗和挫折。這一生，我經歷過的失敗和挫折可謂多也，但不管怎樣的失敗和挫折都沒

有讓我趴下。且不說農村的日子，艱苦的生活和勞累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就是第一批招工因有人打小報告說我殺死了人，公社不讓大隊推薦我，雖然讓我失望，讓我氣憤，我也忍受下來。即使在“說清楚”運動中我挨整的日子裏，面對批鬥，面對處分，我也沒有對自己灰心過。很多事情，一次二次三次，甚至十多次的失敗，我依然堅持。有一年，我還寫過一篇近萬字的《失敗論》，總結我的失敗經驗和我對失敗的思考。本來很想就此寫一本書，後來因閑雜事太多，才放弃了。

可能正因為如此，我不相信命。記得那是1976年的一天，我去羅朝忠家，他不在，他家也沒人。他家鄰居叫我坐坐，我就坐在那吊腳樓下。那鄰居是一個滿臉大麻子的老太婆，當年經常在解放碑周圍賣衣服刷子之類，解放前是重慶城有名的“鐵嘴”，據說連蔣介石、馮玉祥、郭沫若等人都找她算過命。她裝著無意的樣子，問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後就給我算了一命。她說我三十歲前有一場大災大難，不死也要脫層皮。我對她說，武鬥中我已經經歷過好幾次危險了，不怕。她只笑笑，沒有和我多說。後來我才知道她所說的不是我武鬥遇到的危險，而是後來“說清楚”運動中我的遭遇。即使如此，我也不相信命。我曾寫過一首《鷓鴣天》，其中兩句：“唯物者，膽氣橫，敢與天命比輸贏。”如今雖然年過花甲，我不知道我是賭輸了還是比贏了。命運無非就是生命運動的軌迹，生命運動結束，軌迹就消失，而生命如何運動還是要看自己的了。

如今，我們這一代人動不動就用“青春無悔”來寬慰自己。不知是我從來沒有過浪漫還是很小就承擔著生活壓力，我討厭“青春”兩個字，更討厭無原則的所謂“無悔”。文革戰爭那兩年多，正是我們最美好的“青春”，我們却在打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給我們帶來的傷痛和後遺症都可以不論，問題是這樣的戰爭荒唐透頂，沒有任何一點價值，反而給社會造成巨大損害，還能“無悔”嗎？如今，年輕一代罵我們“壞人變老了”，我們還能“無悔”嗎？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一直滿懷著深深的懺悔。

44. 贖罪的日子

1968年9月初，我們結束最後一次“逃難”，從宜賓回到重慶，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風向變了。雖然還有一些小的衝突，但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武鬥已經沒有。接著，就開始交槍。可能是中央的壓力太大，這一次駐軍也頂不住了，也逼迫八一五派全部上交。1968年10月，我們回到學校，一個由重棉三廠（裕華棉紡廠）老工人組成的工宣隊也進駐學校，帶隊的竟然是學校附近那個駐軍連隊的一個班長。那人胖乎乎的，我們叫他小胖娃，和八一五派關係很好，對我們總想打壓。工宣隊的人大多也是八一五派觀點，其中幾個人的派性還特強，動不動就和我們發生爭執。在工宣隊主持下，兩派開始談判，很快就達成協議，成立了學校的革委會。那時，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委會，都要向毛澤東發致敬電，流行一種近似于駢文的文體，極盡鋪排誇張，極盡華麗詞藻，內容却大同小異、空洞無物。本來，一個中學成立革委會，不必也不需要搞這樣的致敬電，為了顯示我們的才能，也是為了“踏屑”學校八一五派沒有人能够寫得出來，我們反到底派的一號頭頭是學校第一才子，親自動筆，洋洋灑灑寫出兩千言，讓我們贏了一局。只可惜那致敬電沒有保留下來，否則列于此，也可供讀者欣賞欣賞那時的文風。

回到學校，成立了革委會，兩派鬥爭暫時告一段落，但兩派間的對立情緒依然很大。畢竟經歷了一兩年的生死搏鬥，一紙協議怎能消解那麼多的仇恨？人多的，有幾個亡命徒的，便結成一夥，私下找對方某人算賬。派性組織解散了，已無靠山，被算賬的只好“下矮樁”，撒上一圈好烟，說一堆好話，或者找朋友來“拿言語”，進行調解。也有強硬的，於是便打架，操場上幾十人百

多人對打，扁擔菜刀亂砍。我們學校那個外號叫“耗兒”的，帶了兩支短槍回到學校，找到八一五派中號稱最“天”的人，要一人一槍決鬥。他丟了一支槍給對方，叫對方自己選距離，30米60米都可以，還讓對方先開第一槍，然後他再開第二槍，直到打死一個為止，誰被打死誰該遭。後來聽說，那兩支槍都是假的。不過，對方卻被“耗兒”這樣的氣勢駭倒了，哪還敢接槍，駭得只好說好話，“拿言語”。當時，操場上圍了好多人，兩派都有。可能是“耗兒”這一招，打擊了八一五派的囂張氣焰，他們想找我們算賬的企圖只好收斂起來。後來聽說要上山下鄉了，幾乎所有的人都蔫了氣，紛紛找自己的出路。鑑於兩派仇恨難消，便相互約上本派同學走到一堆，到一個公社或一個大隊落戶。

同學之間的恩恩怨怨也開始發酵。這些恩怨既有因兩派鬥爭引起的，也有因某一派內部矛盾造成的。為此打架鬥毆、“下矮樁”、“拿言語”之類的事也經常發生。1967年2月，幾個同班同學把我和盧光忠打了，結果被高三的同學教訓了一通。回到學校後，他們開始想報復我，後來知道我在南岸的熟人朋友多，就不敢了。趁我不在，他們找到曾經打過他們的高三同學，想打回來。那高三同學“下矮樁”，又有其他同學來“拿言語”，才將此事平息。

1968年12月25日晚上，我和幾個同班同學到盧光忠家中去看望他父親，說了一些安慰話後出來，走到解放碑，便聽見滿城都在廣播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們都感到震驚。一個參與過武鬥的同學竟發牢騷道：“為保衛他我們出生入死，打了那麼多仗，現在却要把我們放到農村去當農二哥！”於是，大家心裏便涼悠悠的，空蕩蕩的。

冷靜地說，動員幾千萬知青下農村，其本質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問題，搞了兩年多的“革命”，國民經濟異常困難，怎能解決上千萬人的就業問題？把它作為政治問題，那是文革中慣用的伎倆。但是，對於武鬥不止的四川和重慶來說，把最不安定的中學生趕到農村去，的確也解決了一大政治問題。對那些參與武鬥做過壞事的工人，可以用“清隊”、“一打三反”、“批清”等

運動來解決；對一大批被派性侵蝕了的、才十七八歲剛剛成年的中學生，却難以完全采用高壓政策，弄得不好很可能弄出更大的事來。把他們一個個分散開來，弄到廣闊天地去，放在那青山綠水中，來一個“冷處理”，應當是上策。這的確消解了一個很大的不穩定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素。

對下鄉上山的中學生來說，那封閉的環境，那艱苦的生活，那繁重的勞動，又真的是一座煉獄。狂熱的情緒逐漸冷靜下來，非理性的派性逐漸被消解。幾年的知青生活，是中學生們贖罪的日子。誰叫他們要去聽毛澤東的話，要那樣狂熱，那樣去關心“國家大事”，去為“革命路線”打來殺去呢？

但是，派性却難以消解。就是下鄉了，有的人派性還是那樣嚴重。1969年3月，沙坪壩幾所學校的知青在朝天門登上東去萬縣的登陸艇和貨駁。船剛離岸，不知是那個學校的反到底派頭目，便將戰鬥團的旗幟拿出來，在船頭上揮來舞去，引起一陣騷動。送知青下鄉的工宣隊員衝上去，要收繳那派性旗幟，無奈學生人多，都來阻擋，衝不上去，還發生了衝突。下鄉後的頭幾個月，到處傳來兩派學生在鄉場上打架的消息。雖然三番五次動員和威嚇，採取了很多手段，還是有個別人把武器（主要是匕首刺刀）帶到了農村。據說，落戶開縣、萬縣、酉陽、豐都、資中等地的知青，都發生過兩派打架的事，有的還動用了手榴彈。那時，個別地區（例如達縣）的兩派還在武鬥，于是又有知青參與進去，打頭陣。

不過，農村畢竟是農村，一人或兩三人在一個生產隊，串聯困難，要集中幾十上百人很難。跟著來的，是艱苦的生活，是繁重的勞動，使年輕人那過剩的精力和情緒得以消解。兩派學生之間爭鬥打架的事鬧了幾場，便逐漸停止了。知青與農民的衝突則逐漸增多，特別是在一些民風驃悍的地方，甚至還發生過大規模械鬥，有知青被打死的，也有農民被打死的。知青的相同命運把大家聯在一起，派性分歧退居一旁，逐漸消解。

煤油燈下，鶴鳴聲裏，狂熱的腦袋開始冷靜。不少人，特別是一些當頭頭的開始反思，朦朧朧朧的都感到上了當，受了騙。

當年把我們捧上天，如今又把我們貶入地，原來自己僅僅是別人手中的玩物和工具。幻滅、失望、悲觀的情緒在當年的武鬥參與者中間蔓延。再加上沒有吃的、沒有燒的等等現實問題的困擾，好多人都開始後悔當年為何那樣狂熱，那樣賣命。想起死去的同學，便為他們惋惜。

那時，一些當年在家當逍遙派，跳“鍋邊舞”的崽兒們却跳出來，夥在一堆，為爭風吃醋，為佔吃霸賒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他們沒有武鬥的經歷，也就難以反思。有人說：“年輕人都要當幾天‘天棒’，才能長大。”似乎真的如此。不過，後來他們也要為自己的惡行贖罪，那是題外之話了，且不贅。

我是 1969 年 3 月到忠縣望水公社同興七隊落戶的。我所在的生產隊人口多，土地少，一年只能分幾十百來斤穀子，如果拿來打成米，不够我吃兩個月，全年的主糧全靠紅苕。我種的自由地，一年可以挖將近 1000 斤，生產隊又要分 1000 多斤，紅苕要吃大半年。我家窮，又從小勞動下力，務農的勞累和生活的艱苦並沒有讓我感覺受不了。我年輕時又爭強好勝，不但出工積極，而且做農活也要和別人比個高下，栽秧撻穀、挑糞挖地，總要比別人跑得快、做得多。按人頭算，每年我做的工分都是全生產隊最高的。可惜，那工分不值錢，一個勞動日（十個工分）才值一角多錢。做再多的工分，到年終也只能“歸”（剩）十來元，而且由於沒有現金，還拿不到手。我肯幫助人，對人和善，農民和公社幹部喜歡，多次被推薦去參加諸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代表會、毛主席著作講用會之類會議，成了知青代表。我也沒有去參加打架之類的事，連趕場也比別人少，終日呆在生產隊裏“勞動改造”，要把自己“鍛煉”成“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但是，從城市到農村，從“轟轟烈烈”“革命”到終日“碌碌無爲”種地，那失落感依然攬得我心亂，甚至心痛。有時，苦悶難以排遣，就用詩詞來宣泄。且看當年我寫的一首七絕：

小溪靜靜鳥聲來，
濁酒三杯醉語開。

未必此生虛度過？
拳頭一舞又徘徊。

再看我填的一闕《沁園春》：

惡夢纏身，
夢醒惶惶，
天已亮還。
聽夜來秋雨，
潺潺不斷；
樹邊啼鳥，
處處聲尖。
咯咯雄鶲，
昂昂老牛，
遠處磨聲人語喧。
誰知曉，
正床前病臥，
浮想聯翩？

翻身又憶昔年，
似畫片一般飛眼前。
是夜來秋雨，
提槍披挂，
站崗放哨，
八月黃山。
火車飛奔，
蜀川雨霧，
萬里巴山留白烟。
村晨裏，
却暗流泪水，
五味瓶翻。

如今重讀，我依然能够想起當年的情景，能够感覺當年的心情。

1971 年，城裏的“一打三反”和“批清”運動開始波及知青。一批批外調人員奔赴各個遠鄉僻村，一封封外調信函寄到各個公社大隊。雖說知青不像城裏的工人那樣被批鬥，被“全托”，但那時候招工已經開始，被找上門的知青便可能遭殃，填了表的也可能被卡住。為了得到一個招工名額，知青之間明爭暗鬥，于是便有人私下跑去找公社領導，找大隊書記，告張三的狀，告李四的狀，無非張三搞過武鬥還是機槍手，李四武鬥時打死了好多好多人。幸好農民不太管過去的事，只要在農村表現不錯，能幹活能做工分，也就推薦。除了個別頭頭被招工政審卡住外，大多數武鬥人員便完成了贖罪的日子，走進了工廠。

萬幸的是林彪自我爆炸後，“批清”運動便停了，那以後再也沒有大規模地清查過武鬥中的人和事。中學生們雖然在農村艱苦了兩三年，畢竟躲過了一次接一次的清查運動。回城後，與工廠的武鬥戰友相遇，喝了酒，話就多。那當工人的說：“還是你們好，沒挨批鬥，沒被‘全托’。我們那時好惱火喲！每天早中晚，都要你大聲背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那當知青的說：“你們惱火，總還要發工資，總還有飯吃，我們呢？經常鍋兒揭不開，餓得肚皮咕咕叫，就像流放西北利亞的俄國政治犯一樣！”于是大家都嘆氣，都說：“當年真不該搞武鬥！”

不管怎麼說，武鬥都是一種惡事。爲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爲了那一點點派性，你打我，我打你，紅刀子進，白刀子出，槍炮軍艦坦克亂打，死傷那麼多人，燒毀那麼多房屋，損壞那麼多國家和私人的財產，還不是惡事嗎？更不用說槍斃俘虜之類爲非作歹的事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皆報。武鬥還沒完全停止，中央就召開“八一五會議”，逮捕了反到底派武鬥總司令鄧長春和八一五派裝甲司令方文正。跟著就是“清隊”，武鬥中做過壞事的，大多都被揭露出來，受到懲處。後來又是“一打三反”，追查武鬥中發生的重大事件，

清查壞人壞事，又有一批人被抓獲。雖然這些運動都存在擴大化，甚至都存在掌權的一派打擊不掌權的一派等多種弊端，但對那些做過壞事的人來說，挨了打擊也是活該。僅僅是在望江廠，就有 44 人被拘捕關押。以後經法院審理，這 44 人中，判處有期徒刑的 16 人，免于刑事處分的 9 人，教育釋放的 2 人，無罪釋放的 17 人。至于被批鬥、被“全托”（隔離審查）的人，那就更多了，望江廠至少也有上千人！

1970 年開始的“批清”運動，是對武鬥人員的又一次大清查，只要參與了的，幾乎都難以逃脫。首先挨起的，是劉結挺、張西挺兩個傢伙。四川的武鬥，這兩口子要負多半的責任。各單位的運動也轟轟烈烈，大字報鋪天蓋地，廣播白天黑夜吼叫，今天揪出張三，明天揪出李四，更有不少人神經崩潰，主動交待。雖然“批清”帶有強烈的派性色彩，後來被中央定性為方向路綫錯誤，雖然運動中有大量的逼供信，甚至有肉刑，雖然一個小小的單位被揪出的“五一六分子”竟然達幾十人之多，打擊面太廣，但是從某一方面說，“批清”運動也是武鬥人員的贖罪運動。如果那也是一場苦難，那麼經過那場苦難後；大多數武鬥人員也就得以解脫。雖然後來還有派性特別嚴重的人，繼續陷在幫派活動中，跟著四人幫搞“批鄧反右”，鬧“地震”，鬧奪權，以至四人幫垮臺後又被揪住，或者要“說清楚”，或者被抓進監獄，或者挨各種各樣的處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應當說，那也是惡有惡報。

那些在“清隊”中，在“一打三反”中，在“批清”中不按政策辦事，充當打手的人，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他們與武鬥人員唯一不同的，僅僅是在黨組織的旗號下幹的壞事罷了。按腦殼、扇耳光、腳尖踢、拳頭打、皮帶抽、木棒敲，“疲勞轟炸”，輪番攻擊，實行的是批鬥型武鬥，本質上與武鬥人員又何異？當然這不能怪他們，正像不能怪武鬥參與者一樣，這是那個時代的必然，是歷史的悲劇。但從道德上來說，畢竟也是一種惡。惡就有惡報，誰也難以逃脫上帝的懲罰。在工廠裏，那些充當打手的，大多都是家住農村的轉業軍人。農村一搞聯產承包，他們的家屬再也享受不到混工分的好處，于是他們就開始“喊天”，就對改革開放

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跟著就是國有企業改革，他們一無技術，二無專長，立即成為下崗對象。我不知道，對他們來說，這是不是一種報應？是不是一種懲罰？

當然，最應該受懲罰的，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人，是那些挑動兩派武鬥的人，是那些“慶父”們！可惜，這些人中，有的雖然也受到了懲罰，但卻有相當多的人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搖身一變，被他們自己打扮成文革的受害者，繼續掌權，繼續推行文革那一套。而且，通過文革的“鍛煉”，他們已經看穿了所謂路線鬥爭的實質，已經把握了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已經找到了現存體制上漏洞，他們口頭上繼續喊著革命的詞藻，內心深處却早已經拋棄了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想，在社會劇烈變革的時候他們如魚得水，成為文革後期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都當上了領導幹部，有的甚至爬到最高層，並且逐漸演變成新的特權階層。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所謂革命，所謂理想，所謂正義都不過是利益的遮羞布，為了利益，可以沒有任何底線。這樣一批人至今還有不少人在掌權，甚至還在阻擾著改革的深入進行。

45. 終於翻過山坳

說明：此文寫于1992年9月份，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成，原名《我的第一篇小說》。此文反映了參與武鬥對我一生的影響，可能是我特有的贖罪經歷。當時，我的思想認識就是這個樣子，文中諸如“極左思潮”之類是當時流行的術語，為保持原樣，只好不改（括號內的文字是現在加的），放在這兒作為一章，也算是向讀者交待我參與武鬥後的結局。

我是1971年10月被望江機器廠招工離開農村的。到縣城體檢後返回生產隊，碰上一個剛從重慶返回的同學（蘇祖斌）。路上，他把林彪自我爆炸的事講給我聽。我感到震驚，身上的血似乎又在沸騰。我說：“黨和國家面臨這樣嚴重的問題，我們却還在為招工煩惱，太不應該了！”他把我嘲笑一通。下鄉已經兩三年，我那紅衛兵造反派的思維方式却還沒有改變。他嘲笑我，我心中還把他踏屑了一通呢。

離開生產隊的頭天晚上，幾個同學來給我送行。我把最後那點紅苕和那點米煮了一鍋，好歹讓大家吃了一頓飽飽飯。大家邊吃邊教訓我，并為我“約法三章”：一、所有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東西全部付之一炬，不得帶到廠裏去；二、到廠裏後少交往些；三、做個好工人，少去拋頭露面。那是山鄉漆黑的夜，煤油燈一閃一閃，映在一張張黑黑的面孔上，叫人終生難忘。

我與初一的一個女生（王琴）本來有些姻緣，雖隔著一溝一山，却能感覺到相互的白日心跳、夜來夢境。那年春節，她回城一趟，梳起兩個“掃把疙瘩”，從此我就不再理她——只因那些年頭梳“掃把疙瘩”就被認為是“操”（重慶話，講究打扮之意），這使我不

能容忍。招工單位通知我們在區上集中，那天正趕場，她也來了。好幾次撞上，她都欲言又止。終於我們在一條小巷裏單獨相遇。她說：“當了工人，別把我們忘了喲！”那含情脉脉的樣兒使我的心一震。但我看見她頭上那像七品芝麻官烏紗帽一樣晃動著的“掃把疙瘩”，心又硬了起來，竟不理會，轉身走開。極左思潮在我思想中根深蒂固，使我又一次失去自救的機會。

是的，如果我那時就墜入情網，我會上演後來的人生悲劇嗎？

望江機器廠是一家上萬人的軍工企業，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災區”，武鬥之烈全國出名，檢查過往船隻的武鬥哨卡曾打沉軍分區交通艇，從廠裏開出的“艦隊”曾溯長江而上，打了一場全國有名的“八八”海戰。我當年也參加過武鬥，與望江廠的幾個頭頭認識。那時廠裏還在進行“批清”，同學們為我“約法三章”，是為我好。但是，我並沒有認真清理頭腦中的極左思潮，也沒有丟棄我的書生意氣或所謂的詩人氣質和對社會的迂闊見解，還繼續那赤紅色的革命夢幻。這就不能不使我再入歧途……

我們是在極左思潮極度泛濫的年代長大的。我們曾那樣羨慕革命戰爭年代，那樣幻想成為英雄，從思維到服飾，從語言到行為，無不打上左的印記。正因為這樣，我是那樣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成為“鋼杆”，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是那樣亡命，好幾次都差點飲彈成鬼。也是因為這樣，一喊下鄉，我又毫不猶豫地報名，走了第一批，在農村不到三年，從勞動到外表，我幾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在生產隊，每年年終結算，我做的工分都是最高的。對我們這一代來說，誰先跨過極左的鴻溝，誰就先獲得解放。而我是在比別人多吃了更多的虧，栽了更多的跟頭之後才覺悟的。

我帶著惶恐和希望走進望江廠。集中學習時，“批清”運動還在掀新的高潮。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寫一篇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為的材料。別人都寫自己是逍遙派，什麼也沒幹。我考慮來考慮去，還是如實寫了。我覺得我不能對黨說謊話。材料交上去了，我更加惶惶不安。誰知分配工作時，竟然沒有受到影響（那些材料其實沒有任何人認真看過）。我被分配到一個好車間，幹裝配工。那時，林彪雖然死了，戰備依然緊張，生產任務很忙。我沒用多

久便獨立操作，甚至比一些老師傅還幹得好幹得多，很快就在車間冒了尖。

那時我在車間混得不錯。技術考試從來都是前一二名，“壘砣砣”（廠裏工人的行話，“砣砣”即機械產品，也稱“鐵砣砣”，壘即把產品堆碼起來）也行。別人一天做兩三件，我可以做四五件。由於有點文字功夫，多少又讀了幾本馬列，寫批判稿廣播稿什麼的也順暢。有一次，車間指導員還把我叫到他家裏去，請我吃飯，半明半白地用入黨、當官、介紹女朋友之類的許諾拉攏我，要我為他效力。如果我不把學生的那一套迂闊帶到工廠裏，如果不把鑽營祿位、當官上爬視作最大的罪惡，我只要默許，我現在至少也是“縣團級”了，而且也不會有以後的遭遇。指導員拉攏不成，心中對我便有了一個鬥碗大的疙瘩。

由於是“重災區”，望江廠兩派之間的爭鬥很厲害，而我恰恰是廠裏占多數却又掌不了權的反到底派。廠裏的“批清”運動還沒有結束，中央又叫糾正“批清”的錯誤。被“批”被“清”的一派把工廠鬧得一塌糊塗，中央又把兩派頭頭叫到北京去開“團結聯合”的會。後來又是批林反右、批儒評法，接著又是整頓，再後來又是批鄧反右，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旗幟不同，口號不同，兩派的命運也就不同。今日你得勢，明天我占上風，“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由於我思想中的極左思潮沒有清理，我身上的派性也就難以消除。開始，我還記著同學們為我訂的“約法三章”，儘量小心，上班就上班，下班就看書，週末就回城裏的家，不去踩渾水。但是，“約法三章”僅僅是權宜之計，難以約束我思想中的極左思潮，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一步步介入到兩派的爭鬥中去了。

糾正“批清”錯誤的時候，車間開大會，指定我發言。我的稿子當然難以符合指導員那“空對空”的要求。審稿時，他把我聯繫工廠和車間實際的大段話全部砍掉，把工廠當權者定的“我廠‘批清’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基調硬加了上去。我不答應，他就不讓我發言。我就把情況捅給車間幾個被“批清”過的人。他們跑到辦公室連吵帶鬧，指導員只好讓我原稿發言，這就使我

跨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車間有一個比我進廠早幾天的學工，是團支部書記。由於我的派性觀點逐漸鮮明，其他方面也還可以，被“批清”的人便拿我當炮彈，去轟打那團支部書記。那團支部書記的派性觀點比我還鮮明，只是他是另一派的。他學工轉正時，有人藉口他的一點小毛病，硬要讓他延期轉正。在指導員的保護下，他雖然沒有被延期，却在車間“髒了班子”（丟了面子），於是就記恨於我，好像是我要出他的洋相。他不像我這樣迂闊，不久就到廠團委當幹事去了，後來又當了官（車間書記而已）。

那一年，我正好戀愛失敗。其實，那一次戀愛只是我的單相思，女方可能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意思。如果我正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認真解剖一下自己，就會發現我思想中和我性格中那引我栽跟的錯誤和弱點，那麼我也可能避免滑入泥坑。可是，我只把女方那高大英俊的男友和自己的外貌作了一個對比，把失敗歸結為自己的形象寒酸。

廠裏有個反到底派的頭頭叫張亮，他在區革委當副主任。搞武鬥的時候，他是我們那個“紅二連”的指導員，我們私人關係不錯。才進廠的時候我還遵守“約法三章”，還有意避開他。我那時住在偏僻的單工宿舍，車間幾乎處在停產狀態中，過得很悶，又沒個走處。於是，我就經常到他家去耍，吹吹龍門陣，有時也互相交換一下讀馬列的心得體會。那幾年，我讀了好幾本馬列。現在想來，諸如《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之類的書，我或者從來沒有讀懂過，或者就是這些書本來就有問題，加重了我的偏見。當一個人抱著某種偏見時，不管他讀什麼書，都是可能為他的偏見增加論據的，所以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前後，工廠經常停電，車間幾乎完全停產，于是我到張亮家去得也更勤了。有時，他家還來得有其他人，經他介紹也就認識了。我們談形勢，說看法，觀點相同話投機。當然也有爭論的時候，越爭論越有味，去得也就更加頻繁。隨著形勢的發展，廠裏的其他幾個派頭頭也常到張亮家裏來，我也與他們認識了。記得那是1976年1月底的一天，他們幾個頭

頭在張亮家聚會，我去串門正好碰上。他們決定在工廠“點火”，擬好了大字報的底稿。張亮要我看看，我覺得那文字的確有些問題，就忍不住作了一些修改。這張大字報以“從衆”（意思是他們五個人，不包括我）為名貼了出去，在工廠掀起了軒然大波。關於這張大字報，我後來就一直沒有能够“說清楚”。

由於有了直接接觸，我對這些當頭頭的人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反感。或者這也是我迂闊吧？我始終反感鑽營祿位的人，似乎現在都還有一點這樣的反感。其實，官總是要有人當的，你不當，想潔身自好，總不能反對別人也當啊！地位不同，考慮的也就有所不同。為了某種目的，不管是為公還是為私，而採取某種作法，即使好像與傳統道德不相符，與一般老百姓的認識不相同，只要不損傷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是無所謂的。當年我就缺乏這樣的寬容精神。我認為他們是“宋江”，有一次，我還和他們中間的一個人吵起來。他說我是左派，是舉起一隻手打倒走資派，舉起另一隻手打倒造反派，是唯我獨尊。我血氣方剛，也把他批駁了一通。正因為有這樣的反感，我才沒有在他們的泥坑中繼續陷下去。後來，我又做了幾件錯事，例如在廠團委召開的紀念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十週年大會上，我發言把廠黨委書記批了一通。但是，我沒有參加過造反派組織的其他活動。在工廠完全停產的那一天，車間都沒有人了，我還在幹活，把“砣砣”“壘”完了才離開。

嚴重的是四人幫垮臺後，我的思想轉不過彎來。同病相憐吧，我又常到張亮家去。我和他，還有他的一個“學工”，是文革中分配來廠的大學生，我們“英雄”所見略同，一起發泄不滿，一起發泄對四人幫的懷念。“講清楚”運動的時候，那些發泄便被人翻出來，成了我最大的罪惡。

四人幫垮臺，宣告極左路線破滅，但並不等於受極左思潮影響和毒害的人一下子就轉過彎來了。從震驚到迷茫，從痛苦到反思，從解脫到反戈一擊，我經歷了整整三年的時間！這三年是我人生路上最痛苦也最危險的時期。我終於闖過來了，沒有去跳長江，沒有自殺，也沒有成為極左路線的殉葬品，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多年前，有人給我看手相，說我30歲前有一場大災大難，不死

也要脫一層皮。真的算得很準啊，我真的脫了一層皮。豈止是脫一層皮，是思想觀念的大轉變！現在想來，心尖尖也禁不住一陣陣顫栗呢。

“說清楚”運動中，我在班組和車間的大會上不知作過多少次交代和檢查，不知認了多少回罪。我寫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幾十萬字。但是，還是“說不清楚”。好在我在車間人緣還算不錯，幾個當車間主任的都認為我工作不錯，還需要我“壘砲砲”，需要我為車間完成生產任務，所以我還沒有挨過打。當然，按腦殼之類是必不可少的，那可以不算是挨打。有一段時間，我不能離開工廠，不能進城回家，我的信件被指導員私自拆開，我除了寫材料和“壘砲砲”外，什麼也不能做。連廠裏一些派頭頭都過了關，我還要“翻燒餅”。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廠團委還是決定給我“撤銷團內職務，勸其退團”的處分。我本來可以當車間團支部書記的，但我推脫了，只當了個團支部組織委員。據一個知情人說，廠團委在研究的時候，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某書記說：“他名字正權，就憑他這個名字，就曉得他有野心，想奪取政權，所以必須給他處分！”

“說不清楚”使我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1977年和1978年兩年高考，車間都不許我參加，後來我就超齡了。

自己挨整，親身體驗，我才真正認識到“鬥爭哲學”的殘酷和荒謬。從内心來說，我並不反黨，更不反社會主義。相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我還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因為我父母解放前受苦受難，他們的教育對我影響很深。而且，我畢竟讀過幾本馬列，畢竟信仰馬列。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在廠團委對我所作的“處理決定”上，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不能不對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思。開始，我感到自己是上當受騙。這使我想起李白，懷著“爲君談笑靜胡沙”的壯志參加永王李璘的軍隊，結果却因為李璘與李亨爭奪皇位而獲罪流放。何其冤也！

我責怪我太“浪漫主義”。我從小愛好文學，進廠後寫了不少諸如“我是車刀，我是車刀”之類的詩，還在《重慶日報》上

發表過散文和散文詩。我下決心告別“詩歌姑娘”，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裏，除寫交代材料外，一個字也不寫。作為單工，我不打牌不下棋，又無心思看書。下了班，宿舍裏呆不下去，便一個人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躊躇，腦海裏一會兒亂哄哄的，一會兒又空寂得像黑洞。那時，我才理解了李白那“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的苦悶。

人只有在地獄裏熬過，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才能珍惜每一個個平平凡凡的白天和黑夜。在最難捱的日子裏，我體會到絕大多數人的善良，我不會忘記那些曾向我投來一顰一笑的人們，不會忘記那些哪怕只說過一句公道話的人們。當然，我也嘗够了某些人的勢利，遭遇了某些人的落井下石。一個與我幾乎快要同居的女子，聽說我是“說不清楚”的人後，立即和我“拜拜”。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的妻子走進了我的生活，支撐了我的精神，給了我莫大的安慰。

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我擺脫了左的泥沼，使我逐漸拋棄了虛幻的理想和迂闊之見來面對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是胡耀邦挽救了我，是鄧小平挽救了我，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挽救了我。當我面對現實，我才真正感到解脫，渾身都有了輕鬆的感覺。當然，不是說外界的壓力已經完全消除，在車間我還繼續列在另冊裏，還只能夾著尾巴。我說的是解脫是思想上的解脫。我從極左思潮中，從左傾路線的那一套中解脫出來，似乎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于是就有了重新做人的舒暢。

我重新拿起了筆。我開始寫小說。我寫了一個年輕工人，寫他是怎樣紅起來的，又是怎樣死的，死後又是怎樣成為英雄的。1980年元旦，我把自己關在家裏，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伏在床邊，一口氣便寫了15000多字。這篇題為《願他在地下安息》的小說，刊載在《紅岩》1980年第1期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終於翻過了一個山坳（我的思想雖然翻過了山坳，但我的處境却沒有完全翻過，廠團委對我的處分一直“陪伴”了我很多年）。那是一個多麼崎嶇、多麼危險、多麼艱難的山坳啊！

46. 還在疼痛的傷疤

戰友

緊緊握住你的雙手，
細細看著你的傷口，
八月黃山又浮現眼前，
炮聲中我們并肩戰鬥。

“誓死保衛毛主席，
還怕什麼頭斷血流！”
鮮血寫成的遺書，
緊緊放在我們胸口。

寒晨上崗去，
你把衣服脫給我，暖我心頭；
雨夜急行軍，
我扶起跌倒的你，勇敢前走。

伏天大練兵，
你把水壺遞給我，我喝個够；
烈日去作戰，
我紮個草圈給你，擋住日頭。

忘不了啊那一次，
你掩護我，一顆子彈穿肩頭，

我“嘩”的撕下衣服，
冒著彈雨為你包紮傷口……

傷口啊傷口，
記下了八月戰鬥，
望著傷口說不出話來，
半天凝成一句：“戰友！”

這是我1968年5月寫的一首詩，雖然寫得孬，但却反映了當年的戰友情。戰友就是在一起戰鬥或在一起戰鬥過的人。一起參加過武鬥的人，更不要說一起參加過戰爭形態的武鬥的人，當然是戰友了。武鬥也好，戰爭也好，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這樣的場景中并肩戰鬥，結下的情意當然更深也更真切。

其他人我不說了，只說說楊廣德。在我的戰友中，他是最親密的一個，也是下場最悲慘的一個。

楊廣德比我大一歲，1965年在二十中（現育才中學）初中畢業，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考高中，結果進了柴油機廠當工人。說他家庭出身不好，也是莫名其妙的。抗戰時期，他父親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在一個糧庫的守衛部隊中當了伙夫頭，也就是所謂的炊事班長。後來，因當兵時間長，上級就給了他一個準尉的軍銜。準尉是最低的軍銜，只是預備性的最低級的軍官。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糧庫守衛部隊重新編排，他就離開了，在李家沱碼頭下力，當縉夫挑夫，那準尉也就只當了三個月。就因為這三個月，他就成了“偽軍官”，成了“黑五類”，影響了楊廣德的前程。

我到柴油機廠“學工”的時候，和楊廣德住在一間寢室，於是就認識了。可能是因為年齡相當，他也喜歡看書，我們很談得來。後來上山，他當排長，我當班長，雖然也發生過矛盾，但我們的友誼却不斷增長。交槍後，我雖然不再長期住在柴油機廠裏了，却三天兩頭往廠裏跑，每次去都是他到食堂去給我打飯來吃。他知道我吃得，總是給我打很多飯很多菜，很大一個盅盅，裝得

滿滿的。那時，他還是學徒工，一個月只有 18 元工資，我經常去，肯定給他增添了不少的負擔。有時拖不攏，他就找人借錢借糧。

楊廣德聰明，學會了寫舊體詩詞，就教我。1968 年 8 月，我從宜賓趕到成都，去參加柴油機廠造反兩週年紀念大會，和他擠在地鋪上睡。他就把諸如平仄之類的訣竅告訴我，於是我就開始了吟詩填詞。那以後，每寫一首，我就給他看，請他點評，請他幫忙修改。下鄉前，不知為何，我又對電影感上了興趣，想寫電影劇本。他又找來一大堆電影雜誌，把我關在寢室裏，讓我看，看得我對所有的電影都不再感興趣了。下鄉時，他送了一本《唐宋名家詞選》給我，讓我在農村多少有了一點可以消遣時間的娛樂。我在農村呆了兩年零八個月，我們之間的通信始終沒斷過。有時，他還給我寄點糧票和錢來，讓我感到戰友情誼的溫暖。有一次，羅家壩小學的一個“小闖將”叫張德鵬的，也是我們在武鬥中認識的，要到忠縣農村來看我，去找到他，他還給了一張油票，讓他打了菜油給我帶來。

下鄉第一年回家，他讓我去他家過年。他家住在李家沱碼頭上的一條小巷裏，相當破爛。那時，他父親還在南彭鄉下“勞動改造”，他母親在碼頭上當搬運工，家中有一個妹妹。他告訴我，他還有一個哥哥，但已經被關起來了。至于為什麼被關起來，他也沒說清楚，好像是他哥哥娶了一個女朋友，那女朋友的父親是大渡口區法院的院長，堅決反對他們戀愛，就藉故把他抓了起來，說他是反革命。文革中，類似的事我聽多了也見多了，不奇怪，也就不多問。經歷了文革，經歷了下鄉，雖然我潛意識裏依然還在為自己的“紅五類”出身而驕傲，但已經把出身看得很淡了。而且，看到他母親和我母親一樣，都是做臨時工的，都是下力的人，也就多了一分同情和親切。

可能是因為哥哥無辜被抓，楊廣德的思想已經有所轉變，不像我那樣繼續偏執。大年初一，我們一起到南泉游玩，為一個無謂而且無聊的話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雖然如此，我們的友情却沒有受到影響，我繼續去柴油機廠，吹龍門陣吹晚了，也繼續睡在他床上。

從農村調到望江廠，我依然如故，經常去柴油機廠。那時，望江廠休息星期四，我去的時候他們都在上班。為了不讓我寂寞，有時就給我找來一些書，把我關在寢室裏，讓我消磨時間。那時，我已經二十一二歲了，性知識幾乎為零。有一次，他找了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性知識方面的書，說是給我“掃盲”。再後來，他要女朋友了，總把那要朋友的事，包括細節也告訴我。我們已經是無話不談。

楊廣德是夾模具鉗工，技術好，技能高，別人做不出來的，他能做出來，連那些老工人、那些技術人員也只有服氣。我進廠也是當鉗工，是搞裝配，要求的技能沒有搞夾模具那樣高，他却要我好好學技術。有時，他也把我帶到車間去，看他如何做夾模具。雖然我在車間也算技術過得去的人了，但與他比，不知差好長一截。在廠裏，他人緣也不錯，年輕男女都喜歡聽他吹牛。上班時候一沒事，他的鉗臺邊就會圍上一堆人。

1976年，和我一樣，他也介入了所謂的幫派鬥爭。可能是前面沒有人為他遮擋，四人幫一垮臺，他就陷入困境，挨批挨鬥。那時，他已經結婚，生了孩子，住在上新街後面那山頂上的一個小閣樓裏。那段時間，我幾乎每週都去他家裏，忍不住便要發牢騷，也算相互之間有一點安慰。拖到1967年5月份，他終於被抓了進去，判了七年。在他被抓的前兩天，我還去過他家裏。他告訴我，他可能要被抓了。我說，我也可能逃不脫。據他後來告訴我，他被抓前的那天晚上，把家裏所有的文字資料，也就是所謂的“罪證”全部都銷毀了，當然也包括和我有關的。我記得，我把我寫的一些舊體詩詞給過他，讓他點評。而那些詩詞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寫武鬥的，本書中已經引用得不少。

後來，他就被送到雷馬屏監獄去了。雷馬屏是四川很著名的監獄，地處大涼山雷波（現屬涼山彝族自治州）、馬邊（現屬樂山市）、屏山（現屬宜賓市）交界處，據說只有一條公路與外界相通。周圍都是大山，都是原始森林，就是讓你跑，你跑上一天，也跑不出那監獄的地界。後來，我也“燙”起了，用重慶話說就是遭整了。于是，車間就派人到雷馬屏去“外調”。一是我本來

也沒有什麼“罪行”，二是他肯定保護了我，去“外調”的人回來悄悄告訴我，沒有找到我的什麼“鋼鞭”材料。不過，廠團委在給我處分時，依然把我和他的關係作爲一條罪狀，說我與反革命分子楊廣德“勾結在一起”。

楊廣德進了監獄，我却始終不相信他有罪。我不敢再去柴油機廠了，就去他老丈人家。那時，他妻子還在上新街一家街道工業的廠裏上班，但却天天回父母在南紀門的家來住。我偷偷地去看望一下，也表示我一點心意。我在廠裏最艱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後來，我開始寫小說，1980年1月，《紅岩》雜志發表了我的那篇《願他在地下安息》，我又偷偷地給楊廣寄了一本去，沒有落名，也沒有落寄件人地址，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我只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給他帶一個信，一是我還好，二是我們都是像這個小說中的主角一樣，是被政治運動冤屈的人。後來，他告訴我，他收到後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也算是“心中靈犀一點通”吧。

柴油機廠和楊廣德一起進監獄的，還有黃景華、徐福明。徐福明沒有參加過武鬥，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是寫詩的，也接觸過幾次。他很點詩人氣質，好激動，好衝動，說話也很偏激。黃景華拋頭露面的時候多，當權者特別仇恨。他兩個進監獄好像還好說，而楊廣德理智得多，不知爲何被當權者盯上了，堅決要弄他進監獄。要說柴油機廠那幾年，既沒有停產，又沒有哪個當官的被打傷，哪能和望江廠比。望江廠的“幫派體系”可能比哪個單位都厲害，鬧事也鬧得更凶，動不動就鬧得停產，還有個別“天棒”動不動就出手打人。望江廠也弄了不少人進監獄，但要按比例來算，就比柴油機廠差多了。像張亮、鄭祥國、鄧美名等頭頭腦腦，雖然也被“全托”過，但最終還是免了牢獄之灾。這讓我更認定，楊廣德他們幾個都不會坐滿刑期，肯定會提前釋放的。

果不其然，1982年楊廣德他們就從監獄出來了。我聽說後，去看他，才知道把他弄進監獄的主要藉口，竟然不是“造反”，也不是“幫派”活動（可能是實在找不到這兩方面的罪狀），而是他爲他哥哥翻案。那時，他哥哥也平反了，但平反前一天却在

彈子石省二監獄（現渝都監獄）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至今也沒有任何下落。從 1975 年開始，省二監獄就生產新生牌電風扇，成為當年最受重慶人歡迎的家用電器，也是重慶人最早普及的家用電器。楊廣德告訴我，他哥哥就是新生牌電風扇的主要技術負責人。我不知道現在誰家裏還保留著這“老古董”，但用過那電風扇的人，是否應當感謝這個被判了 20 年有期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呢？

回到廠裏，當年弄他進監獄的黨委書記依然還在當書記。那書記見到楊廣德，竟然向他道歉說：“楊廣德，我對不起你。”已經經過這麼多年苦水、碱水、酸水的反反復復煎熬，楊廣德已經看穿了這個世道。他竟然對那當書記的人說：“你也不那麼說，文化大革命我們也鬥了你，我們鬥你是‘形勢’需要，你要抓我也是‘形勢’需要，你挨了鬥，我也坐了五年牢，我們算是扯平了。”

在雷馬屏，楊廣德沒有受更多的罪。雷馬屏監獄掌權的是“紅十條派”的人，對楊廣德的“罪行”自然心中明白，加上楊廣德有技術，勞改農場的農機具要他修理，也就對他網開一面，還千方百計要給他減刑。楊廣德堅決不認罪，刑也就減不了，但終於等到了平反的一天。回到廠裏後，憑他的技術，憑他的人緣，他很快就被提起來當了技術員，後來又當了車間主任。可惜，到上個世紀末，國有企業紛紛破產，他也只好提前退休。退休後去幫私人老闆打工，全心全意做事，搞設計，建生產線，處理技術問題，却被那老闆算計，一個月只給一千多元工資。當他把那個企業理順了，又被老闆一脚踢走。那時，他已經患上嚴重的心臟病、糖尿病，想想這個世道，也太不公平！

如今，楊廣德呆在家裏，每天都要自己給自己注射胰島素。他妻子是街道工業退休的，退休費低。他女兒有嚴重的肺結核，沒有工作，只有吃“低保”。每次去看他，我心中都酸酸的。和過去一樣，我們相見，依然話多。有一次，不知怎麼提起的，我說，想想那些在武鬥中被打死的人，想想那些後來挨整挨打落下殘疾的人，想想那些已經去世的人，我們還是幸運的。他說：“那也是喲。”

是的，一晃眼就是四五十年，當年那些戰友，有好多人已經

不在人世，在世的也都年過花甲，天各一方，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酸辣咸苦，平時也很少往來。雖然我們都對參與那場荒唐的戰爭和那場讓中華民族永遠都會感到耻辱的“革命”而懊悔，但心裏依然珍惜著那烽火歲月裏結下的感情。偶爾相遇，雖無多的言語，握握手，拍拍肩，說一兩句無關痛癢的話，似乎也能傳達彼此的心意。

即使不是戰友，即使當年不是同一派的，即使當年曾經對立過，甚至在戰場上相互拼殺過，無意中提起當年的往事，也依然能够相互理解，依然也能够像戰友一樣，也握握手，拍拍肩，似乎也能理解對方的心意。我兒子多次問我：“你們當年那樣對立，那樣殺來殺去，為什麼現在相互之間沒有仇恨？”我給他解釋，但我知道我的解釋相當蒼白，不僅說不服他，也說不服我自己。例如，我那位望江廠的師兄弟，他父親給母親送衣服去，却被母親“點水”，結果被八一五派槍斃，作為兒子，他却並沒有恨他母親，這中間該隱藏著多少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啊！例如，我在宜賓遇到的那個解放碑中學的學生，他後來參加同學會時，面對那丟磚頭打傷他頭部的同學，會是怎樣一種感情？會採取什麼動作？可是，文革結束已經 30 多年，却沒有聽說過因當年兩派武鬥引起的諸如報復、扯皮、重新爭鬥之類的事。這或許也是文革留下的一樁說不清楚的事吧？

那些參與過重慶這場文革戰爭的人，在後來的日子裏，有的飛黃騰達，有的窮困潦倒，有的事業有成，有的碌碌無為，有的家庭幸福，有的妻離子散，有的繼續強勁，有的貧病交加，有一帆風順，有的挫折困頓，有的平靜順利，有的大起大落。雖然他們都痛恨那被人愚弄、被自己的單純所麻痹的動亂歲月，但那就是歷史，是他們身上不可能抹掉的傷疤，有時甚至也是還在疼痛的傷疤！

是的，寫作本書的過程，就是我身上傷疤疼痛的過程！

47. 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

1964年春，毛澤東曾寫過一闕《賀新郎·讀史》：

人猿相揖別，
只幾個石頭磨過，
小兒時節。
銅鐵爐中翻火焰，
爲問何時猜得，
不過幾千寒熱。
人世難逢開口笑，
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
但記得斑斑點點，
幾行陳迹。
五帝三皇神聖事，
騙了無涯過客。
有多少風流人物？
盜跖莊屢流譽後，
更陳王奮起揮黃鉞。
歌未竟，
東方白。

顯然，毛澤東的這首詞依然透露著他的鬥爭哲學，回應著他早年“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豪邁情懷。

的確，“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從人類誕生以來，人世間就充滿爭鬥。人要生活，就要有衣食住行的物質，而這些物質不管是自然存在的還是人類通過生產獲得的，都是有限的，在相當多的條件下，你多佔用了，我就可能少占用。這種利益的趨使，就會激起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此其一。其二，對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因為所站的立場不同，觀察的角度不同，思維的方式不同，總會有不同的認識，或者說有不同的觀點，而不同的認識或不同的觀點往往又會導致爭論，也會激起人與人之間的爭鬥。這樣的爭鬥，可能只是相互之間的猜忌和不滿，也可能只是言語上的爭執或辯論，但有時也可能是拳腳交加、大打出手，甚至可能引起刀光劍影、槍林彈雨、你死我活的武裝鬥爭（武鬥或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的確就是一部“流遍了，郊原血”的歷史。

至少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能够完全趨同，更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觀點能够完全統一，因此也看不到因利益不同或觀點相異引起的爭鬥會減少會停止。即使到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這樣的爭鬥也依然還可能存在。

雖然從客觀來看，以暴力為後盾的打架鬥毆以及武鬥和戰爭，對人類歷史曾經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但是，打架鬥毆也好，武鬥和戰爭也好，畢竟要傷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要傷害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歷史發展到今天，如果繼續以傷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為代價，來助推人類歷史發展（暫且不論是不是助推了人類歷史發展，能不能夠助推人類歷史發展），顯然已經不適宜了。相反，我們更要警惕某些人藉此對他人使用暴力，藉此挑起武鬥或發動戰爭。可以說，這是十年文革，特別是重慶這場文革戰爭給我們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重慶兩派是因為“革聯會”發生分歧的，由這樣的分歧引發

了爭鬥，引出了“二月鎮反”，引起了後來持續一年多的大規模的全面武鬥，引燃了“史無前例”而又“空前絕後”的戰爭。且不說“革聯會”本身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也不說絕大多數參加兩派的人都是“一不小心”的，更不說後來兩派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就是“革聯會”很有實際意義，就是八一五派因此而實際上掌了權，可以發號司令，可以獲得若干利益，反到底派那樣拼死拼活去“砸”，去打，去“完蛋就完蛋”，就值得嗎？同樣，八一五派那樣去“保”，去誓死捍衛，去“頭可斷血可流”，就值得嗎？至少對廣大的兩派群衆來說，那樣爭來打去，可能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你搬你的磚，他當他的官”。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工資不會漲一分，喊你加班還得認真幹。

對任何一個事物，人們的認識不可能總是百分之百的相同，人們的立場更不可能永遠都百分之百的一致。存在分歧，存在爭議，是很正常的。一旦有了分歧，有了爭議，就拳腳相加，就大打出手，就武鬥，就戰爭，社會還能有一天安寧嗎？人類還能繼續發展嗎？人類畢竟是聰明的。經過千百年來無數的武鬥和戰爭，人類已經認識到，解決分歧和爭議，除了壓迫對方或消滅對方之外，還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民主法治的方法。

用民主法治的方法來處理分歧和爭議，首先要保證人人都有持有自己意見、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不管是對什麼問題，都不要強求意見統一，不要強求“萬眾一心”，不要強求“舉國一致”，更不能搞“輿論一律”，而要允許他人持有不同的意見，允許他人保留自己的意見，并且要允許他人在適當的時機發表自己的意見。“革聯會”成立後，有人要“保”，有人要“砸”，顯然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八一五派心胸開闊一些，能够允許反到底派在那兒高喊“砸爛偽革聯”，不去衝擊反到底派的會場，不去圍攻反到底派的游行隊伍，不去動用專政工具搞“二月鎮反”，把反到底派的人抓進監獄，反到底派喊一喊可能也就結束了。反之，如果反到底派心胸開闊一些，能够允許八一五派繼續操作他們的“革聯會”，不去衝擊“革聯會”，而是采用印度甘地那樣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革聯會”也就不可能繼續生存下去。事實上，

中央下達“紅五條”，就已經宣告“革聯會”“壽終正寢”了，“革聯會”也只存在了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如果兩派都能多少寬容一點，都不要那樣絕對化地無限制地上綱上綫，重慶文革戰爭也就打不起來，好多人的生命也就可以存活，重慶人的苦難也就可以減少好多好多。

其次，即使要消除分歧和爭議，民主法治的方法也是可以大有作爲的。民主法治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由多數決定，同時保護少數。經過兩三百年的實踐，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諸如民主協商、民主選舉、全民公決之類政治民主已經有了成熟的經驗。此基礎上，又形成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法治原則。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民主法治的方法來解決。“革聯會”是好是壞，是“革”是“僞”，該“砸”該“保”，完全可以通過民主協商、民主選舉、全民公決之類手段來決定。如果大多數市民贊成“革聯會”，就應該讓其存在下去；如果大多數市民反對“革聯會”，就只有“砸爛革聯會”。“革聯會”繼續存在，也要允許那些反對“革聯會”的人繼續反對，繼續在那兒高喊“砸爛革聯會”。“革聯會”不存在了，也要允許那些贊成“革聯會”的人繼續贊成，繼續在那兒高喊“誓死捍衛革聯會”，或者在那兒宣傳“市革籌”（市革委）就等于“革聯會”。如果當初能够用全民公決的手段來決定“革聯會”的去留，讓選票來決定是“砸”是“保”，又何至于走向戰爭，把一個好端端的山城搞得烏烟瘴氣、千瘡百孔、滿目瘡痍呢？

再次，即使分歧和爭議的事情事關重大，可能影響國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團結，也需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來進行處置。的確，不管在哪一個社會，總有些意見是不能允許隨意發表的，總有的事情是不能允許隨意就去做的。但是，哪些意見不能隨意發表，哪些事情不能隨意去做，只能由憲法和法律來規定。這也是民主法治方法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革聯會”真的如八一五派所說的那麼好，那麼就要通過民主法治的程序，把“革聯會”置于憲法或法律的保護之中，用法律來禁止諸如“砸爛革聯會”之類的意見。如果憲法和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不得公開宣傳“革聯會”

是“偽革聯”，並且規定誰這樣說了就可以追究誰的刑事責任，那麼反到底派只能閉上“狗嘴”。反之，如果反到底派能够在憲法或法律中找到可以“砸爛革聯會”的依據，能够通過向法院起訴，由地位獨立的法官根據憲法和法律來判定是否可以“砸爛革聯會”，然後作出判決。根據這樣的判決，“砸”也好，“保”也好，兩派都必須服從，這樣也可以解決分歧和爭議。如果當時中國有憲法法院，兩派能够通過訴訟來解決爭議，也不至于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第四，解決分歧和爭議，必須依法進行，不能搞陰謀，不能違法。一旦出現違法現象，特別是在出現暴力行爲時，必須堅決依法制止。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任何人在辯論中都可能情緒失控，都可能有意無意違反辯論規則，都可能使用法律禁止的違法手段，甚至出現暴力行爲。不管是哪一方，不管是誰，只要觸犯法律，就必須堅決依法懲處，決不能任其繼續違法。侮辱謾罵對方的，被侮辱被謾罵的人可以依法控告，要求侮辱謾罵者停止侵害，賠償精神損失；毆打對方的，要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雙方打架鬥毆的，要依法追究其治安責任或刑事責任。當年，當剛剛出現武鬥現象時，如果有法可依，如果執法必嚴，如果違法必究，哪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後來，雖然中央一再下達“九五命令”、“二六命令”、“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等等，措詞也越來越強硬，但由于沒有採取強硬措施，地方上也沒有一個能够真正採取強硬措施的機構，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制止住武鬥。既然你打了我不受懲罰，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報復回來。於是，你打過來，我打過去，冤冤相報，打打殺殺不僅難以制止，反而越演越烈。

第五，按照民主法治的要求，如果分歧和爭議是在群衆之中發生的，掌握權力的人必須依法辦事，而不能在背後挑動，支一派打一派。“革聯會”成立時，掌握著重慶各項大權的，實際上是駐軍。由於駐軍積極參與和支持“革聯會”，並且在此後一直支持、縱容甚至指揮著八一五派，重慶的武鬥和戰爭才持續如此長的時間。如果當初有法律規定軍隊不能介入地方的政治事務，

或者毛澤東沒有發布那個“軍隊要支持左派”的指示，重慶兩派之間也不會鬧得如此之僵，更不會打得如此之凶。當然，省革委（“省革籌”）劉、張兩口子對反到底派的支持和縱容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事實上，不管是反到底派還是八一五派，在他們心中，對自己“堅決砸爛”或“誓死捍衛”都是沒有底的，不知自己是否能够“砸爛”或者是否能够“捍衛”。正是因為有掌握權力的人在背後支持，兩派才如此極端，走向武鬥，最後只好動用戰爭手段，結果既沒有“砸爛”掉，又沒有“捍衛”住。駐軍也好，省革委（“省革籌”）也好，實際上就是當時的政府。正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依法辦事，才造成兩派武鬥和戰爭的惡果。從這個角度上說，他們才是歷史的罪人！當然，他們可能也只是“木偶”，他們後面的那些人以及那後面的後面的那一個人才是真正罪人！

最後，必須堅持法治原則，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法治首先是治官、治政府、治權力的，只有把權力關進憲法和法律限定的籠子裏，才可能避免權力的胡作非爲，也才可以避免掌握大權的人“挑起群衆鬥群衆”。縱觀重慶兩派爭鬥，讓人感到十分可笑的是，大家都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而那個被“保衛”的人却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說，今天好像是支持反到底派，明天好像又是在支持八一五派，今天是“紅十條”，明天是“紅五條”，今天是“三一五指示”，明天是“四二六講話”，讓人捉摸不定，不知他老人家是什麼意思。如今我們完全可以說，重慶兩派的爭鬥就是他挑起來的，重慶文革戰爭就是他發動的！這充分說明，當權力還沒有被關進籠子裏的時候，所謂的民主法治也就可能成爲一句空話。掌握權力的人不受限制，能够爲所欲爲，再加上他有某種私心，或者他精神上有什麼問題，或者他抱著搞試驗的目的，或者他的那個理想脫離了實際，他就會利用群衆的分歧和爭議，通過鼓動、挑撥、左右、變幻等各種手法，加大分歧，激化爭議，甚至促使分歧和爭議武鬥化、戰爭化，他很可能就能夠坐收漁利。如果當年能够多少限制一下他的權力，如果他沒有那樣幾乎沒有限制的“無法無天”，也不至于鬧成十年動亂，重慶兩

派的武鬥也不至于如此持續，如此激烈，以至採用了戰爭這種“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

我們說了這麼多個“如果”了，很可惜，當年的中國並不具有這樣的“如果”，現在的中國也還沒有這樣的“如果”。我們面臨的任務，就是建立這樣的“如果”。目前，不管是執政黨還是整個社會，都已經認識了民主法治，都相信這是一條必由之路。但對於中國這個既缺乏民主傳統又缺乏法治精神的國家來說，要真正建立民主法治社會，要真正實行憲政，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很可能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我們應當相信，民主法治的方法既然已經誕生，而且已經有了兩三百年的實踐經驗，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成果，已經成為世界上不可抗拒的潮流，只要我們始終不放棄，堅持下去，中國最終還是要走到民主法治道路上去的。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歸宿，任何人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雖然我們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一代人也不過只有幾十年，在歷史長河中僅僅只是短暫的一瞬間。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我依然還是充滿著樂觀的。

48. 歷史是不能封閉的

記得是 1994 年初春的一天，我從朝天門趕船回望江廠，在街邊書攤見到一部書，上下冊，五六十萬字吧，書名叫《武鬥》。那時，離武鬥已經二十多年了，在人們記憶中早已經淡漠，年輕的一代人根本搞不清楚那是怎麼回事。本來，作為一段“史無前例”的歷史，應當是人們研究的絕好對象。那段歷史又那樣“波瀾壯闊”，複雜曲折，既有人性的沉淪，又有人性的光耀，應當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富礦寶藏。但是，武鬥的歷史却被封閉起來，成為禁區，不許人們越雷池半步。參加過武鬥的那一代人，那時都已人到中年，有的成了教授，有的當了廠長，有的發了大財，有的依然貧困。不管是誰，都不願再去翻那血腥而又荒唐的一頁。即使偶爾有人提起，那也好像是別人幹的事，與己無關。萬一有人訊問，誰都會千方百計否認自己曾經拿過槍，曾經參加過武鬥。“那時，我在家跳‘鍋邊舞’，哪一派都不參加。”說的人笑笑，搖搖頭，說慣了便很自然，沒有破綻。聽的人也明白，却不點破，更不追究。於是，在人們的視野中，看不到回憶和研究武鬥的文章，也看不到反映武鬥的文藝作品。

其實，參加過武鬥的人，并非都是健忘症者。早在 1979 年底，上海《文匯報》就發表了鄭義描寫武鬥的短篇小說《楓》。小說中，男女主角都是中學生，讀書時就有那麼一種戀情。武鬥時兩人却分成了兩派，於是便勢不兩立。一次戰鬥中，男主角攻進了女主角一派所占據的大樓，女主角寧死不屈，竟跳樓而亡。後來，男主角被當作殺人犯，抓進了監獄。小說後來還改編成同名電影，搏得了好多人的眼淚。據作者後來透露，武鬥中他就在四川，還到過瀘州前線，《楓》就是反映四川武鬥的。

《楓》的成功引出了一批武鬥題材的小說。其中發表在《紅岩》1980年1期的中篇小說《失落的夢》，就是直接描寫重慶武鬥的。那外號叫“豬頭”的農村來的合同工，稀裏糊塗參加了武鬥隊，上了戰場，先是運彈藥，抬傷員；後來便拿起槍，投入戰鬥。在攻打礦業學校的戰鬥中，這“豬頭”被人連罵帶推，強迫去槍斃了一個俘虜。後來，成立了革委會，他却被本派的頭頭送進了監獄。作者殷正渝是重慶人，親身經歷過那荒唐的年月，故事寫得催人淚下，據說其原形是絕對的真實。

我那篇《願他在地下安息》也發表在同一期《紅岩》上。我沒有正面描寫武鬥，只把武鬥作為小說的一個背景，反映了參加武鬥的人後來經歷的悲慘命運，對那荒唐的年月進行了批判。

那一年，四川美院一批學生創作了不少武鬥題材的油畫，其中好幾幅在全國美展中得獎。記得有一幅是陳可之畫的，幾個武鬥隊員抱著槍，露宿在街頭。地上鋪著滿是槍眼與血迹的戰旗，頭上是打得稀爛的電杆電線，再現了當年的武鬥場景。而那幾個武鬥隊員迷茫疲憊的眼光，給人好深的印象。據說，武鬥時，陳可之還是小學生，沒有來得及參與武鬥，哥哥姐姐們的荒唐行為，却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那幅畫有歷史的真實。

重慶參加或介入過武鬥的，不少于十萬人。他們中間有的後來成了作家，都想用文學形式來反映那場荒唐的戰爭，反思那狂熱帶來的災難。但是，不久就有“上級”精神傳來，發表寫武鬥的文學作品要“慎重”。這一“慎重”，便銷聲匿迹，再難見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看到名為《武鬥》的書，我怎能不大吃一驚呢？幸好離開船的時間還早，我如獲至寶，急忙拿起來。但是，我只翻了翻，便放下了。那是一本小說，名為《武鬥》，却不是寫武鬥的。作者僅僅是藉用四川某地文革武鬥來當一個背景，瞎編亂造一通，一會兒像武俠小說，賦予書中的人物超人般的力量；一會兒又像國外和港臺那些所謂黑幫片、槍戰片的故事，弄得神乎其神；不時還再攬進一些性的黃色調料，讓書中的人物在武鬥間歇發泄。可能是寫得太差勁了，好像也難以吸引人，包括沒見過武鬥的年輕人。我不知此書是不是“非法出版物”，更不知道

此書是怎樣出籠的，反正那天以後再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見到過此書，當然也沒見到過內容相似的出版物。

夕陽西下，江風拂拂。我坐在船上，俯看流水，仰望黃山，往事如影，讓我沉思。我想，那畢竟是一段歷史，是一段不可能抹去的歷史，而且是可以為中國人提供教訓的歷史。雖然現在是禁區，但是，誰又能够永遠禁止下去呢？總有一天，這段被封閉的歷史將成為歷史學家們研究的熱門課題；總有一天，這段歷史的教訓將為中國人提供一個反面教材。作為過來人，作為參與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武鬥的真相寫出來，供後來人研究這段歷史時參考。

無巧不成書。就在那天的船上，我遇到廠裏的一個熟人。他告訴我，他去參加了鄧長春的壽宴。那年，鄧長春才從監獄裏放出來還沒有幾年，却當了一個什麼老闆，發了點財，于是在新華路新落成的凌湯元大酒店裏為自己的五十大壽（虛歲）宴請親朋好友，望江廠的不少人都去了，擺了好幾十桌，竟座無虛席。本來他還準備回望江廠來看看的，廠黨委得知後，急忙向市委報告，據說還是市委採取了“堅決措施”，才阻止了他回望江廠的打算。

正是受這兩件事的刺激，我終於忍不住了，害怕我頭腦中有關文革，特別是有關文革戰爭的記憶丟失，利用業餘時間，匆匆寫了一本 10 萬字左右的《重慶武鬥瑣記》。

但是，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但“六四風波”的餘韻依然籠罩在人們心中，文革歷史被封得更死，我不想給自己增添麻煩，更不想給那些涉及到的參與者增添麻煩，因此我捨棄了回憶錄的形式，不便用第一人稱來寫，書中的人名和廠名大多也用拼音字母來代替。那時我的記憶還好，後來據文革史家何蜀說，書稿中除了兩個事件的日期錯了外，其他都沒錯。可惜，這樣的書稿只能藏在書桌的抽屜裏。不過，正是這本近 20 年前的書稿，為我現在來寫這本回憶錄奠定了基礎。

在《重慶武鬥瑣記》的最後，我寫道：“本書回顧那一場荒唐的戰爭，僅僅是把它作為一段歷史。因為歷史是抹不去，割不斷的，否認或封閉都是徒勞的。但是，對於那些經歷過那一場動難，

參與過那一場戰爭的人們來說，還是將他們封閉為好。我們何必去給他們添麻煩，惹事非呢？對他們我們只能說——活著，但是要記住！”

一晃又快 20 年了。這 20 年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却一直停滯，結果就帶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後果。面對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一涌而出，于是就有人幻想再用文革的方法來“殺富濟貧”，來“共同富裕”。于是，竟然有諸如孔慶東、張宏良、司馬南、韓德強、郭松民之類的專家學者教授之類的人物，公開跳出來贊美文革，說什麼“20 世紀 60 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貢獻，是超越四大發明的最偉大歷史發明”，“20 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就是大眾時代取代精英時代，這個大眾時代的基本政治模式就是中國的文革。目前西方人正在由理性走向文革，中國人正在由感性走向文革”。

說說倒也無妨，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這股逆潮流而動的勢力還有行動。2007 年，薄熙來從商務部部長任上，挂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招牌，來到重慶任市委書記，然後又從遼寧喊來了神經上多少有點毛病的“公安楷模”王立軍當打手，開始了他們“唱紅打黑”的“試驗”。一時間，重慶成了“今日的延安”，一夥還在懷念文革的人紛紛跑到重慶來吶喊助威，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更有幾個傢伙，網絡了一些“死不悔改”的當年的幫派頭目，跑到重慶來開所謂的“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第十一屆代表大會”，公然宣布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作為重慶人，作為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又處在王立軍控制的公安系統裏，從一開始，我就反感他們搞的那一套。隨著他們的“試驗”逐漸深入，我親眼看到他們如何踐踏民主法治原則，親耳聽到他們如何掀起個人崇拜熱潮，親身體驗到他們如何實施高壓手段搞“紅色恐怖”，親身感受到他們如何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并對他們在背後搞的陰謀活動多少有所猜測、有所察覺。我斷定，他們搞的幾乎全部都是文革中的那一套。不過，我已經沒有了任何“英雄情結”，我只是看客。雖然心中極其不滿，偶爾

也和他人議論幾句，却不願也不敢有所表現。反之，在領導交辦某些事情的時候，我還得去做去辦，有的文章我還得按領導的旨意去寫。但是，在我心中，我十分清楚地知道，薄熙來、王立軍這樣搞，是不可能持久的，是注定要失敗的。在他們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也堅信，十年文革已經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大的災難，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可能隨便就忘記那血與火、生與死的教訓！

在談到歷史的時候，馬克思常常引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歷史常常驚人地重演”。對這句名言，馬克思又作了補充：“歷史的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第二次是以鬧劇的形式出現。”2012年1月29日，在重慶市委某個辦公室裏，薄熙來揚起手來，打了王立軍一個耳光。正是由於這個可以記入歷史的耳光，導致重慶這場“第二次文革”的“試驗”戛然而止。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停止薄熙來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宣告了薄熙來發動的“第二次文革”的徹底破產。回顧重慶這場“試驗”的鬧劇，只能讓人啞然而笑。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多少還帶有某種理想（哪怕是空想）的成分，那麼薄熙來發動“第二次文革”，就完全只是為了他個人的野心和一己私利。

但是，讓人難以思議的是，薄熙來倒臺了，王立軍判刑了，依然還有一大批人為他們鳴冤叫屈，甚至公開跳出來和中共中央叫板。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些被稱為“薄粉”的人，竟然有不少所謂的專家學者，他們公然向中共中央上書，美化文革，叫嚷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竟然還得到不少人的響應！這些“薄粉”對文革那一套依然“獨有情鍾”，唯我獨左，唯我獨尊，我說的就是真理，你不同意你就是“漢奸”，如果你還敢反對，就“去他媽的、滾他媽的、操他媽的”大罵，甚至大打出手。連一些身為大學教授的人也不例外，竟然重拾當年的武鬥技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衆目睽睽之中，摑年過古稀老人的耳光。打開他們的專門網站，看看他們那些文章，無非是不講道理，無非是誣衊誹謗，無非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非是無限制地上

綱上綫，無非是謾罵一通打棍子扣帽子。畢竟經歷過文革，我熟悉他們那些文章的寫法，甚至熟悉他們那些文章的結構和語言。如果薄熙來真的上臺，他們肯定要讓中國重新陷入“紅色恐怖”，雖然可能不會有辯論型武鬥了，但批鬥型武鬥肯定又將大行其道。事實上，在王立軍控制重慶市公安局的那幾年裏，這種批鬥型的武鬥就一直沒有停過，不過那有了另外一種說法，叫作刑訊逼供。

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十年文革。但是，30多年過去了，可能是害怕影響黨的“光輝形象”，害怕人們追根尋底從而對現行體制造成影響，一直不准人們回顧那一段荒謬的歷史，不准人們深入反思，更不准人們對引起文革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原因進行深入分析，給予徹底批判。這樣的封閉，終於被像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從而釀成了薄熙來事件。這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悲哀，也是所有經歷過文革災難的中國人的悲哀！

古人說，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文革十年的歷史真相，至今也未“大白”。掩蓋歷史，否定歷史，其實是只能得逞于一時，不可能永遠掩蓋下去，更不可能否定得了的。薄熙來事件已經說明，掩蓋文革歷史，必將自吃其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把舊稿重新翻了出來，寫成了本書。我只是想告訴人們，歷史不能封閉，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

附 錄

附錄 A: 運槍記

說明：這個故事寫于 1968 年 2 月。這基本上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在本書中已經寫到過。1968 年初那段時間，重慶相對比較平靜，沒事的時候，我接連寫了好幾個武鬥故事，曾經拿給不少同學朋友看，他們都建議我寫小說，而且要我寫長篇小說。那時，我還缺乏寫小說的能力，更不要說寫長篇小說了。後來，“三一五指示”下達，重慶又開始一輪新的混戰，寫作的事也就只好放下了。可惜當時寫的幾篇故事後來都遺失了，只剩下這一篇，好歹算是留了一個紀念。為保持當時的原樣，附錄中的文字一律不修改。

今天講個運槍記。

“七二五”血洗工業校後，老保今天“搶”這個武裝部，明天“搶”那個軍火庫，不幾天就武裝起來了。當時，我們反到底在市區剩下的幾個據點，都沒有槍。老保憑著那幾條破槍，一會兒這點打兩槍，一會兒那點打兩槍。據我們得到的可靠情報，他們決定 8 月 3 日全市開花，把我們打垮。你說，我們該怎麼辦？當然，只有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文攻武衛！

今天是 8 月 2 日。一輛洗得乾乾淨淨的公共汽車奔馳在兩楊公路上。車上的人，有的望著遠方，有的打扇，完全像一輛客車。這，就是我們派去運槍的汽車。

汽車在寬闊的公路上直向市區飛奔。車上的人雖然裝得很平靜，但心都在激動地“咚！咚！”直跳。要知道，大家都是頭一次參加這樣的戰鬥。身旁的半自動步槍，大家還是頭一次摸到。不是昨晚加“夜車”，硬是還打不響。幾個人又不自覺地摸摸槍。

司機張老反可不慌。這張老反的本名忘了，只記得他這個外

號。這個外號是他自己取的。運動初期，他貼了黨委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今年2月，他又被打成反革命，抓進監獄。因此，他就給自己取名“張老反”。張老反三十來歲，是個在朝鮮戰場上和美帝飛賊搏鬥過的老司機。他很會想法子。有一次，他開著車子通過老保的崗哨，他加大油門衝到崗哨前，一個急剎車：“喂！前面是‘砸匪’的車，快去攔回來！”那些老保一看他左臂上的袖章，信以為真，爬上車，就開足馬力追。追上那部車時，那些老保去盤問那司機時，他自個兒開得遠遠的了。

這時，他聽見有人弄得槍響，回過頭看，嚴肅的目光向大家一掃，好像是說：“鎮靜！別忘了我們的誓言：要毛澤東思想，寧可不要腦袋！”大家心裏又實在多了。

汽車開到八一村了，已進入老保占領區。前面公路上，堆滿了條石，中間只剩下輛汽車過的地方，也放上一些三腳釘。幾個荷槍實彈的老保站在那兒，正在盤查行人。

一個頭戴鋼盔的傢伙紅色小旗一揮，張老反只好把汽車剎住。

“我們是人交捍紅的，才執行了任務回來！”張老反把頭伸出窗外，邊說邊把一張證明和一個特別通行證遞給那戴鋼盔的傢伙。

那傢伙翻天覆地看了幾遍，才把它還給張老反，然後綠旗一揮。幾個老保把缺口處的三腳釘撿開，汽車就從缺口處開過去了。

張老反正要加大油門，忽然車前出現一隊人。一看，啊，走在前面的正是死對頭王麻子，真是冤家路窄。張老反也不管那王麻子揮手喊停下，喇叭“嘟嘟嘟”幾下，飛奔而去。

那一群傢伙回轉身來，對著汽車就是“呼！呼！呼！”一陣亂打。一個坐在後頭的戰士躲閃不及，鮮血直流，大家急忙給他包紮起來。

話分兩頭，却說那王麻子見汽車飛奔而去後，急得直跳腳，把關卡的老保臭罵一頓，也不頂用。他趕忙給市區各老保關卡打電話，叫他們做好準備，攔住這部汽車。

話說大慶路的老保，接到王麻子的電話，馬上就在十字路口加緊布置。他們知道，反到底市區指揮部一定要經過這裏。于是，又從別處調來了一些人，并拿了一大包炸藥，安在十字路口。一

個個戴著鋼盔，架著墨鏡，扣著口罩的老保，凶神惡煞地把看熱鬧的人趕得乾乾淨淨。一切都準備好了。

不一會兒，一輛公共汽車從遠處衝來。只聽得哨子一響，老保們一個個緊張起來。幾個膽小的，更是往牆角溜。管按炸藥電閘的那個老保，更是汗水直冒。一剎時，大慶路一點聲音也沒有。不知那個傢伙太緊張了，“呼！”一槍走了火。一下，“呼！”“呼！”“呼！”就是一陣槍響。等揉揉眼睛再看，汽車已衝近了。

一個拿手槍的傢伙馬路中間一站，抬手就“呼！呼！”兩槍：“哪裏的？”不等他問完，汽車就衝到身邊。這傢伙躲閃不及，被壓倒在車輪下。

那管電閘的傢伙，只聽得汽車上一陣槍響，急忙閉上眼，把閘門一按，“轟！”炸藥炸了。但是，等他睜眼一看，唉呀，汽車乘著硝烟衝了過去。

原來，司機張老反加大馬力，壓倒那問話的傢伙後，忽見那十字路口堆了一大包，心裏知道不好，急忙一個急剎車。那沒得用的老保哪裏知道這些，只管一按。炸藥響了，張老反油門一踩，“嗚”地一下衝了過去。

却不說老保們互相埋怨，自認倒楣。只說我們就這樣把槍運了回來，把自己武裝起來，堅持戰鬥，守住了市區據點，迎來了最後勝利。

附錄 B：花落花開

說明：這篇小說寫于 1979 年 10 月，後來又經過多次修改，沒有正式發表過。那幾年裏，我曾寫過好幾篇關於重慶文革戰爭的小說，只有《願他在地下安息》一篇刊載于 1980 年第 1 期《紅岩》雜志。後來，因有禁令，寫武鬥的文學作品一律不准發表，我寫的那些小說被紛紛“槍斃”，如今連原稿也丟失了，只留下此篇。這個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真實的，是我母親到南山來找我的經歷，讀者可以在本書中找到相關的記述，後半部分是虛構的。當年，搞武鬥的大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大小的學生和工人，他們的母親和我母親一樣為自己的子女擔驚受怕。那被打死了的，更是給父母留下了終生的傷痛。要說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們的父母！

母親發著高燒，躺在這陌生的床上，做著熱昏的夢。

她記不得自己是怎樣來到這兒的，她只知道自己是去找兒子的。她夢見兒子托同學帶回家來的信。那是一封什麼信啊！兒子在信上說，那是他的遺書。什麼叫遺書？念信的人說，就是臨死前寫的信。她夢見在江邊等船，等了整整兩天，好不容易才開了一渡。渡船上那戴鋼盔的姑娘好凶喲，竟平白無故給她一皮鞭，幾乎把她打下河去。她夢見在山路上走著，太陽好毒喲，她頭昏腦脹，暈倒在那大樹下。她夢見天邊閃著雷電，地上滾著火球，傾盆大雨淋得她渾身濕透。她一跤跌在地上，滑進路邊的水田，一身都散了架似的，好痛好痛……

母親搞不明白，大家都好好的，為何又要打仗。你們打仗都不要緊，為何要把我的兒子捲進去呢？他才十五六歲，時常還挂著兩串清鼻涕呢。

她彷彿看見兒子來了，還是那樣，穿著褲衩，光著脊背，一根木棍扛在肩上，喊著“一二一”向她走來。她笑了，却又忍住，伸手想敲他一下。他馬上又變了，變高了，變大了，穿一件舊軍裝，手臂上還戴著紅袖章。她拉住他，不讓他走。他輕輕一掙，便掙脫了，稚氣的臉上裝出一副大人的姿態，又對她說了一通大道理。集合號響了，他走了。她喊著，哭著，追了上去，他却不見了。

母親一聲驚叫，醒了過來。

山背後那幢大樓響起急促的哨音，高音喇叭又開始大吼大叫。主人家告訴她，這是兩派交界的地方，你攻我守，爭來奪去，經常打仗，不是個安全的住所。天一黑，他們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母親不怕死，又在病中，不管主人家怎麼勸，還是留了下來。

喇叭不吼了，母親又昏沉沉睡著了。

兒子又來了，好像是當了工人，又高又大的，嘴唇邊有一圈粗黑的胡鬚。他撲上來，親熱地叫著，又轉身拉開門，門口站著一個姑娘，好漂亮，白襯衫，紅裙子，抿著嘴笑。母親覺得在哪兒見過，却又想不起來。揉揉眼睛再看，姑娘一下變了樣，穿著勞保服，戴著鋼盔，凶神惡煞的，手中還提著一根皮鞭。那皮鞭舉起來，就要向她打下來。母親害怕，急忙躲到兒子身後。兒子也變了樣，端著亮晃晃的槍，迎上去。一陣槍響，一切都消失了。

母親又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呼呼呼——！”

“噠噠噠——！”

這不是夢了。山背後，傳來急促的槍聲。透過玻窗，母親看見，那漆黑的夜空裏，一串串火紅的流星在飛舞。喇叭又響起來：“強烈抗議……最最強烈抗議……”不一會兒，又啞了。槍聲越來越密，像炒乾胡豆。後來，又響起衝鋒號……

母親下意識地拉過被蓋，把頭蒙住。她覺得，那子彈就要打到她身上來。她想喊，却喊不出來。她感到窒息，幾乎就要斷氣。

“轟隆——！”忽然響起沉悶的爆炸聲。

母親想起來了，董存瑞炸碉堡，不也是這樣一聲巨響嗎？今晚來攻打那大樓的人中，說不定也有兒子呢。一想到兒子，她眼

前就出現一幅幅畫面：兒子在衝鋒……機槍在掃射……衝鋒的人一個接一個倒下，只有兒子不倒，衝到那大樓前……炸藥包被兒子托起，導火索在燃燒……在燃燒……轟隆……大樓飛上天……兒子不見了……烟霧散開……兒子躺在地上，滿身鮮血，一動不動……

“兒啊——！”

母親猛然一驚，掀開被蓋，跳了起來。

兒子死了，母親怎能活得下去？她跪在地上，向那響槍的地方磕著頭。

天，漸漸亮了。槍聲，慢慢稀落下去，最後終於消失。嘰喳喳喳的小鳥却唱起來，那樣的無憂無慮，清脆悅耳，沉寂的清晨又充滿生機。

母親又上路了。經過一整夜折磨，她似乎輕鬆了，頭不再痛，身上竟輕飄飄的。她匆匆穿過那死一般寂靜的大街，心裏比昨天還急。必須把兒子找回來，不能讓他再去殺人，不能讓他被別人殺死。

路邊水溝裏是什麼？是一個人。他躺在那兒幹啥？母親忍不住，走過去看。啊，那是一個死人。他朝天仰著，臉上沒有一點顏色，嘴巴張得大大的，眼睛翻著，駭人地盯著母親。母親不禁後退了幾步，她想走開。死人那微微上翹的鼻梁，那尖尖的下巴，好像兒子喲。她驚了一跳，彎下腰再看。死人胸前中了一槍，血染紅了全身，連水溝的水都染紅了。他一手提著手榴彈，一手按在傷口上。他只有十幾歲，好像還不甘心死去，正對著藍天喊叫。

一股刺鼻的臭味，使母親差點兒要嘔吐出來。她忙立起身來，捂著鼻子走開。

只走了兩步，她又停住。如果是兒子呢？他躺在水溝裏，不冷嗎？母親忽然想起，兒子額頭上有一條疤，那是他小時候爬樹，從樹上摔下來的印記。她轉回身去，再一次打量那死人。她越看越覺得那就是兒子，心一下提起來，幾乎窒息了呼吸。

母親蹲下去。她從來沒有這樣蹲在死人面前看過。她一遍又

一遍下著決心，終於伸出手去，輕輕拂開那死人額頭上的頭髮。謝天謝地，沒有那條傷疤，不是兒子！母親鬆了一口氣，站起來，向那死人再瞥了一眼，轉身跑開。

只跑了幾步，她的腳便挪不動了，心沉沉的。死人那大張的嘴，那翻著的眼，晃來晃去，死死糾纏著她。她費了好大的勁，才離開那水溝，向前走去。

轉過山坳，就能看見兒子那所學校了。母親忽然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來。那死人額頭上好像是有一條疤，剛才看花了眼還是咋的？她站住了，遲疑著，猶豫著。終於，她又倒回去，她要再看看那死人。即使不是兒子，也要去找人來，把他抬走，讓他回到他母親身邊。他母親不是也跟自己一樣想念兒子嗎？不是也跟自己一樣愛兒子嗎？她加快脚步，好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迫使她向死人奔去。到後來，她幾乎跑了起來。

“站住！”突然傳來一聲吆喝。

母親駭了一跳，猛地站住。這時，她才看見，好些背槍的人正圍著那死人。死人已經被抬上擔架，不知要搞什麼名堂。她忽然注意到他們的袖章，勉強認出“鋼二連”幾個字。她記得兒子就在信上說的，他就是鋼二連的戰士。

擔任警衛的大個子走過來，喝道：“幹什麼的？”那槍尖上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

母親從懷中掏出信來，遞過去：“我來找兒子，他在你們鋼二連，叫陸貴，不，他改了名字，叫陸忠。”

“啊？！”

大個子驚叫一聲，接過信，看也沒看，就轉身跑回去，交給那背手槍的胖娃。

胖娃看完信，呆住了。一個姑娘從他手中接過信，也呆住了。那封被當作遺書的信，在那群背槍的人手中一個一個往下傳。看了信的人，都呆住了。那大個子忍不住，一把抓下帽子，把槍一頓，蹲在水溝邊，蒙著臉哭起來，像個小娃娃一樣。

母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驚慌地看著他們，也呆住了。

好半天，那胖娃才邁著沉重的步伐，走了過來。其他的人跟

在他後面，也圍了上來。母親茫然地盯著他們，心臟似乎停止了跳動。

“陸媽媽，陸忠同志是好樣的。爲了炸毀敵人的據點，他最先衝上去，他——”

那蹲在水溝邊哭泣的大個子，猛地跳起來，撲到母親面前，跪了下去：“陸媽，從今後，我就是你的兒子！我發誓，一定要打死十個狗雜種，爲陸忠報仇！我一定要像陸忠那樣，孝順你。媽，媽，你答應嗎……”

大個子伏在母親脚下，又放聲大哭。

母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慌地看著他們。後來她似乎明白了，頭腦裏嗡地一聲炸響，便什麼也聽不見了。

“他在哪裏？在哪裏？在哪裏呀——！”

母親突然舉起雙手，野狼似地嚎叫起來。

背槍的人讓出一條路，那後面就是那擔架和那擔架上的死人。母親呆了一下，發瘋地撲上前去。她拂開死人額前的頭髮，一條疤痕明明白白出現在她眼前。

“兒啊——！”

撕肝裂膽地嚎叫，在空蕩蕩的山谷裏迴響。可是，兒子已經聽不見了。

路旁那高高的白楊樹痙攣地顫抖起來，發出一陣陣悲鳴。不知從何處飄來的幾朵粉紅色的夾竹桃花，落在那死人蒼白的臉上。

“報仇！報仇呀——！”

伏在兒子那血肉模糊的尸體上，母親昏死過去了。

兒子就要下葬，母親被人攏扶到墓地。這是一個幽靜的地方，在一個山凹裏，而前面却可以看得很遠很遠。四周長滿夾竹桃，開著粉紅的嫩白的花，好像織就的一個大花環。山脚下有一條小小的溪流，終日叮咚，唱著安魂曲。

爲了給陸忠報仇，昨天晚上，胖娃親自帶隊，又去偷襲了對方，炸毀了一輛對方巡邏的卡車，據說消滅了十幾個狗雜種，還抓到一個俘虜。小山四周，警備森嚴，到處都是崗哨，山頂上還架著

機槍。那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山脚下那條公路。

一夜之間，母親頭髮全白了，眼睛凹了下去，眼仁失去了光澤，和骷髏相差無幾。她軟得不能再軟，輕得不能再輕，全靠那兩個姑娘攬扶，她才能挪動脚步。那個甘願給她當兒子的大個子跟在她身後，左手吊著繩帶，那是參加昨夜襲留下的紀念。他腰間插著手槍，咬著牙，死死盯著那已經挖好的墓坑。

兒子的尸體已經從防空洞裏抬了出來。尸體已經用酒精清洗乾淨，臉上還塗了一點紅，身上穿上了嶄新的軍裝，安靜地躺在連夜趕制出來的棺木裏。尸體雖然已經發臭，母親却聞不到，堅持要坐在兒子身旁。她只是看著他，看著他，不再哭，渾身所有的力量似乎都已經用盡了。她也是一個死人，只是還活著，還有一口氣。再過一會兒，她就要永遠永遠看不見那尖尖的下巴，那微微上翹的鼻梁，那被搭下來的頭髮遮住的傷疤了。那張臉漸漸模糊，化成藍天白雲，化成一灣清泉流水。母親的眼光全散了。

追悼會怎樣開始，哪些人講了話，講了些什麼話，母親都不知道。連那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鳴奏的哀樂，母親也聽不見。她大腦裏是一片灰白，什麼也沒有。她呆呆坐在那兒，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把殺人凶手押上來！”

這聲吆喝，使母親一怔，似乎醒了過來。一個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姑娘，五花大綁被押了上來。當她從母親面前走過，惡狠狠地瞥了母親一眼，使母親一驚，竭力回想在哪兒見過。從昨晚半夜起，就聽見樓下傳來隱隱約約的呻吟，莫不就是她在挨打？

“爲陸忠烈士報仇！”

“爲陸忠烈士報仇！”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殺死我兒子的，就是她呀！母親扶著椅子站起來，踉踉蹌蹌走到女俘虜面前，一把揪住她，似乎要把它一口吞掉。

“還我兒子來！還我兒子來！”

母親那青經突暴的手劇烈地顫抖著。她咬得緊緊的牙齒，發

出嚓嚓的響聲。女俘虜被老太婆那激怒的臉駭住了，惶恐地看著母親，一動也不敢動。母親那手捏著女俘虜的雙肩，那指甲都掐進那肉裏，兩隻眼睛射出的寒光像兩柄劍，令那女俘虜禁不住顫抖起來。母親認出她來了，就是她打了自己一皮鞭，差點兒把自己打下河去。母親向她逼去，向她逼去，要和她拼命。

“媽啊——！”

女俘虜“哇”的一聲大叫，頭一垂，伏在母親懷中。這一聲哭喊，讓母親怔住。她突然想起，兒子小時候偷偷下河洗澡，踩滑了，掉進深水裏，差點兒淹死。她要打他，他也是這樣一聲哭喊，使她的心軟了下去。這姑娘才十幾歲呀，甚至比她那躺在棺木裏的兒子還小呀，她就是殺人凶手嗎？母親揪住女俘虜的手慢慢鬆了，身子又那樣發軟，差點兒跌倒在地。

大個子急忙扶住母親，重重踢了那女俘虜一脚尖。女俘虜痛得“哎喲”一聲叫，彎下腰去，馬上又直起身子，狠狠地瞪著大個子。

“媽，你放心，我們馬上就給陸忠烈士報仇，你看我的好槍法！”

大個子把母親扶到椅子邊，讓她坐下。母親恢復了那茫然的神態，歪著頭，望著那綴滿粉紅嫩白花朵的夾竹桃樹叢，腦海裏又空蕩蕩的，失去了對四周的知覺。胖娃正在宣讀判決書，母親一句也沒聽進去。經過剛才那一番沉重衝動，那本來就虛弱的身子已經支持不住了，她把那顆沉重的頭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

大個子坐在她身邊，用那只沒有受傷的手把那二號駁殼槍擦了又擦。那幾顆為女俘虜準備的子彈，也錚亮錚亮的，在陽光下閃著金輝。

“砰——！”

沉悶的槍聲把母親驚了一跳。大個子就站在她面前，手中的槍還冒著一縷餘烟。可能是受了傷，沒把槍端穩，那女俘虜還站在那兒，沒有倒下。

“孬貨！”女俘虜竟敢嘲笑向她開槍的人。

“好，你等著！”大個子氣極敗壞，又舉起槍來，開始瞄準。

那一刻，不論是大個子還是周圍的人，全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女俘虜更是莫名其妙，傻呼呼地看著撲上來的母親。母親

自己也沒搞清楚，她為何要撲上去。反正，她一下子變得年輕了，變得有力了，動作迅速快捷，箭一般撲到女俘虜面前，一把抱住那簌簌發抖的姑娘，就像抱住她心愛的兒子。

大個子眼明手快，一顆子彈飛上藍天。

“媽，你讓開，你讓開呀！”

母親轉過身來，背著雙手，護住那曾經抽了她一皮鞭差點兒把她打下河去的姑娘。她兩眼盯著大個子手中那余烟繚繞的駁殼槍，嘴角竟然挂著一絲微笑。

“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大個子拿槍的手垂下來，啪的一聲，那槍掉在地上。

“你們打來打去，殺來殺去，還有沒有個完啊？”

參加追悼會的人慢慢低下頭來，不敢再看母親一眼。幾個姑娘竟抽泣起來。那女俘虜被這一幕弄得莫名其妙，承受不了這劇烈的變動，竟昏死過去，倒在樹上，又慢慢滑下來，跌在地上。大個子茫然地望著母親，突然撲在那棺木上，嚎啕大哭起來。

“噠噠噠——！”

不知是誰，端起衝鋒槍，向天上射出一梭子彈。槍聲震撼著人們的心，也震撼著這充滿血污、硝煙和哭聲的世界。槍聲中，一朵朵夾竹桃花飄落下來，粉紅的，嫩白的，帶著淡淡的清香，灑在棺木上，灑在女俘虜的身上，灑在母親頭上，也灑在人們懷中。

遠處，隆隆的雷聲在天邊滾過……

附錄 C：願他在地下安息

說明：這篇小說寫于 1980 年 1 月，刊載于 1980 年第 1 期《紅岩》雜志。這雖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故事中的主人却有我的影子。因本書多次提到這篇小說，且作為附錄放在這兒，供讀者參閱。

如果你讀完這篇小說，你就可以記起他的名字，甚至可以想起他的相貌。你記憶力好的話，你不會忘記，幾年前，報上曾以頭版頭條，配以照片，宣揚過他的事迹。他的樣子很平常，瘦瘦的臉，蓬亂的頭髮，緊抿的嘴唇和一雙略帶憂慮的眼睛。那時，你可能為他的英雄事迹激動過，甚至流過眼泪。如果你愛寫日記，你查一查，很可能還摘錄過他的豪言壯語。你下過決心；甚至發過誓，要以他為榜樣，把毛澤東思想溶化在自己的熱血中，“甘灑滿腔青春血，迎來世界一片紅。”

可是，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什麼事情不能發生呀？他曾經是個英雄，後來，他死了，死得杜烈，或者也可以說，是悲哀的。如果死而有知，今天，當他在九泉之下回顧往事，他是在哭泣，還是在微笑？他是在悔恨，還是在詛咒呢？

阿門！

他是怎樣紅的

他是一個普通的青年，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就沐浴著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思想純潔得像一張白紙。他出身碼頭工人家庭，更有一種“自來紅”的優越感。讀書的時候，每學期都要拿幾張獎狀回家。文化大革命一

開始，很自然地成了紅衛兵。批“四舊”，鬥走資派，打牛鬼蛇神，總是走在前，衝在前。他是首批上山下鄉的。在那偏僻的大巴山下，經過兩年的苦鬥，終於得到貧下中農的推薦，進了這個赫赫有名的國防工廠。

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滿以為能幹上車鉗磨銑，甚至還在一起進廠的同學面前提過勁。誰知，事情的發展却出人意外，他被分配到總裝車間當油漆工。當他聽到這個消息，臉色一下子變了，沮喪到了極點。自己不比別人缺個胳膊少個腿，為什麼遇上這麼一個倒霉的差事？事情就是這樣，你寄予的希望越大，到頭來失望就越深。

頭一天下來，他身上那套嶄新的勞保服就沾滿了紅紅綠綠的油漆斑點，連臉上也沒有幸免。在廠區大道上走著，昨天還是那樣神氣，今天却疲乏得拖不動腿了。一同進廠的幾個同伴嘻嘻哈哈從他身後走過來，那高興勁刺痛了他的心。他的同學小胖娃大聲武氣向別人講述第一次上車床的趣事，似乎是專門說給他聽的，這使他特別惱怒。

“小胖娃算什麼？在農村，哪一年不比我少做兩三百個工分？為什麼他反而能够上車床，又有技術又吃香，我却只能握漆刷，又遭踏屑又勞累？”他這樣想著，心中更不平靜，脚步也就更慢了。

回到宿舍，他一頭倒在床上，閉上了眼睛。迷糊中，好像又回到公社場口的那個小橋上。同學們來送他，又是握手，又是拍肩，熱烈的話語，充滿了羨慕，甚至還有一點嫉妒。他聽見有人在背後嘆氣：“只要能够回去，叫我挑大糞都幹！”他感到驕傲。他真想呼喊，真想歌唱。但是，他沒有喊出來，也沒有唱出來，他醒了。他覺得眼角有一顆淚珠，忙用手擦去。

他從床上跳起來，在室內蹦跳了幾下，暖和暖和有點發涼的身子。說也奇怪，剛才的煩惱已經減去一半。是呀，那麼多同學還在大山裏挖月亮鋤，自己又何必這般垂頭喪氣呢？油漆工就油漆工吧，總比在農村強。

第二天，他心情好了一些，幹起活也輕鬆多了，那刺鼻的香蕉水似乎也不那麼難聞了。他的師傅是一個老工人，不愛說話，

在機器架子邊鑽進鑽出，爬上爬下，弄得滿身鐵銹，滿頭汗珠。他給師傅打來一杯開水，要師傅歇一歇。師傅推開水，話也沒說，繼續幹著。這使他很受感動，也爬上架子，學著師傅的樣兒，用鐵刷去刷銹迹，一任鐵銹沾滿自己的臉和衣服。

正好車間指導員從旁邊路過，看見了他，點了點頭，算是對他的贊賞。吃飯的時候，他碰巧和指導員走在一起。指導員拍拍他肩頭，鼓勵了幾句：“年輕人嘛，就要像這樣。幹革命，不能挑肥選瘦，拈輕怕重。做出了成績，黨是看得見的。”幾句話說得他心裏熱呼呼的。似乎有一股暖流橫貫全身。黨，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字眼。黨看得見，他還能够不安心，怨天怨地嗎？他暗暗下丁決心，為革命當一輩子油漆工。他精神一振，竟用那不入調的聲音哼起了“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來。

從那以後，他快活了，幹起活來勁頭衝天。啊，新的生活是美好的呀！當他揮舞著漆槍，給一臺臺機器噴上春天的色彩，彷彿也就噴出了自己的滿腔激情。油漆工喲，能給大地披上艷麗的新裝，能給藍天染上絢爛的朝霞，是多麼幸福啊！碰見小胖娃，他再不像那樣自覺矮人三分了。

車間要開講用會，指導員馬上想起他。這一批新學工，簡直像群野馬，動不動就給你捅些漏子出來，工種好的就驕傲，工種孬的就胡鬧。和他一起分到油漆組的兩個女生，就來找過指導員多次，又是摔鼻涕，又是抹眼泪，要求調換工種。應當把他樹起來，教育教育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

指導員查閱了他的檔案，沒發現問題，把他叫到辦公室來，說明自己的決定。他激動了。他覺得，安排他作典型發言，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他只花了一個晚上，就把發言稿寫了出來。他如實地寫出了自己對當油漆工從不安心到安心的過程，又生動，又具體。但是，當他把這篇一兩千字的稿子交給指導員的時候，指導員看了，却沉吟了好一陣。文章倒寫得樸實，就是不符合講用稿的格式，而且也沒寫出他轉變後所做出的成績，這怎麼行呢？

“你放在這兒，我幫你改一改。”指導員眨了眨眼睛，關懷地說。

當講用會開始前的半個鐘頭，他拿著指導員給他改過的稿子，驚詫得睜大了眼睛。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前前後後加了那麼多語錄，後面補寫的那一大段，他一看就臉紅。他畢竟是年輕人，還沒學會自我吹噓，對指導員的用意也不明白。他氣惱了，轉身去找指導員。

“唉，你這個人，”指導員還沒聽完，就打斷他的話，“上臺去照著念就行了嘛，想那麼多幹啥？黨給你撐腰嘛！”

他啞了，臉上紅一團，白一團，只好轉身走開。

誰都沒有估計到，他的這篇典型發言，竟使他一下紅了起來，成為全廠的標兵，顯赫一時。他是最後一個發言。他躲在角落裏，一遍又一遍看自己的稿子，幾乎都能背出來了。當他走上臺去的時候，會場照例響起了一陣掌聲。他站在講臺上，首先就看見指導員那盯著他的眼睛。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開始不免有些發慌，說話的聲音也在顫抖。好容易才使自己鎮靜下來，聲音也提高了一些。他講得那麼好，指導員給他加上的那些語錄，又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誰聽了，都會覺得他學得好，學得活，學到了點子上。

講稿還沒有念完，他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當時廠政工組來了一位組長，就坐在指導員身旁。指導員輕聲向組長介紹情況，他正念到在自己的思想轉變中，指導員的鼓勵如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組長微微一笑說：“讓他到廠裏去講一講。”使指導員受寵若驚。那年頭，生產上不去是小事，政治路線不端正才是頭等重要的。指導員原是廠人保科的幹事，才派到車間來當一把手，位子還沒坐穩，更需要做出一點成績來。組長一表態，他就決心要樹好這個典型，封住那些嘰嘰喳喳的反對派的嘴。

在大會總結時，指導員號召全車間職工向他學習，把活學活用的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學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指導員也是從青年過來的，當然知道當領導的幾句表揚話對年輕人的作用。

不久，他果然參加了廠裏的講用報告團，到各車間去巡迴講演，一講就是一個多星期，廠裏剛完畢，他又被推薦到局裏。局裏還沒完，市裏又來找去。他成了一個大忙人、大紅人，赴宴會，

坐小車，事迹上了報，名字響噹噹。他的份發言稿，經各級宣傳部門多次修改，從油印到鉛印，越改越精，越改調門越高，他心中也就越發不安了。但是，別人告訴他，這是形勢的需要、路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他也就無可奈何。良心的責備，使他煩惱，他只想早日回廠去聞那香蕉水氣味。

一個月後，他終於回廠了。他興匆匆地走到師傅面前，怯生生喊了一聲。他師傅瞥了他一眼，沒有答理，繼續幹自己的活。他不知爲啥，轉身去問那兩個女生。胖的那個嘴一癟，走開了。瘦的那個告訴他，他那樣自我吹噓，別人都有意見。早就攬著他的苦惱，被這話一撥，使他更難受了。他想去給師傅解釋，却又不知道如何說好。他只好把勞保服一籠，搶過師傅手中的漆槍，幹起活來。

但是，他還沒幹上十分鐘，指導員就派人來叫他了。他有點惱怒，拿著漆槍在那兒怔了好一陣。他師傅從他手中拿走漆槍，嘆了一聲，叫他還是去。指導員高興地告訴他，他已經是團支部書記、廠團委常委了。他聽了，却好像無動于衷。榮譽、地位似乎成了他的包袱。指導員指著窗外那被風雨衝得七歪八倒的大批判專欄，要他脫產幾天，換上新內容。

“但是，我……”他有點爲難，“我一個多月沒回小組了。”

“這是黨支部的決定，我給你師傅講一聲就是了。”指導員拍拍他肩頭，“革命大批判。是政治任務嘛，壓倒一切。”

他不好再說，只有承擔。他不僅文章寫得好，還能畫一點宣傳畫，寫幾個美術字。大批判專欄一貼出去，馬上引起廠宣傳科的重視，把他借調走了。他成了個寶貝，政工組要用，廠團委要爭，宣傳科不放，車間甚至輪不上。他走到哪兒，哪兒就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議論。廠裏的書記、主任、頭頭和大小官們都認識他，見了面，總要笑一笑，點點頭，打個招呼，爲總裝車間黨支部培養出這樣一個好青年而交口稱贊。一起進廠的同學，在路上碰見他，都用嫉妒的眼光看他，用羨慕的語氣問他，連小胖娃在他面前都收起了得意的神態。

但是他……

有一次，他和指導員走在一起，他向指導員員述說心中的苦惱。他還是想回小組去，多子一點活。他覺得，這樣才對得起黨的培養。

“我師傅……”他說。

指導員盯了他一眼：“你師傅只曉得理頭拉車，是個生產黨員，你不要學他。”

他沉默了。師傅這樣好的人，指導員却看不上，他不知爲什麼。

指導員見他不說話了，拍著他肩頭，問起他的年齡，關切地說：“唉，你不小了啊，應當向組織靠攏，接受黨的考驗。”

他馬上理解了指導員的意思，不由得一陣激動。晚上，他熬了大半夜，寫好入黨申請書。他躺在床上，第一次嘗到因激動而失眠的滋味。入黨，這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情喲，他怎能平靜？第二天，他把申請書交給指導員的時候，指導員發現，他的眼睛都紅腫了。

他覺得，既然向黨提出了申請，理應做出新的成績。于是，他更拼命地幹。雖然指導員要他多抬頭看路，他還是儘量回小組參加勞動。他往往是穿著沾滿各色油漆的勞保服，手拿漆刷走進辦公室。一開完會，馬上就回小組，下班鈴響了，也不停下。他恨自己只生了兩隻手，他怕時間過得太快，連走路都是小跑，連吃飯也在思考。他不打牌也不下棋，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工作上。他明顯瘦了，他師傅關切地叫他注意身體，語氣充滿愛憐。他向師傅述說了自己的心情，終於得到師傅的諒解。

他的才能，他的地位，他的名聲，使多少姑娘傾心喲。認識他的姑娘見了他，總要向他投來含情脉脉的一瞥。他好像一點不懂姑娘的心，僅僅像對其他人那樣，報以淡淡的一笑，冷了別人的心。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沒留寄信人地址的信，拆開一看，竟掉下一張姑娘的著色照片。他只恍惚記得她是機修車間的團支部委員，連名字也弄不清楚。姑娘的相貌還不錯，一雙大眼睛，一張鵝蛋臉，嘴邊一顆黑痣。姑娘的信是熱烈的，充滿了對他的贊頌和愛慕之詞，這使他有點惶惑不安。說實話，他還沒有戀愛的經驗，而且暫時也還不想戀愛。廠裏明文規定，學工不能要朋友。

他下定決心，三年以後再說。

給姑娘回信雖然是一件惱人的事，他還是寫了一封短短的信，婉言謝絕了，但是，照片却沒有退回去。他都二十出頭了，從來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說也奇怪，過上三五天，總要把照片拿出來看一眼。姑娘的眼睛大膽地看著他，使他的心怦怦跳，趕忙又放回箱子裏。他沒有膽量去找那個姑娘，也沒有膽量重寫一封信。他想見到她，又怕見到她。如果偶爾碰上，他頭一低，臉會一直紅到耳根。待她走過去了，他才回頭偷偷望一眼她的背影。

他從農村出來，才僅僅三個多月，上帝就給他安排了這樣一個好環境。雖然爲了不能經常回小組勞動有些苦惱，但是在他的面前，畢竟展現了一條鮮花鋪就的道路。他覺得自己有滿腔的熱，有渾身的勁，要獻給黨，獻給共產主義事業。

但是，他畢竟太嫩了一點，甜的吃得過多，苦的還沒沾邊。他不知道，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像他這樣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稍有差錯，就可能引來滅頂之災，成爲那些爭權奪位的顯貴們的犧牲品。況且，一場風暴正在向他襲來，他能經受得住這場風暴的猛烈襲擊嗎？

他是怎樣死的

“批清”運動的風暴越刮越猛，他開始有點虛了。在那狂熱的年代，革命，造反，文攻，武衛，像排山倒海而來的浪潮，俘虜了多少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喲。他是全校最早的造反者之一，自然也參加了武鬥。他曾堅守的那個醫院，緊扼市區咽喉，兩派必爭，三天兩頭總有一場血戰。市裏的派頭頭常來觀察、督戰，他當然也就認識了那些大人物。而今，那些人一個個都被挂了起來，甚至在報上點了名，他怎能不怕？廠裏倒還沒有知道他底細的人，小胖娃是逍遙派，只曉得他的觀點。從外表看，他溫文爾雅，哪是武鬥隊的亡命徒呢？而且，他現在名聲顯赫，誰也不會懷疑到他頭上來。但是，萬一呢？他心一涼，背心都出了冷汗。

他是搞宣傳的，不能不寫大字報、大標語、批判文章。因爲

是標兵，三天兩頭還要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他明知道，那些挨批挨鬥的人中，大多數和他一樣，都是懷著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紅心，參加了派性組織，被捲進武鬥中去的。但是，他還是要把他們當作“五一六”、“三老會”、“反革命”罵一通。這使他很痛苦，違心的事做起來，總是如此。他躲在寢室寫稿子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文才根本應付不了這種倒霉透頂的差事。寫著寫著，他筆一丟，霍地站起來，在室內煩躁地踱步。他覺得，那一句句尖酸刻薄、如刀似劍的話，不是對別人的，而是直刺自己的心窩。但是，不寫又怎麼行呢？他又坐下去，咬著筆沉思，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唉，運動運動，你快快結束，快快結束吧。”他一次又一次私下禱告。

有一次，指導員又布置他寫一篇批判稿，他忍不住了，向指導員吐露了幾句心中的煩惱。問道：“這些老工人，你會認為他們是反毛主席的？”

指導員驚异地盯了他好一陣。運動以來，指導員已經察覺到他思想跟不上形勢，行動遲緩消極，早就想提醒提醒他，只有在運動中積極努力，才有可能火線入黨。于是，指導員叫他坐下，把黨支部最近討論他入黨問題的事，告訴了他，要他跟上形勢。

“要經得起黨的考驗。”指導員拍著他肩頭，嚴肅地說，“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有鮮明的階級鬥爭觀念，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站穩立場，做黨的一把鋼刀。”然後，把一份用紅字印刷的入黨志願書遞給他。他一下怔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他想說什麼，却沒說出聲來。

“我早就給你講過，做出了成績，黨是看得見的。我沒說錯吧？”指導員停了停，又補了一句，“不過，就看你自己了……”

他走出辦公室，心情却並不好。志願書上有一欄是曾經犯過什麼錯誤，受過什麼處分，這把他難住了。要是把搞武鬥的事講出來吧，緊接而來的就是挨批挨鬥，被抓被關，進防空洞。他曉得，廠裏那些被隔離審查的人，都關在廠後面那陰森恐怖的防空洞裏。

每次從那兒路過，聽見裏面傳來令人寒顫的訓斥聲和撕肝裂膽的哭喊聲，總要加快脚步，匆匆跑開，生怕自己也落進那魔窟。不講吧，組織上一去調查，什麼都會敗露。到那時，不僅要算舊賬，而且還會給你扣上欺騙組織欺騙黨、削尖腦殼投機的罪名。他後悔了，不該匆匆忙忙寫申請。

他那落魄失魄的樣兒，使他師傅感到奇怪，關切地問他出了什麼事。他望著師傅那慈祥的臉，鼻子一酸，幾乎掉下眼泪。自從他當上油漆工，他師傅對他是多麼關心喲，政治上給他指路，工作上給他榜樣，生活上給他溫暖。他把師傅拉到一邊，把自己的苦惱告訴了師傅。他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講著過去那些事情，心一陣陣絞痛。

“師傅，你說，我該怎麼辦呀？”他有點絕望地看著師傅。

他師傅沉默了，巴搭著葉子烟。好一陣，那兩隻深沉的眼睛才轉到他身上來，問道：“你做過什麼對不起人民的事嗎？”

“沒，沒有。”他想起當年自己一顆紅心鬧革命，從沒想過發橫財、撈官帽，氣又上來了，“如果曉得有今天，鬼才去幹那些事情，誰不知道子彈打得死人呀！”

“那你就老實向組織交代嘛。”師傅說。

他一怔：“那，那……”

“要相信群衆，相信黨，而且……”師傅想告訴他，這樣把普通群衆也抓來亂整的運動，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也不符合黨歷來的政策。但是，在這風頭上，怎能這樣說呢？師傅停了停，只好用運動總有開始結束，壞人只有百分之幾的話來安慰他。

他思想更亂了，幹起活來一點勁也沒有，而且連出幾起差錯，把不該塗漆的地方塗了漆，把該塗紅漆的地方塗了綠漆。下了班，他從大字報欄前走過，他感到，那一張張充滿殺氣的揭發、勒令和敦促投降書，全向他壓來。在那幅他自己畫的巨大的刊頭畫前面，他覺得，自己馬上就要變成那個被踩在掄千鈞棒的英雄脚下、拼命哀嚎的“五一六”小丑。他不敢再看下去了，頭一低，匆匆走了過去。

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頭昏濁濁的。他做了一個惡夢，被

幾個戴袖章的群專人員拖了起來，挂上黑牌，押到廠區大道游街。黑壓壓的人群全向他伸出手來，嚇得他直抖。然後，他被投進防空洞，黑沉沉，陰森森，沒有一點光亮，沒有一點聲響，只有風在耳邊嗖嗖撕叫。他驚叫起來，出了一身冷汗。

窗外有人唱歌，他跳起來向外看了一眼。一個才洗了澡的姑娘，披著烏黑發亮的頭髮在晾衣服。歌就是她唱的，聲音柔和悅耳。她轉過身來，他才發現，正是送照片給他的那一位。他心一怔，忙縮回頭。不知怎的，他竟希望立即和她見面。他知道，她住在對面宿舍。人就是這樣，當他在歡樂之中，是不會懂得別人對他的感情的；而當他陷入窘境，他多麼熱望哪怕是一丁點的同情、友愛和關懷喲。但是，他畢竟還沒談過戀愛，他心跳得厲害，使勁壓抑著平白無故升起來的奢望，但是，越壓抑，越強烈。他還是決定去。他找到了藉口，從箱子裏翻出那張照片，像小偷一樣溜進了女生宿舍。他剛走到門口，姑娘就看見了他，驚訝得叫了一聲，臉上綻開了鮮花。

“我，我……”他臉紅到耳根，好半天才開始說話，却口吃得厲害，“來來，還你的照照片的。”

姑娘接過照片，瞥了他一眼，不知他是什麼意思。難堪的沉默使他想轉身走開，姑娘却攔住了他，似乎明白過來，不由婉然一笑。

“不喜歡嗎？”姑娘是大膽的。

“不！”他抬頭看了一眼姑娘，慌亂地吐了一個字。姑娘是美的，那臉蛋，那眼睛，那嘴唇，比照片還好看。她穿著白襯衫、花裙子，飄飄然，就像能够救他出困境的仙女一樣。他離她這麼近，幾乎感覺到姑娘急促的呼吸，他真想一下跪在姑娘面前，把自己心中苦悶告訴她。但是，他不能再呆下去，他只說出“明天晚上，在河邊……”就轉身逃了出來。回到寢室，心還在劇烈地跳。

這一夜，他睡得很甜，從運動開始以來，還是第一次。

但是，那柄懸在他頭上的、用頭髮系著的利劍終於落到他頭上了。就在他和姑娘再次見面的時候，指導員正在專案組挨批評。全廠的運動正在向縱深發展，只有總裝車間還沒揪出一條“大魚”。

這不能怪指導員的無能，車間那些僅僅參加了被清查那一派組織的老工人，都弄出來批了鬥了，那些有子女參加過武鬥的母親，都組織大字報揭發批判了；可是，“大魚”却一個也沒有落網。指導員想申辯，曾經當過保衛科長的專案組長不客氣地打斷了這個老部下的話頭，嚴肅地說：

“我們有些同志，階級鬥爭觀念不知到哪兒去了，總以為他那兒是世外桃源，虧他還當過保衛幹事。支部書記，不抓運動，他這個書記還有什麼用！”

指導員知道，專案組長從來都瞧不起自己，是反對派中最有權勢的人。但是，在這樣的時候，還能說什麼呢？回到家，煩躁、惱怒的指導員隨手翻開他才交上來的入黨志願書，忽然看見他在最後那一欄裏，填著他參加過派性組織，搞過武鬥，而且還守過全市都聞名的那所醫院。指導員像發現了黃金，眼睛都亮了。他顧不得夜深，立即跑到廣播站，把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群專人員從床上喊到車間。他給大家宣布了支部的決定，交代了任務。不到半個鐘頭，積極分子們就挾著墨汁未乾的大字報、大標語走上了廠區大道。

只有那個瘦個子女生為他著急，她要小胖娃去轉告他，叫他要作好思想準備。小胖娃聳了聳肩，白了她一眼：“哼！你喜歡他，他却不喜歡你。我剛才看見，他和機修車間那個女生到河邊去了。不信，你去看。”

女生被如此搶白，只好走開。

而這時，他正為那姑娘像蜜一樣的話語所陶醉，和姑娘一起，從河邊回來。熱戀的歡樂，使他忘記了已經降臨的危險。只要有人愛，即使下地獄又有什麼呢？

走到廠門口，水銀燈下，一幅赫然奪目的大標語向他撲來。剛才還沒有嘛，又是那個車間揪出了新的“變色龍”吧。但是，姑娘却站住了，她的眼光已經從那幅標語轉到他的臉上，他覺得，那簡直是兩柄劍。

“你？”姑娘眼睛楞了起來，連那顆黑痣都變了顏色。

他嚇得後退了兩步，再一次轉頭去看那幅標語。這一回他看

清了：揪出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武鬥凶犯、政治扒手 XXX。那打了三個大 X 的地方正是他的名字。他強制著自己，不要癱軟下去。他像站在鐵路上，被飛奔而來的火車嚇昏了的孩子，不知道躲，也不知道喊，腦海中只有一句話：完了，徹底完了！但是，姑娘的聲音却把他喚醒過來。

“你說，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我，我……”他好不容易才開了口，但是又停住了。他低下了頭，再也不敢看姑娘一眼。

“啪！”一巴掌打在他臉上。

“你個騙子！你個流氓！你個無賴！”姑娘“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雙手蒙住眼睛，轉身跑開，空蕩蕩的夜空裏，還留下她那嗚咽著的聲音，“你害了我喲，天啦……”

他站在水銀燈下，忘了該做什麼，他下意識地蒙住了臉，覺得自己快要倒下了。

姑娘喲，你讀過《牛虻》，你知道，瓊瑪一耳光，把年青的亞瑟送到了那比地獄還黑暗還殘酷的南美洲，而你這一耳光，又將把他，你剛才還熱烈擁抱過的小夥子送到哪兒去呢？

他又來到河邊，坐在剛才和姑娘坐過的那塊石頭上，望著江水出神。他多麼幻想能像牛虻那樣，逃到那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喲。只要不當反革命，只要不看見她那憤怒的臉，只要不被揪上臺去批鬥，只要不進防空洞，他什麼都能够忍受。

他想到死。是呀，身敗名裂不如死，死後才知萬事空。但是，“畏罪自殺”四個字跳進他腦海，他又驚了。畏罪，他有什麼罪呀？當初造反的時候，他才十六歲。不是為了保衛毛主席，誰願意拿年紀青青的生命去開玩笑？才過了三四年，應當寫上歷史史冊的戰鬥，却成了反革命行爲，光榮的紅衛兵戰士，却成了“五一六”分子，活天冤枉呀，活天冤枉！他有點憤憤不平了，霍地一下站了起來。

“我不是‘五一六’！我不是反革命！我沒做過壞事！我沒發過橫財！我要用鮮血來表明我是清白的！我要用生命來證實我是革命的！”

他記不起在什麼書上看見過，一個被人誤解的地下黨員，在完成一次任務中犧牲了，終於用生命證明了自己的身份。雖然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而且他才享受了二十一年的時光，他還是下了決心：用生命證明。是啊，好死總比賴活強。難道還沒看見過那些黑五類挨打受罵、膽戰心驚的過日子嗎？

但轉而又想，他還年輕，機會還多得很，咬著牙等吧。總有一天，事實會證明他的骨頭並不黑。

於是，他心寬了一些，身上也有了一點力量，轉身離開了已經有了寒氣的河邊。

第二天，他走進車間，他師傅發現他眼睛都凹了下去。師傅有點難過，也有點內疚，彷彿是自己把他害了。

“媽的，像這樣！”師傅第一次罵人，然後又用那幾乎有些哽咽的聲音安慰他，“不怕，真金不怕火煉。”

他似乎感動了，又似乎沒有聽懂，默默地向辦公室走去。

其實，指導員並沒打算送他進防空洞，只是把他關在車間後面的那間小屋裏，要他寫檢查，作交代。太陽從早晨曬到晚上，小屋又悶又熱，沒有一絲風，連水都是有限制的供給。蚊子是那樣多，叫人無法忍受。他挨過鬥，挨過批，也挨過打。指導員當著他的面，把他的入黨志願書撕得粉碎。小胖娃幾乎天天都要在那個小窗口出現，似乎是故意刺激他。那兩個女生偶爾也來一趟，他却不知她們來幹什麼。只有師傅關心他，有時送來蚊香，有時送來衣服，有時甚至送來半邊西瓜。那個看守他的群專人員，見是老師傅，也無可奈何。

他不知道那段時間是怎麼過的。每天早上起來，都要背那篇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臨睡前，又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如果不虔誠，臉上馬上就會留下一道道拇指印。這一切他都忍受下來了。他覺得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他的思想凝固了，只是機械地做著別人命令他做的事。世界隔他那麼遙遠，一切都像夢中見到的都樣模糊。

又過了一陣，他逐漸能够思想了。

他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挂起來，想到自己是怎樣紅的，又

是怎樣倒霉的，他甚至微微笑了。他明白了，一切都是假的，在漂亮的口號下，人們在為權力而爭鬥，自己昨天被綁上了別人的戰車，今天却拋出來作為犧牲品。

世界上有這麼不公平的事嗎？

指導員考慮得太差勁了，以為揪出一條“大魚”，反對派就會閉上嘴。殊不知弄巧成掘。專案組長到車間來，連笑帶罵，把這位政工組長的心腹嘲弄了一頓：“哈哈！這樣的怪事，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武鬥凶犯，被你們樹成全廠的標兵模範，天大笑話！天大笑話！教訓呀！教訓呀……”

指導員氣得七竅生煙，却沒有辦法。不是政工組長撐腰，怕早被免去了職務。于是，指導員更加遷怒于他，一直不放他出來。這反而使他有點高興，這小屋雖然悶熱，有蚊子，住慣了，却還安寧。他怕走到廠區大道去，怕見到小胖娃和那些已經當上群專人員的同伴，更怕遇上她——那個曾經愛過他的姑娘。

到了月底，監管方式變了一下，指導員讓他白天回小組勞動，晚上繼續寫檢查。一天到晚，他只是默默幹活，儘量讓自己在勞累中求得一點暫時的解脫。人們都喜歡同情無辜的人，大家對他並不歧視，那兩個女生還常來搭幾句話，他却懶開口，愛理不理的。看著他那呆滯的目光，別人都以為他瘋了，除了在私下感嘆幾聲，都沒有辦法。只有他師傅似乎懂得他的心思，好幾次勸他想開些，看遠些。他只是聽著，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沒有明白。

一個從狂熱中冷靜下來的、終於發現自己被別人騙了的人，誰不如此呀？那些野心家們，今天可以搞這個運動，發動這一部分人整那一部分人，明天又可以搞那個運動，發動那一部分人反過來整這一部分人，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却促使了人們的覺醒。如果給他以時間，他再向前走那麼一步，他是可以成為新的勇士的。機會終於來了，上帝對他開了恩。

那天，他正在漆零件，一身軟綿綿的，幾乎要打瞌睡了。忽然，一聲驚叫把他震醒，他看見，油漆庫房冒出一股濃煙，濃烟中夾著火焰。他知道，油漆庫房旁邊就是汽油庫房，一旦燃起來，汽油就要爆炸，總裝車間就要完蛋。他聽見有人喊：“滅火機！”順

手就從牆上取下兩個，不顧一切撲上前去。

油漆已經著火，火越燃越大，兩三個滅火機起不了作用。他丟開已經空了的滅火機筒，正想轉身再去提，却聽見師傅的沙啞的聲音在喊：“油漆桶要炸呀！要炸呀！”

他楞了幾秒鐘，突然精神一振，下意識地拉扯了一下衣襟，一頭衝進了火焰呼嘯的庫房。

濃烟嗆得他直咳，熏得他睜不開眼。憑著記憶，他衝向堆放油漆桶的地方，摸到一桶已經發燙了的油漆，一掀就掀出了門外。那些還想衝進來的人，見漆桶甩了出來，忙著退了出去，在外面接。

一桶，兩桶……八桶，九桶……

他不知哪來的力氣，一口氣甩了十三桶出去。火燒著了他的衣服，他不知道；火烤焦了他的皮膚，他忘了痛。他還想繼續，却只摸到一個空桶。他不知道還有沒有，只好衝出火海。人們看見，他頭髮已經冒烟，衣服已經燒壞，渾身都被熏黑了，只有臉是古銅色一樣紅，兩隻眼睛還在轉動。他師傅來給他撲身上的火，胖個子女生送來一杯水。但是，他已經快要倒下去了，却聽見有人在喊：“糟了！糟了！還有兩桶！”

他忽然推開師傅和那女生，挺直了身子，又衝了過去。他師傅忙伸手拉他，却只拉下一塊燒壞了的衣襟。

他一衝進庫房，一根燒斷了的屋梁就落到他頭上，把他打昏在地。但是，他立即被濃烟嗆醒了。他想爬起來，却又被幾根亂七糟八的木料壓在背上，翻不了身。他想往後爬，爬了兩步又停住了。他這時才感到身上一陣陣巨痛，他知道自己傷得厲害，但他拚足最後的一點氣力向前爬去。一步，兩步，三步，每一步都是那樣艱難，每一步都留下了殷紅的血迹，每一步都耗去了他的生命。

他又昏了過去，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知道了。而火，在人們的撲救下，漸漸熄了。

他死後是怎樣成為英雄的

他還沒有死，被送進了醫院。他身上的三度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七十幾，一直昏迷不醒。他師傅和那兩個女生陪著他，車間領導開會去了，一人也沒來。廠醫院最好的外科醫生還沒有解放，在五七農場勞改。那些新手拿到這麼重的病人，束手無策。送城裏醫院，救護車又被借去抓犯人用了。卡車送，半路上就要將他的命送掉。他師傅急得火燎火烤，打電話找指導員。指導員聽到失火消息，剛回到車間，正在發脾氣。

“他自己不小心，燒傷了，怪誰？”指導員還以為是他引起的火，不待他師傅申辯，就壓上了電話。

怎麼辦？他師傅含著淚花又去求醫生。有一個醫生算是心腸好，把他安置在手術室裏，挂上了鹽水。

他一直處在昏迷中，輕聲呼喊著，誰也聽不真切他在喊什麼，好像是在喊“火”，又好像是在說“我”。

正好，那天廠政工組長也來看病，聽見別人議論，便到病房看他。當他聽完那兩個女生的介紹，很感動，馬上命令道：“這樣的英雄，必須救活！”醫生把難處相告，組長嚴厲批評了叫苦的醫生，然後又給指導員打電話，要車間立即整理他的材料，報上來。

“那，那怎麼行？”指導員比起頂頭上司來，畢竟低一級塊，“他是‘五一六’呀，還沒有作結論。他參加過武鬥，是……”

“胡扯！”組長生氣了，“‘五一六’分子能去捨身救火？武鬥凶犯能在生命垂危的時候還叨念著國家財產？”

“真的是呀，他自己都供認不諱。你沒有看見那些大字報、大標語？”

“豈有此理！馬上派人把那些有關他的大字報、大標語撕毀，不許留一點痕迹！”組長用命令的口氣說完，本想壓上電話，又怕這個愚蠢的部下不懂他的意思，放低聲音又補充了一句，“嘻，能够出這樣一個英雄，是我們全廠的光榮嘛。”

“哦，”指導員恍然大悟“對，對，你看我，唉……”

在手術室裏，正在準備給他輸血。聽說要輸血，組長首先挽起衣袖。當然，無論如何也不會輪著首長的。他師傅獻了三百CC。但是，師傅的血還沒來得及注入他的血管，他就停止了呼極。醫生手中的針管“啪”的一聲落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兩個女生“哇”的一聲，哭倒在他床前。他師傅頭昏得厲害，伏在椅子上，老淚縱橫。組長惋惜地嘆了一聲，走出手術室，到晾臺上吹風去了。

這時，我們那位可敬可愛的指導員才匆匆趕到醫院。

沒用幾天，他的英雄事迹就整理出來了，送到黨委會上。組長建議，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革命烈士。專案組長堅決反對，把一個清查對象樹起來當英雄，簡直莫名其妙。其實，這位級別還不够讀到絕密文件的人哪裏知道，此時，林彪摔死溫都爾汗已有半個多月了。兩人唇槍舌劍，辯論了一個多鐘頭，沒有結果。最後，還是黨委書記一句話定了案，組長起草的決定草案獲得通過。專案組長氣憤地退出了會場，以表示自己立場堅定，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最高。

廠裏停產半天，專門為他開了追悔會。無數的花圈擺滿了會場，莊嚴肅穆。他專門去照來準備送給姑娘的那張照片，成了他的遺像，被放大若干倍，挂在會場正中。奏哀樂、默哀、致悼詞、三鞠躬。人們都為他的英雄事迹而感動，心腸軟的人都流了淚。只有知道底細的人為他略有一點不平，不過也不敢說。追悼會後，廠裏又撥出專款，為他修了一個墓碑，上面刻著他的英雄事迹，聳立在廠區大道正中那個街心花園裏，讓他遠離那令人肌冷骨寒的防空洞，來聞這花香，來聽這鳥鳴。

報社記者來了。車間的人都接到指導員的預先警告，不許隨便亂說。他進廠後的所作所為，都被塗上了瑰麗的色彩。連他在運動中的表現，都被說成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路線覺悟高，鬥爭性強。他受審查的事，人人守口如瓶，不敢向記者透露一個字。小胖娃不識好歹，在寢室吹牛的時候，講了一件他讀書時的小事，當然有損于英雄的形象，馬上給告到指導員處，於是被貶到南山深處的五七農場勞動一年。

他的短暫的一生的遭遇，使他師傅和那兩個女生都很難過，想起他挨整，想起他的死，怎能不為他傷心呢？特別是他師傅，已經隱隱約約知道他死前的思想狀況，深深為他悲哀，却沒有辦法。只是有一次喝醉了酒，向別人吐露過一回。幸好沒有傳到指導員耳中，否則又免不了有一場災難。

記者又到他落戶的大巴山去，在那兒調查到他曾兩次從水中救起落水兒童，三次從懸崖邊拉回就要滾下去的耕牛。記者到他家中，拜訪了他的父母，翻看了他的日記，那光閃閃的文字，使記者抄不勝抄。記者到他畢業的那所中學，得知他是最早的紅衛兵之一，還上京見過毛主席。于是，長篇報道寫出來了，還發了一篇社論《毛澤毛澤東思想哺育的青年英雄》。

指導員的事情多了起來。廠裏廠外的紅小兵、紅衛兵、共青團員和青年工人，絡繹不絕來參觀，指導員免不了要做長篇報告。他花了好幾個晚上，終於仿照雷鋒生前所在連黨支部的那篇文章，寫成了《我們是怎樣培養他的》大塊文章，寄給報社，照登不誤。在廠裏，總裝車間黨支部書記的名聲越來越響，反對派再也開不起腔了。廠政工組被改組為政治部，那位組長當上了部長。由部長推薦，廠黨委終於任命指導員為政治部副部長。

廠專案組已經撤消。中央文件下達後，人們才知道，“批清”運動是那幾個上了林彪賊船的人搞的，一切都成了誤會。那位專案組長也成了“替罪羊”，被一脚踢到翻砂車間，當了一個工段長。已經平反了“批清”受害者不服氣，要到翻砂車間來揪整人的人，嚇得專案組長連工段長也不敢當了，夾起尾巴，匆匆逃回老家。躲了一年，風聲平息，才偷偷回到廠裏。

“你這傢伙！”已當上政治部副部長的指導員，拍了一下這位老上級的肩頭，“嘿嘿”地笑起來。

專案組長一驚，抬頭見是新貴，只有連聲嘆氣，轉身走開。

那位姑娘最冤枉。當追悼會還沒開完，她就溜回了寢室，伏在牀上放聲大哭。有人聽見了，來勸她，也沒勸住。只怪她當初有眼不識泰山，沒看出他是一位英雄，竟一耳光把他打跑。如果別人知道她是他的情人，她的臉上該有多光彩喲。她恨自己，她

甚至幻想，他還能來敲門，給她輕輕抹去眼泪。但是，他不會來了，除了他，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證明她是他的情人。她大哭，她真想對那窗外的人流高喊——

“我是他的情人呀！”

跋

當你讀完這篇小說，請不要誤解了作者的意思。這不是褻瀆英雄，也不是重翻舊賬，更不是舊時低級小報上的內幕新聞。這裏除了悲憤，就是詛咒：讓那樣的年代一去不復返吧，永遠，永遠！

願他在地下安息。

(原載《紅岩》1980年第1期)

附錄 D：被押下車的情人

說明：這個故事寫于 1992 年 5 月，1994 年曾在重慶市南岸區作家協會辦的一個內部刊物上登載過，後又刊載于 2008 年第 7 期《龍門陣》。發表時，我在“附記”中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只因怕給當事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才隱去了他和她以及其他人的姓名。請本文涉及到的老戰友、老朋友鑒諒！”故事中的男主角是十一中的，女主角是三十八中的，後來一起到忠縣當知青。女主角的妹妹也是三十八中的，沒有去忠縣落戶，而是去了達縣，很早就幸運地進了望江廠，與我在同一個車間當工人。彈子石那條小巷現在已經沒有了，我曾去過多次。圍打女主角的那天，我正好也在資陽，住在那所學校另外一幢教學樓裏，從樓上的窗口可以俯瞰整個場面。當時，那樓裏也有不少三十八中的同學，其中一個姓鄭的，是南山中學已經“逍遙”了的八一五戰鬥團團長鄭望生的兄弟。他手癢癮的，也要衝下去。我對他說：“有本事回重慶去打嘛，打個女生，算什麼英雄！”他才停住腳。

1968 年 8 月。
四川資陽火車站。

太陽已經竄了一竿子高。隨著一聲汽笛，一列火車風馳電掣駛進站臺。這是重慶到成都的快車，沿路上被一個個武鬥關卡攔截檢查，已經晚點好幾個小時。車上擠滿了人，一個個汗流浹背，疲憊不堪。站臺上，那躲在陰涼處的十幾個年輕人立即整整手臂上的紅布籠籠，撲到車門前。其中一個高個子，大熱天還罩一件勞保服，紮一根大皮帶，挎一支五四式手槍。他吹了聲口哨，獨自往站臺前面走。

列車還沒有停穩，車廂裏的面孔在他眼前晃過，既熟悉又不熟悉。上個月從重慶“逃難”出來，在這小縣城吃“支左飯”，吃了睡，睡了吃，煩透了。沒有事，便邀約十幾個初中崽兒來到車站，耀武揚威一番。或許還可以抓到一兩個八一五的，出出氣。可一連幾天都沒有收穫，大家也膩了。列車裏擠得無法插足，那汗臭味叫人要吐。他真不想上去。

突然，他眼前一亮，一張明麗的臉閃了過去。他的血馬上沸騰起來，撒開腳就跟著列車跑。跑到站臺盡頭，列車終於停穩。他前後搜尋，只見到一張張憤怒的、嘲笑的、無動于衷的面孔，却見那叫他心尖尖發顫的臉。猶豫了一下，他扯了扯紅布籠籠，整了整大皮帶和手槍套，擠進了車廂。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一個人帶著槍擠進重慶到成都的列車，是非常危險的。即使車上都是同一派的“戰友”，你那槍也太有誘惑力了。一聲口哨，幾個人一起撲上來，不待你反應過來，你就會被打昏，槍也就不翼而飛。待列車到了下一個站，才放你下去。他知道這一點，可他已經忘了危險，一個勁往車廂裏擠，邊擠邊罵。後來，他乾脆把那槍扯出來，舉在頭上。看著他那又凶又惡的樣兒，看著那閃著藍色幽光的槍筒，那被他撞開的推開的，那被踩了腳的踢了屁股的，只敢低聲嚙咕幾句了事。擠過一節車廂，又擠進一節車廂，勞保服已經汗得透濕。終於，他發現了她。

他和她都住在重慶南岸彈子石一條小巷裏。他住巷口，她住巷尾。他比她大一歲，讀高一；她比他矮一頭，讀初三。每天放學後，他總呆在巷口，拿一本書坐在那石頭上，等她從他面前路過。其實，他從來沒有正面看過她，他怕。她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把頭埋得更低，那心也咚咚亂跳，似乎馬上就要蹦出去，飛到她面前。她一路上蹦蹦跳跳的，還唱：“生產隊裏養了一群小鴨子……”一到巷口，她馬上閉嘴，把頭撇向一邊，躲開那石頭上坐著的他。她覺得討厭，有時候又感到有些甜蜜，忍不住的時候她也會偷偷地瞧他一眼。那時候，如果他也正好從書本上斜眼偷偷看她，兩股閃電相碰，立即迸出耀眼的火花。她的臉燃燒起來，

急忙將斜垮的書包一抱，飛也似跑進巷子。他却像被人敲了一悶棒，怔在那兒，望著她跑去的身影，升起無窮的惆悵。

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被打成右派。而她是工人子女，“紅五類”中的第一類，渾身上下都那樣優越。他覺得自己是癩蛤蟆，而她是天鵝。

她真是一隻天鵝。在當地八一五宣傳隊裏，她長得最乖，跳得最好，唱得最好。有一次，八一五宣傳隊在廣場演出，他躲在附近一幢樓裏，用望遠鏡看她跳“紅衛兵戰歌”。她“負傷”了，一個男子把她從地上扶起，再把她抱起來，走到臺前。那時候，他真想掏出槍來，給那男子一槍（可惜距離太遠）。

他和她從來沒說過話，甚至連招呼也沒打過。

她縮在靠窗的角落裏，早已發現了他。她是去成都參加彙演的。從重慶到成都，要通過反到底派控制的內江地區，宣傳隊只好分散走。這是快車，停了資陽，就到成都。大概是放鬆了警惕。車未停穩以前，她俯在車窗上往外盯，却發現了站臺上他的身影，嚇得她急忙縮回身子。當他出現在車廂門口，她垂著頭，心跳急劇加快。是害怕還是什麼，說不清。

這是他第一次離這麼近看她。那明麗的臉泛起一派紅暈，端正的鼻尖上正冒著汗珠，耳垂微微顫抖著。雖然偏著頭，他還是感覺到她眼睛的餘光在瞟著他。他覺得腳有些發軟，口乾舌燥的。他吞了吞唾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不能放過！一定不能放過！

“下車去嘛，”他咽了好幾下唾液，才說出話來，“我明天送你去成都。”

“不！”

“今天下午就送你去。”

“不！”

“成都出站不安全。”

“不要你管！”

他不知該再說什麼。可他心裏却有好多好多話要說呀！他要

告訴她，他是多麼愛她。他要告訴她，他曾給她寫過信，寫過詩，却沒有膽量寄給她。他要告訴她，“大串聯”他到北京去，給她買了一個綢緞封面的日記本，現在還壓在家裏的箱子底，他要送給她。他兩隻手不停地捏揉著，結結巴巴的，什麼也沒說出來。

車廂裏的年輕人全都盯著他們，有崽兒膽大，吼起來；“親一個喲親一個！”

他聽不見，看不見。

她聽見了，看見了，臉紅得更厲害。

其實，他的話她明白，他的心她知道。可是，他是反到底，她能和他戀愛嗎？而且，他還是右派子女！在宣傳隊裏，有好幾個男生圍著她轉，她一個也沒瞧起。為什麼瞧不起？她不知道。或許——唉！不是冤家不碰頭啊，今天偏偏又撞到他手上，她好後悔。

後來，鈴聲響了。

“今天你下車也得下車，不下車也得下車！”他急了，把那五四式手槍在她面前一晃。

她可以抵抗，可以一動不動，未必他還敢開槍嗎？可她瞟了他一眼，還是慢慢站了起來。似乎想起什麼，朝座位上看了看，然後理了理頭髮。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好像是江姐，又好像是在演江姐，心中甚至有一股甜滋滋的感覺。

他握著五四式手槍，把她押下車來。

他想起《紅岩》。特務們押著許雲峰去赴宴，而自己押著情人下車來傾訴衷腸。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火車長鳴，車輪轉動，從慢到快，越來越快，呼嘯著駛離了車站。望著列車消失在群山之中，她滿臉泪水。後來，她轉過身來，擦了擦眼，揚起手，給怔怔地站在她身後的他狠狠一耳光。

他的臉頓時五根指拇印。

抓到一個八一五，還是宣傳隊的，檢查列車的崽兒們好不高興，推推攘攘把她押回駐地。那是一所中學，就在車站附近。聽說抓了一個八一五，並且從對面樓下傳來一個女生的哭喊。一些

閑悶了的初中崽兒，正好找到出氣的對象，涌了過來，拿箋塊的，揮皮帶的，塞冷錘的，把她一陣狠打。

他被她扇了一耳光，臉上火辣辣的，害怕丟臉，把她交給那幾個初中崽兒，便躲進廁聽，用涼水沖洗了好一陣。他的臉不那麼燙了，不那麼痛了，他才匆匆趕回來。一走進學校，就聽見她的哭叫，這讓他心痛得發了毛。他衝進人群，把那正打得起勁的崽兒掀開。“不許打！不許打！”他高聲嚷著。都以為他是怕禍事，是口慈心軟，誰都不聽他的。他護衛著她，身上也挨了幾箋塊幾皮帶。一皮帶飛過來，打在頭上，頭上立即冒出了血珠珠。他一下子發了狂，抓住那揮皮帶的崽兒就是一拳頭。那崽兒跌了一個仰翻叉。爬起來，那崽兒吼著：“老子偏要打！”又揮著皮帶撲上來。他咬著嘴唇，猛地扯出那支五四式來，“砰！砰！”對空就是兩槍。

兩幢大樓之間，槍聲特別震耳。打人的、挨打的、看熱鬧的，全都怔住了。

“哪個再打，老子跟他拼了！”

他舉著槍，將那黑洞洞的，還冒著青烟的槍口對著打耙和的崽兒們，護著被打倒在地上的她，在人堆裏轉了一圈。他那張方方正正的臉像出土的陶碗，鐵青著。那濃眉下的大眼紅得怕人，只要誰動一下，他就要把誰吞下似的。都知道他是個亡命徒，槍林彈雨中過來的，什麼都不怕，說不定真的會開槍呢，於是，一個個都往後退。

X 校有個跛子，那腳是被八一五打跛的，外號叫“拜拜”，更“天”。聽說有人要拼命，端了一支衝鋒槍出來，對著天空就是一梭子。“噠噠噠噠——！”打得那白果樹葉像雪花一樣往下落。

“哪個要拼命？和我拼！”

聽見槍聲，樓上樓下的人都跑了出來。頭頭們見“拜拜”又在發瘋，走上去，把他的衝鋒槍繳了下來。幾個大一點的男女生連說帶推，把“拜拜”勸走了。

他還舉著槍站在那兒，虎視眈眈的，不許別人靠近。幾個頭頭喊他放下槍，他也不聽。

她從地上爬起來，躲在他身後。

他用左手扶著她，走進屋去，右手上的槍還是沒有放下。其他人見了，似乎明白他為何要護著她，都虛了一頭，不敢進屋去。

她被打得很慘，身上到處是傷，青一團紫一團的。那綠軍衣也被扯破了，露出裏面的白背心。她咬著牙，坐在椅子上，不再哭，不再喊，只是狠狠地盯著他。當他轉過身來，看著她那扯得像亂草堆的頭和那頭上的血迹，忍不住掉下大顆大顆的眼淚，終於“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後來，幾個高中的女生提著藥箱箱進來，把他趕了出去。

他提著那五四式，一直守在門口。

當天下午，他就送她到成都。

在醫院裏，他為她端屎端尿，給她搖風打扇，喂水喂飯。他一直守著她，哪兒也不去，晚上就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躺一會兒。白天，他坐在她床前，就那樣一直守著她，看她眼睫毛的跳動，看她嘴角的顫動，看她那輪廓鮮明的耳垂。醫生、護士和其他病人都以為他是她的哥哥，或是她的情人，他却回答任何人的提問。她一直沉默，不和他說一句話。他坐在身邊，她就翻轉身去，或者就閉上眼睛。她一旦能活動，就不再讓他幫忙。“你各人走嘛。”她對他說。他坐著不動，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

窗外，不停地地下著雨。一片樹林，一片竹叢遮住了大街的喧囂和那被雨水淋得七零八落的標語和大字報，使這病室像個世外桃源。

後來，她出院了，回重慶了。

他也趕回重慶。

他不敢到她家裏去找她，只好天天守在巷口，可是，總不見她的身影。

那是叫人難以承受的煎熬！

幾個月後，要下鄉了。他終於鼓足勇氣，到學校去找到她。他對她說：“我們學校走某縣，你靠挂過來，好嗎？”她沒有回答，只是點了點頭。

1972年，她頂替她母親，被招進一家紡織廠。他出身不好，

一直呆在鄉下。終於呆不下去了，1975年，他辦了病退回城來，到處打臨時工，掙一碗飯錢。

她和他結婚，全家人都反對。父母要與她斷絕關係，把她趕到廠裏的單工宿舍去住。她義無反顧。

一晃又是十多年過去了。我衷心祝福他們生活得美滿！

附錄 E：一個强奸犯的故事

說明：這個故事寫于 1994 年 4 月。那一兩個月裏，我接連寫了好幾個在武鬥中看到或聽來的故事。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其真實性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不過，這個故事在 1968 年期間流傳很廣，我從好幾個朋友那兒聽到過，細節互有出入，故事却很真切。故事中所說的“西郊某地”，實際上就是黃桷坪的王家大山；所說的“1967 年 8 月某日”，實際上就是 1967 年 8 月 18 日。關於那場戰鬥的一些情況，讀者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故事中主角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只好賣了一個關子，加了一個說明：“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只好隱去本文的主角的真實姓名，且用 A 代之，還望讀者鑒諒。”A 是電技校的反到底派的，電技校反到底是“八一八”王家大山那場大戰的主力部隊。

1967 年 8 月某日。

重慶西郊某地。

激烈的槍聲終於稀疏下來。太陽火辣辣地升上了天空，樹上的知了又開始嘶鳴，空中偶爾還劃過一聲子彈的驚叫。人們早已習慣，膽子大的人從床上爬起來，煮飯的煮飯，出門的出門，上街的上街。城市依然熱鬧。

這時，一隊荷槍實彈的戰鬥隊從山上的陣地撤下來。經過一夜的激戰，一個個精疲力竭，骯髒的勞保服上還濺著斑斑血迹。受了傷的纏著綑帶，被人攬扶著。其中一個遠遠掉在後面，走走停停，似乎不願和戰友們走在一起。我們且稱他為 A 吧。

戰鬥隊下了一面坡，轉了一個拐，便從 A 的視野裏消失了。A 似乎不急著回駐地，便坐到一棵樹下，點燃一支烟。

昨晚的戰鬥太激烈了。另一派出動重兵，趁著夜幕來偷襲，沒想到 A 這一派早有準備，偷襲者剛剛爬上來，便遭到一排排半自動步槍的猛烈射擊，只見偷襲者一排排倒下去。偷襲者惱羞成怒，好幾挺輕重機槍朝 A 的陣地掃來，A 左右的戰友都挨了槍子，鮮血濺了 A 一身，而 A 却毫毛也未傷到一根。他好慶幸！後來偷襲者終於撤走了，陣地前留下好多尸體。A 跳出戰壕去看，死人堆裏竟然還有好幾個女生。其中一個辮子又粗又長，仰天躺著，腰上繫著皮帶，胸脯挺得高高。身上沒有血迹，可能是子彈射中了內臟，是內出血吧。那張臉恰白，兩眼恐怖地盯著他，駭得他差一點就要叫起來。不過，那女生的確漂亮，嘴角還有一顆黑痣，就像他班上那個女生。他和那個女生還有點那個“意思”呢。

A 抽著烟，想著和班上那女生的浪漫往事，身上竟有些燥熱。死就像一道門檻，跨過去就完了。他才 20 歲，還沒有品嘗過與女人溫熱的滋味呢，如果也像陣地前那些與他年齡相仿的死人那樣，那就劃不著喲。

抽完了烟，A 的精神振作起來。這時，他聽見路旁菜地裏有窸窸窣窣的響聲。他猛地站起來，嘩地拉開槍栓，大喝一聲：“誰！”

那是一個姑娘，正在自留地裏摘豇豆。剛才，她見一隊武鬥人員走過，駭得趴在地上，大氣也不敢出。她沒有看見 A，以為他們都走完了，才站起來，沒想到路邊還坐著一個。面對 A 那黑洞洞的槍口，她恐懼得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手中的提籃也掉在了地上。

A 收了槍。他想轉身走開，可不知是為什麼，那腳却不聽使喚。那姑娘也有一對又粗又長的辮子，一直拖到大腿那兒。天氣熱，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汗衫，一對乳房突得高高的。A 不敢看她的臉，眼光却死死地落在那乳房上。那一刻，A 覺得自己的大腦裏一片灰白，那零星的槍聲，那恬噪的蟬鳴，全都聽不見了。

“走！”

A 把槍又掄起來，喊了一聲。那聲音乾澀而又刺耳，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

只走了幾步，A 便迫不及待地將槍往地上一丟。沒等那姑娘

回過神來，A便撲上去，將她抱住。姑娘早已不知所措，連叫也沒叫一下，便被他擺放在地上，扯開了汗衫，扯脫了長褲。只是在最後那一瞬間，姑娘才掙脫他那鬍子巴茬的嘴，吐出幾個“不，不……”來。

且說A的戰友們回到駐地，却也不見了A。當頭的皺了皺眉頭，手一揮，一班人便又跟著他返回去找A。戰友們大聲喊著A的名字，A却聽不見。終於，戰友們聽見響動，循聲找過來，那時，A還趴 在那姑娘身上。當頭的頓時火起，一槍托向A砸去，把A從半昏迷中砸醒。A從姑娘身上滾下來，躺在地上，下意識地往上提那勞保褲。那姑娘爬起來，抓起褲子，飛也似地跑了。

望著戰友們一張張憤怒的臉，A想說什麼却又說不出來。

半自動步槍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可能是當頭的先動手，其他幾個戰友也動了手，給A有屁股捅了好幾個窟窿。鮮血從那勞保褲裏冒出來，像一股股小噴泉。

戰友們繳了A的槍，連恨帶罵走了。

那時候，對他這樣敗壞聲譽的傢伙，沒有槍斃就算是特別寬大了。

知了的嘶鳴把A喚醒。山坡上再也沒有一個人影。他想站起來，可屁股上的傷口正火辣辣地痛，試了幾次，也沒有站得起來。A只好爬。兩隻手都還有力，好歹還能爬過田坎，爬過山堡堡。也不知爬了好久，太陽都當頂了，A終於爬到一家農舍。那門緊閉著，他扶著門檻，咚咚敲門。敲了一陣，沒有響動。這正是戰區，武鬥這樣凶，誰知主人家跑到哪兒去了呢？A很失望，又精疲力竭，伏在那高高的門檻上，再次昏迷過去了。

這正是那姑娘的家。全家人都跑到親戚家躲武鬥去了，只留她獨自守屋。A敲門時，她便在門縫裏看見，却不敢開門，駭得她渾身發抖。剛才她逃跑時，她聽見他的慘叫。她回過頭去看，正看見一把把刺刀閃著寒光，向他屁股上扎去。他還有槍嗎？還有刀嗎？是來找她報復的嗎？

後來她聽不見聲響了。從門縫裏看出去，發現他昏迷在門檻上。她很猶豫，又很氣惱，還很憤恨。想著剛才他把自己壓在地

上的那一幕，她恨不得提起菜刀衝出去，再給他幾刀。

終於，她打開了門。

她咬切齒，舉起扁擔，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又往那屁股上狠狠打了幾扁擔。

血又像噴泉一樣，從那勞保褲裏冒出來。

他被打醒了，痛得哎喲喲叫。他轉過頭來，才發現，她正是那個被他强奸了的姑娘。一剎那，恐懼、羞愧、後悔、絕望一下涌上來，他頭一低，哇哇哇哭起來。

後來他又暈了過去。

當他醒來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躺在床上。屋裏很陰暗，只有兩匹亮瓦漏下一束耀眼的陽光。農舍裏特有的清香和那土牆的氣息使他感到舒服。灶房裏正在燒火，柴草燃燒的劈劈剝剝聲像音樂，很是悅耳。好一陣，他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躺在這兒。他不知道她會拿他怎麼辦。

那姑娘端了一盆鹽開水走起來，A急忙俯下頭，假裝還在沉睡。

屁股上的血已經結成疤。姑娘給他脫褲子，痛得他大聲叫起來。

“哼！”姑娘將那盆一推，轉身就走。

A終於明白，她要為自己清洗傷口。他猶豫了一陣，咬著牙，狠著心，自己往下脫那血褲。只脫下一點點，他又忍不住叫起來，失去了勇氣。那姑娘聽見叫聲又跑過來，看了他一眼，從抽屜裏找出剪刀，將那褲子剪開。可是，還是有些布片巴在那傷口上。

“你，你給我撕，我不叫喚。”A說。

A把臉埋在枕頭裏，不敢再看她一眼。姑娘却用鹽開水將那疤痕泡軟，輕輕撕去那些布片。然後又用鹽開水給他清洗傷口。鹽漬在傷口上，火辣辣地痛。A咬著牙，終於沒有再吭一聲。當她給他上藥的時候，他的眼淚流了出來，打濕了枕頭。

他在她家住了一個星期。

屁股上的肉是“死”肉，他人年輕，身體又好，不幾天便可以下床了。雖然還有些跛，却可以走動。開始，他不讓她知道。那天，趁她出門去的機會，他便偷偷逃跑了。

他怕武鬥一停，她家裏人回來，把他扭送到駐軍去，扭送到公安局去。

那個時候，強奸犯不被槍斃，也要判無期徒刑。

住在她家裏，他羞愧難抑呀！

武鬥還沒有停，到處都是槍聲炮聲。他不敢回學校去，戰友們看見他，誰知會不會讓他吃一顆“花生米”呢？他只有逃回家去，從此“逍遙”起來。

一年多以後，開始“復課鬧革命”。A是技校生，不下農村，可以分配工作。但是，在分配工作之前，要“清理階級隊伍”。A強奸過一農村姑娘，全校師生都知道。A回學校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工宣隊”和掌權的那一派正在整他的材料。A的心一下子又落進枯井中，惶惶然的，不知怎麼辦。

別人告訴他，只要那姑娘到學校來說兩句話，就可以保住他。

他在她家的田野上轉了大半天，終於沒有勇氣走進她的門。

A的幾個“直接”兄弟夥伴去找那姑娘，她只有一句話：“喊他自己來。”

于是，A硬著頭皮到她家去。

一見到她，他就跪在地下。

她咬牙，她切齒，她揚起手，給他幾耳光，又握緊拳頭，在他身上不停地捶。後來她終於住了手，雙手捂著自己的臉，嚶嚶地哭起來。

他始終跪著，垂著頭，一動不動。

屋外梧桐樹上，小鳥兒嘰嘰喳喳唱著，然後便“卟”的一聲飛向秋陽艷麗的晴空。

兩個月後，A被分配到一家電廠當工人。他到電廠報了到，便匆匆趕回來和她結婚。

據說，他們生活得很美滿。

附錄 F：一件勞保服

說明：這個故事我寫過很多次，最早是 1980 年寫的小說，寫得很長，但自知沒有寫好。後來又多次改寫，也不滿意。1994 年 4 月，乾脆刪繁就簡，寫成現在這個樣子。這個故事是我編造的，權當吹“神話”吧。

那是 1967 年 8 月某日的清晨，天才粉粉亮。雖然武鬥打得凶，可樹上還是有鳥兒在唱，有知了在叫。

某武鬥據點大樓前。

故事的主人公 Z 起來屙尿，聽見遠處一個女生在叫喊，便提起他的二號駁殼衝出門去。循著叫喊聲，他在一個岩坎坎下發現兩個傢伙正把一個女生按在地上。那女生的軍裝已經被撕爛，還在拳打腳踢，拼命反抗。其中一個傢伙俯下身，要去吻那女生的嘴。那女生一泡口痰吐到他臉上。趁他去揩臉時，又一爪將他的臉挖出幾條血路路。那傢伙惱羞成怒，揚起拳頭，正要往那女生臉上打去，Z 大喝一聲：

“幹啥子？不准動！”

兩個傢伙抬頭看見 Z，都楞了一下。那個臉被挖爛的傢伙伸手要去撿丟在一邊的步槍，Z 毫不猶豫，一摳板機，那傢伙便倒在地上，血濺在那青草上，斑斑點點。另一個傢伙駭得轉身就跑。Z 又是一槍，子彈從那傢伙的肩膀上擦過，那傢伙順勢一滾，滾到岩坎下，飛也似地逃跑了。

Z 不想追，“呸呸”吐了兩下。

這時，那女生站了起來。

Z 認出她來。她是對方宣傳隊的，跳“紅衛兵戰歌”的女主角，

跳得好。他估計她和那兩個傢伙是一派的，這麼早在這兒，肯定有問題。他們是晚上出來準備摸“夜螺螄”（抓俘虜或黑整人）的，沒有得手，兩個傢伙便想亂來。或者乾脆就是預謀好了，將女生騙出來，弄到這僻靜地方好下手。這樣的事，Z這一派也發生過。大哥不說二哥，兩個差不多。

她認不到他，只能猜到他是自己的對頭。

他的駁殼槍還冒著烟，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她的胸膛。當他的眼睛從她那恐懼的臉上向下滑，滑過那小巧玲瓏的下巴，那柔軟靈便的頸頂，落到那起伏不止的胸脯時，他驚絕了，呆了，拿槍的手也顫抖起來。

她的衣服已經撕爛，一對剛剛發育齊全的乳房無法掩飾地顯露出來，正對著他的槍口。乳峰完美，高聳著；乳頭細細的，像兩顆紅寶石。那乳峰，那胸脯，雪白而有光澤，在晨光中又透出一種粉紅。

那時，他不過 19 歲，還沒有見過姑娘這最美的地方。

他只感覺到那兩顆紅寶石在顫動。

時間已經停滯。

呼吸異常困難。

後來，她終於發現他盯著自己的隱秘，一聲驚叫，急忙用雙手掩住那乳峰，轉身逃跑。

他大喝一聲：“站住！”

她知道他的槍口對著自己，不知是出于恐懼還是出于本能，她站住了。

她以為他要撲過來，可很久都沒有聲響。她大著膽子回過頭去，她看見他正在脫他身上的勞保服。那一刻，她的心又一下掉進冰窖，先是兩隻腳，然後是身子，輕飄飄起來。她好不容易才使自己鎮靜下來，咬著嘴唇，緩緩轉過身來，狠狠地盯著他。只要他撲上來，她拼死拼活也要和他鬥一場。

他沒有像那兩個傢伙一樣，將勞保服往身後一拋，而是將勞保服挂在槍口上，一步步向她走來。

他的眼睛始終停在她胸脯上那兩顆紅寶石之間，一眨不眨。

她已經忘了她那裸露的乳房。

離她兩步遠時，他站住了，將勞保服遞過去。

黑洞洞的槍口被勞保服遮著。

她開始疑惑不解，只是惶恐地盯著他。後來她終於明白，便伸手去接勞保服。

勞保服捧在胸前，遮住了他的視線。

“穿上！”他命令道。

她下意識地服從他的命令，將那又長又大的、浸透了男子漢臭味的勞保服穿上。在她穿衣時，那一對雪峰和那一對點綴在雪峰上的紅寶石，又毫無遮掩地暴露在他眼前。他的心又開始劇烈跳動，渾身又開始顫抖。

她却楞著，甚至忘了拉過衣服來，扣上扣子。她讓自己袒露著，任他將自己最美好的地方一絲一毫不遺漏地攝入他的眼中，攝入他的心中。

終於，他吼了一聲：“滾！”

她終於醒悟，將勞保服一裹，連跑帶滾，逃出了那一片窪地。

她跑了很遠，回過頭去，她看見他還站在那兒，楞著，呆著。

跳下一道土坎，她看不見他了，才停下來喘氣。那時，她聽見窪地裏響起“砰砰砰”三聲槍響。她爬上土坎，俯在草籠中。她看見他垂頭喪氣往那大樓走去。

她哭了。

後來有一次，她在人民大禮堂演出，跳得正起勁時，她突然發現他端端正正坐在場子裏。開始，她以為自己眼花。下場後躲在幕布後仔細看，果真是他，穿一件軍裝，戴一頂沒有紅五星的軍帽，還是像那天清晨一樣，板著臉。滿場都是她這一派的人，不知他是怎樣混進來的，真是膽大包天，孤膽闖虎穴啊！萬一誰點個“水”，他不被打死也要被打個半死。那被他打傷肩膀的傢伙說不定就坐在場子裏呢。

下一個節目出場，她發現自己的聲音也變了，脚步也亂了。兩束火辣辣的眼光，像兩束強烈的探照燈，使她心慌意亂。她不敢再往他看一眼。當眼睛不得不向他那個方向看時，她强迫自己

閉上眼睛。

再下一個節目她推說人不舒服，叫另外的人頂著，便溜出了後臺。她想溜走，却又忍不住，又鑽進場子裏。可是，那個座位已經空了，他已經走了。

她無精打采地走出大禮堂。

那以後，她再也沒有看見過他。她不知道他是哪個學校的，叫什麼名字。她想打聽，却又不知道向誰打聽。即使打聽到了，萬一讓那肩膀挨了一槍的傢伙知道，豈不要把他送進監獄嗎？於是，她只有死了心。

那件勞保服她一直保存著，直到現在。

附錄 G：一個亡命徒的故事

說明：這個故事我也寫過很多次，1994年4月改成現在這個樣子。這個故事也是我編造的，但裏面許多情節和細節也確有其事，讀者或許可以從本書中找到若干影子。

那年月，提起M的大名，那個地區的人沒有幾個不曉得的。不信，你到那個地區去找找，在那要垮不垮的舊房子牆壁上，在那骯髒不堪的官茅房糞坑上，說不定還能找到“抓住M匪，千刀萬剮！”“血債要用血來還，不除M匪心不甘！”之類的標語殘迹呢。

M出身好，成績在全年級數一數二，又聽老師的話，剛15歲就入了團，當上了團支部書記。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保皇派，不知挨過多少批鬥。後來造反派分成兩派打“內戰”，他便“逍遙”了。1967年7月底，重慶武鬥升級為戰爭，槍炮聲到處響起來的時候，也不曉得是那股水發了，他竟捲了進去。據說是幾個耍得好的同學硬把他從家裏拉走的。M個子不高，一把小，却聰明。打了兩仗，膽兒也整大了，槍法也練精了，竟被任命為排長。打到9月初，中央派了代表團來，談判成功，停火交槍，M便回學校去。哪知道對方一派留有短槍手榴彈，再加鋼針刺刀，把M這一派趕出學校。爭鬥中，M屁股上挨了兩刀，還是他同班同學捅的。M在醫院住了兩天，發誓在報復回來。

正好M這一派要成立“打狗隊”，要與對方一派打游擊，M憑他在“戰爭”中的英雄事迹和那排長官銜，便擠了進去，還當上一個不大不小的頭目。“打狗隊”先是配備匕首刺刀之類，後來又跑到專縣弄來駁殼、科爾特、手榴彈之類，戰鬥力日益加強。M膽大亡命，半夜三更潛回學校埋伏，抓住一個外出撒尿的傢伙，

正是那個給他屁股上留下兩個窟窿的同班同學。M 以牙還牙，也給那傢伙屁股上留下窟窿，只是多留了幾個。那傢伙嘴巴被爛草塞住，雙手被綁得死死的，哭也哭不出來，叫也叫不出來，在學校背後的墳包包堆裏難過了一夜。幸好那時候沒有野狗之類，否則更慘。

“打狗隊”神出鬼沒，幹起事來迅雷不及掩耳，今日闖進對方一派控制區，襲擊那滿街的大字報大批判專欄，寫上籬笆一樣的大字標語；明天又溜到對方武鬥據點樓前，“砰砰啪啪”一陣亂打，把那廣播打啞。那時候，聽說“打狗隊”來了，連又哭又鬧的三歲娃娃也要閉上嘴呢。

“打狗隊”打人，當然也有被人打的時候。受傷者不論，命除脫了的都有好幾條！M 命大福大，逢凶化吉，遇水有橋，一而再，再而三，次次都逃脫了槍子的追捕，回回都蒙得了死神的寬容。小凶小險且不論，只說三次大凶大險便可知。

第一次，M 一個人帶一支二號駁殼槍潛到對方一派控制區。運氣不佳，正遇到本校一夥崽兒出來貼大字報。那屁股上留有他那匕首印痕的同班同學一眼便認出他來，一聲大叫：“抓 M 匪！”大字報、漿糊桶、墨汁瓶一起往天上一拋，抽槍的抽槍，取刀的取刀，一起向他撲過來。他轉身就跑。跑過一條街，又跑過一條街，向側面一轉，鑽進一條小巷。沒想到這是一條死巷，左一拐，右一拐，迎面一道兩三丈高的堡坎便把巷子堵死。M 心中喊聲不好，略一猶豫，只好閃進一幢樓房。

他提著槍，上了一樓上二樓，三樓上了上閣樓。那房子太老，樓梯吱嘎吱嘎要垮不垮的，叫人提心吊膽。閣樓也有人住。推開門，有一個女生躺在床上。那女生駭得跳起來，急忙拉過毯子來把自己赤裸的身子遮住。M 插上槍，對那女生說：“有人追我，救我一命吧！”那女生鎮靜下來，細細打量他，眉毛向上一挑，問：“你是 M ？”M 一怔，下意識去扯槍。那女生笑笑，說：“不要怕。你忘了？那一回，我被蛇咬了，是你背我到醫院的。”M 這才想起來，這女生是高中的。那年下鄉去支援農忙勞動，一個人爬到坡上去扯野香蔥，被蛇咬了，哇啦哇啦亂叫喚。他正好路過，聽

見叫喚，把她背到山下的大隊醫務室。那時，他還不懂男女之事，只覺得她俯在他背上，那嘴裏的熱氣直往他脖子裏灌。

正說話間，樓梯咚咚響起來。那女生把他推到床脚去，用東西遮住。然後披上衣服，紮上皮帶，插上一支小手槍，迎出門去。M 伏在床脚，頭也抬不起，大氣不敢出，有屁不敢放，攥著那張開機頭的駁殼槍，一身都汗濕。那尿罐夜壺裏溢出來的氨水的羊騷味，幾乎把他悶死。他聽見，那女生和追兵在說話，還笑，還要那些追兵進屋裏來坐。幸好追兵沒有進屋裏來，又咚咚咚下樓去了。那女生把 M 叫出來，M 還恍惚如夢中。

那女生是對方一派的頭，却已經厭倦了這殺來殺去的爭鬥。她勸 M 不要再當“打狗隊”了，死了傷了為哪樁？她甚至叫 M 和她一起離開重慶，全國到處去走一走。兩派的介紹信都帶上，走到哪兒也吃香。她心中的那份意思，M 當然不懂，可她救了自己一命，只好點頭答應著。捱到天黑，那女生親自把他送到大街上，含情脉脉和他做再見。M 回到駐地，飽飽睡了一覺，便把那女生的話忘得一乾二淨。

第二次，“打狗隊”到專縣去中了埋伏。那實際上是一場誤會，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汽車在山區公路上急馳，拐了一個彎，鑽進一條溝。突然，前面響起槍聲，掃過來一排子彈。那時，M 正俯在車頭的機槍下。他只感覺到頭好像被木棒狠狠敲了一下，便倒在車廂裏不省人事了。車上的人拼命還擊，當場便被對方打死打傷兩三個。那伏擊的人終於發現是一場誤會，害怕重慶的兄弟夥來報復，便急匆匆溜走。後來不管怎麼查，都沒查出個所以然來，“打狗隊”吃了一回暗虧。M 被送進醫院，那時他早已蘇醒，醫生給他檢查傷口，頓時驚呆。你知道那有好玄，有好險？那子彈從他頭頂上擦過，剛好在他頭皮上留下一條淺淺的印痕。那子彈哪怕是再下來一絲一毫，M 也休想再喊叫一聲了！M 自己還無所謂，醫生却連連感嘆他命大福大，至今與人說起，也還搖腦殼呢。

第三次，他回家去，被人跟了綫。他剛坐下，就衝進來一夥夥人。他從樓上跳下去，搶了一輛自行車，蹬起就跑。那夥夥人是死了心要抓他的，跟在後面追，他舉起駁殼槍，向後連開數槍，

也沒有把那夥夥人駁回去。偏偏迎面開來一輛大卡車，把他撞到路邊的水溝裏，仰面八叉地躺著，槍也不知丟到哪兒去了。那夥夥人一擁而上，他被抓住。

這一次看來是跑不脫了，不被槍斃，也要被打斷脊梁，下幾個“零件”。他的確被打得够慘。別的不說，只說坐“土飛機”。操場上，四個彪形大漢一人提著他的一隻手脚，喊聲“1——2——3！”往上一拋，然後手一鬆，他便扎扎实實摔在水泥地上，就像砸夯墩一樣。一個兩個，他盡力把頭往上抬，儘量讓屁股去觸地；三個四個，那骨頭便像散了架；五個六個，終於昏死過去。然後又被弄醒，蒙上眼，去鑽“工事”。喊：“伏倒！”其實什麼也沒有。剛把頭抬起來，“砰！”碰在桌子上，眼冒金花。左彎右拐，上上下下，把任何人的腦殼都要攪亂。最後，五花大綁，丟在屋角，還有兩個端半自動步槍的人看守。他被折磨了大半天，乾渴難忍，便求給一碗水喝。那看守媽的娘的罵，罵够了，才遞過來大半碗。待他喝完，才給他講，那是陰溝裏的污水。他一噁心，又哇哇吐，差點兒把腸肝五臟都吐出來。

聽說戰友被抓，“打狗隊”隊長匆匆忙忙去找本派的第一號頭頭。那當司令的聽完，當即同意用前兩天抓住的對方的一個大頭目去換M。于是，廣播站廣播聲明。于是，雙方進行艱苦的談判。于是，M又逃過一劫，凱旋而歸。歸來之時，“打狗隊”為他放了一路鞭炮，撒了一路彩紙花。

不過，這一次M的確被駁軟了。放他之前，把他拉到操場上，蒙上眼搞了一次假槍斃。“砰！砰！砰！”子彈射上天，他却雙脚一軟，癱在地上。然後又被硬拉著手指，在那“認罪書”上按手印。回到“打狗隊”，他一直有點神魂顛倒。別人給他放鞭炮，他以為死了人，連喊：“莫放！莫放！”戰友們不理他，他竟忍不住發抖。

那當司令的親自到“打狗隊”來，為M設宴慶祝，握手照相，授毛主席紀念章一枚（據說是江青同志所贈送），贈紅寶書一套，外加軍裝軍褲軍帽和一支日本王八盒子槍作獎賞。他的那支二號駁殼槍已經成了別人的戰利品，那可是一支好槍！M總有些恍惚，宴席未完，他便躺下，呼啦呼的，睡了一天一夜。

醒過來，又是紅日高照艷陽天，M 恢復正常，免不了自吹自擂：該死鷄兒朝天，不該死鷄兒朝地，本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云云。

不過，那以後他多少學精靈了，孤膽英雄不再當，衝鋒打仗看兆頭，眼睛不再哈呼呼，手脚反而更靈活。有一天，M 甚至偷偷溜到那死巷子盡頭的樓房裏，去找那救過他一命的高中女生。可惜，那女生已經與別人一起，周游全國去了。他覺得好遺憾。

好在武鬥沒能繼續下去，幾經談判，幾經破裂，終於達到協議，馬上就要成立革命委員會，“打狗隊”不能不解散，槍不能不交。M 和戰友們“殺”回學校“復課鬧革命”。學校進駐了解放軍和工宣隊。長槍已交，短槍也不敢再露面。解放軍和工宣隊貼出“布告”，交槍最後時限就在那天下午。上午，M 約了幾個要好的同學，包括兩個女生，一起到後山去把那最後幾夾子彈打靶打掉。半路上，碰上高中那女生。M 和她還打了招呼。幾個同學都過了槍癮，興奮異常。只有一個女生膽小，不敢打。M 把她摟住，幾乎是強迫，終於也讓她打了三槍。只留下一顆子彈，交槍時好有個交待。

中午，回到學校，那膽小的女生把飯給他打來。食堂早已打得稀爛，且髒，都在操場上吃飯。M 端著碗，蹲下，正準備往嘴裏刨那香噴噴的大米飯，那反插在腰上的王八盒子突然落下，掉在地上——“砰！”槍響了，那最後一顆子彈從他腹下射進，從他背上飛出。他倒下了，一滴血也沒有流。槍眼向外翻著，紅不紅白不白的，像罐頭裏的紅燒肉，鼓起一坨，很叫人噁心。

怪只怪他粗心！

怪只怪日本產的王八盒子槍太孬！

M 死得不是時候。學校成立革命委員會，豈能讓死人來干擾，第二天便把他送進火葬場，連追悼會也沒有開。除了那兩個跟他學打槍的女生，似乎也沒有人哭泣。不過，那救過他一命的高中女生直到現在都還為他籲噓感嘆。

附錄 H：謝華俊傳奇

說明：這篇小說寫于 1993 年，刊載于 1993 年 12 月 16 日《重慶日報》副刊。

謝生華俊，吾同窗友。少時即有成才相。作文曰：“長大後當作家。”正值極左年代，難逃厄運。讀至中學，即挨批鬥。“文革”始，即造反，為紅衛兵團之頭領。出生人死，不一而足，然作家夢未曾泯滅。後下鄉務農，油燈下苦讀，朝霞裏默思，形象思維能力大增。時有一女生姓王名惠，亦好文學。二人交，常海闊天空。或野霍充饑，或山泉解渴，或登山放歌，或入林嬉戲。後王惠招工返城。是夜，與謝生抱哭，山盟海誓。數年去，謝生仍來返城，遂與王惠絕。

後謝生頂替其父，于輪船公司駁船上謀水手職。三十歲時，娶一鄉下女子為妻。駁船終年在外，或泊小鎮數月，無聊之極，重萌作家夢。將其身世撰一長篇小說，苦寫十年，數易其稿。送出版社，却需包銷萬冊，交預訂金三萬元。謝生頹然，默默而出，幾被一出租車撞翻。手中書稿飄然亂飛，灑一地。司機罵曰：“找死乎？”方醒豁，急退。然又撲之車前，拾其書稿。乘車人乃王惠也，竟認出謝生，遂下車。近二十年未遇，一時默然，心跳如鼓。惠邀其入咖啡店，久坐無語。謝生自慚形穢，遂告辭。惠將書稿扣下，約數日後見。

謝生返船即蒙頭大睡。二更即醒，不能再睡，乃步出艙外。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賦詩曰：“水流廿載恨難銷，夢裏相逢月正高。莫說醒時人惆悵，腮香猶在舌尖飄。”吟畢，情緒方定。思前想後，哀嘆三聲，乃決定與王惠絕。

數日後，謝生著工作服勞保鞋，與惠聚于咖啡店。惠略施脂粉，著裙裝高鞋，早已坐待。見謝生，招手呼之，滿座皆斜目視之。謝生若芒刺在背，乃環顧天花板，作冷漠狀。惠曰：“此書好，令我流泪幾夜也！”謝生不語，復寂然。惠難捱，邀去電影院。謝生曰：“不去。”復邀跳舞，曰：“不會。”惠笑曰：“爾何苦板冷面孔？吾乃熱泪流也！”謝生曰：“君系富裕階層，吾乃貧寒之土，豈可同日而語？”惠啞然。有頃，低泣。謝生欲掩飾，竟冷笑數聲。惠遂獨去也。

謝生追至路邊，攔一出租車，將惠拉人車中。惠大哭。謝生手足無措。駛回碼頭，惠方止，眼已紅腫。是夜，江流滔滔，燈光輝映，惠宿于船上。

待天明，惠曰：“等吾數月，吾定找三萬元，為君出書。”謝生笑曰：“偷汝丈夫麼？”曰：“君休問。請將書稿送出版社，吾不食言也。”遂上岸，戀戀而去。謝生日送其背影隱于人群，悵然若失。

越明日，謝生即去出版社送稿。返船後即上船遠航，三月後方返。一日，電報至：“款已匯出版社三日後到渝接惠”。謝生倒抽冷氣。看電報，乃海南來也。屈指三月，竟有三萬收入，乃疑。倘佯街頭，小販正呼：“看海南高級妓女！看海南性病黃潮！”略有所悟，憤然，返船蒙頭大睡也。

三日後，惠自海南返。火車進站時，竟無半文。站臺內外尋覓近一小時，不見謝生。拖疲憊之身去碼頭。謝生獨坐船頭吹簫，如泣如訴。惠責之：“汝自逍遙，豈知吾將餓死乎？”謝生曰：“與吾何于？”惠憤然曰：“吾為汝下地獄數月，汝竟如此！”謝生冷笑曰：“吾不需汝之錢也。汝醫病去罷！”惠曰：“吾何病？”曰：“誰知？”遂大吵。惠復默然，痛哭。謝生復取洞簫，然曲不成調，乃擲之，返艙蒙頭睡也。惠幾時離船竟不知也。

自此謝生心灰意懶，終日惶惶。遂回鄉下探親。是夜，獨飲白酒兩瓶，醉翻在地，送入醫院，七日七夜方醒。待出院時，已骨瘦如柴，鬚髮皆白，風吹即踉蹌也。有頑童數人尾之，曰：“瘋老頭，喝悶酒。醉倒地，爬起走。送醫院，打屁股。哎喲喲，像

條狗。”謝生回目視之，頑童急逃。謝生潸然泪下。

鄉下休養近一年，謝生方返船。某日上街，見書攤前有多人圍觀，遂趨前觀之。攤主遞一書曰：“此才出版之新書，寫‘文革’，寫武鬥，寫知青，絕也。”乃觀其名，竟是《血賦》。又觀其作者名，赫然三字：謝華俊。一時頭腦空白，呆若木鴉。半晌，兩行熱淚溢出，乃擲一“大團結”（十元鈔）與攤主，抱書急奔返船，放聲大哭半日餘。師傅以為其瘋也，竟報公司領導。越明日，謝生尋公司領導，申請病退。領導准之。三日內即辦畢手續回到鄉下。守茅屋一間，田半畝，了却殘生。一日，夢惠至。醒時正秋雨潺潺，鷄鳴聲聲。乃賦詩曰：“簾外秋愁雨蹉跎，稀疏往事影婆娑。莫言怨恨長如水，難抵真情愛更多。”吟罷，熱淚長流，濕透枕席。

後記

寫完本書，有兩個問題一直在我頭腦中縈繞，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答案：一是文革真的能够避免嗎？二是文革還有沒有正面意義？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網上搜索，可以發現有好多種答案，有的人認為不可避免，有的人認為可以避免。不管是持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說法的人，幾乎都把原因歸結到執政黨，甚至歸結到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持可以避免說法的，以鄧小平和陳雲為代表。他們認為，文革之所以發生，就因為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實行家長制。按鄧小平說法，只要從制度方面解決一些問題，例如只要解決了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只要解決了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之類，就可以避免。按陳雲的說法，只要在黨內實行了民主，讓毛澤東的權力受到約束，堅持黨內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就可以避免。持不可以避免說法的，大多也是從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執政理念、執政方式、歷史經驗等方面來進行分析的，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就是劉邦、朱元璋那樣的人，文革就是殺功臣，或者文革就是權力鬥爭，而權力鬥爭對政治家來說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至今也要擁護文革的人，也認為文革是不可以避免的。他們認為，文革全面發生的時候，社會已經面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尖銳的矛盾衝突。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文革不可避免。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是把如今尖銳的社會矛盾投射到了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因此他們甚至呼籲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他們還沒有走出文革的泥沼，但其謬誤却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論。我們只說前面兩種觀點。

的確，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他的個人特性，例如他的政治思想、浪漫情懷、個人秉賦、極端權慾等等，對文革的發生以及文革的走向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我認為，即使沒有毛澤東，文革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景象，但依然還是要發生的。

據說，世界上上百種的古文化或者消亡了，或者退場了，只有中華文化從古代走到現代，幾千年來延綿不絕。這當然是中國人的驕傲，但也讓中國人背上了沉重的文化負擔。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這樣的文化負擔總是要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表現出來。直到現在，人們往往還只是從民間或只是從普通老百姓身上來分析這樣的表現，其實，這樣的表現在那些政治人物，包括那些所謂的偉人身上可能更突出，引發的後果可能更嚴重。

對中國 20 世紀歷史發展進程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四人了，人們也願意稱他們為偉人。但是，如果認真分析就會發現，他們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懷、個人秉賦、極端權慾等等，幾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他們的一些言論，他們的主要行為，甚至他們的行為方式，也幾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與毛澤東的大躍進，蔣介石的新黨計劃與毛澤東的“踢開黨委鬧革命”，鄧小平的“垂簾聽政”與毛澤東的“退居二線”，豈不是完全相同？至于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與毛澤東帶兵上井岡山，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與毛澤東的反右鬥爭，鄧小平搞的“六四”事件與毛澤東搞的“四五”事件（不再過多舉例），雖然其原因、過程、形式、結果、影響等方面都有許多的不同，但如果你認真分析一下，其出發點、其動機、甚至其手法又何其相似乃爾！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如果孫中山能够完全掌權，如果他還能多活幾十年，他搞不搞大躍進，搞不搞文革，真還說不清楚呢。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只能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不能隨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所有的傳統都會“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這些偉人，雖然政治思想不一定相同，但都是在中國這樣的文化背景中成長起來的，都生活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文化土壤之

中，而且都面臨著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大課題。他們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懷、個人秉賦、極端權慾等等，不可能不打上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他們更不可能脫離既定的歷史條件，去創造他們想要創造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來說，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可能就是他的隨心所欲，至少不可能全是他的隨心所欲。我們當年參與文革，參與武鬥，參與戰爭，也不是隨心所欲，而是有著歷史的、文化的、傳統的深刻原因。因此，如果我們把文革放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中來認識，我認為，文革很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說，文革很可能就是一個必經的歷史過程。

我們來說兩個假設：

假設一：如果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去世，文革由劉少奇來主導，文革會怎樣？現在已經揭露出來的事實已經不容分辯地說明，劉少奇將把文革變成第二次反右。如果是那樣，雖然其形式和某些內容以及其規模、持續時間、深入程度和後果可能都有所不同，但對中國現代化的阻礙作用，可以肯定地說，并沒有多少區別。在那十年裏，經濟可能得到一定的發展，但對以民主、自由和法治為標志的現代化進程來說，其阻礙作用可能是依然相同的，至少也是相似的。況且，劉少奇還有所謂的“馴服工具論”，連共產黨員都只能做“馴服工具”，不得有非分要求，何況一般老百姓呢？

假設二：如果林彪的耐心和隱忍再加強一點，能够等到毛澤東去世，文革又會怎樣？按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的安排，毛澤東造成的那種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可能停下來，整個社會可能“克己復禮”，但是中國很可能就被他們引到當年日本走過的那種軍國主義道路上去了，中國人很可能陷入法西斯專政之中。事實上，當年的軍管會在地方、在企業中實施的就是那一套，他們的一句話就成為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也無法違抗。如果那樣，中國就更加背離了現代化進程。按林彪的“復禮”，人被分為不同的等級，人人都要壓抑自己的慾望，那還談什麼民主、自由，還說什麼法治！

我們往往都愛做“事後諸葛亮”。文革一結束，幾乎所有的人都標榜自己是受害者，都標榜自己很早就開始反對文革了。特別是那些當權者，包括那些早就“結合”到“新生紅色政權”裏的當權者，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純粹的受害者，找當年衝擊過他們的群衆算賬（且不用反攻倒算這樣過分強烈的字眼）。他們的確受過衝擊，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阻礙，甚至大大超過那些曾經衝擊過他們的人。特別是那些很早就被“解放”的領導幹部，文革十年，可能受了兩年衝擊，却在後面八年實際上領導著操縱著文革，所做的壞事可能更多更壞。他們本來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更讓人莫名其妙。我不是“錯誤言論人人有份”的擁護者，但除了極少數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之外，我敢說，沒有幾個人敢于拍著胸膛說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無辜的。相反，像我這樣自以為“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自覺地、主動地、積極地投入其中的，并不在少數。即使是那些逍遙派，也僅僅只是外在表現不同而已，其內心和我也差不多吧？因為我們都背負著傳統文化的包袱，都脫離不了既定的歷史條件，不可能隨心所欲，也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

因此，反思文革，不能只責怪毛澤東一個人，也不能只打倒林彪、四人幫，更不能只批判所謂的造反派，還應當從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甚至人類學的多個側面去研究，去分析，才能真正治本，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來一次”。

再說第二個問題。其實，文革有沒有正面意義這個問題，其基本含義就是，沒有文革，會不會有改革開放。我們且不從政治、經濟、社會等角度去分析，只說說文革對老百姓民主意識發展的作用。

如今，一些人竭力美化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其實，那十七年裏，雖然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社會有了一定的進步，而且諸如“當家作主”、“人民政府”、“群衆路線”之類說教，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從來只能生活在強權下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從整體來看，不管是社會的民主程度還是人們的民主意識，依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隨著政治權力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日益深入，

加上諸如反右之類政治運動，反而強化了人們的奴化意識。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大躍進後餓死三千萬人，除了極少數人向中央反映情況之外，除了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之外，整個國家竟然沒有任何反應，甚至極少有人出去討飯、出去逃荒！雖然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搞清楚像反右、大躍進那樣一些政治運動的來龍去脉，但是，總是上面怎麼說，下面就怎麼做，或者當權者怎麼說，被管理者就怎麼做，極少有人反思，更極少有人真正反對（哪怕只是在心裏的反對）。甚至那些被整的人中，也有相當大一部分“謝主隆恩”，認為自己有罪。

1968年初，全國已經陷入全面內戰的深淵，毛澤東却說：“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衆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衆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麼廣泛，這麼深入。”不管如今的人們對這段話如何理解，但文革的確是把中國人都發動起來了，都動員起來了。雖然幾乎全體中國人都曾因此而受過苦、受過難，但却從一定的角度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至少讓中國人認識到，當官的也可以被打倒，權威也可以被懷疑。文革期間，甚至形成了一股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思潮。

從理論上來分析，從社會實踐角度來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思潮當然不好。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社會思潮，如果中國人還一直處在“謝主隆恩”的狀態中，要搞改革開放，要出現安徽鳳陽小崗生產隊那樣分田到戶的事件，要涌現諸如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人物，肯定是不大可能的。更不要說，沒有文革中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思潮，沒有文革對中國人的切身教育，沒有20世紀80年代對文革的那種反思，中國能够出現天安門事件，能夠出現如今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沒有文革，就沒有今天我們對民主、對自由、對法治，也就是對現代化的認識，甚至也不可能有這樣強烈的嚮往！從歷史角度來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思潮，雖然有點矯枉過正，但對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却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

我們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現代化並不完全等於高樓大廈，

也不完全等於 GDP 世界第一第二之類，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不認可普世價值，沒有民主法治，沒有馬克思所說那種人的完全解放，也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中華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畢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歷史的包袱越重，這個過程也就越長越艱難。在這個已經超過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過程中，文革十年可能更加具有特殊的教育價值。可以說，是文革教育了整個中華民族，是那十年的災難喚醒了整個民族，讓我們懂得了反思，讓我們認識了民主，認識了法治。不過，由於當局始終壓抑我們對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育作用實際上還沒有真正得到釋放。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唱紅打黑”之類模仿文革的做法，才有了那麼多呼籲文革“再來一次”的雜音。但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雖然有這樣那樣形式的倒行逆施，雖然中國向現代化的轉型還會遇到一個又一個難題和一個又一個阻礙，但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妄圖讓文革“再來一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薄熙來的垮臺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我們一直在批評日本不正視歷史。用外交部發言人的話來說，不正視歷史，就不可能開闢未來。其實，不僅僅國際關係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正視歷史，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歷史的包袱就會壓在我們身上，就會拉扯我們的後腳，就會阻礙我們去開闢未來。在這方面，我們是向二戰後的德國那樣，認識錯誤，徹底反思，採取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各種措施，堅決予以否定，防止其重演呢，還是像日本那樣，躲躲閃閃，否認歷史，歪曲歷史，以不搞所謂的“自虐史學”為藉口，幻想著“再來一次”呢？戰後，日本一直或明或暗否定自己的侵略行為，雖然在一定時期內這樣做也沒有阻礙其經濟發展，但是最近這二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是不是歷史問題在對他們進行懲罰呢？而且，這種懲罰是不是還將持續，甚至還將改頭換面，還將加重呢？我們的經濟也在迅猛發展，但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會不會像一個定時炸彈，在某一天突然爆炸，讓我們措手不及，不僅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而且還會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動蕩，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害呢？

不過，我是一個歷史的樂觀主義者。我相信，歷史總是要向前發展的。文革十年讓中華民族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這樣的代價是不可能白白付出的。早遲總會有那麼一天，通過對文革進行徹底的清算，通過對文革進行深入的反思，中華民族就會向前大大地邁進一步，中華文化也將洗刷自身的那些污點，真正走向現代化。當我們的後人用百年千年的尺度來看這段歷史時，他們或許會說，文革那十年，文革後對文革反思壓抑的那幾十年，可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過程，中華民族終於還是走向了現代化，中華文化終於還是走到了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如果說文革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歷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那麼這樣一個過程也自有其歷史價值。如今的問題在於，為了防止文革“再來一次”，為了中華文化更好地更快地完成現代化的轉型，我們應當怎樣更充分地利用文革的這種歷史價值。

首先當然是加強對文革的研究和反思了。作為文革的一名參與者，一個過來人，為文革留下一點記憶，留下一點多少可以供後人研究文革、反思文革的參考材料，應當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得知我在寫作本書，有朋友說現在還不是寫的時候。的確，當局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區，不許說，不許寫，不許研究，更不許出版，本書寫出來很可能依然只能放在抽屜裏，說不定還可能引來諸多麻煩。但是我想，參與過文革戰爭的那一代人，包括像我這樣當年還沒有真正成年的人，如今都已經年過花甲，時日不多，精力漸枯，繼續等待的本錢並不太多，還是早點完成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好吧。

1994年，我寫了十萬字的《重慶武鬥瑣記》，但却沒有地方發表，只好放在抽屜中，讓書稿睡覺。薄熙來事件後，我想，不能再讓其睡覺了，就找了出來，換了一個寫法，重新寫成本書。為了供歷史作檔案，供武鬥參與者們反思那沉痛的教訓，我力求儘量真實地反映武鬥的本來面目。但是，當年處在極度的混亂中，兩派都愛誇大其辭，瞎編偽造，甚至公開造謠。我只能保證自己經歷的事是真實的，而難以保證當年從大字報、傳單、小報、參與者自述等等渠道獲得的記憶的真實性。即使是我自己親歷的，

也可能由於時間久遠和遮蔽性記憶等原因，難免有失真之處。作為一部原生態的回憶錄，本書可能在內容、結構、語言、文字上都存在不少問題。因此，我真誠希望讀者和有關專家給予批評指正。

既然要真實地寫，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當事者，這就很可能給某些當事者帶去某種風險。為了不給當事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個別當事者我只好隱去其真實姓名，采用了一些變通方法。即使如此，局內人或明眼人一看，也立即能够知道這些隱去真實姓名的人是誰，更不用說其本人了。但這也可能產生兩種後果，一是讓涉及的當事人不快，二是讓讀者感到困惑，并有可能因此懷疑本書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在寫作過程中，我因此而一直猶豫不決，思前想後，在現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只好保持這種變通方法。因此，我一要請本書涉及到的不管是用了真實姓名的還是沒用真實姓名的老戰友、老朋友、老同學鑒諒，二要請讀者鑒諒我的這種變通。

此外，我還將若干年前寫的一些有關武鬥的故事、小說之類文章作為附錄或作為本書的一個章節，也呈現給讀者。從這些文章中，讀者可以多少看到我思想發展變化的軌迹。

早在十多年前，何蜀先生就鼓勵我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并且給我出了不少主意。如果不是他和其他幾位朋友的鼓勵和支持，本書肯定難以出籠。在此，我要對他們表示謝意。

作 者

2012年10月10日初稿畢

2014年1月30日第七次修改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6350-3-7



9 789881 635037

ISBN 978-988-16350-3-7

定價：HK\$ 75 元